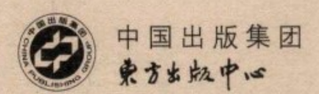



# 尼日利亚史

托因·法洛拉 著　沐涛 译



# The History of Nigeria



The History of Nigeria



ISBN 978-7-5473-0107-4

9 787547 301074 >

定价：28.00元

# 第一章　尼日利亚概况

1

尼日利亚作为一个现代政治主体是由英国在1914年建立的，而作为欧洲人在非洲统治区域的一部分，则开始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然而，这里的诸多民族却有悠久的历史，一些地方的人类栖居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以前。除了联邦首都阿布贾外，全国设有36个行政州。许多年来，拉各斯一直是联邦首都，直到1991年政府搬迁到内陆城市阿布贾。拉各斯现在仍然是外交、媒体、商业和金融活动的中心。军队在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倒不是因为它的战斗力，而是因为它消耗资源和妨碍民主政治发展的能力。武装部队人员保持在78 000名左右，其中陆军62 000名，空军10 000名，海军6 000名。法律体系建立在习惯法、伊斯兰法和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之上。

## 地理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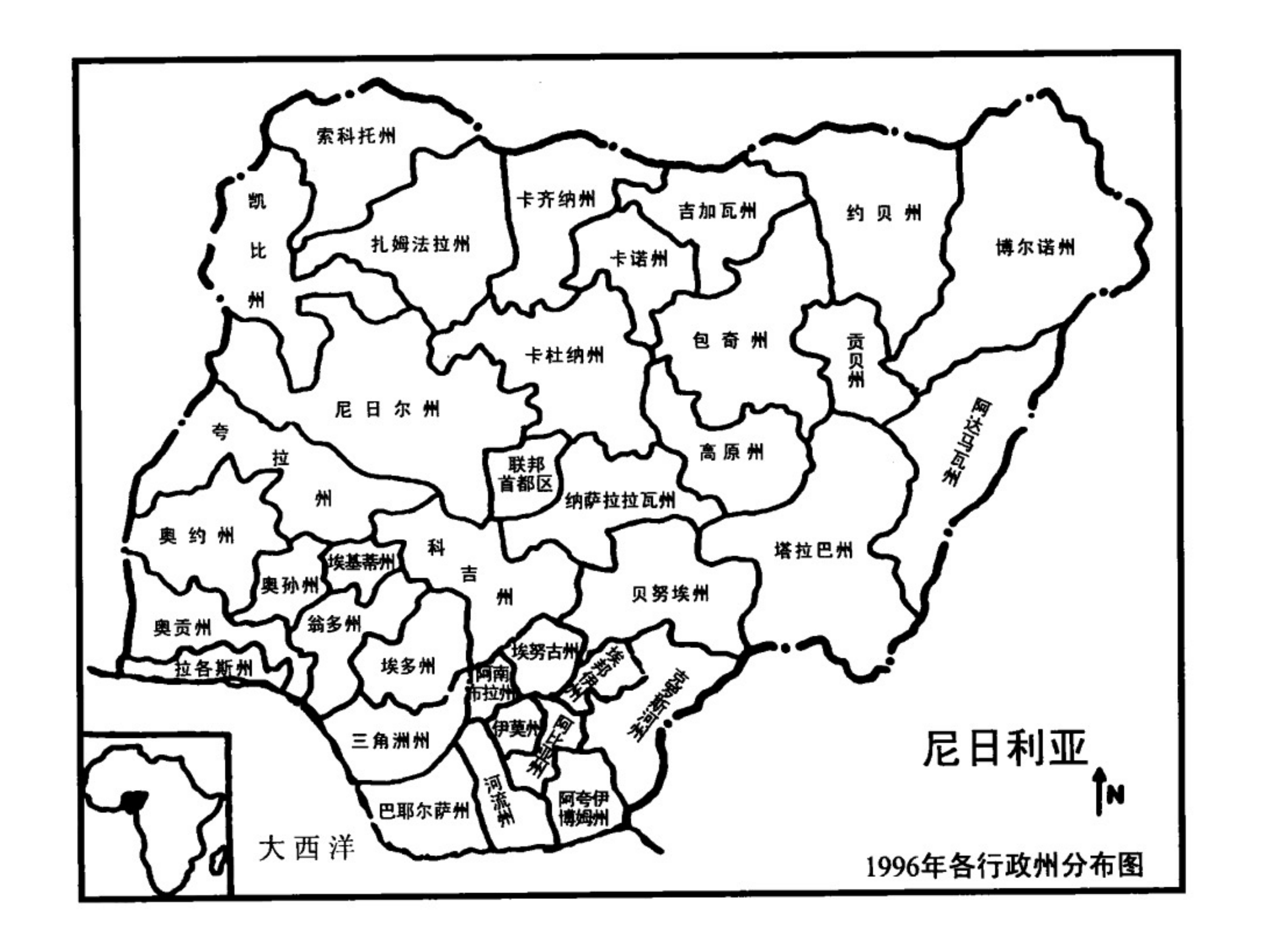
尼日利亚是一个濒临大西洋、占地336 669平方英里的大国，面积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2倍，英国的3倍。国土从东到西绵延约700英里，从南到北约有650英里。国家大致位于东经3°到15°，北纬4°到14°之间。尼日利亚西邻贝宁和多哥，东接喀麦隆，北接尼日尔和乍得，南边以贝宁湾和比夫拉湾为界。尽管与邻国的关系总体上相处融洽，

但它与喀麦隆在巴卡西半岛(Bakassi Peninsula)问题上仍长期存在边界纠纷。

地理和气候分布包括：从沿海沼泽地的红树林和热带雨林，到北部的萨赫勒大草原和半荒漠地。存在两个明显的季节：雨季和旱季。在南方，雨季从5月延续到10月，北方从5月持续到9月。降雨量从南到北逐渐减少，气温总体较高。旱季有一股来自东北的干燥的冷风，被称为“哈马丹风”(harmattan)，1月份在北方这种风刮得最厉害。最热的月份是3月和4月，最湿的是5月、6月和10月。

当地有两种植被：森林和热带稀树草原。前者位于南部，那里有茂密的热带雨林，而后者在最北边。尽管东部有些地区遭到侵蚀，北方受到沙漠扩张的威胁，沃土仍然很多。生活在热带草原上的人受到北非和中东地区文化的影响，而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则比其他地区更早地受到欧洲人的影响。居住方式和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植被的影响。在沿海地区，包括许多小海湾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捕鱼和农耕文化在伊乔和卡拉巴里等部落中得到发展，他们用盐和鱼与邻近部落做交易。由于缺少成片的、干燥的陆地，沿海地区的定居点普遍较小。居住在森林地区的约鲁巴人、伊格博人、埃多人和伊比比奥人主要务农，种植根茎类农作物。各邦大小不一，包括前殖民时代两个最著名的王国——奥约和贝宁。在热带草原地区，畜牧业和农业(尤其是谷物种植)混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经济。豪萨城邦和卡奈姆-博尔努帝国的出现，要归功于发达的农业、国王的强权和高度发展的商业贸易，以及骑兵带来的流动快捷。携带锥虫病的萃萃蝇给牲畜带来致命影响。在萃萃蝇普遍存在的地方，如雨林地区，牲畜和马很难存活。不同地区间的交往很普遍，包括在各种不同经济区间互通有无的长途贸易。

非洲的第三大河——尼日尔河在尼日利亚境内奔腾730英里。在洛科贾，主要支流贝努埃河汇入尼日尔河，并继续向南流向三角洲，直接注入大西洋。尼日尔河其他重要的支流有索科托河、卡杜纳河和


尼日利亚
1996年各行政州分布图
N
大西洋
博尔诺州
阿达马瓦州
约贝州
贡贝州
塔拉巴州
吉加瓦州
包奇州
高原州
卡诺州
卡齐纳州
卡杜纳州
纳萨拉瓦州
贝努埃州
联邦首都区
索科托州
扎姆法拉州
凯比州
尼日尔州
夸拉州
科吉州
奥约州
奥孙州
埃基蒂州
翁多州
奥贡州
拉各斯州
埃多州
三角洲州
巴耶尔萨州
河流州
阿夸伊博姆州
伊莫州
阿南布拉州
埃努古州

阿南布拉(Anambra)河,而贝努埃河的支流主要有栋加(Donga)河、卡齐纳阿拉(Katsina Ala)河和贡戈拉(Gongola)河。这些河流都是交通要道,尤其在雨季,带动了许多居民点沿河而建。近年来,河上还修建了一些大坝以供水和发电。

尼日利亚位于富矿带,中部地带盛产花岗岩,还有丰富的锡矿、铀矿和铌铁矿。其他矿产也很丰富,有煤、金、铝、铁、盐、铜和锌。这些矿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发挥作用,特别是铁,它推动了农业社会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丰富的矿产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在英国统治时期,发生了一场矿业革命,当时全境铁路网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开发矿产资源的需要。在乔斯和埃努古等地,采矿业推动了经济的多样化和城镇化。

4

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的人口已超过了1亿,并继续保持年均2.83%的增长率。非洲人口有1/4生活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人自诩为“非洲巨人”,毫无疑问,这与其人口、面积和资源有关。尼日利亚主要有3个人口聚居区:北部的卡诺地区,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100人;西南部的约鲁巴地区是每平方英里140人;东南部的伊格博地区是每平方英里150人。平均年龄为17岁的年轻人占人口比例很高,他们的流动性大,如果在国内找不到发展机会,就设法移民国外。14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的44.9%,而65岁以上的老人只占到3.3%。

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包括撒哈拉沙漠的扩张、土壤的盐碱化、城市的贫民窟、石油污染、来自欧洲的有毒垃圾在沿海地区的非法倾倒等。对热带草原上的树木肆意砍伐导致了土壤的盐碱化,而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沙漠化。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尼日利亚在20世纪中森林面积缩减了90%,且每年仍将失去35万公顷的树木[1]。另一项报告预测,撒哈拉沙漠每年要向前推进2－3英里,将

[1] Ma Xiufang, "Roundup: Africa in Battle with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Xinhua News Agency*, Neirobi, June 28, 1993.

导致农业收成和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干旱。国家已启动了许多造林项目，不过这些项目之间缺少协调，成功者寥寥。在 1974 － 1976 年间，尼日利亚建立了 200 多英里的防护带，在 1981 年还发动了一场植树运动。另外世界银行资助了多达 35 个造林项目，以阻止进一步的盐碱化和土壤肥力的丧失，增加作物和作物秸秆产量。而对柴火和家畜饲料的需求是这些项目实施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 政府

宪法规定，尼日利亚实行由总统领导的联邦行政制度、立法和司法体系独立。然而，民主还未降临到尼日利亚人身上。

除了个别年份外（1960 － 1965 年；1979 － 1981 年），军人从 1960 年起就一直掌控政权。在政变和反政变、缺少责任心和反民主倾向的氛围中，军人统治是灾难性的。民族内部及各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包括1967 － 1970年间带来深重灾难的内战，成为体制性的痼疾；各个层级的掌权者都贪污腐败，独断专行。民族政治具有分裂性和危险性。豪萨人、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这 3 个主要民族靠着人多势众，使政治为本民族牟利。1945 年之后，以民族为基础的政党相继成立；他们相互争权夺利，要求按民族分裂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并引发了国家是否要采用沙里亚法[①]还是继续使用世俗法律的争论。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宪法能够长久沿用，而军人又顽固地拒绝真正不再干预政事。国家依然保持统一，但未必是出于各个民族的共同愿望，而是由于武力的强制。1990 年，一群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军人发动了一场暴力政变，他们决定将北方的 5 个州从国家中排除出去，许诺在谈判的基础上重新接纳它们；他们谴责北方的政治阶层实行“尼日利亚国家内部的殖民行为”。从 1992 年起，约鲁巴人威胁要退出联邦，而其他民族则继续呼吁召开一次国民大会来讨论国家的未来。

5

① Sharia，阿拉伯语，意为“安拉指引的道路”，沙里亚法即伊斯兰教法。——译者注

## 社会和文化体制

尽管大部分人住在农村，城市化在整个 20 世纪还是快速发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部分是因为粮食种植业的衰落。现在，农村与城市的人口比率是 5.25∶1，其中 36%的人口住在 358 个城镇中。由于缺少现代交通工具、娱乐和休闲设施，除了种田外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村民们发现让自家的年轻人留下来很难。一群上了年纪的人靠传统的农具(锄头和大砍刀)，不情愿地从事着农业生产。

尼日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 200 多个族群，说着 250 多种语言。英语是官方语言，同时广泛使用的本地语言还有豪萨语、伊格博语、约鲁巴语、埃多语、伊多马语、福尔福尔德语、伊比比奥语和艾菲克语等。说豪萨语的人约占人口的 21%，说约鲁巴语的人约占 20%，说伊格博语的人约占 17%，说富拉尼语的人约占 7%；众多的少数族群使用其他语言。本地语言和英语混合而成的皮钦语也广泛流行。在阿巴查将军统治下，政府曾将法语作为另一种官方语言推广使用，这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为了发展与法国的关系。另外，尼日利亚国内一直有呼声要选择某一种地方语言作为通用语言，但因为政局动荡而没有施行，相互竞争的族群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企图统治其他民族的行为而加以反对。

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表现为由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多。然而，家庭基本上还是父系家长制的，与一个大的氏族组织相连，成员依然较多，拥有许多孩子。扩展型家庭也存在，这与人们的认识有关，即认为每个人都是他兄弟财产的继承人。这里不提倡个人主义，人们教育孩子要尊重传统习俗和社会道德。婚姻稳定，尽管离婚不再是偶然现象。离婚往往是由于不育，或被指控不忠，或做了不负责任的事。尽管还存在包办婚姻，但最为普遍的还是男女双方通过参加各种聚会互表爱心，直到步入婚姻殿堂。家庭与婚姻有关联，因为聘礼是要支付给新娘家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得社会认可，而不是财富的再分配。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一夫一妻制流行，而穆斯林和因循保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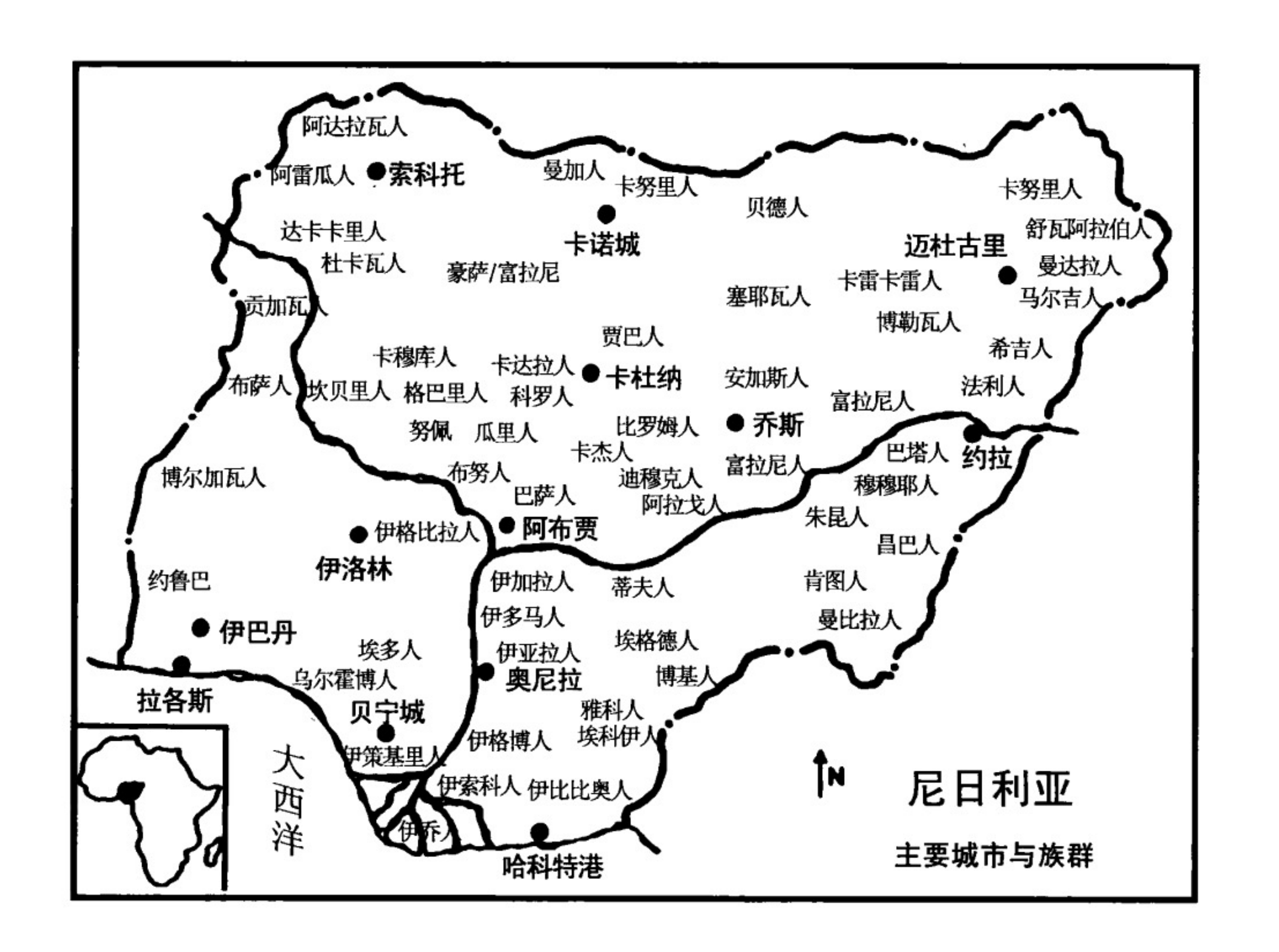
者仍然实行一夫多妻制。许多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接受西式教育直到大学的层次。



宗教生活也呈现多样性：穆斯林集中于北部和西南部，约占总人口的50%；基督徒集中于南部和中部，约占人口的40%；剩下的人信仰某一种本土宗教或其他宗教。由于不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的领导人都竞相获取政治权力，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越发明显，引发了有关国家是否应当世俗化、是否应该将“沙里亚法”引入司法体系的争论。教派之争造成了一系列冲突。许多人信教非常虔诚，例如参加受政府资助的每年到麦加或圣地的朝拜、每天坚持礼拜、主张宗教复兴并强迫别人改信宗教等。

本土宗教已经受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削弱。在前殖民时代，宗教为万物由来、政权的正当性和权力合法性提供了解释。政治权力被看做是神圣的，由国王代其臣民掌握。最高神和诸神被赋予了造物、力量、慷慨和仁慈等诸多美德和能力。直到今天，本土宗教还没有完全消亡，甚至在某些地方重新活跃。在许多人身上仍有对各种神灵、巫术、法术和护身符的强烈信仰。很多社区仍举行古老的节日仪式，例如伊格博人庆祝薯蓣丰收的仪式。在仪式上一般都要举行音乐表演，特别是在葬礼上，很多地方要因此消耗掉大量的资源。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存。过去的文化中心包括以青铜器闻名的贝宁，其作品很多制作于殖民时期；还有以木雕闻名的伊莱-伊费。在音乐方面，尼日利亚有许多天才，包括创造了“非洲节奏”(Afrobeat)的费拉·阿尼库拉波·库提，以及“居居”(Juju)音乐的超级明星“国王”桑尼·埃德。受当地的和许多其他文化的影响，舞蹈、音乐和戏剧持续繁荣，也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学术和文化巨匠，如齐努阿·阿契贝、沃尔·索卡因和阿摩斯·图图奥拉。夜生活由于舞吧而变得丰富多彩，足球成为年轻人白天喜爱的运动之一。一些地方仍然保留有传统的运动和休闲活动，例如讲故事、月光游戏(moonlight play)和摔跤，不过它们也开始受到电台和电视节目的冲击。这些节目以一种脱离现实的、夸张的方式描绘西方社会。尽管旅游业发展迟缓，但自然景观和其他旅游资源却相当丰富，包括国家公园、牧场、海滩、野生动物和地方节日等等。



尼日利亚
主要城市与族群
N
大西洋
阿达拉瓦人
阿雷瓜人
索科托
曼加人
卡努里人
贝德人
卡努里人
舒瓦阿拉伯人
迈杜古里
曼达拉人
马尔吉人
达卡卡里人
杜卡瓦人
卡诺城
豪萨/富拉尼
塞耶瓦人
卡雷卡雷人
博勒瓦人
贡加瓦人
贾巴人
希吉人
卡穆库人
卡达拉人
卡杜纳
安加斯人
法利人
布萨人
坎贝里人
格巴里人
科罗人
富拉尼人
努佩
瓜里人
比罗姆人
乔斯
巴塔人
约拉
卡杰人
富拉尼人
布努人
迪穆克人
穆穆耶人
博尔加瓦人
巴萨人
阿拉戈人
朱昆人
伊格比拉人
阿布贾
昌巴人
伊洛林
约鲁巴
伊加拉人
蒂夫人
肯图人
伊多马人
曼比拉人
伊巴丹
埃多人
伊亚拉人
埃格德人
乌尔霍博人
奥尼拉
博基人
拉各斯
贝宁城
雅科人
伊格博人
埃科伊人
伊策基里人
伊索科人
伊比比奥人
伊乔人
哈科特港

生存技巧和社会价值观在家中和学校里被传授。在信仰伊斯兰教 8 的地区,古兰经学校和正规的、西方化的学校并存,并且两者都赞成在家庭中进行非正式教育。尽管正在逐步现代化,当代文化中仍保留了过去的很多方面,例如对老人和长者的尊敬,在各种场合的恰当问候,以及真诚、谦逊和慷慨的品质。社会仍然尊敬那些对古代知识和格言很有研究的人,尊敬那些用它们来娱乐或解决纠纷的人。过去的主食习惯沿用至今,主要有薯蓣、玉米、大豆和小米。

## 经济

尼日利亚的经济和社会指数显示它既充满活力,又仍然落后。虽然尼日利亚仍是一个农业社会,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经济开始依赖石油收入。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木材、矿物燃料(石油、煤和褐煤)、金属矿(锡、铌铁、钽铁、钨锰、辉钼、铅、锌、铁和金矿)、放射性矿(铀、独居石、钍矿、锆矿)和非金属矿产(石灰石、大理石、工业用石和碎砾石、黏土、页岩、高岭土和长石)。工业生产主要是煤矿、锡矿和铌铁矿的开采,石油开采和提炼,天然气生产,以及对可可、木材、橡胶和花生等出口作物的加工。制造业包括纺织品生产、啤酒酿造,以及建筑材料和水泥的生产。农业是农民之本。大部分农民种植各种作物,主要是棉花、可可、橡胶、木薯、小米、玉米、稻和薯蓣,这既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也是为了出口。非正规企业——雇佣 1－10 人的小公司——高度发展,且效率高,满足了当地大量的服务和维修需求。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在增长。随着经济作物生产、矿业、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发展,现代经济开始形成。然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经济状况呈下降趋势,本地货币奈拉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国际贸易对尼日利亚的生存至关重要:尼日利亚每年出口总值超过 150 亿美元,进口在 100 亿美元左右。尽管经济大幅下滑,尼日利亚的交通网络由于拥有 68 个机场,67 104 英里公路和 2 178 英里铁路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数千条泥土路连接着乡村和城镇。尼日利亚拥有 50 多种报纸,诸多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00 多万部电话,以及互 9

联网的接入,尼日利亚的通讯系统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的,尽管有时服务不到位,农村地区被排除在服务之外。经济看起来可能会很糟糕,但由于拥有约 350 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尼日利亚仍然是非洲大陆排在南非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

## 教育和卫生

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受到人们追捧。成人识字率现在超过了 51%,如果我们把能阅读其他文字,如阿拉伯文包括在内的话,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知识分子在许多领域受过很好的训练,颇有见地,文学、历史、地理和医学领域中的有些人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多年来,大学教育成为培养社会精英的主要途径,因此推动了很多大学的创立,虽然它们的办学条件总体上只能算差强人意。

现代卫生设施的改进与西式教育培养出医护人员和革新观念有关。但医生与人口之比是 1∶16 000,药物通常短缺,现代医院很少,且相距甚远,病床位与人口之比是 1∶900 000。女性的预期寿命是 58 岁,男性是 54 岁。婴儿死亡率仍然很高,每 21 个婴儿中就有 1 个死去。平均的卡路里摄取量只有联合国粮农组织最低标准的 91%。常见的疾病包括河盲病、疟疾、脑膜炎和新近的艾滋病。由于药价不断攀升和现代医疗设施匮乏,很多人仍然求助于传统的医生,或者求助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职人员,通过祈祷或者某种魔力获得救治。在教育国民如何应对主要的健康问题,提供充足的食物、恰当的营养、必需的药物和安全的饮用水,确保基本的卫生设备和母婴护理,给孩子接种疫苗以抵御各种主要的传染病,以及在控制常见疾病方面,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历史

尼日利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古文明的遗迹已经在一些地方被发现,包括西南的伊莱-伊费,东部的伊格博-乌克乌和中部的诺克。到公元 1000 年时,很多部落已经具有各

自鲜明的政治特征。到 19 世纪,许多王国兴起又衰亡。殖民前的社会依赖于农业、手工业和贸易。他们生产了高质量的陶器、木器和皮革产品,供消费和贸易。

对外联系除了使尼日利亚参加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外,也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影响经久不衰,突出表现在 19 世纪哈里发统治的创立和伊斯兰教在近代尼日利亚的广泛传播。从 15 世纪起,欧洲人开始涉足尼日利亚地区。他们从事的奴隶贸易恶果难消,尼日利亚成为非洲最受影响的地区之一,其部分海岸线被称为“奴隶海岸”。

在 19 世纪期间,奴隶贸易被禁止,但这没有终结欧洲与尼日利亚的关系。打击奴隶贩子的需要将英国海军中队引到了尼日利亚海岸。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成为获救奴隶的收容地,其中数百人后来回迁到尼日利亚,在拉各斯和阿贝奥库塔形成了回归者社区。他们将巴西建筑风格带到那里,推动了基督教和英语的传播。与欧洲的贸易在继续,但商品不再是奴隶,而是原材料,特别是棕榈油和棕榈仁。

从 19 世纪中叶起,英国人的兴趣开始转向殖民。1861 年,英国在拉各斯建立了一个领事馆。40 年后,英国控制了尼日利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此后又对它统治了 60 多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各族群没有融合发展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他们保持分裂。西式教育在南方比在北方发展得更快。殖民经济主要依靠出口,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种植值钱的经济作物地区,例如种植可可的约鲁巴地区和种植花生的北方,从中获益巨大。像伊格博等其他族群的人则在境内四处流动,成为雇工或工匠。

1960 年 10 月 1 日,尼日利亚赢得独立。国家被分成 3 大区域:北区、西区和东区,分别由豪萨—富拉尼人、约鲁巴人和伊格博人控制。这 3 块地区及其民众之间争斗得不可开交。这一状况直到 1966 年 1 月 16 日发生军事政变后才得以结束。

然而,这场政变只是更深危机的开始。领导政变的恩泽奥古上校未能控制后来的局势,他的一个伊格博族同伴阿圭伊·伊龙西成为首


11

脑。政变被其他族群的人认为是伊格博人发动的,因此引发了 1966 年 7 月的一场反政变,把来自中部的北区军官雅库布·戈翁推上了权力宝座。与政客们一样,士兵们也效忠于他们的族。事态进一步恶化引发了混乱,导致北方成千上万的伊格博人被屠杀,随后伊格博人宣布脱离联邦,在以前的东区创建了比夫拉共和国,内战从 1967 年延续到 1970 年。

内战期间,尼日利亚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因为有些国家支持比夫拉,另一些则支持尼日利亚政府。战争使 100 多万人丧生,主要是比夫拉方面的。在 60 年代晚期的危机中,戈翁政府打破原先三区的格局,建立了 12 个州,这部分地降低了地区主义的影响(从那时起,为了满足各方需求和方便地赢得政治声望,创建更多的新州成为频繁现象)。日益增加的石油收入使联邦政府承担得起昂贵的战争开支,并将军队扩充到远远超出国家对外防务需要的规模。战争之后,戈翁宣布了一项"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战败者"的政策,国家因而很快获得民族和解。石油收入稳步增加,并被用来资助战后的重建项目。联邦政府加强了对各州的控制,联邦公务人员变得相当有权力。当戈翁拒绝履行还政于民的承诺时,他的威信开始下降,最终在 1975 年的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推翻,穆尔塔拉·默罕默德随即上台(之后是奥卢塞贡·奥巴桑乔)。

掌权 13 年后,1979 年军人自动退出政治。此前已进行了新宪法的起草和建立政党的准备。美国式的总统制取代了英国式的议会制。国家总统被看成是全民的代表,至少要在 2/3 州的选举中赢得 1/4 的选票。有 5 个政党参加了州和联邦层面的竞选,一个由北方控制的保守党——尼日利亚国民党(NPN)赢得了联邦统治权,谢胡·沙加里成为总统。事实证明第二共和国是一场灾难,因为领导人采取了与导致第一共和国毁灭相同的政策。当 1983 年 8 月和 9 月举行新的国民选举时,选民被过度操纵,政党制度再一次失去了它的威信。1983 年 12 月 31 日,军队发动政变,穆罕默德·布哈里少将开始掌权。尽管整个社会在 70 年代大声呼求民主政府,但是因为沙加里政府的糟糕表现、大



12

量的选举欺诈使民族党掌权、警察和司法部门滥用权力、政治精英们的大规模腐败，民众在 1983 年转而欢迎军人执政。

70 年代是尼日利亚在 20 世纪中经济增长的高峰和值得骄傲的时代，当时人们坚信尼日利亚会成为第三世界最强大和最发达的国家。戈翁在 1973 年宣布资金对本国来说不成问题。这种吹嘘反映了大量石油收入的流入，以及对其后将有更多流入的预期。穆尔塔拉·默罕默德推行激进的对外政策并支持反种族隔离事业，而奥巴桑乔政权因为成功地、自愿地还政于民而创造了历史。经济增长的程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77 年，尼日利亚主办了一届非洲文化艺术节(FESTAC)，展示了它在人权和文化发展方面实实在在的成就。希望被重新点燃，政府使国家发展成地区强国，在世界上成为非洲的代言人。尼日利亚人开始谈论发展核力量，创建一支强大的非洲军队。经济运行良好，中产阶级规模在扩大，轿车、电视机和录像机之类的奢侈品成为上层阶级的日用消费品。虽然机遇被统治阶层所葬送，他们贪污腐败，肆意挥霍和浪费，同时过度庞大的军队消耗了大部分的公共开支，经济策划者们仍对未来信心满怀。在 70 年代晚期，军人统治的结束激励着人们对未来充满光明的憧憬：尊重法治，保护人权，出版自由，州和地方政府都能按照自己的路线发展。

穆罕默德·布哈里政府持续了两年时间。它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公共生活的秩序，以改变过去几年的颓废之风。但是执政者热情过度，在惩罚某些政客和赦免另一些政客的问题上选择性太大，表现出双重标准。布哈里政府漠视公众意见，被指责为不尊重人权。公众之所以与之合作是因为高压统治，而不是出于爱国。

1985 年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少将推翻了布哈里政权。为马上获得支持，他释放了政治犯，取消了一项使许多记者受到迫害的法令，并承诺政府公开纳贤。尽管他比布哈里性格更加和善，但他紧紧抓住权力不放的野心成了祸根。他粉碎了 1985 年和 1991 年的两次政变，其中后一次政变非常激烈。他的政权经历了由劳工联盟和大学生组织的多次抗议活动，并因此将学校关闭数月之久；也经历了酿成数千人死亡的



13

教派内部和教派之间的严重暴力事件。他刁难并逮捕了许多记者,查禁各种出版物,还用卫星监控来自海外的新闻。他许诺将权力移交给一个民主政府,以此作为维护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在 1993 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与他的愿望相违,酋长 M. K. O. 阿比奥拉获胜,他取消了这次选举。最后他对局面失去控制,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临时过渡国民政府。

临时过渡政府由著名的企业家、酋长欧内斯特·肖内坎主持,由于未能赢得尼日利亚人的信任和尊重,这届政府只持续了 82 天。肖内坎被认为是巴班吉达的傀儡;几乎每天都有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注定了它的短命。600%的燃料价格上涨进一步激怒了本已受苦受难的民众。在临时政府奇怪的人员组成中,多年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的阿巴查将军作为唯一的高级军事长官被留用。很快,阿巴查开始主导政局,他首先将那些忠于巴班吉达的高级军官调走,然后不费吹灰之力推翻了临时政府,自任总统。与此同时,阿比奥拉和他的支持者继续为他可能的就职而努力,他们一度还认为阿巴查会支持他们。然而当阿比奥拉在 1994 年 6 月宣布自己为总统时,他被逮捕并被秘密关押,直到 1998 年去世。阿比奥拉的被捕引发了骚乱,随后有许多人被捕或被杀害,但局面仍未就此好转。阿巴查利用种族矛盾、政客的贪婪、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自己的权力,对抗民意,直到 1998 年 6 月 8 日在丑闻缠身中死去。他的继任者阿布巴卡尔将军通过与各种利益集团举行对话,释放大量的政治犯,开始了和解进程。

## 欠发达与政治问题

14

尼日利亚面临的问题众多,又没有能力利用丰富的资源去化解它们。贫穷和政局动荡困扰着这个国家,短期内还没有解决方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英国统治的最后 10 年里,人们对获得独立将带来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变化寄予很高的期望。当时已出现了某些变化——学校、公路网、通讯设施和现代化部门的就业者有所增加;得益于石油收入,经济有了惊人的增长;在艺术和文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

而，随着国家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尼日利亚人的希望破灭了。

军人主政造成的急剧动荡破坏了政治环境。政治动荡又使经济问题难以解决。独立初期的任务是使经济迅速转型。为此，1962 年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国民计划，不幸的是计划却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各个项目。来自农业的收入下降，外援没有如期兑现，而政治纷争分散了对计划的关注。从 1965 年到 1970 年，国家的关注重点是如何保持领土统一，发展问题被抛诸脑后。

70 年代经历了一次石油繁荣。尼日利亚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该组织在 1973 年成功地提高了石油价格，尼日利亚也因此受益。滚滚而来的巨额财富使尼日利亚政府开始对教育、交通和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大学数量从 1970 年的 5 所增加到 1983 年的 21 所。70 年代晚期实施小学普及教育。一群生活安逸的中产阶级诞生了，为了抑制他们的激进思想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大规模地提高工资，为数千人的巨额欠款买单。到 1975 年，石油繁荣的负面影响显现。许多新生的百万富翁不是从合法的经济投资中获利，而是窃取公共资金。农业和其他非石油相关部门受到破坏，因为国库的钱来得非常容易。高通货膨胀率损害了那些不能从石油生产中直接获益的农民的利益。

然而，到 1979 年 NPN 执政时，经济仍然表现良好。当时外债很少，每年的石油收入稳定增长。可是，政府错过了这次机遇。NPN 关心的是用合同和进口许可证回报其党员。诸如在联邦新首都阿布贾的庞大的、高速的建设项目使这种情况变得可能。地方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国家不得不进口大米、植物油和其他物品以满足地方上对食品的需求。非石油产品出口下降，农民受苦，城市居民发现很难买到廉价的食品。由于国家禁止某些商品的进口，各种物品的走私活动呈上升趋势，沉湎于 70 年代中期富足状态中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声地抱怨。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活动加剧。在 1980 年，宗教组织“麦塔特斯尼”通过吸纳这些移民扩大了其规模，并开始攻击国家，谴责政客们非法聚敛财富。“麦塔特斯尼”与政府爆发了一系列冲突，造成数千人死亡和大量的财



15

产损失。劳工组织在 1981 年发动了一场重要的大罢工以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储备下降,国家不得不更加依赖外国贷款。到 1983 年,国内生产总值已呈现下降的迹象。工业增长放缓,石油财富没有公平地分配给所有的社会群体。平民对政府的愤恨怂恿了军人卷土重来。为了努力修复经济,布哈里集中整治腐败,宣布了一场“反对无纪律的战争”。前政府部门官员的大量腐败证据在法庭上被揭露出来,其中一些人被判了长期监禁。但当布哈里政府将高压政策延及无辜的记者、学生和商业联盟领导人时,开始引起公众的愤怒,削弱了其威望。

巴班吉达时代出现了在“结构调整计划”(SAP)下开始的经济改革。起初,巴班吉达拒绝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只是继续推行紧缩政策。著名的 1986 年预算方案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结构调整计划,它使奈拉贬值,限定工资,限制消费,并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府对民众许诺,只要他们能够等上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等待却产生了更多的不幸:通货膨胀加剧;1988 年政府提高了所谓的石油补贴,因而几乎提高了一倍的运输和相关产业的成本;失业在知识青年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可以说,巴班吉达并不关心大多数民众,他关注的是如何使军官和政治精英满意,创造机会让他们发财,使腐败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 1993 年起,局面变得更加糟糕。阿巴查政权在国内外缺少威信。由于通货膨胀率高达 70%以上,奈拉失去了地区影响力,严重贬值。人们无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大量的奈拉。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以至降入世界上最穷者的行列。外来投资极少,外债居高不下,很多人不得不以犯罪为生。1997 年,政府推出了一项叫做“遥想 2010”的计划,承诺在 10 年里通过改变政策和规划来改变国家面貌。除了计划的设计者和政府的同盟者外,没有多少人对这种“遥想”抱有信心和希望。在阿巴查统治的整个时期里,他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势力的挑战,有时甚至是诱骗,但他在处理贫穷、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问题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冷酷。他的信条就是维持自己的权力比改善

16

国家糟糕的经济更重要。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是这个国家痛苦的时期。经济直线下滑而没有复苏的希望。奈拉疲软不堪(1 美元=84 奈拉)。70 年代人均收入 1 500 美元,到 1993 年降至 395 美元,到了 1998 年则不足 300 美元。外债依然很高,估计超过了 300 亿美元。外国投资者对尼日利亚避之不及。一些“生意人”通过买卖毒品、洗钱和其他欺诈活动来赚钱。尽管石油收入很高但不稳定,石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其他出口商品,占出口收入的 91%,公共财政的 75%,以及 GDP 的 20%。尽管如此,或许是国家日常管理的无能,汽油短缺已成为生活中一个常见现象,造成低收入者要步行许多路上下班。农业受到严重破坏,农民们的贫困化超过了该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当尼日利亚步入新千年时,它是如此的孱弱:经济蹒跚而行,政局仍然不稳,外部形象严重受损,民众处于绝望和极度痛苦之中,暴力抗议和内讧周而复始。“非洲巨人”现在已经被世界银行列为世界上最穷的 20 个国家之一。

# 第二章　殖民前的邦国与社会

17

## 早期历史

比达的黄铜制品，伊莱-伊费和贝宁的黄铜和铜质头像，伊格博-乌克乌的青铜制品，博尔努的赤陶动物，诺克的赤陶头像，可追溯至奥杜瓦(Oldowan)和阿舍利(Acheulian)时代的石英石、玄武石、花岗石和玉髓石制成的工具分散在不同地区：所有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都提供了在史前时期尼日利亚就有土著人生存的证据。史前时期被分为两个阶段：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尼日利亚境内已发现了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乔斯高原地区最有名)、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尼日尔河、塔拉巴河和贝努埃河北岸地区，乔斯高原和奥基圭地区)，而石器时代晚期和金属时代遗址在全国都有发现。

石器时代是狩猎采集者的时代。他们居无定所，四处寻找食物，随后渐渐向农业社会过渡。细石器(小的合成工具)、弓、箭和矛的使用是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这时人类学会了更好地利用骨制物品，制作岩 18 画，使用陶器及磨光了的石斧劳动。尼日利亚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12000 年，当时森林中新石器时代的人已从事农业活动，他们培植野生水果、薯蓣和棕榈，而在北方(例如在代马的一个遗址)，人们种植小米和高粱，放养牛、绵羊和山羊。

金属时代从使用铁器开始，稍后是铜、黄铜和青铜器。以下地区在金属时代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公元 9 世纪的伊格博-乌克乌，公元 10 — 12世纪的伊莱-伊费，公元 13 — 14 世纪的贝宁，以及其他中心地区。铁和其他金属的使用导致农业取得很大的进步，促进了城市和集权政治体系的出现，如伊莱-伊费、豪萨城邦、贝宁和加涅姆-博尔努。铁器时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代表是中部的诺克，它制作了大量的赤陶人物雕像。到公元 4 世纪，铁的使用已经传播到很多地方，并因此改变了那里的农业和战争方式。

各族都在创世神话和口头传说中记录了他们过去的事，因此为考古发现和其他证据提供了补充材料。很多传说都在试图回答起源的问题，认为他们迁自尼日利亚内地，或遥远的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一些传说宣称他们的祖先是顺着一根链条从天上下来的。到处都有关于祖先和王朝怎样出现、战争是如何打响及输赢情况、人们怎样进行贸易和谋生的故事。故事听起来可能很纯朴或不可信，但它们通常揭示了许多道理：人类已存在太久了，要想追溯其起源并非易事；人们必须妥善处理与环境的关系，并且发展要靠自己的努力；一族必须要和其他族交往，正如迁徙故事所指出的重要联系。可以列举一例来说明这些故事：住在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将自己的起源归于一位叫巴亚吉达的人，他是巴格达的一位王子，他旅行到豪萨的道腊并娶了那里的女王。王子和女王的后代发展成 7 个“嫡系的”豪萨城邦（被称做“豪萨巴克韦”）：比拉姆、卡齐纳、道腊、扎里亚、腊诺、卡诺和戈比尔。传说还称巴亚吉达另有 7 个“私生子”，他们建立了班扎巴克韦城邦（意为“庶出的城邦”）：赞法腊、瓜里、克比、努佩、亚乌里、“约鲁巴”和夸拉拉法。这是一个强大的外来民族转化为本地人的传奇。至 15 世纪，这些小城邦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王国，每个王国都有一座主要的城市——比尔尼（birni），它是权力、商业、文化和军事的中心。

19

## 邦国、政治和经济

殖民前的尼日利亚由许多大大小小的邦国组成，统治形式各异。

在北面，有位于热带稀树大草原北部的加涅姆-博尔努，它绕着乍得湖而建。到公元 8 世纪时，这个帝国变得很强大，也是最早从与北非交往中获益者之一。帝国一直到 19 世纪都受塞法瓦王朝统治，因接受伊斯兰教、商业网络和作战技巧而出名。被称做“玛伊”的塞法瓦国王们势力非常强大，进行了很多次扩张和巩固领土的战争。其中最著名的“玛伊”是伊德里斯·阿卢马(约 1571 — 1603)，他建立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的军队，征服了许多地区，并摧毁了对他帝国的一系列抵抗。阿卢马除了聘请土耳其滑膛枪手训练他的军队外，还被认为是将滑膛枪引进这一地区的第一人。他是一位穆斯林，并在其臣民中推广伊斯兰教，积极发展与北非穆斯林统治者的外交关系。他去过麦加朝觐，引进沙里亚法，推动伊斯兰教义的学习，并建立了很多清真寺。帝国因为定居农业和长途贸易而变得富裕。该帝国的强盛和其王朝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超过 1 000 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领导层的能干、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参与穿越撒哈拉贸易的回报、军队的强大，以及利用伊斯兰教推动各族的统一和组织行政。

到 13 世纪时，许多豪萨王国，如戈比尔、克比、扎里亚、卡诺和卡齐纳因为发展农业和贸易都已经建立。豪萨城邦和加涅姆-博尔努的南面，也就是现在尼日利亚的“中部地带”，当时人口稀少，小城邦众多。然而，它却是一个拥有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古老文明区。这里是诺克文明和朱昆帝国的故乡，还是像伊多马、伊加拉、蒂夫、布萨、埃比拉、努佩和巴里巴这些著名的河边氏族的故乡。在尼日尔河与贝努埃河交汇处附近，约鲁巴人、努佩人、蒂夫人和伊加拉人等一些族群相互影响，推动了贸易和交往。

20

在森林地区和尼日尔河三角洲，有许多较大的王国和小的城邦。沿海地区人口密度高，和森林地区一样，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如像东南部的伊格博人。在尼日尔河三角洲，邦尼、布拉斯和卡拉巴尔等城邦因为对河流和海岸的控制以及与欧洲人的贸易而出名。伊斯兰教直到很晚才渗透进森林地区。此地区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是可乐果，它和鱼、海盐等都成为长途贸易的一部分。贸易路线将热带雨林与稀树大草原

连接起来，将西部的约鲁巴与他们北方的邻居连在一起，也将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沿岸的商民们彼此相连。

南部最强大的邦国是约鲁巴人的奥约帝国，它成名于 16 世纪。其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与约鲁巴人祖先奥杜杜瓦有关的古代时期。口传历史称奥杜杜瓦从天上下凡到伊莱-伊费，也有的称他来自东北方。其后代创建了 7 个王国，其中奥约的政治势力最大。奥约的早期统治者通过控制其邻近的部落，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君主体系，为建立王国打下了基础。早期统治者之一——桑戈，被看做“雷电之神”。奥约的声名鹊起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首先，位于尼日尔河和热带雨林北缘之间的地理位置，使奥约能够控制北至豪萨、西北到尼日尔河湾地带的约鲁巴人的主要贸易路线，能够扮演进入约鲁巴腹地的中间商角色，并能方便地获得马匹。它也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令人生畏的、以骑兵为基础的军事组织，并且巧妙地构建了它的管理系统。征服的胜利带来了贡赋，也为奥约的货物营造了一个大市场。一套强大的行政体系能够将不同的部落联合起来，并能够在首都的约鲁巴人中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奥约在 18 世纪达到鼎盛，国土囊括约鲁巴的大部分、努佩的一部分、博尔古的部分地区，以及现在的贝宁共和国。西南的阿贾和埃维城邦被迫向它纳贡。在 18 世纪伊始，奥约帝国势力强大，是尼日利亚南部面积最广和最有多样性的国家。但在该世纪的后半叶问题接踵而来，尽管国家在 70 年代一度繁荣，此后却再也没有完全复兴。

尼日利亚南部的另一个大帝国是贝宁，它是沿海地区最早崛起的邦国之一，由埃多人创建。到 14 世纪，它变得强大。贝宁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它的统治一直存在到 1897 年被英国征服。在 1400 年以前，贝宁的统治者被称做“奥奇索”。后来，一个叫埃维卡的人创立了一个新王朝。依照传说，他受到约鲁巴人的影响。埃维卡选择了奥巴(国王)的称号，并建立了 7 位大臣辅政的制度。随后几年，出现了几位强势的奥巴，被赋予神秘的色彩。埃多人接受君主制的观念有利于形成集权的政治体系，便于统一分裂的部落。君主掌握了所有重要职位的任命，并借助一种回报机制，掌控各个利益团体间的争斗，提拔或奖赏

21

那些忠于国王的人。贝宁从与邻居约鲁巴人的交往中获益,借用了他们一些有用的观念来改革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它也享受到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因为其邻邦大多很小,且缺乏战斗力。贝宁积极参与地区贸易,把所赚的财富用于资助军队和政府。贝宁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时达到势力的顶峰,其中奥巴埃乌阿(1440 — 1473)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统治者。埃乌阿结束了王室成员和国内酋长之间的政治斗争,增强了国王的权力,重建了城市,扩建了防护墙,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他有才干的继任者扩展了这些成就,比如 15 世纪末的统治者奥巴奥祖鲁亚。他是一位尚武的国王,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并与葡萄牙人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开始贸易,并且因为外交关系的建立得到进一步加深。此后,贸易得到扩大,允许贝宁购买用于扩张战争的枪支。

## 集权制的邦国

如不考虑分布,邦国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集权制的和非集权制的。一个集权的邦国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其领土的变化依赖于军事实力的消长。在殖民前的尼日利亚,这样的邦国一般由一位强势的国王及其酋长们统治,以邦国的都城为基础,王宫和重要的市场都建在那里。在都城,国王进行直接统治,同时把其重要亲属安排到各地进行统治。邦国分为若干个省,每个省由一名忠于国王的酋长统治。一个省可能有很多村庄和城镇,也有许多族群的人,就像在奥约王国一样。对省一般实行间接统治,允许地方政权有一定的自治权,尽量减少与中央政权的紧张关系。国王及其酋长们通过征税、纳贡、收捐和赠物来筹集公共财政,而省通过定期缴纳贡赋来表示他们的效忠。国王和酋长们可能很富有,而大多数臣民的生活水平仅限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邦国有贝宁、奥约和加涅姆-博尔努。

这些强大的邦国能够出现,地理环境起了重要作用。肥沃的土地使发展农业、城市化和人口大量集中成为可能。它们所处的位置便于参与地区贸易,因此它们能够从贸易中赚取财富。一位精明和强大的领导人会发动有效的征服战争。军队通常规模较大,由武装起来的臣

22

民组成。在热带草原地区，草地四处存在，萃萃蝇不会构成威胁，因此强大的骑兵发展起来。

国王是政治中的中心人物。创建帝国的国王所建的王朝，会统治到其权力受到对手的挑战或者王国崩溃。帝国建立者原来可能是一个氏族的首领，后来变得强大，将其他氏族首领纳于他的统治之下。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有势力的祭司会利用他掌控的超自然力量来攫取政权。还有其他的情况，即一名善战的武士突然从一个弱小的氏族中崛起，然后统治它。建立起政权后，帝国开创者利用军队来对其他族、重要的市场和肥沃的土壤进行掠夺，从而扩张帝国的领土。他的继任者继承了王国，然后根据习俗、制衡原则以及个人的品性来管理它。

在北方，实行集权的城邦可以加涅姆-博尔努为例。其政府首脑是“玛伊”，一位从塞法瓦王室中选出的国王。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其臣民视他为具有神性的半神。随着伊斯兰教的引进，他就既是半神的国王又是伟大的伊斯兰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判处别人死刑。在日常管理中，他听取顾问的意见，顾问们组成一个 12 人委员会，每人负责一个省。他们住在首都，因而不得不任命次级官员来管理所负责省内的事务。重要的妇女也很强势，尤其是这三位：玛伊的母亲(Magira)、玛伊的姐姐(Magara)和他的第一夫人(Gumsu)。不仅她们的意见很重要，而且她们也是重要权力的代理人。权力的经济基础依赖于对农民征收收割税、向众人征收人头税、向商人征收过路税和关税，以及各个省缴纳的贡赋和礼物。

23

在南方，奥约也实行集权。它发展了一套在大酋长和阿拉芬(国王)之间实行制衡的政治体系。帝国被一分为二。首府奥约城由阿拉芬和他的大酋长管理。省实行间接统治，奥约派官员(Illari)监督地方统治者。在权力集中的中央，阿拉芬从作为王国创立者奥兰延的后裔的王室成员中遴选产生。从理论上说，阿拉芬拥有绝对的权力，被视为仅次于神，而实际上，他的权力受到其他权势较大的酋长的制约。当他去世的时候，包括他长子在内的几个人要为他殉葬。国王非常富有，住在一座巨大的宫殿中。排在他之下的是 7 位重要的酋长，称“奥约姆

西”,由“巴索朗”领导。这些酋长拥有巨大的权力,负责新阿拉芬的任命,并有权要求不称职的阿拉芬自杀。为解决奥约姆西和阿拉芬之间的纷争,以及批准酋长们的一些要求,一个叫“奥格伯尼”的秘密会社应运而生。国家还有一大帮官僚,他们由住在宫中的“伊拉里”组成。作为一个主张扩张的帝国,奥约拥有一支以大量骑兵为基础的强大军队,由一位叫“埃索”的军事首领统帅。作为军队的总领导人,人们期望他要么赢得战争,要么自杀。

## 非集权的社会

在殖民前,尼日利亚的第二种邦国是非集权型的,如尼日利亚东部的伊格博、伊索科、乌尔霍博和伊比比奥,以及中部的大多数邦国。这些邦国规模小,一般围绕着某一村庄或城镇而建,或发展为酋长国,如在伊索科和乌尔霍博人中那样。权力在长老和年轻人协会之间分配。政府的权力被下放,因此没有必要建立强大的军队来实行扩张。一个地区内部有共同利益的各个族群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联合起来,其成员组成一个贸易协会。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根据社会习俗、宗教力量和氏族首领的管制来运行。



伊格博人为非集权式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伊格博人分为很多父系氏族,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开创祖先。存在的数百个村庄不是作为统一的伊格博王国的成员,而是作为自治的单位,每个都有自己的政府。在一个典型的伊格博人村庄里,有一个长老委员会(ama-ala)和一个村议事会,前者由不同的家族首领组成,后者是一个允许大部分民众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并且影响到决策的制订。司法制度民主,由长老和村民们一起讨论案情,作出定性和惩罚。有一个秘密会社从事许多与法律有关的活动,同时,一个同龄人会社负责公共事务。人们崇拜相似的神,并且承认有强大魔力的神谕的权威,这为各个村庄提供了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手段。

不管是否集权,邦国在很多方面存在共性。它们的经济依赖于农业、贸易、矿业和手工制作。不管什么地方,人们都把“生产要素”——

工具、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集中起来从事各种经济活动。锄头和大砍刀是农民们使用的最常见的工具，其他职业也有它们自己专门的生产手段。由于工具在当地制作，因此不需要依赖外部技术。他们从事的劳动很简单，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即使进入 20 世纪也是如此。资金通过家庭渠道或地方储蓄社团来筹集。

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成员们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由院落的首领组织他们从事经济活动。没有工资，但会满足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大家庭，以便有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婚姻。为了获得额外的劳动力，一个家庭可以与其他家庭组成互助性的劳动组，这在豪萨人中被称为“加雅”，在约鲁巴人中称为“阿罗”或“欧维”。对有钱有势的人来说，使用奴隶可以给他们提供扩充劳动力资源和获取更多资源的机会。奴隶融入家庭之中，在达到必要的条件后，他们可以重获自由。

土地对大多数职业而言是最基本的，社会确保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土地属于公共财产，受到政治层面的保护，以供所有人使用。社区中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份地，这是不能被剥夺的。土地不准出让。作为一份最有价值的财产，它也被神圣化，这样就可以利用宗教制裁来维护阻止土地买卖的法律。土地也被看成是属于祖先的、活着的和未出生的人的，因此活着的人无权分割家族土地。外来者要获得土地安顿下来，要么需要某个大家庭接纳他们，才可以使用这家的土地；要么由统治者分给他们土地。

25

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是种田。农业提供了食物来源，并使人口扩张和城市化成为可能。在热带稀树大草原，牧民们将大规模放养牲畜与农耕相结合。他们到处游牧，寻找草地和水源。由于草地的缺乏和萃萃蝇的存在，放养牲畜在热带雨林和沿海地区很少见。生活在沿海和河边的人则主要以捕鱼为生。

经济成分多种多样，包括重要的冶炼和手工制造业。生产者依靠当地资源，并从地区贸易中得到原材料的补充。在有些职业中，例如炼铁业，工匠们组成行会来保护他们的生产秘技，确保产品质量，在与统

治当局打交道时保护自身利益。矿业存在于蕴藏铁、金、盐、锡和铜的地区。铁是最重要的金属,因为很多工具和武器依赖于它。在采矿地,矿工和冶炼工们的社团声望极高,并带有神圣色彩。在其他地方,铁匠将铁打造成各种类型的器具。盐作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同样也是地区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在沿海地区,通过煮海水获得海盐;在半沙漠地区,通过过滤含盐的泥土来获得。黄金是一种奢侈品和可以赚钱的物品,也是政治领导人巨额财富的来源之一。锡被发现于乔斯和包奇高原地下的较浅土层中,被用来制作各种器皿。

手工制作依靠不同的动物、矿石和植物产品。最常见的手工制品有陶器、皮具、纺织品和食品。在黏土充足的地方,技术熟练的男女工匠们用它制作厨房器皿、装饰品和仪式上用的罐子。皮革加工业兴盛,涌现了一批对动物皮毛进行加工、硝制、染色的行家,这些加工好的皮革再由其他人制作成包、垫子、马鞍套子和其他有价值的商品。纺织业到处都有,连带兴起的还有棉花种植、纺纱和染料等几种相关的职业。

26

贸易对本土经济至关重要。它能使人们处理剩余的产品,为更广的消费者提供特产,并分享不同生态地的产品。广泛流通的商品包多盐、铁器、可乐果、奢侈品和纺织品。在一个社区里,生产者相互依赖——农民依赖于铁匠提供工具,铁匠则依赖农民提供粮食。在地区之间,相互依赖也很明显。例如,热带雨林地区向稀树大草原地区供应可乐果,后者反过来则提供肉制品。流通范围很广的货币和道路网为分配体系提供了保证,尽管成本仍较高。布料、金属制品和贝壳是三大货币。在博尔努的东北部,棉布条被当做钱使用。在尼日尔河三角洲,铁和铜棒广泛流通。最常见的货币是贝壳,主要是因为它体积小、耐用和不能被伪造。货币使财富得到积累,商品能够定价,并产生了一个资本市场——借款者和贷款者在这里可以讨价还价。

运输靠陆路或水路。大部分人通过陆路旅行,随身携带货物。在稀树大草原,人们使用负重牲口,主要有驴子、骆驼、骡子和牛。这些牲口中最得力的是骆驼,它能很好地适应沙漠和半沙漠的环境,并能克服水和食物的短缺。独木舟使用于沿海和河流地区。陆路和海路网络将

各个定居点连接起来，并由不同的族群的人维护。

市场是交易的主要场所，它与露天的小摊位有明显区别。市场一般较大，并充斥了各色人等，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很好的交往机会：进行贸易、交流信息和建立关系网。当局也在这里收税，作为政府的资金。一个市场可以每天或者定期开放。每天都开放的市场在早晨或晚上营业，它们一般服务于某一村或镇及其周围的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定期市场每隔两天或更长的时间举办，它们主要用于采购、储备和交换地方特产。一个地区的所有定期市场是统筹安排的，因为不同的村镇要在不同的日子开市，便于商人在不同的时间前往不同的市场。

27

一个市场可以是本地贸易网和(或)地区与国际网络的一部分。本地贸易网主要是城镇居民和附近村民之间的交易。地区贸易网将很多城镇连接起来，有的甚至距离很远；而国际贸易网则将尼日利亚的不同地方和西非其他地区的市场连接起来，穿越了撒哈拉沙漠。业务娴熟、流动性大和进取心强的长途商贩控制了各种贸易网。在很多地区，他们和许多商人一起组成大的商队，一道跋涉，缴纳路税，并最终建立了商业据点。

邦国间的交往出于很多原因。总的来说，大多数关系是通过贸易推动的。没有哪个邦国能够在必需品或奢侈品方面能自我满足需要。这主要是由于生态差异。沿海居民可以向其他人提供盐和鱼。热带雨林地区的人可以用可乐果交换北方的岩盐、马匹和畜牧产品。有各地商人参加的地区性市场在许多地方出现，它们都是交际的场所。商路穿越各个邦国，因此在使用和维护中将许多族群联合起来。邦国同样地由宗教、社会和文化媒介连接起来，如同龄社、秘密会社、婚姻纽带和祭祀活动。同龄社由出生在相近几年中、构成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组成。在一个地区有很多这样的盟社，各有自己的名字和领导人。这种成员关系超越血统和村庄，因此促进了友谊和相互影响，以及一种强烈的忠诚意识。神秘会社的成员也来自不同的村镇，成员以秘密方式联络。他们有自己的社规和标识，借此形成了一个增进友情、势力和商业活动的高效体系。神谕体系在东南部很普遍，它依照遥远的众神的旨

意做出公正的判决。部落之间的联姻也很常见,因为很多文化习俗阻止氏族内的婚姻。通过婚姻,村镇得以联合,他们的后代在不同地区,但却有亲戚关系。借助影响族群间关系的各种因素,观念得到传播,联系得到增强,地区贸易繁荣起来,并且部落间的联姻被鼓励。



## 对外交往:伊斯兰教和穿越撒哈拉贸易

几个世纪以来,尼日利亚地区一直得益于同西苏丹、撒哈拉、北非、尼罗河谷,以及间接地与欧洲人之间的交往。其中交往最久的是伊斯兰教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传道士同时也是商人,而像卡诺这样的重要商业中心也同时是伊斯兰传道士的拓居地。

对伊斯兰教的皈依最早可以追溯到 11 世纪位于东北部的加涅姆-博尔努王国。借助来自北非的传道士和伊斯兰商人的活动,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缓慢传播。加涅姆-博尔努的国王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不少国王变成狂热分子,鼓励臣民皈依和去麦加朝觐。在豪萨人中,受到西部邻族和北非的影响,伊斯兰教从 14 世纪起开始传播。像卡诺、卡齐纳和扎里亚这样的城市成为著名的伊斯兰中心。几个世纪后,伊斯兰教传播到尼日利亚北部和西部的其他地区,但是,在 19 世纪以前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宗教。在豪萨和加涅姆-博尔努,国王和酋长们接受了伊斯兰教。有些人非常虔诚,并献身于传教。不管虔诚与否,统治者们都从与伊斯兰有关的活动中获益:穿越撒哈拉贸易的财富,从北非传播来的观念,以及有能力与别处的穆斯林统治者建立外交关系。

伊斯兰教是变化的一个动因。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新的宗教,它用清真寺和学校改变了这儿的风貌;通过学者、阿拉伯语和伊玛目、斋戒和前往麦加朝觐,影响了这里的文化。随着伊斯兰学校在各个城市的激增,伊斯兰文化得到传播,青年男女被鼓励汲取相关知识。朝觐活动推动了物质文化和知识的传播,因为朝觐者带着新思想返回故里。在豪萨城邦和加涅姆-博尔努,伊斯兰教鼓励任用有文化的人、政治上集权,以及推行伊斯兰法,即沙里亚法。阿尔及利亚著名的学者和律法专

家谢赫穆罕默德·马基利为15世纪的统治者们写下一篇政论《君主的义务》。文中主张领导人应强有力，以及在统治中有效地使用军队和牧师。[①]

29

许多统治者和百姓前往朝觐。统治者带着大量的随从前往。他们一路上分发礼物，展示了他们地区的产品，因此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在返程时，随他们而行的是来自中东和北非的商人、学者和手工艺人，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技术。另外，旅行也提供了增加外交活动和友谊的机会。

穿越撒哈拉贸易是几个世纪以来重要的对外贸易，它得以进行的因素有：使用骆驼穿越撒哈拉（骆驼能经受住白天的酷热和夜晚的寒冷，以及克服水和食物的缺乏）；欧洲、中东和北非对西非黄金的需求；以及主要参与者能从贸易中获取巨额的利润。奴隶是仅次于黄金的值钱商品，它基本上用于劳动和服兵役。尼日利亚也提供了品种多样的奢侈品，特别是纺织品和皮革制品、胡椒、可乐果、象牙和鸵鸟羽毛。作为交换，尼日利亚获得的奢侈品有布料、金属制品、香料和椰枣、玻璃器具、珠子、书、纸张，以及来自沙漠地区比尔马和塔加扎的食盐。另外，他们还购买马匹装备骑兵来用于统治者的炫耀。在集权的豪萨城邦和博尔努，统治者通过扮演地区商人进行贸易和收缴市场税而获取巨额的利润。南部的贸易终点，如卡诺、加扎加姆和卡齐纳，都是繁荣的商业中心。一些统治者对盐和奴隶实行贸易垄断，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很复杂，因为路途遥远（从北非到西非单程就要花费70－90天），必须要穿越沙漠，沿路遭遇的族群也很多。资本是必需的，它大多由北非的富商和统治者提供。这项贸易还需要许多代理商的协助——长途商贩先将货物运送到尼日利亚，交给当地代理商，后者在接下外国货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本地产品，来自不同方向的中

---

①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inces*, *An Essay on Muslim Kingship*, trans. From Arabic by T. H. Baldwin and cited in H. R. Palmer, *The Bornu*, *Sahara and Sudan*. London: Frank Cass, 1936.

间商在得到货物的同时，也提供最新的信息。商人们受到保护，免受强盗的袭击。沿途的每个邦国都尽力确保安全，商队由士兵护送，队伍有时多达数千人。沙尘暴和干旱是商人们面临的最大的危胁，所以知道商路沿途有哪些可靠的绿洲，并预测气候变化，这是必需的。雇佣有经验的向导和保镖来照料骆驼，寻找水源等重要物资，也是商队管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据距离、沿途绿洲的位置、预防袭击，以及在终点能得到的货物等因素，仔细挑选商业路线。最早的商路之一位于乍得盆地和北非的的黎波里之间。到 16 世纪，加涅姆-博尔努和豪萨城邦被通往的黎波里的重要商路连接起来。在 17 世纪及以后，卡诺和卡齐纳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在跨入 19 世纪时都进行得很好，直到欧洲人在沿海活动日益频繁才受到威胁，此后贸易转向南方。

贸易为地区间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纽带，使货物和观念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播。贸易使得草原地区的邦国因为马匹的输入改进了军队的装备。国王和酋长们变得富有，并因此能够扩充军队，从事领土扩张，过着铺张的生活。商人也同样能够发财。贸易使尼日利亚地区的邦国声名远扬。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新的政治和文化观念，以及阿拉伯文明的其他方面被传播到尼日利亚，这也是贸易深远影响的一个结果。

## 对外联系：欧洲和奴隶贸易

北方和北非建立起联系，南方则在 15 世纪晚期开始和欧洲人建立起联系。欧洲人的扩张得益于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以及从探险中获利的欲望。葡萄牙人约在 1486 年首先登上贝宁南部海岸。在通商、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了解非洲地理和传播基督教欲望的驱使下，葡萄牙人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其他沿海地区及拉各斯建立起联系。胡椒、布料、各种装饰性的珠子和象牙是交换欧洲廉价商品的主要货物。葡萄牙人并不想侵占领土，将自己局限在设防的贸易站中。他们在贸易方面很成功，但未能将当地人转变成基督徒。

16世纪随着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加入到贸易中，葡萄牙人的控制局面不复存在。贸易的重点转向将奴隶输送到新大陆，在那里创造出较成功的种植园经济。奴隶贸易最初只是偶尔的行为，最早可能出现于1480年，当时两艘葡萄牙船只装载了400名奴隶驶离尼日尔河三角洲。16世纪期间，美洲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刺激了奴隶贸易的发展。从那以后直到19世纪，奴隶贸易成为欧洲与尼日利亚关系的主要内容，数百万的奴隶被输出。该项贸易现称为“三角贸易”：欧洲商贩把工业制品拿到尼日利亚换取奴隶，再将奴隶运到美洲；然后，欧洲商人购买美洲原材料(例如烟草和糖)到欧洲出售。

31

欧洲人推动了对奴隶的需求，他们带着船只来到尼日利亚海岸装运奴隶。许多欧洲公司专门从事奴隶贸易，例如英国的皇家非洲公司和荷兰的西印度公司。尼日利亚沿海的民众对此有所反应。那里的酋长和商人发现奴隶贸易有利可图，他们成为中间商，用从内地获得的奴隶交换进口商品，主要是枪支、金属棒、布料、刀、烈性酒和廉价的珠宝。在内地，国王和酋长抓捕奴隶，再把他们卖给沿海的商人。在尼日利亚东部的部分地区，随着定期的奴隶集市的出现，产生了交易寡头。用奴隶进行物物交换盛行，被用来交换的货物有纺织品、金属棒、铜制手镯或马尼拉麻、玻璃珠、珊瑚和枪支。

奴隶贸易产生了严重后果。尼日尔河三角洲和沿海的其他地区一样，在销售欧洲商品和获取当地产品的过程中，贸易进一步推动了与内地的联系。然而，奴隶贸易压倒了其他贸易，因此产生了一种狭隘的经济，一小撮中间商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而获利。贸易造成了人口流失，数百万人被运往海外，其中多数是年轻力壮的男子。由于奴隶部分地是通过偷袭和战争获得，因此暴力冲突的规模和部落间的争斗上升。从偷袭冒险开始，经过海上的“中程”，最后到达种植园，奴隶制都是惨无人道的——奴隶被看做下等人，当作没有任何权利的财产，自身一无所有包括尊严。尼日利亚的文化受到影响：欧洲语言被引入贸易共同体中；本土的和外来的语言相混合形成了皮钦语；欧洲人的服装在某些地区被接受；葡萄牙人将基督教带到贝宁和沃里；引进了新作物，包括

32

木薯、红薯和玉米，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非洲文化也被输送到新大陆，例如，巴西、古巴、特立尼达岛和海地就受到约鲁巴文化的强烈影响。

奴隶贸易影响到了政治和城邦结构。那些财政依赖奴隶贸易的城邦，贸易的存在与否直接影响到它们的命运。其中对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影响最厉害，在那里奴隶贸易盛行。15 世纪之前，伊乔人只是一个小的捕鱼社团，不仅规模小，人口也很少。人们被分成若干个区域或居住区，实行父系制，由一名被称为“阿曼亚纳博”(amanyanabo)的长者领导，他主要起的是仪式性的作用。同龄社和舞蹈社则将不同区域的成员联合到一起。由于参与奴隶贸易，渔民社群转变为商业城邦，著名的有邦尼、奥沃弥(即“新卡拉巴尔”)、奥克里卡和布拉斯(即“内姆比”)。另一个部落集团埃菲克人也从贸易中获利，他们在克罗斯河口建立了老卡拉巴尔。在奴隶贸易时期，社群的规模普遍扩大，每一个从几百人增加到约 5 000 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经商致富，社会和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地位的标准从年长和家族背景转变为财富和经济地位。阿曼亚纳博不再仅仅是一位宗教首领，更是一位政治领导人和富商。成功的阿曼亚纳博竭力让他的孩子继承他的职位和财富。居住区也转变为被称做“独木舟社”(canoe house)的贸易共同体，一个有规章和领导人的贸易组织。“独木舟社”的领导人都有钱有势，每个“社”都是靠奴隶扩大。一个能干的奴隶可以上升到“社”的领导层中。当一个成员变得富有时，他被允许去创建一个新“社”，但要保持对原“社”的忠诚。各社之间在控制城镇贸易和权力方面竞争激烈。

## 革命和改革

19 世纪发生的巨大变化终结了前殖民社会的悠久历史。各种事件和问题围绕着贸易、战争和伊斯兰教交织在一起，它们都影响到政治和经济。社会和城邦打乱重组——一些垮台了，另一些诞生了，有些扩大了规模，所有这些都是内部的深刻变化和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

33 在西南部的约鲁巴人中，其伟大的奥约帝国因延续约一个世纪的

战争而衰落。在 18 世纪后半叶,奥约已经开始走向衰败。权力斗争出现派别化,导致体制崩溃、软弱不堪的国王即位,以及军队衰败。它的军队软弱到连一些省都可以宣告独立的地步,同时,奥约无法阻止来自北部努佩的攻击及西部达荷美的崛起。努佩的崛起和热带大草原的政治变化阻断了奥约可以获益的商路,造成经济的部分下滑。危机在 1817 年达到高峰,当时军队的首领阿丰贾造反,另建自治的伊洛林王国。在此过程中,他把住在奥约的豪萨穆斯林拉了进来,并允许包括著名的富拉尼人马拉姆·阿利米(Mallam Alimi)在内的伊斯兰传道士定居在伊洛林。富拉尼穆斯林转而反对阿利米,并在 1823 年将他杀死,在约鲁巴人中建立起唯一的伊斯兰酋长国。伊洛林依靠一支更强的军队,成功地打败了奥约,使它在 19 世纪 30 年代晚期衰落下去。旧奥约帝国的难民向几个方向迁移,主要是向南,在那里他们建立了新的城邦伊巴丹和伊贾耶。为了建立新的王国,避免被更强的势力所吞并,以及控制商业,特别是通向沿海的商路(因为欧洲人通过此商路供给枪支和其他商品),阿鲁巴人内部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后起的城邦彼此攻伐,其中伊巴丹作为新生力量在 1840 年建立起帝国,并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80 年代。约鲁巴人的其他两个部落埃格巴和伊杰布反对伊巴丹的统治,并联合其他敌对势力,在 1877 年发动了一场持续 16 年的战争。通过利用传教士,英国成功地介入战争,并在发动殖民征服前给此地带来了短暂的和平。

各场战争对约鲁巴影响深远。在 19 世纪的头 40 年里,数千难民不得不迁移到其他地方去适应新的环境。阿贝奥库塔、奥凯奥丹、伊巴丹和伊贾耶等新城市最初都是难民营。在伊莱-伊费,莫达克克(Modakeke)难民没有被成功地融合,因此造成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部落间的冲突。人口的迁移使奥约-约鲁巴的体制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诞生了新的中心城市。随着军事首领成为主角,政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伊巴丹,建立了一种与传统的约鲁巴君主制相左的军事共和国。在伊贾耶,城邦在 1862 年垮台,它的领导人库伦米建立了个人独裁统治,其类型和规模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统治得如此成功,以至其臣民害

34

怕他甚于害怕神。而阿贝奥库塔则建立了一种联邦政治体系，将城中几个区域的大酋长都吸纳进来。约鲁巴人的经济也受到了影响。为了进口枪支进行战争，以及维持军事首领们奢侈生活的需要，使用奴隶劳动变得更加广泛，以满足国内需求和外贸所需的棕榈油和棕榈仁。约鲁巴内陆的经济被与沿海的贸易融合。靠近港口的伊杰布和埃格巴成为中间商，它们对商路控制的企图导致了政局的不稳和英国对沿海城市拉各斯的干涉。尽管极少数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胸怀大志，力图变革，但约鲁巴人还是在内耗中度过了 19 世纪。

在南部的其他地方，商业竞争和城邦扩张是两项重要主题。约鲁巴的强邻贝宁王国在 19 世纪逐步走向衰落。由于对王位的激烈竞争、统治者的软弱、内战、各省的反叛、战争和掠奴对经济造成的破坏，以及由于贸易的控制权转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部落而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贝宁带着明显的衰落迹象进入 19 世纪。1897 年，英国的入侵给贝宁的独立画上了句号。

在经济已经转向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尼日尔河三角洲，人们担心的主要是如何应对 1807 年之后奴隶贸易的取消，以及引进的棕榈生产的新贸易。向新经济的转型取得了成功，尽管它使欧洲人介入到了地方政治中。这些变化的深远后果之一是一个新的商人阶层崛起，他们在棕榈油和棕榈仁的贸易中获利，虽然在卡拉巴尔的商人也拥有由奴隶劳动的棕榈种植园。这个新阶层很快就利用其财富去获取权力，因此同控制"社"的旧贵族发生了冲突。与在该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不一样的是，欧洲商人深深地卷入对贸易的控制和国内政治中，因而产生了欧洲人与尼日利亚人贸易竞争的局面。欧洲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干涉：英国海军在大西洋巡弋来阻止奴隶贸易；地区的衡平法院(Court of Equity)经常干涉地方的司法决定；欧洲人竭力确保地方经济和政治决定有利于他们；并且欧洲企业决意向内地渗透，来减少地方中间商的控制并增加自己的利润。像奥波博的贾贾和伊特塞基里地区的纳纳等地方领导人成为与欧洲人商业竞争的英雄。在 19 世纪末，英国采取措施强化了他们对该地区的殖民控制。

35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北部是伊格博人，他们为土地争端、价格制定和债务偿还打了几场小规模的战争。在其他地方，城邦出现后创造了稳定的局面，但在伊格博地区，一个宗教兼商业组织“阿罗丘库”（简称“阿罗”）是主要势力。“阿罗”利用他们的商业网和神灵控制了很多村镇。奴隶贸易的结束预示了“阿罗”的衰退。与他们的南方对手一样，伊格博人必须应对新的“合法贸易”、传教士的渗透和不断增多的欧洲人。

在北方，由谢赫奥斯曼·丹·福迪奥领导的吉哈德（圣战）创立了索科托哈里发帝国，这是19世纪西非最大的国家。圣战的背景是豪萨城邦的危机和伊斯兰领导人想借助宗教来改造社会。在18世纪，豪萨社会经历了城邦之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随着王权的建立和有才干的伊斯兰学者、法官的增多，城邦变得纷繁复杂，得到高度发展。政治野心司空见惯，继位之争比比皆是。在经历了代价高昂的、野蛮的战争后，西北部的戈比尔强势崛起。商人和国王们变得富有，他们奢华的生活激怒了穷人和虔诚的穆斯林。积累财富的手段涉及腐败和对穷人的不公正对待。赋税沉重，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激增，蓄奴现象普遍，征兵扩军毫无节制。伊斯兰教的规定得不到严格执行：很多人仅仅是名义上的穆斯林；传统宗教被糅合进伊斯兰教激怒了虔诚的穆斯林；并且只有极少数人投身于传教活动。

谢赫丹·福迪奥成功地将许多被剥夺公民权和不满的人聚集到一起，促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他是富拉尼族人，这个民族掀起了19世纪西非大部分伊斯兰运动。他是作为一个有献身精神的、积极从事传道活动的教师和传道士走向成功之路的。福迪奥生于1754年，上学很早，20岁就开始传道。他以戈比尔城邦为基地，聚集了很多学生和追随者，鼓动他们要虔诚信仰。到1788年，他被戈比尔的国王承认为一位有影响的传道士，并获得一系列特权。然而，这没有持续下去，因为新国王在1802年对伊斯兰教团体实行了严厉的规约。皈依伊斯兰教被限制，禁止男子戴巾、女子戴面纱，并且不允许出现新的传道士。丹·福迪奥和政府的关系恶化到他被勒令离开他及其追随者居住的德

36

盖尔。此时，丹·福迪奥已写了很多文章来论证吉哈德的正当性。模仿先知默罕默德，他在 1804 年 2 月 21 日发动希吉拉[①]前往古杜，以退为进，准备宣战。谢赫成为埃米尔埃尔-穆米尼(信徒的领袖)，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戈比尔国王派出征讨队，最终引发了 1804 年的战争。谢赫丹·福迪奥号召各地给予支持，向豪萨地区许多伊斯兰领导人分发旗帜进行吉哈德，并在几年内取得了胜利。

从宗教领导人的观点来看，发动吉哈德主要是想改革伊斯兰教，使它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也是一种将它转播到“异教徒”地区的使命，以及解决腐败和压榨穷人问题的需要。然而，还有其他的相关原因。一个是社会的：吉哈德可以被解释为一场穷人反抗压迫性的税收和政治阶层高压控制的社会运动。另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拉尼人感到被排斥于权力之外，同时该部落的其他人则抱怨被边缘化。后来事实证明，吉哈德以及之后的权力再分配使富拉尼人从中受益颇多。

伊斯兰运动得以占领辽阔地区——从北部的亚达尔和阿加德兹到南方的约鲁巴的北部边界；从西部的马西纳到东部的巴杰尔米[②]——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奥斯曼·丹·福迪奥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他能吸引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许多杰出的学者和将士也接受了他的领导。很多人加入伊斯兰军队来反抗贵族统治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吉哈德鼓动起了穷人反对城邦的群众起义。豪萨国王们未能联合起来反对穆斯林，被迫进行防御性的战争。在吉哈德爆发之前，豪萨城邦间的内战削弱了自身力量，并且彼此互不信任。国王们不能赢得臣民的爱戴，民众选择当一名圣战者。穆斯林们也赢得了宣传战——吉哈德将改革伊斯兰教、解放被压迫的人，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将迎来拯救者马赫迪。普通士兵甚至相信战死是非常荣耀的，会升入天堂。

37

① Hijra，意为“迁徙”、“出走”，指默罕默德于公元 622 年 9 月为躲避迫害，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译者注

② 位于今乍得境内。——译者注

吉哈德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豪萨城邦崩溃，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神权国家——索科托哈里发王国。旧王朝被新王朝取代，新王朝主要由富拉尼的诸位埃米尔建立，他们的后裔一直统治到今天。哈里发王国由住在索科托的苏丹统治，其下各酋长国由苏丹任命的埃米尔统治。埃米尔们行使着国王的权力，但要通过缴纳贡赋和参加打击哈里发敌人的军事征伐来表达忠心。所有主要的城邦官员都被要求效力于伊斯兰教的兴盛。

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有了复兴：进行了改革；有新的地区被并入到伊斯兰势力范围；出现了学术繁荣；并且一些人从吉哈德中掌握了宝贵的经验，其中像塞库·阿哈迈杜和哈吉·欧麦尔在西苏丹发动了更为成功的圣战。

其他地区的政治也受到了影响：随着吉哈德蔓延到南方，它导致了奥约帝国的垮台和伊洛林酋长国的创立。吉哈德也蔓延到中部的部分地区。在东北部，它终结了加涅姆-博尔努地区历史悠久的塞法瓦王朝，加涅米王朝趁机取而代之。因为无法控制圣战者的军队，塞法瓦转而向著名的领导人和神职人员加涅米寻求保护。加涅米告诫圣战者不应当攻击另一个伊斯兰城邦，他成功地阻止了军队的屠杀，进而篡夺了政权，并且得以在 1837 年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欧麦尔。欧麦尔在 1846 年取缔了塞法瓦王朝，开创了加涅米王朝，但他对宫廷礼仪几乎没有做出改变。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 1880 年。此后，由于一些省份能力增强后重新获得独立、丧失了对东苏丹穿越撒哈拉商路的控制、来自苏丹的拉比赫·法德拉拉的入侵，以及后来英国、德国和法国的领土瓜分，这个帝国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衰落。

38

在北部很多地方，人口要么已迁徙，要么构成族群发生改变，原有的城镇规模被扩大，且又产生了新的城镇。随着种植园面积的增长和很多工业规模的扩大，经济得到发展。哈里发王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拉动了地区和长途贸易。伊斯兰学术研究在所有城镇繁荣起来，并产生了大批经典书籍。圣战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快速传播，同时

20世纪的北方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哈里发统一的统治结构来组织现代政党,从而统一北方的辽阔地区。

当所有这些事件正在开展的时候,那些与欧洲人有关的事件也正在发生。下一章我们将转到这些其他的变化上,以完成对现代尼日利亚的基础和20世纪发展背景的讨论。

# 第三章　欧洲人的渗透

19世纪，欧洲人接连不断到来，这影响了尼日利亚的社会。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欧洲人深入内地，他们原有的主要驻扎在沿海的模式被改变了，到这个世纪末，殖民统治已建立。欧洲人的活动涉及四个主题：探险、传教、贸易和帝国主义。它们都相互关联——探险者为其他人提供了有用的知识，并鼓励商人前往内陆；传教士担当殖民主义者的开路先锋；商人需要靠帝国主义获得利润，他们和传教士一起向英国政府施压夺取尼日利亚。在这一章，我将分析探险者、传教士和商人的活动是怎样影响这个国家的。

## 探险者

虽然欧洲人进入非洲已经有很多年，但是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对非洲内陆的了解都很有限。例如，他们尚未确切知道尼日尔河的走向或它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关系。1787年英国成立了非洲协会以探索尼日尔河河道。几位英国探险家——芒戈·帕克、休·克拉珀顿和兰德兄弟——是探索尼日利亚内地，特别是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两岸及河道的领导人。芒戈·帕克到非洲旅行过两次，收集了关于尼日尔河道的信息。19世纪20年代克拉珀顿和德纳姆从北非旅行到尼日利亚北部。30年代兰德兄弟从巴达格里南部旅行到布萨北部，再从那里到贝

努埃河交汇处，随后他们意识到尼日尔河在油河处流入大西洋。

虽然有一些人兴趣在科学知识上，但想搞清楚内陆的商业价值是推动探险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报告被送到商业公司和商人的手中，他们也捐助了探险活动。很多报告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正等待被所谓“受诱惑的”外国人来开发资源的国家。有些报告带有如何与不同社会统治者打交道的提示。在一些地方，如博尔努和奥约，统治者要求探险者提供军事和政治帮助。然而，在另一些地方，如索科托，统治者小心谨慎，怀疑探险者的动机。探险者总是尽可能地美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好像在为这里的统治者最终接纳他们做准备。

## 传教士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基督教传播到尼日利亚许多地区。先前的努力大都不成功，这是因为奴隶贸易占据主导地位、传教士的人数有限、传教经费不足、主流观点认为没有必要让非洲人皈依基督教、传教士对传统宗教无知，以及缺少来自非洲人及其统治者的合作和兴趣。在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基督教会重组，传教事业大勃兴。走在前面的是一些新教团体和天主教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呼吁取消奴隶贸易，主张基督教会应当帮助铲除奴隶制，认为使用武力不足以阻止奴隶贩子的活动。一些新的皈依者在精神上被灌输要废除奴隶制和其他无法忍受的行为，转而接受源自基督教的新的道德规范。另外，这些皈依者通过种植或买卖经济作物从事“合法贸易”。因而诞生了“圣经与耕地”的说法，这是指改宗与商业相结合，由此产生了一个拥有不同世界观和道德标准的新的非洲人阶层。这种观点期望，这个新阶层不再受所谓旧传统的腐蚀。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成为反对伊斯兰教的斗士。欧洲传教士谴责伊斯兰教在非洲人中制造了罪恶，阻碍了基督教的传播。1842年到1892年间，欧洲和美国的很多教会团体派遣他们的传教士到尼日利亚地区。

41

一些为人正直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作为牧师和领袖人物被招募为教会工作，以便在当地建立一个“自我管理、自给自足、自我传播的

教区。"[1]当欧洲人进入非洲的时候,他们总是扮演说教者和领导者,想方设法向非洲人移交责任。这种以"土著代理"著称的战略降低了传教的成本,从热带疾病中拯救了欧洲人的生命,并利用本地人加速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督教王国"。因为废除了奴隶贸易,很多来自塞拉利昂、古巴和巴西的前奴隶从19世纪30年代后开始返回尼日利亚。欧洲教会对这些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将"文明之光撒向周边地区。"[2]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教会工作人员或以自己的名义积极宣传基督教。像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托马斯·伯奇·弗里曼和J.C.泰勒等人都因忘我地工作而出名。早期的皈依者也从事不同的职业,要么传播基督教,要么从事与教育或卫生有关的职业。

英国组织的一支较早的考察队叫做"尼日尔传教团",它于19世纪40年代抵达尼日尔河流域。尼日尔传教团的动机囊括宗教、商业和政治;传教团计划传播福音,建立一座示范农场,开拓贸易机会,与当地统治者签署合作条约。它成为正教传教会(C. M. S.)的一个成功案例,在非洲牧师与其欧洲伙伴之间的种族政治关系上,提供了宣讲福音的策略和有益的经验。尼日尔传教团的传奇人物之一是阿贾伊·克劳瑟,一个被释放的埃格巴奴隶的后代,他被提升为正教传教会的第一位非洲主教。

很多传教团在尼日利亚南部各地站稳脚跟。正教传教会在约鲁巴(包括拉各斯、阿贝奥库塔、伊巴丹、伊莱沙)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该传教会视阿贝奥库塔为基督教传播的中心,最初在那里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卫斯理公会在约鲁巴人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于1842年最早在巴达格里传教。长老会派在1840－1890年间在卡拉巴尔较活跃。罗马天主教会同样很活跃,在拉各斯、阿贝奥库塔、奥约和伊巴丹的约鲁巴人中,以及东部的伊格博人中打下了牢固

42

---

① 转引自 J. F. Ade Ajayi, "Henry Venn and the Policy of Development", in O. Kalu, ed.,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80, p. 63。

② 转引自 "Introduction," in O. Kalu, ed.,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west Africa*, p. 2。

的基础。

欧洲和非洲传教士的共同努力效果显著。出于各种原因,地方统治者和民众接受了基督教宣讲或传教士的到来。对于约鲁巴统治者而言,他们期盼传教士能帮助他们赢得战争和设法获取武器弹药。对那些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统治者而言,他们的愿望是传教士能促进贸易发展,提高三角洲商人掌控与欧洲人商业关系的能力。当邦尼酋长们接待传教士时,他们表示希望传教士能“教会他们丈量油桶、算清账目和读写书信的能力。”[①]一些三角洲地区的国王请求传教士为他们的人民创建学校,从而培养出一个管理阶层。

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在南方传播,并逐渐扩展到尼日利亚的中部和北部,尽管规模有限。在西南部,它不得不与伊斯兰教共存,而在“征服”北部伊斯兰教时遭遇惨败。它还挑战本土宗教,尽管后者在整个 19 世纪仍然势力强大。

基督教与社会很多方面的改革和变化联系在一起。它的传播涉及传教士与当地统治者的政治互动。传教士干涉地方政治,如他们要求废黜拉各斯国王科索科。他们也充当和平调解人,如在约鲁巴人中劝解各方结束战争。在获得国王和酋长信任的地方,他们甚至扮演起大使的角色。然而,传教士们都更想建立英国统治,以便他们有更大的传教空间,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传教士们创办西式教育。在很多地方,教堂和学校连在一起。这有助于使人们转变信仰,因为家长们只要能够获得教育,便愿意将他们的孩子送到教会。基督教和西式教育培养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们后来控制了国家的政治、商业和需要专业技术的部门。该阶层的许多人接受了西方文化,开始思考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改造尼日利亚。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国家应当逐步抛弃它的很多传统,向西化迈进。另外,该阶层推动了对尼日利亚许多语言的研究,使包括约鲁巴语

43

①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 G3A3/1884/166, Pratt to Crowther, September 9,1884.

在内的一些语言成为可书写的语言。他们开始使用英语或当地语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因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

这个新的精英阶层处于民族主义活动的最前沿,而民族主义活动开始于殖民统治的初期,并最终导致国家的独立。传教士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的深受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中间阶层。在社会应当改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精英们显然存在分歧,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应当承担起领导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的责任。他们在基督教内部开始了坚持自身权利的过程。在尼日尔传教团,克劳瑟等人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被剥夺了权力。在 80 年代抵达的白人传教士赤裸裸地反对尼日利亚的精英分子,认定他们在教堂里仅仅是皈依者而不是领导人。他们也反对由非洲人自我管理教堂的做法。像正教传教会主教詹姆斯·约翰逊这样的要员也遭到了羞辱,白人传教士们认为他们的尼日利亚同伴缺少领导人的素质。民族主义者的反应是退出。例如,19 世纪 80 年代,尼日利亚人另起炉灶;建立了土著浸礼会,就是为了反对南部浸礼会传教团在神职人员的任命上对尼日利亚人的歧视。很多由尼日利亚人创建和管理的土著教堂支持一夫多妻制的习俗,这与传教士们宣讲的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传教士的影响延伸到提供卫生设施、基础建设等很多方面,并逐步扩展。另外,他们鼓励信徒们从事经济活动,以维持生计。他们建立了示范农场和种植园,尽管最终都没有成功。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使信徒们对新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有了兴趣,不断尝试欧洲商品,因而提高了进口。他们引进了诸如甘蔗等新作物,推动了后来成为出口主导产品的可可的栽种。新的木工、砖瓦工和印刷技术被引进,促进了一小部分人创建了自己的小企业。

44

在转变人们信仰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必须要谴责土著宗教和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基督教比现存宗教优越。本土的神灵和巫师被描绘成“异教徒”和“恶魔”,而社会本身成为恶魔撒旦存在的基础。在可能的情况下,传教士们毁坏当地的神庙和图腾,攻击像一夫多妻制这样的习俗。一些激进的传教士甚至批评像唱歌、跳舞和讲故事这些非宗教的

文化活动。在传教士取得部分成功的地方,他们得以破坏古老的价值观和文化。新皈依者经常参加这种改革活动,因此造成了他们社会的分裂。然而,很多尼日利亚部落到 20 世纪还在固守其传统。

在 19 世纪期间,基督教并没有试图将自身本土化。传教团由海外资助和控制;牧师是外国人。当欧洲基督教行为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时,本土的被认为要让位于外来的。基督教的宣讲、标志和仪式基本上都是“外国的”。如何把基督教变得对尼日利亚人更有意义成为该宗教在 20 世纪面临的挑战之一。

## 贸易关系

废除奴隶贸易和将贸易转向原材料——所谓的合法贸易——成为 19 世纪欧洲与尼日利亚商业关系的两项重要内容。贸易将更多的欧洲人带到尼日利亚沿海,并导致各个社会发生重大的重组。

与 18 世纪工业革命有关的经济变化使奴隶的使用不再成为必要。原材料和制成品贸易的有利可图使需求产生变化。另外,积极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对奴隶贸易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呼吁将其取缔。很多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在道义上抨击奴隶贸易。1807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使奴隶贸易成为非法,并在 1833 年禁止本国公民蓄奴。尽管相当缓慢,但其他国家还是逐步加入到英国的行列。在控制奴隶贸易方面仅次于英国的法国,在 1815 年废除奴隶贸易,并且美国早在 1807 年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许多国家通过了反奴隶制法案,并达成协议控制海上运输和逮捕奴隶贩子。英国建立了一支海军中队在西非海域巡弋。在贝宁和比夫拉海湾被逮捕的违法的奴隶贩子,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接受审判,他们抓获的奴隶被释放后重新安置在弗里敦殖民地。海上巡逻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不仅因为牵涉区域太广,还因为很多欧洲奴隶贩子的反抗。在 1811 — 1870 年间,仍然有超过 200 万的奴隶被抓捕,他们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和贝宁共和国,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带往巴西和古巴,那儿的需求量很大。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奴隶贸易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衰落,最后一艘驶离布拉斯的运奴船在 1854 年。

拉各斯和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40 年代，1851 年英国占领拉各斯是对奴隶贸易的沉重一击。到 19 世纪 60 年代，许多奴隶贩子不得不承认奴隶贸易的时代已过去。在美国，反奴隶制的法案得到严格执行，同时巴西和古巴也停止输入奴隶。

工业革命产生了对原材料和销售制成品市场的需求。尼日利亚拥有一些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其民众也要购买进口产品。奴隶贸易的废除要求对新的经济需要做出快速调整。正如所预料的，原先的奴隶贩子抵制废奴令，只要欧洲人的船只能够到达他们的海岸，他们就从尼日利亚继续提供奴隶。酋长和商人中为是否还要继续奴隶贸易产生分歧，并导致政治冲突。这种冲突将英国卷入到拉各斯的内部政治纷争中，他们支持反对奴隶贸易的酋长。这是一个由英国人起草的各式条约的时代，它终结了奴隶贸易，为英国公司带来了贸易便利。在某些情况下，违背条约成为英国干涉当地政治的理由，尽管英国人自己充满了欺骗，并且经常不遵守条约的规定。

在与欧洲奴隶贩子继续合作直到环境不再允许的同时，一些尼日利亚人也开始了扩大出口作物的生产，从贸易转型中获利。原先卖往国外市场的奴隶被转而用于国内，特别是作为农场工人。先前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的精英阶层经过持续调整后，开始使用奴隶大规模地生产出口作物。

46

“合法贸易”强化了欧洲与尼日利亚的关系。很多欧洲公司与尼日利亚建立了贸易联系，在拉各斯、卡拉巴尔和邦尼等城镇派驻了贸易代表。通过 1861 年在拉各斯建立领事馆，英国更直接地施行控制来保护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领事将地方统治者置于他的影响之下，确保他们不会采取对英国经济利益有害的政策。在一些势力强大的地方中间商控制贸易的地方，如在老卡拉巴尔的埃格博，领事会设法削弱他们。

欧洲商人沿着海岸抵达尼日利亚各港口。在 1875 年前，商人们只在沿海城镇开设店铺和货栈，之后开始迁到内陆开设店铺。欧洲公司主要经营进口产品，包括枪支弹药、珠子、五金器具、烟叶、盐、铁器、纺织品和烈性酒。盐、铁、纺织品和烈性酒构成进口总值的 3/4。由于是

规模化生产，它们比本土产品便宜。从尼日利亚方面看，出口产品包括棕榈油、棕榈仁、橡胶、咖啡、靛蓝、胡椒、花生和可可。菜油，主要是棕榈油，是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时间的主要出口产品，因为它们是制造蜡烛和肥皂的重要原材料，到19世纪50年代又被当做机器的润滑油。尼日尔河三角洲是其主要产地，这也是欧洲商人为什么称尼日尔河为“油河”的原因。在19世纪下半叶，花生和棕榈仁也成为大宗商品，前者用来制造肥皂和油，后者用来制作人造黄油和牲畜饲料。

交易用现金或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除了已有的货币外，增加了诸如英国硬币、西班牙银元，以及从西班牙、葡萄牙和美洲输入的达布隆[①]等新的货币。信用体系中的信贷贸易在用进口的制成品交换原材料时相当普遍。大供货商(主要是欧洲商人)先把货物赊给他们的尼日利亚代理商，后者反过来将货物卖出后购买当地产品，要么用欧洲货物交换当地产品。几个月后，代理商用原材料偿付对欧洲人的赊欠。为保护自己，欧洲商人要求代理商请当地统治者做担保人，这样，如果出现意外，可以在欧洲政治代理人如领事出面之前，抓住债务人。

信用体系虽然使尼日利亚商人能够用有限的资本把生意做活，但它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包括很多由失信和竞争导致的冲突。首先，信用体系确保欧洲商人通过强迫代理商将货物卖给他们而控制贸易，即使在无利可赚的时候也是如此。欧洲人通过剥削他们的非洲代理商，甚至在初始合同已经完成时仍然要求加大供货的方式来滥用这套体系。一旦本地代理商接受了信贷，他就必须供应货物，即使价格上涨或者另一个欧洲商人提供更高的价格也得如此。一些不良商人——那些低价卖出进口货，高价买入出口货，以优惠条件进行交易的、新来的欧洲商人——努力寻找那些准备毁约的代理商。有些代理商通过收取两家或更多的欧洲代理商的贷款也成为“双重信用者”。当他们无法供应货物

① Doubloon，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双面的”，即在硬币的两面分别铸有西班牙15世纪下半叶的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伊萨贝拉的头像，每枚重约6.77克拉。主要流行于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殖民地，葡萄牙及其拉美殖民地也曾使用。19世纪中叶后，西班牙逐渐停用，但在拉美仍流通。——译者注

时,在欧洲商人与代理商之间,以及欧洲竞争者之间就会发生冲突。此外,代理商总是处在负债和缺乏竞争力的状态中,因而降低了可能存在的利润,削弱了积聚财富的能力。一些信贷后果非常严重,以至有些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人开始呼吁用法律的形式取缔它。举例来说,报纸曾报道,接受了大量信贷的人患上了及时挥霍狂想症:

> 通常,接受了大量的信贷就会立即过上新的生活方式;贪婪的欲望急速膨胀;奢侈品、贵重物品和欧洲式的享乐生活,以及奢华的外国时尚变得必不可少;建造大房子,然后进行豪华装修——在有些案例中,妻妾的数量迅速增加,再配上许多仆人,甚至越过司法许可的界限,使用大量的奴隶。这些人滥用信贷——并最终将他们自己和他人带入痛苦的纠纷中。暴发的绅士们,像他们暴富一样又快速地变成穷光蛋![1]

尽管有很多问题,贸易仍推动了许多本土商人的出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富有。这些住在沿海商业城镇的商人是经纪人和中间人,负责用尼日利亚的内陆产品交换进口的欧洲商品。巨额的财富汇聚到成功商人的腰包。19 世纪后半叶,当蒸汽船的使用让更多的人参与经商变得可能的时候,一个新的商人阶层——被称做"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也加入进来。他们是以拉各斯为大本营的自由奴,毕业于教会学校,养成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他们重新打理他们的生意,参照欧洲企业的模式充当零售商和欧洲各家公司的代理商。当很多人继续接受欧洲人的赊货时,另一些人在艰难地与欧洲人进行直接贸易。有些尼日利亚企业家变得如此富有和成功,以至他们开始和欧洲企业进行竞争。

48

各个层面的贸易都存在竞争。在尼日利亚人中,那些内陆商人与他们的沿海同行相竞争,并指控后者经常欺诈他们。内陆商人和小贩

① *The Lagos Times and the Gold Coast Colony Advertiser*, August 8,1881.

希望与欧洲人建立直接联系。在约鲁巴人中,最靠近海岸的埃格巴人和伊杰布人关闭了商路,以阻止欧洲人向内陆的渗透。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要求打破沿海商人的贸易垄断引发了很多冲突。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是于 1854 年在邦尼成立了衡平法院,这是一种有权解决争端的商业或贸易协会。成员由有影响力的欧洲和非洲商人组成,主席由"白人商务负责人担任,月月轮换。"①尽管只是一个非官方的仲裁机构,但法院能够解决一系列争端和规范贸易。它在 1872 年得到英国政府的法律认可。

欧洲商人之间也存在竞争。当英国企业在贸易中起主导作用时,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企业在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到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商人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他国家,这归因于他们充分利用蒸汽船、提供更加廉价的进口货物,特别是酒的能力以及德国广大的牲畜饲料市场。各个国家的商人为市场和代理人而相互竞争。本地商人联合起来反对那些"游击"商人。1852 年后蒸汽船开始定期航行,这降低了运输成本,使更多的商人(没有自己的蒸汽船)得以参加贸易。已有的企业与新来的企业有摩擦。随着探险家和传教士深入内地,他们为有雄心的商人提供了资料。80 年代欧洲商人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促使一些公司迁入内地,以便越过尼日利亚中间商,增加利润空间。激烈的竞争最终促使一个贸易垄断特许公司的建立——皇家尼日尔公司(RNC),它也是一个成功的领土侵占代理机构。

## 皇家尼日尔公司

49 RNC 的英雄是乔治·陶布曼·戈尔迪先生,一位野心勃勃的英国商人和帝国建立者。他是英国占领尼日利亚的功臣之一,主要是利用它的贸易公司在尼日尔河上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帝国,为在非洲的其他特许公司树立了一个榜样。

---

① 转引自 K. O.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 — 18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p. 126。

1877年，经商的戈尔迪来到了尼日尔河下游，当时，欧洲商人之间以及他们和尼日利亚商人之间的竞争都很激烈。三角洲酋长们通过对经过他们水路的商人征税而获利丰厚。缴税、维持大量的代理商和确保雇员安全，降低了欧洲商人的盈利空间。戈尔迪的设想是大家联合起来。1879年他将所有英国贸易团体并入一个公司——非洲联合公司(UAC)。与两家法国公司的进一步竞争，以及来自喀麦隆的德国人的逼近，促使戈尔迪进一步重组非洲联合公司。1882年，他将公司改名为国民非洲公司(NAC)，注册资金从20万英镑增加到100万英镑，并向公众出售股份。虽然不能兼并两家竞争的法国公司，但他设计将他们的商品价格降了24%，迫使他们退出经营。他又利用德国和法国对这一地区殖民扩张的威胁，向英国政府申请皇家特许权，来控制贸易和领土。特许状在1886年被授予，并且公司获得了另一个名字——皇家尼日尔公司。虽然特许状禁止公司排挤尼日尔地区其他公司，禁止其将领土转给其他国家，但它授予公司统治那些签有保护条约的地区的广泛权力，包括扩展新的领土，征收关税以维持行政机构的运行，以及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

特许状使RNC直到1899年为止一直在尼日尔河下游地区能像政府一样运行，充分代表了英国的存在。它将总部设在尼日尔河畔的阿萨巴，拥有一个行政机构、一支警察部队和一座高等法庭，公司不仅对贸易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它也开始政治统治：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在该地区经营的公司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费用，德国和法国的公司被迫逃离。戈尔迪与不同的酋长签署了约37个条约，获得了干涉地方政治的权利。当外交失败的时候，他可以动用一队炮艇以武力惩罚那些攻击公司贸易处的城镇和统治者，并支持那些与公司结盟的当地统治者。RNC也把许多尼日利亚人排斥在贸易之外，导致他们不止一次攻击其商站。公司建立了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和中部部分地区的控制。这个“帝国”让远在英国的持股公众获益，使他们分到了大笔的红利，政府也获益，但政府后来逐步控制了原先由公司占领的地区。戈尔迪毫不避讳使用种族主义、高压手段和过度使

50

用暴力——土著人(他这样称呼尼日利亚人)只有与他合作,才是有用的生产者。

## 贸易、政治和社会

尼日利亚社会的精英分子深刻感受到了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同前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原材料贸易催生出规模化的生产。如果说奴隶贸易压制了经济,那么"合法贸易"则使上百万的人在种植固定的粮食作物外,又种植经济作物。良好的农业条件,正常的货物销售渠道,以及传教士和其他人的宣传,确保了农民和奴隶的生产。像棕榈油和棕榈仁等产品只需要简单加工,因此又刺激了大规模加工企业的出现。成百上千的商人成为从农场到欧洲大工业长链中的一部分。由于加入者只需要极少的资金投入,很多人都能够加入到这根链条中。

经济的增强也反映在劳动力关系上。那些没有大规模生产机会的地区的人们选择向其他地方迁移。然而,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劳动力主要是奴隶。统治者和富商获取奴隶为他们干活。他们有时也被当做抵押品,也就是说,他们被当做贷款的利息为债主工作到借款被完全付清。

尼日利亚的经济转向为国外市场而生产。在出口作物的生产有回报的地方,它被优先于粮食生产。在主要进口纺织品和酒等奢侈品的地方,贸易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在社会方面,而不是经济。由于贸易受到价格和供应量波动的影响,生产者和本地贸易者的收入无法预料。尼日利亚商人的兴起与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数上规模的地方,例如在拉各斯、阿贝奥库塔和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城邦,尼日利亚商人开始寻求参与政治,其中一些商人批评酋长们恪守传统,对机会反应迟缓。

51

作为棕榈油的主要生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是观察上述变化中大多数的最佳地点。能够从事生产和贸易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原来的奴隶和其他身份低下的人也可能获得权势。在此之前,一部分从奴隶贸易中获取财富的贵族阶层,已经控制了卡拉巴尔、布拉斯、大邦尼、新卡拉

巴里、伊特塞基里等5个重要城邦。奴隶和平民得以加入到棕榈油生产中,并且其中的一些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开始用钱来获得在这5个城邦的地位和权力。在布拉斯和新卡拉巴里,他们中的一些"新人"成为"氏族"的首领,而在伊特塞基里,一个叫"纳纳"的平民竟然对王位开价,尽管他被否定了。在卡拉巴尔,发生了一场社会革命。奴隶和受压迫的人建立了歃血兄弟社,他们迁到夸伊博河上一个单独的社区,开始要求实行社会正义和权利平等。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邦尼,当地的贵族和奴隶争夺王位。前奴隶阿拉里在36年的时间里(1830—1866)一直是"安纳佩珀尔社"(Anna Pepple house)的首领,并且是这个城邦最有势力的人。在他死后,一位伊格博奴隶贾贾继承了他的位置。当贾贾在1868年受到一个敌对氏族攻击时,他战略性地迁移到奥波博,切断了邦尼和伊莫河之间的贸易联系。后来他没有选择返回邦尼,而是在奥波博建立了一个自治城邦,成为这个蒸蒸日上的贸易帝国的国王和领袖。但贾贾的成就和他的同辈们一样,被欧洲人的渗透所削弱。

# 第四章　英国人的征服与当地人民的反抗

53　对尼日利亚的征服是欧洲人各种利益和尼日利亚各族民众之间多年交往发展的一个巅峰。截至 19 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并没有把殖民占领提上日程:对热带疾病的恐惧和高昂的扩张成本阻碍了任何野心勃勃的帝国计划,那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得以控制教会和行政部门的重要职位,未来似乎是掌控在他们手中。尽管如此,英国人没有从尼日利亚撤出。1849 年,他们任命约翰·比克罗夫特为西非沿海的领事,驻扎在费尔南多波[①],负责管理“合法贸易。”[②]1880 年时,英国的殖民地和影响力仅限于拉各斯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但到了 1905 年,整个地区都处在英国统治之下。除了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非洲其他各族人民都有类似的、作为欧洲瓜分和争夺殖民地行动的一部分而被征服的经历。殖民占领的动机包括确保各自国家更大的经济利益,阻止竞争势力的插手,以及通过争夺海外领地来解决欧洲的政治和外交难题。

---

① Fernando Po,西非比夫拉湾的一个小岛,15 世纪末由葡萄牙航海家费尔南多·波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该岛地处西非重要的战略位置,在 1778 年被西班牙占领,在 1827 年又被英国接管,改名为克拉伦斯,作为在西非打击奴隶贸易的一个海军基地。——译者注

② Public Record Office (P. R. O), London, FO 84/775, Draft of Beecroft's Appointment, June 30, 1849.

与非洲其他地区一样，对尼日利亚的瓜分发生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为了尽量减少因为殖民争夺引发的紧张局面，德国在1884－1885年主持召开了柏林会议，讨论欧洲对非洲的入侵。在达成原则协议之后是对非洲的疯狂争夺，相互竞争的欧洲列强都竭力得到“有效占领”的证据，以向别国证明他们已经统治他们征服的地区，或已建立“势力范围”。尽管有别国的抗议，保护国依然宣布占领的地域从沿海伸向内陆。欧洲人通过边界条约或谈判解决了他们的争端，完全不管尼日利亚地方统治者的态度。

54

法国、英国、德国、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参与了对尼日利亚的争夺，彼此勾心斗角。为了先声夺人，他们都不择手段地使他们的要求“合法化”。1884年，英国抢在法国和德国之前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签署了一项条约。领事和总督们把为帝国占领做出贡献看做是获得升迁和满足个人野心的一种方式。那些在拉各斯和尼日尔河三角洲经营的欧洲商人，要求用政治控制来建立贸易垄断。雄心勃勃的商人们梦想通过没被开采的矿藏得到黄金和钻石，梦想得到生产大量原材料的农场和能够消费制成品的市场。欧洲人把殖民争夺看成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认为征服可以显示国家的实力，即使这块地区不一定具有经济价值。殖民地因此成为鼓吹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手段。不少人还表露出种族主义观点，认为“优等种族”有权统治“未开化的初民”，以便提高他们的文明水平。

英国对尼日利亚的征服分为两个阶段：1850年到1897年的南部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14年的北部阶段。由于地方首领采取相似的策略，或者只在战败后才投降，外交和武力成为重要方式。许多地方统治者知道被征服是什么后果，明知失败也要尽力抵抗。

## 南部阶段：1850—1897年

1851年，拉各斯在经历了英国人的炮艇袭击后，被迫签署了一项条约，交出了主权。这一事件的起因有奴隶贸易的持续、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的欲望、拉各斯复杂的继位斗争等。其统治者科索科因为支持奴

55

隶贸易而被罢免，一位声称反对奴隶贸易的王子阿基托耶被立为新国王。但是，一部分拉各斯酋长反对废除奴隶贸易，并拒绝同一些英国商人及其同盟者合作。在阿贝奥库塔城附近的一些传教士想把他们的传教工作扩张到拉各斯。他们把支持奴隶贸易的人看成是敌人，渴望英国政府的干预。另外，从 1811 年开始，各方候选人就已经开始以武力争夺拉各斯的王位。在有野心的竞争者眼里，英国人和传教士是可以寻求的支持力量。同样，狡猾的英国人也利用这场纷争，通过支持阿基托耶来使自己获益。1851 年，英国指责科索科拒绝签署一份结束奴隶贸易和支持传教士的条约。1851 年 12 月 26 日，英国海军攻击了拉各斯城，迫使国王和他的支持者逃离，并拥立了新的国王。阿基托耶签署了条约，保证支持传教士工作，给予英国公司最优惠的待遇。作为回报，英国给国王提供安全保护。这是英国在拉各斯和其邻近地区取得的重大进展。英国官员从这里能够监控内地约鲁巴的一举一动。驻拉各斯的领事以有利于英国的方式对贸易和政治进行干涉，1853 年还参与挑选阿基托耶的继承者。

1861 年英国使拉各斯成为自己在尼日利亚的第一个直辖殖民地，任命了一位总督进一步推动贸易。当时，曾讨论过修建一条通道与约鲁巴境内尼日尔河相连的可能性，以开发这一辽阔地区的产品。英国商人在拉各斯逐渐站稳脚跟，传教士活跃于很多城市。英国人对内地的事务很感兴趣。尽管约鲁巴正经历一场内战，但确保出口货物运到拉各斯港成为总督的首要任务。随着控制贸易路线成为外交的一部分和战争的一种策略，英国人想方设法保证商路的畅通。另外，他们通过调停战争，促使 1886 年和平条约得以签署，迫使约鲁巴各邦国听命于总督，并许诺不干涉贸易。

约鲁巴人是否尊重总督，若干年后在伊杰布奥德得到了检验。在这里，鲁莽的伊杰布酋长们拒绝接受传教士，阻断通往内地的商路，甚至剥夺约鲁巴商人进入他们集市的特权，并拒绝接受 1891 年到访的拉各斯殖民地总督卡特提出的那些不受欢迎的条件。一年后，卡特指控他们企图破坏贸易，发动了对伊杰布的进攻。伊杰布民众顽强地捍卫

56

自己的主权,但最终失败。这是约鲁巴人武装抵抗帝国主义的一次重要案例。英国人的入侵成功地征服了约鲁巴人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实上,伊杰布人不仅接受了英国的统治,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接受了基督教教育。伊杰布人的失败削弱了阿贝奥库塔和伊巴丹等其他城邦抵抗的决心,它们甚至没有考虑对英国人做任何武装反抗。这也为英国将约鲁巴其余地区最终并入自己的殖民地作了铺垫。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向伊巴丹派遣了一位特别代表和一支驻军,将势力伸展到内地最有影响的城邦。英国人从这里将影响扩伸到其他地方,要求它们答应合作。但是,在奥约王国首都奥约,英国在 1895 年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征服阿拉芬及其下的各位酋长。阿贝奥库塔被暂时地赋予半殖民地位,但这种特权随后被取消。

在东南部,英国的猛烈渗透导致三角洲的奥波博、布拉斯、邦尼、新卡拉巴尔,东部的奥克里卡,西部的伊特塞基里,以及比尼河周围地区邦国的垮台。三角洲地区的恶性贸易竞争十分厉害。1849 年英国任命约翰·比克罗夫特作为贝宁和比夫拉湾的领事,最终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英国渴望避免同德国和法国为控制这一地区而竞争。正如在下一章要讲的,RNC 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同时,休伊特领事到处签署所谓的保护条约。RNC 用武力赤裸裸地统治三角洲部分地区和尼日尔河下游地区。1891 年英国建立了一个殖民机构,称为"油河保护领"(Protectorate of the Oil Rivers),这标志着其派驻的官员现在开始要插手管理该地区,其商人可以毫无阻拦地从事贸易了。英国也决心将法国和德国排除在这个地区之外。它为领地任命了一位总领事,驻扎在卡拉巴尔,拥有独立的预算、办公人员、军队,并在其他 5 个重要城镇为其设置了副手(副领事)。

57

三角洲的酋长们抵制过这种侵入,因为他们知道这对贸易和主权意味着什么。一些酋长不愿签署任何条约,认为这些是不可信的文件,正如一位酋长指出的,这些将导致他们的领地被占领。[1] 第一次重大

---

① P. R. O. ,FO 84/1117, Hutchinson to Russell, February 12, 1860.

冲突发生在1887年的奥波博,由奥波博的商人兼国王贾贾领导。贾贾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主要是因为他精于做中间商,长于与其他商业城镇结盟,以及与英国进行直接贸易。1885年英国不得不与他谈判,签署了一项保证奥波博主权的条约。然而,他随后的措施威胁到了他的统治。当英国商人试图迁到由贾贾控制的内陆时,冲突发生了。贾贾阻止英国商人接近能赚钱的货源,他惩罚与英国人合作的地方商人,维持与欧洲的直接贸易。所有这些招致英国商人的极度愤恨。尽管贾贾派代表团到英国面见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但H. H.约翰斯顿领事坚持要求他必须答应不得阻拦英商前往他的领地,停止收缴"科米"(comey,过路费),否则将面临军事打击。

在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后,领事邀请贾贾到一艘英国船上讨论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贾贾不疑有诈,登上了英国船只,但马上被捕,被放逐到黄金海岸的阿克拉。他在那里被审判,被指控干涉贸易,拒绝配合领事的行政管理和促进贸易。随后他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在被赦免后,他在1891年死于回程的路上。与对西南部伊杰布的袭击一样,对贾贾的羞辱是向邦尼和新卡拉巴尔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他们必须和英国合作。1891年英国对"油河保护领"的管辖正式开始,其财政来源于进口税。1893年,其他领地的获得导致了"尼日尔沿岸保护领"(Niger Coast Protectorate)宣告成立。

对三角洲西部伊特塞基里王国的占领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英国不得不和纳纳酋长—— 一位富有的商业诸侯,且正如他的头衔所描绘的那样,是比尼河的统治者——进行较量。英国想将伊特塞基里纳入到它的保护领,但被纳纳拒绝。纳纳富有、势力强大,充满自信。令英国商人恼怒不已的是,他深知控制原油市场和掌控贸易条件。他们指控他不仅垄断贸易,而且犯有人祭罪行,这两项成为武力进攻的依据。58 1894年8月和9月,在纳纳拒绝被诱骗上船参加谈判后,军事对抗随之发生。在一位敌对的伊特塞基里酋长的帮助下,一支强大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击败了纳纳。在拉各斯,他被指控犯有阻碍贸易和文明罪,他的对手被任命为政治代言人。另一些小的战争发生在三角洲的其余4

个地区,英国在那里的扩张和征服同样也获得了成功。

1897 年,英国征服了强大且历史悠久的贝宁王国,完全占领了油河流域。英国人把贝宁描绘成一块富产象牙、橡胶和棕榈油资源的土地,所有这些都等待开发,只要它的国王愿意合作。与三角洲各城邦不同,贝宁没有直接与欧洲人进行贸易,而是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贸易垄断。不过,贝宁和伊特塞基里、约鲁巴等邻邦的贸易往来频繁,使之深受与欧洲人贸易变化的影响。贝宁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其势力在 19 世纪遭到削弱,因此为英国的占领创造了条件。当英国领事在 1862 年访问贝宁时,他未能就一些重要的贸易事务与其进行谈判,他的报告把这里的人描绘为支持人祭和奴隶贸易的野蛮人。英国成功地劝服了欧洲其他列强承认贝宁是其油河保护领的一部分。1891 年,加尔韦领事自认为贝宁已受他的管辖,为贸易谈判访问了这座城市,但国王拒绝接见他。第二年,另一位代表带着一份条约出现在贝宁,该条约要求保证贸易自由,并由英国官员做顾问。国王拒绝签署该条约,但他的酋长们签了,英国人认为这已经足够。国王拒绝遵守这项条约,于是英国在 1897 年决定攻打贝宁。英军的第一次进攻由菲利普斯上尉领导,在这首次交锋中,贝宁成功地打垮了英国的军队。在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攻击中,贝宁在经过英勇抵抗后被打垮,王宫被抢劫一空,国王奥翁拉姆文被捕,并被流放,直到他 17 年后去世。这个著名的帝国就此终结。

贝宁以东和三角洲各部族以北居住着伊格博人和伊比比奥人,他们也在 19 世纪末被吞并进尼日利亚殖民地。在这里,英国人不需和王国或城邦较量,但要和以阿罗丘库城神官的神谕为统治基础的阿罗贸易寡头交锋。阿罗是一些成功的商人,他们利用神谕的影响力,组织军队来保住他们在内地的伊格博人与伊比比奥人和沿海的欧洲人之间的中间商地位。为抵制英国人的渗透,阿罗自发地同克罗斯河地区邻近的部落结盟,来组织抵抗和袭击亲英分子。然而,从 1901 年 11 月到 1902 年 3 月,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远征中,英国人靠武力征服了阿罗。

## 北方阶段：1900－1914年

RNC利用它获得的特许状向北部渗透。它以尼日尔河下游的阿萨巴为中心，在1897年攻占了伊洛林和努佩，并同索科托的苏丹和关杜的埃米尔签订了条约。当特许状在1899年被废除时，英国政府迅即采取措施巩固公司取得的成果，并进一步扩大范围，如果需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它建立了一支殖民军队——西非边防军，总部设在杰巴。弗雷德里克·卢加德上尉（后被封为勋爵）被任命为北尼日利亚的高级专员。1900年1月，卢加德升起米字旗，宣布原先由RNC控制的地区改称为“北尼日利亚保护领”。苏丹接到来信得知上述消息后，在回信中表示“极为震惊”，且再也不愿读另一封这样的信了。[①] 卢加德将大本营设在交通要塞洛科贾，然后继续向北方扩张，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酋长国。1901年，孔塔戈拉和比达酋长国在被指控从事奴隶贸易后遭到猛烈攻击，随后，英国又为他们任命了支持英国的新国王。接着，包奇和贡贝酋长国垮台。英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省级管理机构，但直到1907年都在镇压零星的抵抗。卡诺城邦在顽强抵抗后于1903年沦陷。

哈里发王国首都索科托进行了最为顽强的抵抗，但最终在1903年失守。在这里，伊斯兰教对于抵抗起着鼓动作用。苏丹埃塔西鲁及其臣民群起反对异教徒——基督徒们的统治。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坚信抵抗英国人是他们的宗教责任。埃塔西鲁的对策是放弃王位，采取以退为进的“希吉拉”迁徙运动。上千臣民起而追随他，但英国对他进行了追捕，在伯尔米终止了他的迁徙。随后战争爆发。英国在战争初期遭到失败。但埃塔西鲁后来选择投降，要求允许他前往麦加。可英国再一次向他发起进攻，将他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杀死。其子继续抵抗，带着很多追随者逃亡到王国东面的苏丹避难。

---

① 转引自D. J. M. Muffett, *Concerning Brave Captains*(London: Frank Cass, 1964), p. 39。

在中部地带,英国在 1900 — 1901 年以及 1906 — 1908 年间与蒂夫人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在东北部的博尔努,英国陷入到与法国和拉比赫·法德拉拉的激烈冲突中,后者是一名苏丹人,军事冒险家,于 1893 年在这里建立了统治。法国人与加涅米王朝结盟后,英国人与拉比赫结盟。1900 年 4 月,法国人杀死了拉比赫,并把前王朝的乌马尔·桑达(Umar Sanda)扶上王位,而英国人在 1902 年打了回来,并让自己的支持者任国王。1902 年后,英国迅速采取措施巩固其统治,例如强令征税,迫使人们交出武器以降低暴力反抗的危险,在库卡瓦建立新都(卢加德在那里为宣誓效忠于他的国王配备了一批官员)。

60

通过与法国和德国的协议,尼日利亚的边界确立。和其他殖民地一样,尼日利亚的边界也是人为的产物,例如,约鲁巴和豪萨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国家。就面积来说,尼日利亚成为非洲第一大国。然而,其文化多元性从未转化为巨大优势,因为还没有找到能够促使不同民族共创一个强大、统一国家的良方。

## 抵抗和失败

地方统治者及其民众必然要对殖民占领做出回应。那些精明的领导人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联系的人们懂得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他们清楚殖民征服的战争也在其他地区打响。三角洲的酋长们知道 RNC 和英国人正在逐步削弱他们。伊巴丹的军事领导人在 19 世纪 90 年代就发出这样的悲叹:他们的城市多年来不断地向其他殖民地输送居民,如今也将变成一个殖民地了。1903 年,卡诺的埃米尔把卢加德和他手下的人描绘成一群将要“征服”其臣民的狗。[①]

回应有多种形式,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像索科托、贝宁和伊杰布等许多地方以武力来捍卫主权。不管面积大小,权力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许多部落都尽其所能地为他们的自由而战。如果国王和武士们发起攻击,村民们也奋起加入。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村民们和其他被边缘

① 转引自 Muffett, *Concerning Brave Captains*, p. 96。

61

化的民众比其政治领导人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争，例如在萨蒂鲁，被哈里发当局或伊格博上层所抛弃的穆斯林被称做“埃库梅库人”，他们在伊格博西部的战斗中表现得无比坚强。

在埃库梅库人的案例中，另一种抵抗形式出现了。伊格博西部的一群小村庄将他们男子秘密会社转变成被称为“埃库梅库”的抵抗运动，与英国人战斗了 10 年之久。1898 年“埃库梅库”成功地袭击了RNC，迫使其代理人和职员放弃了这一区域。1902 年英国人担心埃库梅库人再一次起义，迅速逮捕了他们的领导人，毁坏了他们的许多村庄。两年后，埃库梅库人重新组织起来，但再一次失败。在被囚禁的近300 人中，仅有少数人活了下来。为了向倒下的英雄表示敬意，“埃库梅库”运动在 1909 年再次兴起，新一轮的战斗持续了 3 个月。1911 年英国人预感到又要发生起义，逮捕了有嫌疑的埃库梅库领导人。

在尼日利亚北部，继 1903 年战败后，很多人转向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新的号召力量是马赫迪、弥赛亚，即在末日来临之际降临人间、改革这个世界的“正统先知”。英国的入侵和其他本土衰亡迹象被解释为马赫迪即将来临的征兆。一些伊斯兰传教士预言马赫迪将在索科托军队被打败的伯尔米附近出现。一些人确实在耶卢瓦、捷巴、努佩和曼达拉宣布自己为真正的马赫迪。1906 年，一场马赫迪起义在索科托北部的萨蒂鲁爆发。殖民地政府军在第一次镇压起义时被击溃。马赫迪义军受到鼓舞，向前进发，鼓动起更多的力量，并向苏丹和其他伊斯兰领导人寻求帮助。但是，他们失望了；苏丹和其他政治首领现在接受了英国政府的任命，他们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还允许手下人加入英国一边来攻击萨蒂鲁。重新组织起来的殖民地政府军使用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进攻萨蒂鲁，彻底毁灭了该城。被俘的马赫迪起义军成员被当做危险的罪犯，受到野蛮的虐待。

伊斯兰教还提供了其他的意识形态上的选择。如果武装抵抗失败了，很多人在“嘴上”而不是“内心”里接受征服，即是一种权宜之计，等待反抗的机会。伊斯兰教也建议信徒们迁移到其他地方，像埃塔西鲁和他的儿子所选择的那样。迁移因此成为一种抵抗方式，而不是生存

手段。

伊斯兰教不是组织动员的唯一源泉。在南部的很多地方，人们转而向神和巫师寻求抵抗英国的方式。战士们被魔法所激励，祭品被献给诸神来求取他们对社群的保护。到处流传着一些通过使用不寻常的计谋而获胜的故事，例如，用魔法变出疾病来消灭敌人。如若战争获胜，例如在“埃库梅库”反对 RNC 的事例中，荣耀不仅属于战士，也属于巫师。对失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神没有给予帮助，或者敌人的神过于强大。

62

一小群精英分子用报纸和宣传册谴责英国人的入侵，尽管效果甚微。当武力被滥用时，他们会进行控诉。例如在 1895 年英军轰炸奥约的事件中，《拉各斯每周要闻》刊登了反英的报道。

人们的反应不只是暴力或抗议。有些民众和地方对帝国主义采取了顺从或投降的态度。在沿海的拉各斯，一些贵族成员把英帝国主义看成是现代化的代表，希望它能带来“好处”，如公路、工业、西式教育和基督教等。这些贵族成员把武装反抗英国的尼日利亚人和他们的领导人看做是阻碍文明的落后势力。他们是在看到其他地方及其领导者反抗后的遭遇后，才做出投降决定的。毁坏城镇，惩罚曾进行抵抗的酋长，用羞辱的方式流放国王，这些传遍大陆的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很多人的斗志。

为什么英国人的征服会成功，而尼日利亚人的抵抗会失败？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抵抗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19 世纪 80 年代时，当帝国主义的瓜分行动已开始的时候，一系列事件已朝着有利于英国人的方向发展。借助于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活动，英国人掌握了尼日利亚的详细信息，得以策划军事行动，建立军事基地，甚至设立行政中心。先前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和拉各斯的军事和外交活动，除了给当地许多统治者留下了英国人是拥有优良武器的伙伴的印象外，还为英国人赢得了很多的尊重。

英国不择手段地进行扩张。一次战斗的失利或从一地的撤退，并不意味着征服野心的结束，而会导致动用更多的力量进行反击。相反，

63 尼日利亚某一族群的一场重大失利则可能意味着他们反抗的终结,因为他们力量有限,或没有能力重新组织起来。大量的非洲人被招募进英国军队,因此使非洲人自己反目成仇,成为对同胞的真正征服者。征服北部的西非边防军中就有很多豪萨族战士攻打自己的领土。尽管尼日利亚的疆域辽阔,扩张的任务艰难,但只有少数英国士兵阵亡。除了征用尼日利亚人作战外,英国也利用他们作为政治代言人,从事情报活动。这些人渗透到很多地区,充当为英国收集有价值情报的间谍。很多人担当英国人的向导、同事、翻译和使节。无疑,这些代理人很多是被私利所驱动——工资、津贴、权力和其他机会。然而,他们最后成为了征服尼日利亚的帮凶。

尼日利亚的诸王国和族群一个接一个地被征服,许多缺乏力量进行长久的武装抵抗。索科托哈里发王国是一个悲剧的典型,它没能动员所有的酋长国进行共同的抵抗。在这场失败中,哈里发忽略了其自身创建的历史,奥斯曼·丹·福迪奥正是利用豪萨各城邦的分裂将它们个个击破。然而,也存在不利于合作的因素。在哈里发王国内,有一些小规模的抵抗是由那些不愿改信伊斯兰教或反对新的政治统治阶层的人组织的。不能指望这些心存不满的人加入大规模的起义或集体抵抗。另一个问题是,哈里发的防御体系建立在各个酋长国自保的基础上。在殖民者瓜分非洲的时代,他们还是遵循这样的模式,每个酋长国单独与英军作战。

像伊特塞基里的情况一样,一个酋长可以被用来反对另一个,从而削弱了集体抵抗的实力。欧洲人充分利用各个城邦之间的争斗,就比如当英国人 1892 年入侵伊杰布时,其他的约鲁巴城邦还感到高兴。伊杰布、阿贝奥库塔、伊巴丹、奥约等约鲁巴主要城邦之间存在的利益分歧阻碍了它们的联合。在伊巴丹的前殖民地,如内陆的埃基蒂和伊杰萨等城镇,英国人被一些政治领导人误认为威胁不大,因为当时他们之间的敌视和战争状态形成了他们这样的观点。在东部,有些社群寻求英国的帮助来对抗他们的敌人或强大的邻邦,因此建立了一个最终导

64 致他们自己被征服的联盟。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王族”内部各派别间

的竞争和排斥导致对建立联盟的渴求。为此，有些人把英国人看做是可信赖的盟友，而不知道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

有些地区早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就因内乱而元气大伤，根本无法组织有力抵抗或互相联合。例如，约鲁巴人由于长期的战争很难联合起来。在贝宁，奥翁拉姆文国王已和他的一些酋长处于敌对状态，也就失去了集体抵抗的可能。在其他一些城邦，包括努佩，领导人被划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一派主张抵抗，另一派呼吁合作，结果是无法齐心协力。

主战派尽管其士兵作战勇敢，但存在严重的军事和技术上的缺陷。武器原始，枪支短缺，其对手却拥有现代武器。欧洲人的先进武器在征服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工业革命，武器制造技术改进，生产出了马克希姆和加特林机枪，它们每秒钟能够发射11发子弹，而非洲人连早期的机械步枪都没有。那些还依赖传统的矛和弓箭的社会显然无法应对机枪的杀伤力。有些人虽然拥有火器，但都是一些老式的、慢速的前膛枪。土墙和大规模的骑兵能够对付旧式武器，但不能对付那些在骑兵靠近前就将他们杀死的机枪。例如，卢加德能够打败强大的努佩军队，就在于利用他们的防御战术来打击对手。在开阔地带，如热带大草原，地势空旷，便于入侵的军队快速运动，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机枪。侵略军是冷酷无情的。例如，RNC的军队大规模地屠杀努佩战士，将阿萨巴毁坏了一半，烧毁了数百座建筑，彻底毁灭了比达城，以确保胜利是决定性的。英国军队行动更为敏捷，与非洲人以前遇到的军队相比更为训练有素。

而大多数尼日利亚族群的军队都是临时招募的，仓促地经过短期训练以应对紧急局面，缺乏抵挡配备现代枪炮的侵略军的作战技巧，经受不住长期的军事对抗。许多地方也曾试图进行军事改革，但不是很成功。举例来说，伊杰布和奥波博曾想方设法获得新式步枪。然而，他们很少有机会去练习使用它们，因为弹药不能浪费。当战争来临时，许多战士都缺少正规的枪法训练。没有将领负责教导新式武器的使用，或者改变旧的城墙防卫和骑兵偷袭的战术。

最后一点是,当看到邻邦所受的屈辱和战败后,一些地方认为抵抗是徒劳的,就自动投降了。下面举两个实例:一是约鲁巴的其他部落在看到伊杰布被击败后,就停止了抵抗;二是扎里亚的酋长国在1902年为避免打击而投降了。

殖民征服给尼日利亚带来了新的政治格局。数百个不同的族群被纳入到一个国家中,一个新的行政体系被强加到他们的头上。随着尼日利亚迈入所谓现代的20世纪,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些重大变化。

# 第五章　殖民统治

1900年至1914年间，英国全神贯注于巩固自己的成果和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系。他们不得不应对一系列急迫的问题。首先，他们通过采取所谓的“和平”措施，来有效处理人们对外国统治的抗议和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鲁巴人和伊格博人中发生过起义。军队和警察在全国各地被用来消灭反对力量。另外，新的政策或改革往往要以高压手段才能强迫人们接受。殖民当局在不给不列颠纳税人增加额外负担的情况下，需要另想办法筹集资金来维系行政运转。英国人的数量对尼日利亚这样规模的国家来说显得远远不够，而增加人员又会给公共开支带来负担。人员短缺伴随着沟通的严重困难，包括基础设施不足和语言不通。尼日利亚人与其统治者之间存在语言障碍。在统治初期，英国不得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虽然进一步消耗了有用的资源，但有助于巩固他们对尼日利亚的控制。到一战爆发时，英国已建立了一套双重的政治体系：管理整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被称为“间接统治”的地方政府模式。此后直到1960年间，变革不断，以纠正各种问题和应对尼日利亚人的各种需求，改变了尼日利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

67

68

## 合并

被分别占领和统治的地区最终在1914年合并。在此之前，有3个

自治区域,2个在南方,1个在北方。因此,出现了"三个尼日利亚"的奇异现象,人们对此提出了许多更改建议。1906年,拉各斯殖民地和南尼日利亚保护领合并,以拉各斯为首府。这样就变为"两个尼日利亚"。1912年,弗雷德里克·卢加德被任命为南尼日利亚的殖民领地和北尼日利亚保护领的总督。1914年1月1日,他将两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国家,置于一个总督统治之下。

合并的动因是经济。北方很贫穷,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可它没有直接的入海口,仅仅靠关税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南方行政当局和英帝国国库必须对北方提供财政援助。合并将会把南方创造的多余的财富转移到北方。另外,还有人提出合并将精简许多部门,可以减少机构重复设置。而且不同保护领的高级官员在政策制定上会产生冲突,向英国殖民事务部就一系列问题提出的建议也各不相同。但如果他们之上有一位起统摄作用的官员,私人冲突将会被降到最低限度。更为重要的是,把由南方和北方资助的铁路建设统一起来至关紧要。经过合并,总督获得了管理整个国家的广泛权力。虽然有不同意见,卢加德仍将间接统治制度推广到南方。国家设立了一个最高法院。

合并后建立了一个中央管理体系,以拉各斯为首府。从未完全代表这个国家的拉各斯的尼日利亚议会(后来称"立法委员会")开始立法。议会通过的法案要得到总督的批准,总督也享有就北尼日利亚利益发表声明的权力。总督掌管有关军队、铁路、财政、林业、邮政、电报和公共事业等的各个部门。他主持主要由英国官员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查来自各个部门的政策和建议。总督直接向伦敦的殖民事务大臣报告。在北方和南方都任命了副总督,治所分别设在卡杜纳和埃努古。他们都归总督管辖,财政预算需要得到审批,但他们负责管理警务、农业、公共事业、林业、教育、矿业和监狱等地方部门。南、北地区都设有省,由副总督委派的地方官领导。省又被分成若干个地区,各设一名行政长官。公共开支来源于直接税和进出口的间接税。

69

然而,由于北方和南方在统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面仍然一直存在许多差异,合并并没有产生一个内部融合的国家。卢加德和他的继任

者们认为北方不同于南方，它们各自都应该朝着自治的方向发展。南、北方代表坐在一起议事的中央立法机构没有设立，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建立了一个中央秘书处。仅有一些部门取得初步联合，包括国库、铁路、监察、邮政和电报，以及审计部门。

1919年，南尼日利亚保护领被划分成9个省，北尼日利亚保护领在1929年被划分成12个省。1939年，南方的省被划分为2个地区——西部和东部，北方成为第三个区，这种分裂局面直到1960年独立时仍然存在。在总督理查兹任期(1943－1947)内，由于在三个区都设立了议会，地方主义更加明显。每个议会都向拉各斯的中央立法机构派代表。

虽然1914年后中央政府可以协调各个部门的活动，但在国家糅合方面仍很薄弱。直到40年代，中央立法机关中的南方人仍寥寥无几。当它扩大到包含北方人时，代表们把自己看做是地区利益的维护者。英国人武断地认为一个多样性的社会很难实现统一。中央政府也远离民众；相反，建立在间接统治政策之上的土著地方政府则与民众联系更紧密。

70

## 间接统治

间接统治是一套地方管理体系，它可以通过土著统治者和机构帮助英国人统治尼日利亚。殖民官员为土著统治者出主意，自身则尽量减少与广大民众的直接接触。由酋长和国王向民众发布新的规章制度。在剔除所谓的过分和非人道的习俗后，原有的体制被保留下来。对殖民统治没有帮助的土著法被舍弃。

间接统治的设计师是卢加德，他在印度和苏丹观察了间接统治怎样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在将尼日利亚北部的酋长国与苏丹的政治体制进行比较后，他认为间接统治适合于尼日利亚。对卢加德及其继任者而言，间接统治有助于巩固权力，克服由沟通不畅与人员和资金短缺带来的各种障碍。它的理论设想是，英国人与尼日利亚人有文化差异，统治他们的最好途径是通过他们自己原有的体制。这些观点和其他思想

在卢加德所著的《热带非洲的双重统治》(*The Dual Mandate in Tropical Africa*)中得到阐释,这是一本解释和实施间接统治的手册。实施间接统治政策的目的是获得土著统治者及其民众的合作。通过地方领导人来接近民众可以减少对英国统治的反对;并且通过允许地方领导人行使权力,加之以工资和津贴作为报酬,英国把他们变成了殖民主义的“合作者”。使用这些人降低了行政成本,解决了人员不足的问题。英国人的工资、退休金和外出补助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至降低开支的最佳选择是削减他们的数量。虽然英国人自认为他们的文化优人一等,但他们并不急于推广它,因为在他们看来土著人的接受速度是很慢的。间接统治容许保留一些传统习惯,但同时会逐步引进一些所谓的先进理念。

卢加德最初在北方实施间接统治,以管理广大地区和控制伊斯兰信徒。当地早已建立起一套带有等级制度、文职官员和行政单位的管理结构。在这样一个本土体系下,很容易确定领导人和权力中心。另外,还存在一套以税收为基础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以及以“沙利亚法”和“阿尔卡里”法庭(由有学问的伊斯兰法学家主持)为基础的司法体系。卢加德小心地变动土著人的制度。他和其他英国官员控制埃米尔们,而埃米尔们统治其民众。英国人不干涉伊斯兰事务,以避免激起大规模的起义,并支持由伊斯兰教创建的政治结构。如果国王和埃米尔曾领导人民发动反对英国人的战争,那么间接统治将把他们转变成朋友和宝贵的盟友。过去的酋长国成为新的行政区,各配有一名地区行政长官(D. O.)。埃米尔们通过一个被称做“土著管理局”(Native Authority, NA)的机构获得权力,作为这个管理单位的政治首领,他们配有辅助人员,有权征税和开展新项目。埃米尔作为土著法庭的头掌管司法,并拥有警察来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在直接向英国官员做出请求后,土著法庭可以执行伊斯兰法。埃米尔也是一位“财政管理者”,负责征税,并截留一部分作为地方政府运转的资金。对英国人而言,这套体制成本很低,可以确保稳定与和平。

71

然而,埃米尔由政府任命,听从于行政区长官,而且法律必须得到

政府的批准。因为大多数条例是经过埃米尔传给民众的,他们不得不承受人们对不喜欢条例的谴责,和政府一起平息人们的抗议。埃米尔和土著管理局因为北方地区西式教育发展缓慢,没有尽到责任而备受指责,他们辩称传统贵族对现代化的很多方面都没有什么兴趣。派驻地方的地区长官或特派专员对埃米尔进行监督,但他们都不愿意进行过多的激烈的改革,或使机制现代化,以免激怒地方统治者。事实上,不少英国官员把自己看做是传统的保护者,抵制变革,警示要反对可能发动革命的势力。

从 1914 年到 1916 年,卢加德将间接统治模式从北方推广到南方,让奥巴们(国王)享有和埃米尔相似的权力。如果说约鲁巴人的国王和酋长们对他们地位和权力的提高感到满意,那他们的臣民则并非如此。约鲁巴人的国王此前从未行使与埃米尔同样的权力。在新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为当权者,忽视了在传统的王权体制下的控制和协调。为了寻找类似于苏丹的统治者,英国人转而去找奥约的阿拉芬,因此忽略了19 世纪约鲁巴人的历史。当时奥约王国垮台,伊巴丹王国达到鼎盛。由于征税成为间接统治的一部分,约鲁巴人提出强烈抗议,因为他们过去从未缴纳过北方酋长国实行的那种强制的、固定形式的税收。当地发生了反税收暴动。紧张局面的另一个源头是受过教育的新贵,他们被间接统治边缘化了。该阶层一直在向殖民当局施压,要求参与本地城镇的管理工作,而间接统治却没有考虑到他们。为捍卫他们的利益,新贵们攻击传统统治者的保守及其对英国人的忠诚。

72

在东部,间接统治遇到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卢加德想扶植几位大酋长,可此前他们并不存在;想通过向民众征税提高财政收入,而当地过去没有税收的观念。在那些政治分裂、村庄构成了最大的政治单位、缺少强有力的统治者的社会里,间接统治成为一种灾难。英国刻意扶植新的强势的酋长,所授予的权威并非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那些被称为"授权的酋长"(Warrant Chiefs),在其臣民面前更像是陌生人。实际上,其中有些酋长是毫无影响力的小人物,无法获得尊重和信任,并因为倒行逆施和冒犯已有的习俗而臭名昭著。当直接税被引进时,

传言说征收对象也将包括妇女，从而引发了1929年的阿巴妇女暴动，这迫使英国在当地的管理中实行民主化，并邀请村社长者参与。

间接统治有严重缺陷。首先，在选任土著统治者时，应当强调的是，英国干预了许多新领导人的任命，制订了许多这些领导人必须执行的法律，并付给他们工资，而如果他们拒绝合作就停发工资。英国官员提出的所谓建议不亚于命令，地方统治者经常被迫服从。在早期，那些抗拒命令或抵制改革的统治者要么被解职、流放，要么被投进监狱。间接统治遵循的假设是，所有的尼日利亚社群传统上都由强有力的国王和酋长统治，而实际上有些社群根本没有国王或酋长，而有些族群（像约鲁巴人）则限制了他们的权力。

间接统治使酋长拥有的权力远远大于传统社会所给予的，因此助73 长了权力的滥用和专制。人们无法赶走他们讨厌的国王和酋长，因为他们的任命和收入来自殖民政府，他们知道取悦英国人比让民众满意更为重要。滥用职权的事例时有发生，例如统治者的贪污腐败和巧取豪夺，但政府对这些视而不见，以免同这些合作者为敌。

土著管理局的职员们——法院书记员、信使、国王和酋长的随从——也给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人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权力的行使者，而不是公仆。他们要求别人尊重，收取贿赂，然后提供相应的服务。最声名狼藉的是法院书记员，他们在记录和将诉讼状从本地语言翻译成英语时，总是偏袒向他们行贿的一方，从而影响判决。除了北方官员努力学习豪萨语以外，英国人基本上依靠翻译来和他们统治的民众交流。这些书记员和其他懂得英语的人把这看成是他们的优势，利用他们中间人的角色来获取权力和物质利益。书记员、警察和其他政府雇员都竭力模仿英国官员的生活方式——住着带有管家、园丁的宽敞别墅，开着汽车，穿着晚礼服。由于薪水不能满足这些奢侈的需求，他们只能借助于腐败行为。

在间接统治最为成功的北方，它也只促成了很小的进步，因为殖民官员认为这儿的传统和社会都是静态的。由于阻止传教士大规模的扩张，同时政府又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西式教育的发展尤其迟缓。从间接

统治中获利的埃米尔及其属下是传统最坚定的守护者。用当代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酋长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里的“中世纪政权”，很难进步。[①]

从整个国家来看，间接统治更青睐酋长而不是受过教育的新贵。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因为骄傲自大和过多的改革要求而被人们鄙视。在北方，英国人更愿意与伊斯兰知识分子打交道，认为他们比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更加举止文雅，更加听命于当局。一些官员甚至建议打压受西方教育的人，使他们不再提要和白人平等的过分、无礼的要求，去掉他们的“虚荣、诡计和好讼”[②]。受过西式培训的律师不能在土著法庭上辩护，因此酋长们不需要法律知识就可以做出行政判决。由于酋长们与殖民政府已协同一致，他们缺少动力与知识分子结盟以谋求独立。

74

税收是所有变革中最招人怨恨的。它在很多地区引发了抗议，并使很多人心中积怨难除。为了获得纳税的钱，很多人被迫去劳动，甚至做一些不愿干的活。武装卫队被用于收税，进一步暴露出殖民政府对民众的无情和冷漠，特别是对穷人。酋长们转变成征税者，不再站在其民众的立场上。政府用钱做了什么从来不对大众公开，人们在他们的社区中也没有看到福利设施或工业的兴建。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助推了尼日利亚的分裂和种族间的敌视。南方和北方被尽可能地保持分裂。全国变革的步伐不统一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了冲突。土著管理局培养了种族意识；殖民政府把每个族群（例如蒂夫人）都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而先前当地人并不这样认为。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为福利设施和财政收入展开了竞争。

## 经济变化

英国统治的经济目标是使尼日利亚财政自给、生产原材料和消费

① W. R. Crocker, *Nigeria: A Critique of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6), pp. 216 – 217.

② Crocker, *Nigeria*, p. 22.

进口的工业产品。实现这些目标比满足尼日利亚人对快速发展的愿望更为重要。为保护英国工业，他们不在尼日利亚建立会形成竞争的工业部门；农民们不得不生产更多的出口作物，而不是当地需要的粮食；新的变化必须有利于对外贸易；必须允许外国商人不受限制地进行贸易。经济方面的资本投资和长期规划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才开始。

实现各种目标的基础是交通运输（港口、公路和铁路）和通讯服务（电报和邮政）的现代化。修建由南到北的铁路线将产地与港口连在一起，便于对原材料进行加工。1907 年至 1911 年拉各斯—卡诺铁路线修建，它穿越辽阔的可可和花生生产带。1911 年，为运输锡矿石，铁路从扎里亚延伸到乔斯。随着煤在埃努古被发现，铁路线紧接着铺设起来。因此，铁路主要用于运输原材料。由于尼日利亚在西非地区的重要地位，它有多条铁路线与非洲其他国家相连。

75

公路被修建起来，以连接铁路、城市和农场。由于铁路的终点在港口城市拉各斯和哈科特港，港口也得到扩建。随着许多城镇靠电报与拉各斯联系，邮政和电报服务同时也得到了发展。另外，引进了新货币——主要是便于携带的硬币和各种面额的纸币来代替当地原先流通的货币。

新的交通和通信体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铁路和公路增加了货物和人口的流动，以及思想的交流，提高了初级产品的生产。农村市场与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的连接刺激了进口产品的销售。新货币促进了工资收入的增长，增加了贸易交易量。公路和铁路带动了族群间的交流，将大量人口从农村送往城市。关税、税收和廉价的劳动输出产生的资本支撑了铁路和公路的修建，这些修建工程又成为把尼日利亚人吸引进雇佣劳动的最早途径之一。一个新的工薪阶层发展出一种新的将传统与欧洲风格相结合的嗜好和生活方式。

农业是殖民经济的基石，它主要发展出口作物的生产。交通网络根据将农产品运往港口的需要而设计。政府对于国内消费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兴趣不大。东部的重点产品是棕榈油和棕榈仁，西部则是可可和橡胶，北方主要是花生、棉花和非洲酪脂树相关产品。农民们必

须生产这些农作物去卖钱，以支付税收、购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并承担孩子在新的西式学校受教育的费用。农业技术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生产技术仍然靠原有的经验。国内市场顺应国外需要，很多市场变成了出口作物的集散中心。然而，在出口生产兴旺的地方，由于没有注意使经济多样化，结果造成数百万人的生活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

工业生产主要以面向出口的采矿业为基础。锡矿业开始于 1904 年的乔斯高原，后来成为一项盈利丰厚的工业。煤矿业开始于 1911 年，它的产品使用于本地的铁路、锡矿、蒸汽机和轮船，并出口到黄金海岸。其他的矿产包括黄金、钽、铅、锌、钨和铌铁矿。外国企业控制了采矿部门，它们获取了大量利润而没有被要求纳税。例如，一家英国企业——联合非洲公司垄断了尼日利亚北部的采矿权。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导致工会的成立和矿工们的罢工。



制造业发展缓慢，直到 1945 年才逐渐兴起，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欧洲工业的竞争。在发展的初期，偏重于出口加工。面包、饮料和啤酒以及其他一些消费品的生产随后出现。生产技术靠引进，有时代价高昂，并且没有保养机器的技术诀窍。

英国与尼日利亚间的贸易逐步扩大。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同时国内市场也得到开拓。欧洲大公司主导了船运、银行和出口贸易，著名的有约翰·霍尔特公司、成立于 1929 年的非洲联合公司以及两家法国企业——法国西非公司(C. F. A. O.)和西非贸易公司(S. C. O. A.)。这些企业以低价从生产者手中收购产品，并且将价格固定，因此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高价竞争。在零售贸易方面，尼日利亚人不得不和黎巴嫩商人竞争，许多黎巴嫩商人生意做得很成功，他们能预先阻止来自雄心勃勃的尼日利亚商人的挑战。

殖民经济基本上是剥削性的。出口的实质是将财富从尼日利亚转到欧洲。来自出口的收入被用于维持政府运转，并作为储备存放于英国，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货币走软的时候。欧洲人和亚洲人的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它们不一定还投资在尼日利亚。原有的生产技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现代技术引进缓慢。总之，尼

日利亚作为原材料生产者和制成品的接受者被纳入到国际体系中。它的命运受制于外部需求——20 世纪 20 年代享受了繁荣,30 年代遭受了大萧条,并且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尼日利 77 亚启动了发展计划,同时对社会各部门如何转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然而,资金的缺乏使发展的结果没有达到计划中所设想的程度。同期,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奠定了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 社会变迁:西式教育、卫生服务和城市化

基督教传教士开创了尼日利亚的现代教育事业,并主导了殖民时期的教育发展。传教士学校重点是教授书写、阅读和算术,培育了一个为殖民社会服务的精英阶层。在早期,殖民政府对发展教育不感兴趣。例如在北方,卢加德认为应该加强伊斯兰教育,使之免受西式教育的"腐化影响"。他甚至阻止传教士在北部的伊斯兰地区创办新的学校。在南方,传教士继续扩建教育设施,建立新的学校。殖民地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些小学和中等学校,并为传教士学校制订指导方针。私立学校要达到一系列的指标政府才提供资金,因此降低了政府必须承担的成本。大部分公立学校坐落于城市地区和行政中心。学校培养出的文员远远多于技术人员。总之,殖民时期的教育体制不是要培养大量的专业人士来管理一个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

各个阶层对教育的需求成为民族主义的诉求之一。人们的不满促使政府在 1934 年创办了第一所高等学府——亚巴高等学院。即便如此,它当时也不是一个授予学位的高校,最初 10 年招收的学生也很少。随着二战结束后几年里的巨大变化,第一所大学于 1948 年在伊巴丹创建。纵观整个殖民时期,有志向的尼日利亚人都尽力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

尽管西式教育存在局限性,但它是引发社会变化的一个有力因素。被培养出来的精英分子成为现代尼日利亚变革的先驱。这个精英阶层不仅因为能使用英语而联合起来,他们也逐渐地投身于反殖民事业中。78 学校使这些精英分子汇聚一堂,克服了因种族和地区差异带来的障碍。

学生们通过交流建立了持久的友谊，这成为他们日后成立政党的基础。集中于公共服务等部门的劳工阶层也产生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共同发起了工会运动，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斗争。

通过教育，被笼统地看做“文明”的西方文化开始传播。这从英语被用作交流和威望的象征中得到说明。欧洲物质文化，特别是举止和服饰，被当作社会地位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到欧洲旅行是那些想融入欧洲世界的精英分子的最高理想。英国官员与传教士鼓励这种倾向，宣称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使“落后”民族变得文明。

南方从殖民统治中的获益比北方多，造成了很难纠正的教育不平衡问题。在殖民统治时期，南方精英分子控制了那些需要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政府公职部门和其他一些社会机构。随着工资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教育提供了获得钱财和过上舒适生活的途径。正规教育还提供了从银行借贷，获得资金创办或合并新企业上的优势。

西方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医院从 1917 年的 17 家增加到 1951 年的 157 家，到 1960 年已超过 300 家。殖民政府出于关心其职员的身体健康等需要，修建了综合医院、诊所、医务室和妇产科医院。另外，还制订了接种天花、麻风和麻疹疫苗、提高卫生条件的庞大计划。医院一直不足，它们主要设在便于殖民代理人和欧洲人看病的地方。传教士继续产生影响，解决他们信徒的一些卫生需求。尽管存在机构和人员缺乏、几乎没有培训学校等缺陷，但现代医疗的基础还是成功地得以奠定。

城市化是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像伊巴丹和拉各斯这样的古老城市得到大规模的扩建。很多城市是新建的，尤其是作为行政中心的埃努古、哈科特港和卡杜纳。像卡凡钱这样的火车站点，因为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商人、顾客和定居者而发展成城市。像阿巴这样的中心城镇，能够从过境的铁路和公路中获益。港口城镇（像拉各斯）或矿业地区（像乔斯和伊努古）发展快速。在东部，1931 年时还没有一个人口超过26 000人的大城市，到了 1952 年，4 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 5 万，1921 — 1952 年间城镇的人口增长速度接近 70%。

79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日益普遍。人们主要是想到城市中殖民政府和商业机构中寻求就业机会。自谋职业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中也大量存在——例如手工艺者、理发师、食品小贩和修理工。与农村中又苦又累的活相比,做雇工和商贩提供了更快的赚钱手段。农村地区失去了吸引力。重大的经济和政治事件都发生在城市。在城市中赚钱和娱乐的机会比乡村要多得多。像自来水和电力这样的现代便利设施只有城市才有,这让农村地区成了"原始"的代名词。很多青年男女通过到城市生活寻求摆脱这种特性。随着大家对农村地区的抛弃,农村开始走向衰退,许多至今还未恢复。

城市作为多元文化的汇聚地,使不同种族的人出于经济和社会原因进行相互交往。为了互相帮助和照顾新来的移民,诞生了作为城镇、宗教和其他利益体有力代表的合作社。有些合作社标榜自己的"先进性",称它们的成员都积极从事现代化,要完成他们所代表的团体或民众的某些义务。

城市也是冲突的孳生地。外来者和本地人之间为土地分配问题关系紧张。属于原住民的土地以某种方式可以出售或赠予外来者,这造成了争夺。由于便利的生活设施从来都不够,不管怎样分配使用都会产生不和。工作岗位的不足产生了一支失业大军,其中有些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为了应对城市生活的困难,很多人不得不与他们大家庭中的成员断绝关系,选择了一种更加个人化的生活方式。

在城市及其他地区,殖民时代的人们感受到了急速的变迁和生活中的矛盾。许多人对强迫劳动制,对将年轻人推出农村或陷入犯罪的金钱恶念,以及对日益上升的离婚率、快节奏的生活和税收感到极为愤怒。但是,他们同代的人也对各种新的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电力、现代医院和学校等印象深刻。他们想得到更多这样的设施,当然还包括掌权的机会,这种渴望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

80

# 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独立

即使最有远见的人也没有料到英国的统治仅持续了 60 年。在殖民统治初期，如果想到尼日利亚在短时间内会取得独立，似乎非常荒谬。1919 年一位官员放出这样的豪言："只要人类存在，白人就一直会待在这里。"[①]然而，受征服和新政策的刺激，民族主义早就出现。激进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来临，随后导致独立。虽然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国家的独立，它也有其他相关的内容："新尼日利亚"将由西化的精英分子统治，借助政党的力量和西方政治理念，努力创建一个统一的、发达的国家。如果英国是从尼日利亚传统的贵族手中接管了政权，那么，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迫使他们把权力移交给当地有知识的精英阶层。 81

## 民族主义的成长

民族主义起源于 19 世纪。各地的抵抗战争给 20 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灵感。以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黑人思想家对非洲和种族问题进行了反思，他们号召追求进步，理解非洲 82

① R. Cudjoe, "Some Reminiscence of a Senior Interoreter," *Nigerian Field*, 1953, p. 159.

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贡献，并以身为黑人而骄傲。在19世纪晚期，教会内部出现了一场分离主义者运动，以表达对殖民统治的抗议。例如，爱德华·布莱登号召非洲人建立自己独立的教会。新教会的一些成员成为反殖运动的中坚力量。早期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把非洲人看成是一个种族。随着殖民时代的开启，对国家的认同感变得重要，渴望摆脱殖民统治获得自由成为民族主义的最高表达形式。民族主义者想在尼日利亚新的国家中供职，而不愿在像约鲁巴或伊比比奥这样旧的土著王国中工作。不管是仅仅要求纠正殖民体系的弊端，还是更加激进的寻求自治，民族主义的各种力量都受到了殖民统治的推进。

殖民政策在民众中造成不满，特别是在那些最初要求变革、后来要求独立的精英分子中。在欧洲人统治期间，使民众感到不满的问题包括种族主义和对传统价值观的破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尼日利亚人抱怨在就职和升迁方面的种族歧视，其中一些有抱负的人不满白人官员享有的地位和特权。在抱怨社会变迁太剧烈的人中，民族主义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即大力推崇尼日利亚人的食物、姓名、服饰、语言，甚至宗教。他们中的基督徒尽力改革基督教以适应当地人的价值观，如大家庭和一夫多妻制，并从中引申出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理念。对大部分人而言，土著管理局是一个压制性的和腐败的机构。很多尼日利亚人认为，如果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就能解决原材料价格过低和经济受外部控制的问题。对那些遭受外国公司和企业联合体贸易排挤的尼日利亚男女商贩来说，反殖运动是重新获得贸易控制权的一种策略。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经济艰难、失业和紧缩。民族主义者借此对英国进行批评和谴责，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例如，著名的工会领导人迈克尔·伊姆杜领导了1931年铁路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失业和种族歧视导致人们对殖民统治不满，使得民族主义领导人拥有大批的追随者。

83

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变化——城市化、西式教育和交通改善——

有助于民族主义者开展活动。随着城市成为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中心，城市化推动了民族感情的培养。报纸、杂志和其他媒介加速了信息的传递和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政治和民族主义的理念在城市得以发展和传播。城市居民又把其中的许多理念带回他们原来的乡村和族群中，因此将城市与乡村联系在一起。新的基础设施便利了人们的出行和全国各地的交融。成千上万的约鲁巴人和伊格博人迁到北方，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其故乡之外的政党的成员。西式教育的传播培养出了一批能够阅读、参与和领会关于民族主义和发展的讨论的人，在南方尤其突出。教育造就了拥有新思想、新视野和有远大目标的领导人。

探讨民族主义问题的当地媒体越来越多，社论中表达的民族意识达到较高的层次，并设有反殖问题的专栏。约翰·佩恩·杰克逊是这一领域的早期英雄，他原籍利比里亚，1890 年到 1918 年间生活在拉各斯。他创办的报纸《拉各斯每周要闻》支持改革的呼声，号召尼日利亚人联合起来与英国进行斗争。尼日利亚海外学生中有一个新闻联盟，他们成立组织联合抗议。这些组织中最著名的是 1925 年创立于伦敦的西非学生联盟(WASU)，其宗旨包括：增强非洲人的民族意识、种族自豪感、自力更生、联合与合作。西非学生联盟呼吁酋长和精英分子之间的合作，游说英国政治家进行改革，并利用它的月刊为民族主义事业服务。

政治性的团体迅速出现并最终成为表达民族主义和参与竞选的重要平台。早期领导人寻求的是在殖民体系内进行改革而不是国家独立。最早的联合行动都是一些抗议活动，例如 1908 年成立的“人民联盟”是为了抗议拉各斯开征自来水税。另一个团体，1920 年成立于拉各斯的“改革俱乐部”反对征收直接税。取得较大成功的是“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简称“大会”)，该团体成立于 1920 年，旨在反对种族歧视，联合西非精英分子谋求自治。在加纳的阿克拉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大会”要求英国将立法委员会的一半席位留给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建立一所大学，引进义务教育，消灭种族歧视。这些要求都有利于精英阶层的进一步壮大。1920 年 9 月到 1921 年 3 月，大会派了一名代表到

84

伦敦表达他们的诉求,但殖民地事务大臣拒绝接见。这是一次因殖民当局很深的敌意所造成的彻底的失败,当局把"大会"的成员看做是自封的代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想破坏土著体制。酋长们同样反对"大会",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剥夺。"大会"虽然在 1923 年终结,但还是给后世留下了印记:行政部门给了非洲人几个高级职位;1922 年选举原则引入;同年重组了西非上诉法院。

1920 年,"加维运动"(Garvey Movement),即"全球黑人促进协会"(the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的一个支部在拉各斯成立。该运动由牙买加人马库斯·加维创建,是一个激进的种族觉醒运动,目的是将所有的黑人团结到一个组织中,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在 1916 年移民到美国,在那里创建了一个大众组织,召开了由来自非洲代表参加的会议。他开通了"黑人之星"航线(前往非洲),鼓励美洲的黑人返回故乡为自由而战斗。他创办的杂志《黑人世界》在尼日利亚颇受欢迎,传阅甚广。大会拟订了建立一个非洲黑人国的计划,推举加维为非洲临时总统,还选定了国旗和国歌。对加维来说,非洲的独立不用商量,即使采用武力也要实现。他的运动失败了,他本人被抓进监狱,后来被流放,但是他的政治哲学并不乏虔诚的追随者。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尼日利亚人,包括像欧内斯特·伊科利和纳姆迪·阿齐克韦这些著名的民族主义活动家。

在早期政党中,最成功的是成立于 1923 年 6 月的尼日利亚国家民主党(NNDP),它由赫伯特·麦考莱为回应 1922 年的宪政改革而创立。这次改革使得一个新的立法委员会得到授权为拉各斯和南尼日利亚殖民地立法。委员会有 46 名成员,其中 19 人为非官员,27 人为官员。在 19 名非官员中,4 人必须从拉各斯和卡拉巴尔两个自治市中选举产生,也只有这两个城镇的受教育阶层可行使选举权。NNDP 的建立就是为了参加这些竞选。该党公布了首份精心准备的竞选纲领,其序言很重要:

85

作为大英帝国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确保尼日利亚殖民

> 地和保护领的安全和福祉，我们要高举“权利、真理、自由和正义”的大旗去民主的天堂，直到实现由民众选举的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宏伟目标。[①]

该党反对强迫劳动制、强占土地、建立大种植园，以及严酷的法律。它呼吁对拉各斯实行城市自治，施行面向所有人的义务教育，建立西非上诉法院，并使行政部门人员非洲化。该党在 1925－1938 年间赢得了拉各斯城市委员会的所有席位，以及 1923、1928、1933 和 1943 年拉各斯在立法委员会中的所有席位。该党成员包含地方酋长、行会成员，以及女商贩，因此能够动员起人口的绝大部分。另外，它的报纸《拉各斯每周要闻》起到了宣传政党活动和批评政府的作用。该党的活动局限于拉各斯，这可以理解，因为拉各斯是精英分子的聚集地，但委员会的成员也提出有关国家其他地区的议题。NNDP 没有对英国的统治构成挑战，它只是在殖民统治框架内寻找强化权力的工具。它希望权力的移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该党在立法委员会中只有少数成员，该党及其代表的精英阶层的声音非常弱小。

为了应对该国第一个高等学府亚巴学院存在的问题，1934 年“尼日利亚青年运动”(NYM)成立。1934 年成立的亚巴学院，主要培训学生在行政部门工作，发放人文、经济学、农学、工程和医学方面的文凭。它不隶属于英国任何大学。尼日利亚精英分子对这所学校不满的原因是，它的文凭低于英国大学的，在国外不获承认。他们从其制度安排中看出了种族主义动机：亚巴的毕业生将永远屈从于英国官员，并且永远不会升迁到领导岗位。

NYM 得以将自己成功地转变成第一个民族性的、多种族的组织。 86
它在 1933 年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抗议对亚巴做出的决定。政府没有做出反应，但 NYM 将它涉及的范围扩大到反帝措施、经济剥削和社会不公等方面。它发布了一份综合宣言，涉及提高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水

---

① *NNDP Maifesto*, Lagos, 1923.

平,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宣言要求实行大众化教育、提供针对每个人的平等的经济机会、将权力移交给尼日利亚人、给予 21 岁以上的公民普选权。1938 年,它的候选人赢得了拉各斯城市议会的选举和立法委员会中的 3 个拉各斯席位。这场胜利标志着 NNDP 一党独大局面的结束。NYM 在全国建立支部,拥有成员近 2 万名。由于北方支部主要由定居该地的南方人组成,这遭到了英国的抨击,因为英国人把他们看做是玷污了北方保守环境的、令人讨厌的人。作为"全国性"政党,它以自己的报纸《每日报道》为主要阵地,对拉各斯地区之外的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谴责。然而,由于 NYM 的很多成员是政治温和派,所以他们不主张立即结束殖民统治。1941 年,该党根据种族划分分裂了,向立法委员会推出了各自的候选人。此后,它再也没有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

NYM 的一位重要成员是纳姆迪·阿齐克韦。1937 年,他加入该党,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年他创办了《西非舵手》,它以发行量大和不可辩驳的反殖立场立即获得成功。报纸的社论集中于殖民的非正义、剥削和种族主义等议题。以拉各斯为大本营,阿齐克韦是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东部的著名民族主义者,他能将拉各斯的伊格博精英分子动员起来支持 NYM。阿齐克韦为西非 1934 — 1949 年间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成为最著名的反殖斗士和新闻工作者。他被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尊称为"齐克"(Zik),用孜孜不倦和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打动了别人。他本人经历了殖民时期的巨大变化。作为一名少年,他生长于城市的大杂院中。他对他父亲在尼日利亚军团所受待遇感到不满,也不满于他本人在 1923 — 1925 年当小职员时的待遇。他经过一番拼搏来到美国,在那里他以一名穷学生的身份进入一所黑人为主的学院,目睹了种族歧视以及由非洲裔美国人组织的抗议活动。尽管拿到了两 87 个学位,他在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谋得一份公职,不得不到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创立了《阿克拉晨报》(*Accra Morning Post*),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非洲的复兴》(*Renascent Africa*)。1937 年,他的报纸发表了一篇由工会领导人 I. T. A. 华莱士-约翰逊撰写的《非洲有上帝吗》

的文章,该文用了过激的言词批评殖民政府。阿齐克韦遭到指控,但后来被判无罪。他返回尼日利亚,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和民族主义者。

阿齐克韦推动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新闻业的战斗性。通过在美国的经历,他看清了尼日利亚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斗争,呼吁建立反对英国的联合战线。他的报纸仿照美国新闻业的煽动文风,发表对种族问题的深度评论,不断对英国进行批判,使殖民官员震惊不已。通过创办地方日报和拓宽发行渠道,他使新闻大众化,使民族主义思想传到内地。

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国外的事件和思想。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作为独立国家的成功被其他非洲人当做他们可以管理自己的例证。由美国著名黑人领导人加维和 W. E. B. 杜波伊斯创建的泛非运动,鼓励黑人的军事斗争和相互合作。苏联的崛起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为非洲领导人传递了自由和解放的思想。1947年印度的独立对他们是一个激励。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为提高地方诉求的重要性和重塑国际政治形态提供了条件。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直至 1930 年,政党主要由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分子组成,要求改革而不是独立。进入 40 年代以后,民族主义经历了一次高潮:反殖运动从拉各斯扩展到其他城市,甚至是农村,媒体和一线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激进的独立要求。在之前几年,政治气氛因为 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而变得紧张。很多非洲人对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非洲独立国家遭到侵略感到愤怒,他们开始呼吁自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民族主义产生了影响。近 10 万尼日利亚人被征召入伍。许多人接受了战时关于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宣传。他们退伍后许多人加入了政党。主张自由和反对剥削的宣传被用于反对英国。尼日利亚士兵通过与白人士兵的交战,以及与驻扎在尼日利亚的白人士兵的交往,削弱了很多人对白人的敬重,鼓励他们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海外服役时曾享受过较高的生活水平,当战争结束时,他们不再拥有这样的生活,因此,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88

要联手终结殖民统治。

当战争扩大到北非、中东和印度的时候，尼日利亚成为英国及其盟军向这些地区转运军队和组织供给的战略要地。设在伊巴丹、拉各斯、卡诺、埃努古、迈杜古里和乔斯或其附近的军营、机场和连接它们的公路迅速修建起来。超过10万的军队曾借道西非。很多城市因此获益，工薪阶层壮大。尼日利亚也通过资金和原材料形式为战争作出了贡献。除了原先的出口商品和新增的木薯粉等食物外，随着东南亚的丧失，盟军对其他地区的锡和橡胶的需求增大。战时资源短缺造成了尼日利亚的经济繁荣，但没有持续多久，随着非正常需求的结束，艰难时期到来。

若没有美国的参战，盟军很难赢得这场战争。战后，英国失去了世界权力的领导地位。两个新的超级霸权——美国和苏联，在非洲没有殖民地，他们出于自身的原因都对欧洲殖民列强施压，要求实行非殖民化。工党在英国上台执政后，其领导人对殖民地表示出更多的同情。《大西洋宪章》给予了非洲自由斗士另一股动力，该宪章决定建立联合国，并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的思想。

还有其他条件推动了民族主义活动的高涨。集中在欧洲企业和亚洲零售商手中的经济力量打压了尼日利亚商人和小商贩。联合非洲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独自控制了进口贸易的40%，它和其他5家企业组成了“西非商人协会”(AWAM)，控制了超过60%的进口和70%的出口。战时控制有利于欧洲企业，使它们成为政府采购的代理商。尼日利亚商人被剥夺了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因为他们被看成有民族主义的背景。对贫穷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而言，解决价格低廉问题也是他们积极参加反殖斗争的原因。

89

也有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压力，他们要求扩大西方教育。许多英国官员仍然瞧不起他们，而政府又不能满足这些精英分子扩大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多的精英分子加入政党，组织和参加集会，尽可能地到处宣传他们的政治纲领。

由铁路工人、教师、邮电员、海关人员和政府公务员等组织的工会

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中也有按种族(例如伊格博人联盟)或城镇(奥约进步联盟)组成的其他社团。由于成百上千的人加入到雇佣者的行列,更多的社团在40年代出现。民族主义领导人能动员这些社团获取支持。更重要的是,工人们有了组织抗议的平台。在1945年,劳工联合会已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了一场持续52天的总罢工。罢工是对政府的一种挑战,它使工会和民族主义运动能够融合到一起,揭示了合作的优势和利用威胁来获得让步。被早先大多数民族主义活动排除在外的北方,也被吸引参加了罢工,因此,民族主义和政治意识传播到了英国人用来抵御新思想的地区。很多人大胆地提出移交权力的要求。在40年代初,工会领导人和学生向政府提交了备忘录,并在媒体中写文章号召接管政权。1941年,WASU呼吁创建一个"实行联邦体制的统一的尼日利亚"。两年后,该组织要求在建立由尼日利亚人领导的五年制的全责政府之前,先建立十年制的代议制政府。

## 权力移交(1945－1960)

向尼日利亚人移交权力是通过1945年后和平的宪政变革完成的。在宪政改革、尼日利亚领导层的存在和各政党为获得权力而不懈努力的合力作用下,国家在15年内得以获得自治。尼日利亚领导人组织政治团体,动员各阶层的选民,以获取当局的认可。他们倾向于利用人们的反殖情感,而很少从历史、文化和语言中寻求共鸣。他们极力渲染独立会给每个人带来的好处,并把这点与殖民统治的缺陷相对比。更加年轻、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者开始出现。当英国增加尼日利亚人在立法委员会的名额,并允许一些通向独立的宪制改革时,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在获取权力的斗争中变得举足轻重。

90

1944年8月26日,"尼日利亚国民协会"宣告成立,由赫伯特·麦考莱任主席,纳姆迪·阿齐克韦任秘书长,它将各种不同团体和民众组成一条统一阵线。协会的成员包括各政党、工会、种族联合会,以及专业的和文艺团体的领导人。为了吸引设在拉各斯的喀麦隆人团体参加,它的名称改为"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党"(NCNC)。用了约

10 年时间，该协会成为尼日利亚起领导作用的国民组织，在各城镇拥有分支机构，呼吁自治。

1923 年宪法在 1947 年被修改，以总督的名字命名为《理查兹宪法》。这部宪法的目标是在不破坏三个地区立法机构或土著管理局的权力的基础上，将北方和南方合并到一个中央立法委员会下。宪法强调国家有三个区，每个区有自己的议会。行政委员会仍由欧洲人组成，选举权还是限于拉各斯和卡拉巴尔，地区议会没有立法权。地区议会和立法委员会都包括由州长和地方当局任命的官员和非官方成员。尼日利亚人在战后想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他们反对制定新宪法时采取的专横方式。NCNC 率先批评《理查兹宪法》。它在全国各地组织巡回演讲以筹集资金，准备派代表到伦敦抗议该宪法。演讲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和民族意识。

工会和一些激进团体加快了武装行动的步伐。包含有 NCNC 军事成员的齐克分子运动，组织演讲和出版宣传材料来煽动公众反对政府。由于和阿齐克韦绑在一起，未能广泛宣传他们激进的意识形态，齐克分子没有演变为一个全民组织。齐克分子组织劳工暴乱，导致 1949 年埃努古煤矿 18 名工人死亡，以及随后其他一些抗议活动。齐克分子还组织、领导了暴力游行。由于政府把齐克分子看成是极具危险者，且它也被阿齐克韦本人抛弃，1951 年该运动被禁止。

91

1948 年殖民政府作出了一系列让步，成为非殖民化的"转折点"。这包括修改《理查兹宪法》，宣布采取措施将行政部门官员尼日利亚化，对土著当局实行民主化，以及扩大高等教育。政治改革的进程开始启动。新生代的领导人开始呼吁更大的地方自治权，并创建社团来实现这一目标。将在 20 世纪下半叶一直困扰尼日利亚的种族政治问题也开始出现。种族问题的起因包括由殖民主义造成的地区差异、对城市有限资源的争夺，以及新兴政客为寻求最佳途径来获得支持而将种族问题工具化。对地区的情感最终导致以地区为基础的政党出现。以西部为基础的"行动派"(AG)由奥巴费米·阿沃罗沃领导，他利用约鲁巴创世神话和祖先生活的伊莱-伊费城的影响力，创立了一个文化组

织——埃格博·奥莫·奥杜杜瓦(意为“奥杜杜瓦的子孙”)。它在 1951 年转变成一个政党。创立于 1949 年的北方人民大会党(NPC),利用人们对 19 世纪哈里发的怀念,借助伊斯兰教在北方创建了一个稳固的政党。北方出现的第二大政党“北方进步联盟”(NEPU),是一个由阿米努·卡诺领导的左翼政党。最初作为全国性政党的 NCNC 变成了东部的政党,由伊格博人控制。当领导人舍弃了处理泛尼日利亚问题,越来越关注地区利益时,时局就此改变。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地区主义者,他们为了狭隘的利益而热衷于独立。地区议会和联邦中央议会被建立起来。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后,激进主义趋于平缓。地区政治为那些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谋取官位或其他显赫身份提供了大量机遇。行政部门扩大,雇佣了很多尼日利亚人。一个大学学院于 1948 年在伊巴丹创建,成为尼日利亚第一所高校,它招收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将自己看做是未来的领导人。工人们不再焦虑不安,部分是因为经济的改善,部分是因为在官方打压下齐克分子运动的激进思想已被抛弃。尼日利亚企业家们除了扮演政府控制的出口市场计划的许可证购买者之外,还从尼日利亚化和地区主义中得益,可以更加方便地得到银行贷款和政府合同。新的工业建立起来,国内市场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初级产品的出口扩大,农场主甚至也能获得薄利。在教育、公路、能源和工业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增长很快。在没有周到考虑过其行动前景的情况下,政治家们就急于让尼日利亚人都相信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处在转折点。50 年代成为现代尼日利亚历史上充满希望和理想的黄金时代。

92

新来的总督约翰·麦克弗森修订了《理查兹宪法》。与理查兹不同,麦克弗森允许公众讨论他们想得到什么。新宪法于 1951 年生效,这只是一个折中的措施,它包含很多相矛盾的内容。宪法保留了三个地区,但给北方的代表数量是其他两个地区的总和。未来取决于各个政党在选举中的竞争。民族主义者现在为了各自的政治权力斗争而分裂。到 1952 年大选时,政局已经明朗,所有政党都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统领全国。只有通过地区加种族联盟,而不是意识形态,他们才具有了全国性政党的形象。在东部及联邦层面,政局因为针对修订宪法产生的僵持而变得不稳。作战的对象不再是已显露出瓦解迹象的殖民政府,而是尼日利亚同胞。为了把冲突降到最低限度,英国不得不于 1953 年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

伦敦会议把相互竞争的各个政党和地区代表聚到一起,由他们决定国家的宪政。尼日利亚将是一个联邦政体,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一个来自各个地区 4 名部长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宪法还确立了由地区总理、部长领导的地区政府都由尼日利亚人担任;而且它授权给每个地区实行完全的内部自治。在随后 3 年里发生了更重要的变化。众议院的选举举行后,1953 年 3 月 31 日,安东尼·埃纳霍罗在众议院建议尼日利亚应该在 1956 年取得独立。这遭到北方代表的反对,他们担心会被南方精英所操控。代表地方利益的政客开始争斗,以至于北方威胁要分离出去,后来英国施压才使国家维持统一。在 1954 年召开了另一场制宪会议,产生出一部给地方更多权力的宪法。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在 1957 年举办,当时西部和东部地区寻求在 1957 年自治,北方寻求在 1959 年自治。1959 年的大选使哈吉·阿布巴卡·塔法瓦·巴勒瓦当上总理,NPC 和 NCNC 结成联盟。

93

两个问题延迟了独立:人数较少的族群担心他们会被由大的族群控制的地区政治压迫,同时北方担心受南方掌控。更大的区域自治权缓解了北方人的担心。人数较少的族群大声呼吁对他们实行宪法保护,或者建立单独的自治州。由主要族群控制的三大政党得不到少数族群领导人的信任。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大党拒绝建立新州,一个调查少数族群不满的委员会没有做出符合他们意愿的决定。该委员会建议将保护措施写进宪法来缓解少数民族的担忧。这些措施包括:警察由中央统一指挥,制订法律保护权利,地方当局的职能不能过于集中,建立一个发展委员会来规划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实体经济。尼日利亚在 1960 年 10 月 1 日获得独立,并在 1963 年成为共和国。但依然有很多被掩盖了的突出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种族问题、少数族群的不满、

暴力和日益严重的腐败。另外,英国成功地控制了非殖民化进程,来保护其重要的经济和其他利益。后殖民经济体系的基石在这个时期被奠定,出口生产继续进行,外商从传统领域(生产出口产品、零售)中撤出,转移到更为现代的经济部门。英国人就此与新兴的尼日利亚资产阶级买办进行部分合作。当尼日利亚人对自治的第一个10年进行回顾时,会发现取得独立比管理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要容易得多。

# 第七章　第一共和国(1960－1965)

95　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头 10 年经历了 1960－1965 年政府议会体制的实施与失败,1966 年的两次军事政变,在雅库布·戈翁统治期间爆发和终结的 1967－1970 年内战,以及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尝试。这些就是该章和下一章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 政府和政治

尼日利亚宪法在殖民统治的最后一年通过,并于 1963 年得到修订。它仿照英国议会体制,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立法议会的议员由普选产生,而行政系统人员则不需要。政府接受经投票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即议会)的授权。议会授权给某些成员,因为不可能由整个立法议会的议员来组成行政机关。这个体系显示出以下四个特征:名义上的行政首脑和事实上的政府首脑相分离;行政当局遵循相对多数的有效原则,由一个总理领导的部长内阁构成;立法和行政的混合性;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部长们都对议会负责。96

政府有三个机构:议会是主要的立法机构;行政当局是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司法部门确保宪法和法令得到遵守。这三个机构在联邦和地方层面上都存在。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总统是三个机构共同的首脑(就像英国的女王)。总统的职责之一是每年至少召开

一次议会。他也拥有休会或解散议会的权力。在行使后一项权力时，他要听从总理的建议。如果众议院通过一项对行政当局的不信任案，而总理拒绝在3天内辞职，或者在方案通过之后，总理没能解散议会，总统也可以解散议会。当总理之位空缺，没人能够得到议会信任时，总统也可以解散议会。

参议院有56名议员，分别代表拉各斯和3个区。代表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人口规模为准，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少数族群的利益，促进国家的统一。参议员由地方立法议会从总督提交的一份名单中联合推举产生。联邦直辖区由4名参议员作为代表，同时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议选出另4位参议员。参议员不是以政党为基础选出的。众议院共有312名成员。他们是由一个个选区选出的，每10万人产生一名代表。因此，地区越大，它的代表就越多。例如，北方拥有过半的议员。在总共312名议员中，拉各斯地区占3席，西部占62席，东部占73席，而北部占174席。

参议院议长或副议长主持参议院。当两者都缺席时，议员们可以指定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来主持。众议院以同样的方式运作。每个议院行使权力的法定人数是总数的1/6。如果在开始议事时到场成员数量未达法定人数，议会应该休会。议事用英语进行，以防议员们为用何种语言争论不休。每个议院的决议必须要由出席的大多数议员投票通过。议会主持者拥有一张决定票。

97

议事规则决定了议会的程序。根据《立法院(权力和特权)法案》，议员在议会和某一下属委员会中所做决议、质询、动议、提案、请愿或评议，享有刑事和民事豁免权。法案的第4－13节规定议员有权召集证人，得到与案情有关的资料。如果某人散布诽谤性或虚假的信息，而让议员名誉扫地，法案的第24节认定其有罪。

议会制订法律采用两院表决通过议案的方式，且要得到国家总统的批准。每个议院都可以提出议案，但只有众议院才可以提出财政议案。在将议案提交给总统批准前，两院要对议案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然而，总统可能拒绝批准。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可以利用在议院辩论的

机会,发表批评意见,否决掉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反映人民最大利益的议案。由于议会不是经常召开——甚至一年只召开一次,因此它下设许多工作委员会,例如选举委员会履行由众议院交给的任务,议事规则委员会负责议案二读以后的辩论。各个委员会代表的人选取决于各政党在议院中的实力。

联邦行政当局由总统、总理和部长们组成。总统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和军队最高统帅。总统由两院联席会议选出。当总统五年任期结束,或者在职时去世或自行辞职,或者根据《宪法》条款被免职时,总统之位将空缺。

实权掌握在总理及其内阁手中。总统从众议院大多数人支持的候选人中任命一人为总理。他也在总理的提议下任命其他部长。当总理之位空缺时,部长们也被停职。这种空缺发生在众议院被解散或者总理不再是议员时。总理及其部长们是政府运作的关键人物。他们集体对议会负责,但在处理以下情况时例外:赦免权,司法部长权力的行使,议会的解散,部长、部长委员会的成员和议会中的部长秘书等职位的任免,以及当总理生病或出国时,从部长中任命一人来代行总理职权。



政府的第三个机构是司法部门。《宪法》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不得少于 5 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其他法官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最高法院中有 4 名成员来自地方,他们由州长提名、总统任命。按照议会的规定,总统可以解除首席法官和其他法官的职务,原因包括失职、思维或身体的欠佳不能继续任职。

4 个区采取相似的安排。每个区有两院:州众议院和酋长院。像联邦众议院一样,州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酋长院的成员不是由民众选举出来。地区的行政权由区总督掌管。总督由总统根据地区总理的建议进行任免。然而,总督并不是总统的代表。地区总理和部长会议代表总督行使职权。地区总理从区众议院中选出,而在北方他也可能从酋长院中选出。其他部长由总理提名、总督任命。其中有两位部长必须来自酋长院。每个区有自己的高等法院,由至少 6 名法官和 1

位大法官组成。他们由总理提名、总督任命。每个区可以设立上诉法院,在北方甚至有一个沙里亚上诉法院。

议会政体有几个方面值得批评。首先,它几乎未涉及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宪法更多的是关注权力的分配,而很少涉及权力的目的。另外,它的很多条款并不太利于联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宪法肯定了地区差异,并为集团势力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基础。政党利用这个基础来为他们的成员谋取私利。每个区有足够的能量和其他区进行争斗。宪法也助长了各个区之间的偏执和对立情绪。在各区内部也存在着问题,主要是因为每个区的大的族群可以统治无数个较小的族群。由于小族群和大族群的代表会为权力和资源争斗,这种主一次的地区结构本身就充满冲突。在整个第一共和国时期,各个区的少数族群代表都抱怨歧视、统治的不合理、压制和忽视。例如在北方,这煽动引发了蒂夫地区 1960 年和 1964 年的两次暴动。

99

国家借用了议会模式,但却忽视了让它发挥正常功能的行为规范。国家的各个立法机关在一年内总共开会不到 50 天。例如,北方众议院一年内从未有超过 30 天的开会纪录。立法委员大都是兼职的,结果造成行政部门在大多数时间里自行其是。只有两次例外,在 1960 年和 1965 年,在反对党的提议下,政府决定撤回一项议案。甚至这些议案(1960 年的《英国—尼日利亚防务条约》和 1965 年的《报纸(修正)法》)被撤销,也不是因为立法机关的反对,而是由于公众舆论的敌视。政府的 3 个权力部门经常是合而为一,并且有时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串通一气。当一个部门或其代表竭力阐述已见时,几乎看不到另外两个部门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例如在 1963 年,当众议院的公共预算委员会对联邦政府审计报告中透支的项目提出质疑时,行政部门迅速解散了该委员会,此后它再也没有建立。在此前的一年,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联邦政府审计长因为对政府的超支进行质疑,而被财政部长解职。

当选的立法委员是由政党推举出来的,而行政当局由赢得大选的政党组建,它要么单独组阁,要么和其他政党联合组阁。当时存在许多政党,但引人注目的只有三个:NCNC(现在叫“尼日利亚全国公民大

会党")、AG 和 NPC。政党的竞选纲领涉及如何迅速发展和权力分配的问题。在冷战时期,政党还必须要表明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在一群激进分子中,认为社会主义为发展提供了捷径的观点颇为流行。



从 1951 年到 1966 年,NCNC 控制了东区的政府,并成为西区众议院的主要反对党。从 1959 年到 1966 年,它和 NPC 一起组成联邦政府。NCNC 努力从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团体那里获得支持,例如伊格博国家联盟、博尔努青年运动以及各种文化和劳工联盟。直到 1951 年,该党成员主要由这些组织构成,而不是个人。阿奇克韦被个人成员和团体组织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依赖力量,而党内的一些内部危机就围绕着是否忠诚于他而起。虽然在 NCNC 党内有一个"左翼",但阿奇克韦仅仅利用它的激进口号来吸引大众。当他因为创立一家金融企业而被指控违背社会主义事业时,他声称社会主义和积累财富是不矛盾的。[①] 在 1958 年联邦选举期间,该党把自己描绘为"一个费边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坚决反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②]从 1960 年到 1965 年,该党明显地表露出它的社会主义口号主要是为了拉选票。

AG 提出了一项福利计划。它的根基在西区,虽然它在博尔努、大河、卡拉巴尔和奥戈贾省也有选民支持。在第一共和国期间,该党成为联邦立法机构的反对派。它争取知识分子(律师、医生、教师)、商人和传统酋长的支持。该党强调对进出口贸易的参与,以便使自己的党员能够成为外企的代理人,并积累财富。1959 年选举之后,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加明显,部分是作为一种吸引更多民众的方式。1962 年该党正式发布了新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这进一步强化了其内部的不和,并导致后来的分裂。AG 始终没有机会把它的社会主义理念付诸实践。

NPC 成立于 1951 年,最初是文化团体——"北方人民协会"

① N. Azikiwe, "Presidential Address at the 1957 Annual Convention," mimeographed.

② *Daily Times*, October 23, 1959.

(JMA, the jam'yyar mutanen arewa)的一个分支。该协会是北方一些知识分子想有一个讨论政治平台而在1948年成立的。NPC是一个有准入条件的政党,主要对北方人开放。在50年代,它的大部分成员是土著当局的职员或北方众议院议员。后来,该党完全投身于土著管理中。与AG和NCNC不同,该党没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是在其纲领中宣传要造福北方人民和延续殖民经济结构。索科托酋长艾哈迈杜·贝洛一直是该党的领导人和区政府总理,直到在1966年政变中去世。他的助手塔法瓦·巴勒瓦是第一共和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总理。从1954年到1966年,NPC是联邦政府执政联盟中的主要政党。



其他的小党包括北方进步联盟(NEPU)、中部联合大会党(UMBC)、尼日利亚联合独立党(UNIP)、博尔努青年运动党(BYM)、卡诺人民党(KPP)和中西部民主阵线(MDP)。这些小党为三个大党提供了结盟的机会,使他们的选举人范围扩大到他们原有的势力范围之外。例如,NPC通过与MDP结盟,势力扩大到中西部。而AG通过与UMBC结盟,势力延伸到北部。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小党对选举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在各种选举中,他们的总票数不超过全部选票的15%。但小党在结盟中却获益;他们通过大党的帮助获得了更多的选票,其党员主要通过被任命到政府部门和政府半国营性质的企业任职而受益。

其中的一个小党NEPU值得单独评述,因为它可能是最激进的政党。它认为观念上、政治上的争议应该集中于纲领和阶级利益上,而不是地区主义。它在1950年脱离了NPC,批评该党专制,同时宣布"所有的政党都是阶级利益的体现"。NEPU倡导重建社会结构来取消特权和消灭贫穷。党的领导人阿米努·卡诺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正直的政治家,主张"由普通大众、穷人和未受教育的人进行统治",他对民主的定义也很特别:

> 我们以更为传统、激进的理念来解释民主,那就是由普通大众、穷人和未受教育的人进行统治。但我们的对手却以现代的、保

守的观念来解释它，认为民主是少数受过教育和富有阶层按符合普通大众利益的方式进行统治。①

该党不得不和NPC的力量相竞争。1952－1956年间，它在北方众议院中没有席位；1956年，在131个席位中占7席；在1959年联邦选举中，赢得了174席中的8席；但在1961年，它只赢得1席。

102

下文对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分析将涉及政党合作、政党间的冲突和党内的危机。这些冲突和合作影响到经济、外交政策、人口调查和选举等国计民生问题的阐释和解决。这个时期的政治有如下的特征：权力掌握在一些寄生的小集团手中，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没有出现；选民们缺少对其代表的监督权（除非采取暴力），这意味着实施的还不是真正的民主；未能防止政府官员对公共财富的聚敛，这进一步刺激了对官位的争夺，加剧了由当权者引发的宗教、种族、部门和种族竞争的问题；当权者未能改变进一步剥削穷人的新殖民主义结构。

第一次全国性的直接选举在1959年举行。这是一次决定由哪一个党将统治独立的尼日利亚的关键性选举。最后的结果是：NPC赢得134个席位，AG夺得73席，NCNC获得89席，独立候选人占据16席。总督詹姆斯·罗伯逊邀请塔法瓦·巴勒瓦组建政府。NPC和NCNC同意联合组建政府，而AG成了反对党。尽管南方政客们要求联合起来反对北方，但NCNC从政治和经济上考虑拒绝了同AG结成联盟。若和AG结成联盟，双方在谈判时几乎具有对等的力量，对彼此也构成对等的威胁，所得利益也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均分。与NPC结成联盟，是因为NCNC认为它虽然是一个实力较弱的合作伙伴，但它可以通过偶尔地对AG在选举上的威胁，来体现胁迫的力量。这样的联盟也使NCNC有可能得到和它自身实力不成比例的利益，这比同AG结盟所能获得的要大得多。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特别是

① Ainu Kano,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Party Convention," Zaria, January 1－2, 1961, mimeographed.

当地方上面临支出不断增长、收入持续下降，正向拉各斯的联邦政权寻求更多的发展资金时。然而，NCNC 的愿望没有成为现实。至 1961 年初，NPC 在联邦议会中已构成足够多数，因为 16 名独立候选人和一些原来与 AG 结盟的小党的成员已转而投向了它。



政治几乎不关注政府的好坏或者对需求竞争的调解。它主要关注原始积累，索取资源来满足政客们的愿望。在这些欲望中，包含有对政治支持的渴求。为满足这些欲望，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控制变得至关重要。这是 NCNC 为什么认为它最好和掌权的政府结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从未拥有获取的能力，因为 NPC 变得越来越强大，使北方成为联邦开支中的主要获利者。由于 NCNC 没能实现在结盟时的期望，它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尽管同 AG 结盟可得到的承诺更少。对 NCNC 来说，最佳策略是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尤其是向西部发展，与 AG 一起分享选民的支持。如果 NCNC 能够获得对西部的控制，它将不仅使 AG 边缘化，而且会严重削弱 NPC 的基础。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AG 和 NCNC 都想改变南方和北方的代表比例，也希望改变财政分配机制。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改写国家的人口数字和各个地区间的人口比例。一项人口统计的争论从 1962 年延续到 1964 年。1952－1953 年的人口统计使北方在众议院 312 个席位中占据 174 席。南方的政治家们希望新的人口统计能对他们有利，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权力(和财政收入)。1962 年 7 月，一项令人震惊的统计结果送到了拉各斯：东区的人口增长了 71%，西区增长了 70%，而北部地区只增长了 30%。后来挑出一些地区进行复查，结果北区的数字进行了调整，从最初的 30%的增长率改为 80%。没有一个政党愿意接受这些数字，总理不得不取消了统计结果，答应在 1963 年进行新的人口统计。1963 年人口统计的结果没有什么改变：北区增长超过了 74%，东区为 65%，西区达 100%。赶走 NPC 的企图再一次失败。

与此同时，西区的政治局势恶化，发生了动乱。1961 年爆发了零星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在 NCNC 和 AG 的支持者之间。1962 年发生了

更大的危机和更严重的暴力事件，导致 AG 内部由不和到政党分裂。104 分歧最早出现在 1959 年阿沃罗沃由西区升迁到联邦立法机构工作后，谁将接任他担任区总理。后来，酋长 S. L. 阿金托拉成为继任者，在巩固了权力后，他没有同阿沃罗沃沟通就做出了一些重大决定。他们个人间的分歧混杂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如 AG 是否要信奉社会主义，怎样和 NPC 相处等。阿金托拉赞成和 NPC 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而阿沃罗沃反对这一主张。事实上，阿沃罗沃利用自己反对派领袖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对政府进行抨击，突出的有《英国–尼日利亚防务条约》、联邦政府的工作效率、要求对经济进行更多的本土化等。

NPC 对阿沃罗沃的批评感到羞辱和愤怒，便想方设法诋毁他。机会轻易地就来了。1962 年 5 月 25 日，由于 AG 内部的冲突引发了在区众议院的暴力事件，当时，有人试图解除阿金托拉的总理职位。联邦政府进行了干涉，宣布解散众议院和暂停总督之职，还宣布了紧急状态法，任命了一位行政官。

其他事件的发展对阿沃罗沃产生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并最终结束了他在第一共和国的政治生涯。联邦政府成立了科克尔委员会，调查西区的投资政策和 6 个政府企业的资金，以及它们与政党的关系。委员会澄清了对阿金托拉的指责，发现 AG 犯有卑鄙的财政交易罪，并指控了阿沃罗沃。1962 年 11 月阿沃罗沃被逮捕，被控犯有叛国罪。1963 年 6 月他被判处 10 年监禁。

NCNC 从西区危机中获益。该党得以在拉各斯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在西区之外建立一个叫“中西”的新州。这个提议在众议院获通过，并得到东区和北方立法机构的批准，由西区行政长官签署实施。后在中西州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现场 83% 的人投票同意建立一个单独的地区。1963 年中西州成立，成为该国第四个区。

在西区度过了 6 个月的紧急状态后，尽管受到阿沃罗沃派系支持的候选人、酋长埃德格本卢的反对，阿金托拉仍重新成为区总理。阿金托拉派组成了一个“统一人民党”(UPP)，由于在区议会中不占多数，105 决定同 NCNC 结盟。NCNC 现在成为一个较强大的政党，它控制了东

区和中西区,并在西区建立了联盟关系。NPC 为此感到担忧,特别是 NCNC 现在已有能力在南、北之间形成均势的两个对立的集团,这将影响它在 1964 年大选中的胜率。NPC 迅速行动,破坏了 UPP 和 NCNC 的联盟。阿金托拉被 NPC 说服去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即尼日利亚国家民主党(NNDP)。他终结了 UPP 同 NCNC 的联盟,并命令他内阁中的 NCNC 成员要么参加他的新党,要么退出。一些 NCNC 成员投向了 NNDP,阿金托拉的党成为地区议会的多数派,而 NCNC 失去了西区。

NPC 把阿金托拉在西区的成果转化成一种优势。阿金托拉政府认可了有争议的 1963 年人口统计数字 6 600 万,南方和北方人口比例保持不变。中西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因为新政府接到了将撤销它所依赖的联邦援助的威胁。因此,NCNC 对人口统计结果的反对坚持不下去。到 1963 年底,NCNC 期望 1964 年的选举能改变它讨价还价的筹码,而 NPC 关注的是巩固它在联邦层面的权力。

1964 年的联邦选举在两大联盟之间竞争:尼日利亚民族联盟(NNA)和联合进步大联盟(UPGA)。前者包括 NPC 和一些小政党,后者由 NCNC、AG、NEPU 和 UMB 组成。NPC 想把自己塑造成全国性政党的形象,而联合进步大联盟则显示自己进步和激进的形象。那些把眼光盯在联邦职位和联邦国库上的政客们都不想输掉选举,他们动用各种伎俩来赢得胜利。随着 12 月国家选举日的临近,政治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政党招募地痞来保护本党成员,攻击对手。负责选举的官员或者被贿赂,或者遭恐吓。一些候选人的提名表被扔掉了,以确保其他人的当选。在西区,选举程序如此混乱,以至 NNDP 在这个得不到支持的地区居然有 30%候选人顺利当选。在北方,NPC 的 174 名候选人中 88 名也顺利当选,同时 NCNC 阻止了在东区的选举。

联邦选举委员会对大部分违规事件视而不见。在一场极端腐败的选举中,尼日利亚民族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巴勒瓦向总统提出重新担任总理,组建新政府的要求。但遭阿奇克韦的拒绝,部分是因为对选举结果的怀疑和对其政党的忠诚。这场宪法危机在首席大法官和 106

军队领导人等其他政治家的压力下被化解。阿奇克韦请巴勒瓦组建政府,同时达成交易,同意新政府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之上,包括来自两个联盟的代表。东区的选举安排在3月举行,在这之后,NCNC的成员将进入政府任职,而西区新的众议员选举在10月开始。这场交易不能弥合政治本身存在的严重分裂。尽管总统先前威胁要辞职,但他还是很留念自己的总统宝座。总理通过妥协来谋求第二个任期,而不是依靠宪法和司法制度解决问题。司法本身因为以党派的方式干涉政治而削弱。因此政府的所有功能都暴露出问题。随后发生的事件导致共和国最终垮台。

1965年3月,东区举行了选举。作为回报,NCNC的成员马上被任命在联邦行政部门工作,造成内阁主要职位的任职者达到了80名,相当于联邦立法会人数的1/4。政府现在成了一个股份公司,每位"大政客"都成了股东。那些没有捞到好处的人在报纸上宣泄不满,很多本来应当从国家资源合理利用和刚刚赢得独立中获益的尼日利亚人,开始发牢骚和讨论变革的必要。

1965年10月,西区众议院选举为变革提供了催化剂。在联邦选举中惨遭失败的联合进步大联盟对10月的选举很乐观,希望会赢得胜利,进而实现变革。由于选举从来不是变革的因素,这种乐观主义注定要落空。大量操纵、违规的选举使NNDP赢得了选举。这场胜利立即带来了灾难。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脆弱的经济由于税收大量流失变得更加糟糕。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支付工资。为避免破产,政府决定从可可农身上榨取"剩余价值"。阿金托拉作为新政府总理,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将可可的价格从每吨110英镑降到60英镑,这一重大政治失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期望联合进步大联盟的胜利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农民们举行了暴动。

暴动在农村和城市广为扩散。NNDP和警察对此都束手无策。而NPC控制的联邦政府则认为NNDP在西区有统治基础,暴动不久就会过去。拉各斯不是去寻找克服危机的办法,却将精力放在1966年1月它将主办的英联邦大会上。军队在1月15日早晨大罢工发生前,

107

允许会议参加者离开了会场。

此时，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几乎年年都有严重到足以毁灭新生共和国政治根基的问题出现。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预计它会迅速垮台。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是新生独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分，那么它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化总是伴随着政治危机。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他们抨击传统，否定土著社会在建设国家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承认暴力事件和危机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会发生。

一些分析家已注意到，尼日利亚缺少克服地区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必需的"全民共享价值观"。事实上，没有多少政治人士热衷于一个统一的尼日利亚。然而，另外一些分析家把垮台归咎于西区的暴动。这好像混淆了问题的表象与问题的本质。暴动是政治不稳的结果而不是起因。这种结论也揭示出政治家看重的是权力本身，而不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方式。他们的兴趣主要不是实现选民利益的最大化。不管用何种方式获得权力都被认为是合法的。没有必要去谈论政治游戏的规则，因为政治家们不会遵守这些规则来实现那些看得见的特定的目标。但是，缺少规则对政治来说是很难想象的，这也意味着没有恰当的政治观。而没有正确的政治观，那么，流行的道德规范就是满足私欲，即政治家们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

最常见的解释是种族因素。有人认为，"部落"太多，自主权太大，以至于在一个共同的国家框架内无法共处。推动这些"部落"分离的力量远大于推动它们统一的力量，这不仅造成中央管理的困难，而且最终导致内战。现有体制无法抑制这些分离势力，因为它承认这些地区的权力和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这种种族的解释，特别是有些分析家认为种族问题只是受到政客们的利用，正如他们利用宗教来操控选民一样，淡化重要问题，逃避道德和刑事的指控。持不同意见的分析家们倾向于将殖民因素看成是第一共和国期间稳定的一个障碍。他们认为英国故意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国家，因为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的恶果，殖民经济结构造成的分离倾向，牺牲本土文化、培育亲西方文化的精英教

108

育体制,使国家变得很难管理。

对垮台的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三种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政治的特性、国家的特征(继承了殖民主义留下的许多问题的一个脆弱的国家),以及国家在导致其落后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政治实行“赢者通吃”的原则,政客们从未被排斥在政府机关之外。政治主要涉及获得对公共资源控制的能力,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私利。失利者除非和获胜者结盟,否则得不到任何回报。权力的自我膨胀、腐败、敛财被合法化和合理化;宗教和种族问题成为可利用的工具。当政府在联邦或地区层面的控制方式威胁到了某一政治利益集团索取财富的时候,暴力事件、对不公的抱怨和种族间的争斗在此时便达到了顶峰。只要政治家们满足于他们的特权,这种体系下的政治稳定还是有可能的,但他们是不会满足的,稳定自然不会实现。

政治的特性植根于殖民时期。在殖民经济时代,赚大钱和致富的机会集中于贸易和政治。尼日利亚商人们为许多外国企业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提供服务。随着国家垄断市场部门的建立,政府也开始从农业出口中分一杯羹。由商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尼日利亚精英阶层要竭力控制政治权力,以便得到政府资金、商业机会和曾经被殖民政府和外国企业所剥夺的工作。那些当权者通过提高资源划拨和分配来加固他们 109 的经济和政治根基。当好处惠及新贵时,政治也成为阶级构成的手段。政客和商人与外国企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他们通过控制政府和市场部门,也能给他们的支持者们带来合同、工作和许可证。那些想从国家建设的机遇中(例如学校、医院和工厂)分享利益的人们和团体要同政党和政客们打成一片。这些团体设法维护他们的利益,排挤来自其他政党、地区和领域的人分享他们认为应该属于他们的资源。一旦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客们失去权力,这些团体就会感到受到威胁。因而政府的替换也意味着命运的改变。

非殖民化过程使地区主义成为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政治与法律结构强化了经济。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政权体制特意将政治权力下放给由三个不同政党控制的三个地方政府。这些政党在他

们的地区里恐吓对手。相互竞争的地区和政党争夺对权力中枢的控制,主要就是为获得通向资源和外国企业的捷径,以及实现对敌对地区和在冲突中失利的政党的控制。NPC 主要通过对拥有议会大多数席位的北方的控制,成功地主导了权力中枢。此后,该党利用各种方式,包括武力胁迫,把对手从权力岗位上排挤掉。同样地,其他的政党和地区也采用各种策略驱赶北方人民大会党的势力。

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政治暨法律结构不能解决危机,反而助长了危机。新生的尼日利亚没有继承殖民时代随意动用武力或高压统治的能力。它依然处在外国经济利益的主导下。事实上,外企和外国(主要是英国)充当中间人和仲裁人,由他们决定最佳的行动方案,并做出对他们有利的选择。政治冲突不会终结贸易,对他们来说却是有利的,因为冲突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严重的经济方面转移开(特别是国有化)。冲突还能使他们贿赂那些需要钱进行战斗和向对手显示其优势(在物质方面)的政党和政客们。作为一项聪明的政治预防措施,外国企业指定政客们(以及他们的商业盟友)作为专门的经销商、股东和代表。尼日利亚政府成为本土精英分子和外国资本利益的一个调节器。 110

然而,由于监护人彼此争斗,政府没能扮演好调节器的角色。社会的其他群体,尤其是遭到各种剥削的农民(通过税收、不公平的产品价格、政治家没有兑现的诺言等),对国家提出了强烈的不满。这些不满表现为暴动、拒绝纳税和经常的抗议活动。农民们的不满也推动部分军队投入到行动当中。

## 经济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国家把资金投入到一系列的发展计划上。先是拟订了一个 1945－1955 年的十年计划。1955 年联邦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后来又延长了两年。在 1962 年,制定了第一个独立后的发展计划。1962 年前的几个计划非常关注殖民者的利益,1962 年的计划依然未能剔除外国利益,因为就政策而言没有什么改变——走资本主义道路,重视外国投资、私人资本和贷款。在整个第一

共和国时期,国家没能解决好外向型的、受国际经济体系变化影响的新殖民经济下的矛盾。

国家承袭了一个落后的经济。政府成了一个主要监督向西方国家出口的交易机构。农业重点是出口作物的生产。工业部门很弱,在1950年、1954年和1960年,分别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0.9%和0.8%。制造业更糟,1950年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是0.6%,1954年是0.9%,1960年是4.7%。它只有罐装食品、啤酒、液体饮料、火柴和香烟生产等企业。这些生产活动也主要集中于拉各斯和伊凯贾。国际收支为赤字,外汇储备从1955年5.622亿奈拉,减少到1960年的3.433亿奈拉。社会和经济生活发展不平衡,其中精英阶层享受各种经济机遇,而农民只能依附于城市。第一共和国没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加深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111 第一个财政预算着重于十点经济计划:增强对本国货币价值的信心,将工资和报酬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继续扩大所有经济发展都要依赖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支持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工业增长和对矿产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促进对人力资源的培训,特别是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方面的人员培训;确保各个发展项目要根据它们对国家的重要程度有序进行,联邦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在这方面要妥善协调;根据金融发展有效安排资金供给,既要调动国内的资源,也要吸收海外资本;根据经济承受能力,发展需求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设施;充分发挥尼日利亚在国际机构和组织中的作用,推动国际贸易向着更加自由、宽泛的方向发展;确保尼日利亚在国际技术援助项目中,既要扮演捐助者,也要扮演接受者的角色。

以上所有内容都包含在1962－1968年的计划中,它预计固定投资23.66亿奈拉,其中7.8亿投资到私营部门,15.86亿投资到公共部门。财政分配集中于交通、电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贸易、工业和教育上。还预计每年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储蓄率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在地方层面上,每个区都重点发展它认为重要的部门:西部追求工业发展;北方希望增加农业产量;东部是同时发展农业

和制造业。这些都希望通过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各个区的财政收入加以实现。[1]

但 1962－1968 年的计划收效甚微。将所需财政的 50%寄望于外国援助,注定了计划的失败。到 1964 年,预计的资金只到位了 14%。这一时期政局的不稳也导致了不好的结局。由于政变和内战,计划被迫取消。其他的如行政机构的不作为和可利用资料的缺乏等原因,也注定了计划的失败。

经济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 1960－1961 年的 23.786亿奈拉,增长到 1966－1967 年的 34.054 亿奈拉,年增长率达到 5.3%,这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石油,它对增长率的贡献从 1960 年的 1.2%,增加到 1966 年的 4.8%。农业、渔业和林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开始下降。部分是由于石油的生产。农业增长率从 1960 年的 4.7%,跌到 1964 年的 1.2%。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得到扩大,从 1960 年的 4.7%上升到 1966 年的 6.1%。但制造业主要还是对进口商品的加工和包装。

112

国际收支呈现赤字,这一趋势开始于 1955 年,主要是因为大规模进口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为了发展,需要大量进口。1960 年的贸易赤字是 1.386 亿奈拉,1963 年则降到 1.11 亿。外汇储备从 1959 年的 4.208亿奈拉,下降到 1963 年的 1.954 亿。政府为摆脱这种局面试图在 1964 年减少进口。到 1966 年,贸易和资本账户的改善使整个国际收支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国际和国内经济因素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生活指数每年上升了约 5 个百分点。

政府采取了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不是汇兑控制(这在内战时期及之后更加突出)。尼日利亚于 1961 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遵守布雷顿森林条约中尽量减少汇率限制和控制的条款。因为政府财

---

[1] 在尼日利亚,收入分配是争议性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一次安排能令人满意。一个地区产生的财富被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经常成为局势紧张的一大原因。此外,另一不断重复的争议是北方利用联邦的力量为己谋利。

政支出和收入的大规模增加，第一共和国采取了财政扩张政策。来自贷款和税收的固定财政收入从1960年的2.41亿奈拉，增加到1966年的3.22亿奈拉。经常的资本支出主要用在行政、社会和经济服务上，从1960年的1.625亿奈拉，增加到1966年的2.785亿奈拉。投资的增长必然带动资本货物的进口。在1964年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对来自诸如日本的纺织品等商品进行限制，同时加大商品出口，以增加财政收入。1964年后实施的财政措施目标是控制总需求的扩张速度，留住外汇储备，提高国内储蓄水平，削减政府开支和提高关税。但是，这些措施却造成了财政收入的下降，特别是关税收入，以及经济发展放慢。政局不稳给经济问题雪上加霜。

1958年，成立了监管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该银行填补了因第一个发展计划中未能获得足够的外国援助而产生的货币缺口。结果，货币供应增加了约29%，助长了通货膨胀。1964－1966年，政府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实现收支平衡。主要经济活动——农业开始遭殃。现有体系的维持通过剥削农民实现。在"市场委员会"的支持下，政府夺走了农民们的"农业剩余价值"。原材料收购价格由委员会决定，在提价后又被卖出去，所得利润被转移到国库。

113

非农业部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变化，要么是受外部的推动，要么是为了让由外国企业控制的私人部门获利。作为对第一共和国时期经济状况的真实反映，商业和工业部长扎纳·布卡尔·迪普卡利马这样总结道：

> 严格地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超过75%的海外贸易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掌控。[1]

---

[1] Federal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bates, November 16, 1961, Vol. IV, Col. 2943.

# 第八章　军人统治和内战 (1966－1970)

115

第一共和国的一些分析家没有预料到军人会掌权，因为他们认为，在联邦结构体制下这不可能发生，军队缺少训练，人数也少(10 000名)，而且奉行不干涉政治的传统。但是，他们忽略了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已经被政治化了，因此，不能把它与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制造或继承的问题隔离开来。另外，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忽略了军队的上层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即使军队没有掌权，他们也会通过强制力量扶植一个文官政权。在第一共和国时，总统和总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会向军队领导人咨询。在 1964 年联邦选举前夕，军队在拉各斯大街上游行，警告选举人不要诉诸暴力，而总理却不得不与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商讨预防措施。同样的，在 1962 年和 1964 年，政府动用了军队以平息西区和蒂夫人的骚乱。

尼日利亚军队是殖民时期的产物，目的是保护殖民者的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兵来自穷人、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人或少数族群。后来，通过吸纳其他社会团体和受过西方教育的中产阶级，军队构成有了改进。早期入伍的士兵或为了借机报私仇，或为了从殖民体系中获得补贴。而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军人(尤其是其上层)关注的是职位的晋升，这不仅涉及地位问题，而且为他们与文职权力精英建立同盟关系

116

提供了机会。到 1960 年，军队的构成存在严重问题。大多数军官是英国人(占 83%)，但本土化计划和 1962 年多数英国军官的退役并未使其构成变得均衡，因为现在大多数军官来自南部。本土化和职务晋升已成了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家们支持各自中意的人，而不同族群的代表也在为他们本族的人能担任重要职位而进行游说。于是，引入了军官分配制度，辅之以个人能力和功绩，使北方人在军事上占优。

军人干预政治的原因主要包括：捍卫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或者促成一场革命；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打击敌对势力；防止即将发生的社会崩溃；维护军队自身利益，尤其当军官们想要得到权力和财富时；以及参与民众运动，推动社会变迁。通过对 1966 年两次政变的原因和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变大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第一共和国遭遇政治困境时，政治家们未能解决他们内部以及他们与民众之间的危机，他们也没有维持一个稳定的外国投资环境。因此，这为 1966 年 1 月的军人干预打下了基础。陆军少校卡杜纳·恩泽奥古，一个没有民众运动作为基础的、自成一派的革命者，和他的同事之所以能干政，不是因为军队与国家其他统治机器相比更加现代化，或者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和更加老练，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暴力的手段。

民众对政变的反应是短时的。新的领导者阿圭伊·伊龙西少将没有宣布任何意在赢得民心的临时政策。人们认为政变是因伊格博族军官渴望获得地方统治权而引发的。这种看法在北方很流行。但是，如果考虑到第一共和国的困境，以及三个主要参与者认为他们是出于爱国之心，那么政变的理由就清晰了。下面是恩泽奥古一些煽动性的话语：

117

> 我们的敌人是政治投机者、骗子，他们占据各种职位，索取贿赂和谋取私利；他们希望国家永久分裂，以便他们能继续占据部长之位，充当大人物、部落主义者，任人唯亲；他们使我们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变得微不足道；正是他们腐蚀了我们的社会，使尼日利亚

发展倒退。我们保证,你们将不再羞于说自己是一个尼日利亚人。[①]

政变策划者陈述的动机没有揭示出他们企图实现伊格博人统治。然而,因为他们不担任领导职务,就很难核对他们的言行是否一致。也许,他们的言辞也只是为了想赢得政权。当然,政变的过程是一场政治灾难。伊格博军官是政变的设计者,在被杀害的27位重要政客和军人中,没有一个是伊格博人。在发动政变的4个关键地区(拉各斯、贝宁、埃努古、卡杜纳),只有在卡杜纳取得很大成功。这种局面使得总指挥——伊龙西少将成为国家第一位军事首脑。

正如伊龙西和他之后的其他军官所认识到的,政治与管理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和复杂。社会压力和政治问题困扰着伊龙西的统治,他无法解决种族纷争问题。各地方的统治者也没能制定出人们所期望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东区和西区的统治者甚至被指控任人唯亲。政治家们不希望军事统治太长,他们仍然在进行自我组织。国家在经济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总之,除了一些承诺外,新的军人政权未能制定出连贯的政策,与它的前任没有什么区别。

地方主义和政治纷争没有得到缓和。伊龙西所做的事反而对北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有利[②],他没有处理好对政变是地方行为的指控,对政变的策划者也不知该作何处置,如果他们是叛国者就应该受到惩罚,如果是自由斗士就可以得到宽恕。他没能建立一个统治基础广泛的政府,而是更喜欢和一小群人共事,而这群人恰巧就是伊格博人。这对其他族群中有野心的人构成了威胁。除此之外,伊龙西没有意识到军队中北方人的担忧,怕在职位晋升问题上遭遇不公。尽管宣布对军官的晋升暂停一年,但他还是提拔了21名中校军官,其中18人为伊格 118

① Radio Broadcast, Kaduna, January 15, 1966. 完整演说见:J. Ojiako, *Thirteen Years of Military Rule, 1966－1979*(Lagos: Daily Times Publication,1979)。

② 为了维持统治和讨好北方传统势力,他把一些重要的职位分配给了北方有势力的军官担任。——译者注

博人。

落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1966年5月24日发布了《统一法令》,它最终使尼日利亚结束了联邦制,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国。[①] 法令主要引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各大区将被撤销,代之以各个省;管若干省的军事领导人将取代地区总督;由军事长官监管各省;联邦和地方上所有公务员的行政等级将被统一。这项法令忽视了现有的政治环境。伊龙西忘记或轻视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建立起来的对各大区强烈的忠诚度,而一些政客和士兵正是利用这种忠诚来发展他们的事业。伊龙西本人也从未声明过他能超越对本族的忠诚。对于那些认为他是伊格博代理人的人来说,这个法令也仅仅起到佐证的作用。到处流传的谣言是,军队中的北方人将被清洗,政治家们则开始告诫人们伊格博人统治国家的后果。

1966年5月29日,也就是法令颁布5天后,位于扎里亚的阿赫玛杜·贝洛大学(Ahmadu Bello University)和管理学院(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的学生最先以游行示威的形式做出重要反应。这些学生都是潜在的中产阶级新成员,他们自认为受到了《统一法令》的侵害,因为法令将会减少他们的就业机会,迫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争。区域自治则能确保应届毕业生容易地找到工作,在社会上一步步向上爬。抗议后来演变为对住在北方的伊格博人进行人身攻击,尤其是对住在市中心、在商业和运输业方面对其他人构成竞争的伊格博人发动攻击。

这次骚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许多伊格博人逃回东部,气氛变得紧张。关于伊龙西准备强化统治的流言继续蔓延,助长了人们对住在北方的伊格博人更大的怒火。当伊龙西着手到全国各地向酋长和地方统治者诠释该法令时,1966年7月29日的一场反政变运动使他没有能完成他的旅行。"七月政变"结束了伊龙西的统治和北方人所认

---

① 取消以区为单位的分权式联邦制,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中央集权制政府。——译者注

为的伊格博人对政府的控制,但因为“七月政变”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他们士兵的控制,或许是因为组织不当,伊格博人士兵遭到肆意屠杀,并殃及与伊龙西政权毫不相干的人。

119

一连数月,意外事件不断发生,人们开始期盼出现一位新的领导者。经过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后,雅库布·戈翁,一位来自北方的资深中校,成为国家新首脑。他必须要赢得人们的信任,尤其是在东部,他在那里被看成是北方的代理人。东区伊格博军事领导人奥杜梅古·奥朱古中校,并不认可戈翁的领导,部分是由于他把戈翁看成是反伊格博的人,部分是由于他认为还有其他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出任领导人。包括阿沃罗沃在内的若干政治犯的释放,安抚了大部分地区人们的情绪。

## 内战

此次政变仅仅以对豪萨—富拉尼人统治的担忧取代了对伊格博人统治的恐惧。戈翁承诺会解决地方主义问题,他在第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应当审视一下我们国家的地位问题。”[①]但是,这个审视过程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战争。1966 年 8 月 9 日,各区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建议所有的军人应该回到他们的出生地,由戈翁负责拉各斯的卫戍部队,并召开各地代表组成的临时立宪会议,探讨国家下一步的立宪问题。

临时会议在 1966 年 9 月举行。军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各成一派,而地方代表则为各自地区寻找最大利益。每一个区都诉述了许多不满。在西区,阿沃罗沃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他们希望约鲁巴人能够在西区掌权,并且能分得较大份额的国家的收入。阿沃罗沃被地方政府承认的精英团体“思想领袖”(Leaders of Thought)封为“约鲁巴人的领袖”。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约鲁巴人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约鲁巴人的领土被瓜分,拉各斯、伊洛林、卡巴和阿科科—埃多已经从约鲁巴人的版图中分割出去;约鲁巴人在政府事务上听命于其

① 全文见:*The Struggle for One Nigeria* (Lagos: Federal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n. d.) pp. 37－39。

他区；他们是第一共和国权力滥用的受害者，遭受了生命财产的损失；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受到联邦中其他族的妒忌；联邦中其他族担心西区和拉各斯将来会统治联邦。在中西区，一些人想和东部合并，而其他人则想保持自治状态。在北区，意见分成了两派：一些人想要保持一个大区，而另一些人则想分成一个个州。前者的支持者包括酋长、土著管理局的职员和那些从一区结构中获益的人。而后一种意见的倡导者认为，州越多带来的收入也越多。针对其他族对北方统治的担心，北方的代表做出了集体回应：

120

> 我们彼此都有自己的担心。一些人担心在他们自己的地区机会有限，因此，他们希望能不受限制地向其他地区发展和创业；一些人害怕别的区域人多势众，从而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些人对其他族的技术优势和有可能的入侵感到担心……这些担心有些可能是存在的，有些则是想象的……不管它们是真是假，它们都必须被认真考虑，因为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各族之间的相互交往。[①]

伊格博人对这场"反政变"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惧怕北方人的统治，拒绝承认戈翁为国家的领导人。伊格博知识分子主张分裂尼日利亚。在东区，有关分裂的宣传日益高涨。

由于存在这些不同的意见，临时会议收效甚微。代表们大多是第一共和国的政客，他们彼此互不信任，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才坐到了一起。戈翁力劝他们避免国家的彻底崩溃和维护政府的统一。然而，代表们在一些议题上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主张在联邦或邦联体制下，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强化地方政府的功能。

临时会议还讨论了9、10月的骚乱和在北方发生的对伊格博人的

---

① Northern Delegation to the Ad-hoc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Lagos, September 1966.

屠杀。这次袭击比 5 月份那次规模更大,还涉及军人。丧生的伊格博人估计在 7 000 －50 000 人之间。从表面上看,这次大屠杀起始于住在东区的北方人被杀害的谣言。随后,东区的人大批逃离北方,那些逃走的人又到处传播可怕的谣言,这些传说证实了一些文人在竭力所做的宣传。西区的伊格博人也加入到大规模地迁到东区的运动中。军事领导人奥朱古面临着成千上万难民的经济问题,他命令非东区的人应该离开东区,他不能再保证他们的安全。难民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又一条理由。地方政府声称,如果它能完全控制地方资源,它才能照顾这些难民。

社会分裂已经太深而很难愈合,这一点戈翁和许多人都很清楚。戈翁试图用妥协的办法来解决危机,这似乎还存在一丝可能性。在所有妥协的措施中,1967 年 1 月 4 日－5 日在加纳举行的阿布里会议最有名。对会议报告的细致研究显示,会议参加者们试图掩盖一些棘手的问题,但情形并不乐观。他们最终达成了以下协议: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冲突;改组军队(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给予总督更大的权力);明确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职能(这再一次赋予总督更大的权力);废除使权力过分集中的法令;安置无家可归的人,主要是北部骚乱中的受害者。

阿布里协议随即面临两个现实问题。首先是对协议的解释:戈翁认为应建立一个较松散的联邦,而奥朱古认为国家应该实行邦联制,这样东区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理事务;其次是协议的执行。戈翁随后采取的措施被奥朱古解释为破坏了阿布里协议。1967 年 3 月 30 日,奥朱古政府颁布了三个重要法令:《征税令》(*Revenue Collection Edict*)、《正规教育令》(*Legal Education Edict*)和《上诉法院令》(*Court of Appeal Edict*)。《征税令》指示所有来自东区的纳税人不再向联邦政府纳税,改向东区地方财政部门纳税;《上诉法院令》废除了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正规教育令》打断了东区与联邦其他地区之间的教育联系。后两个法令打破了本区与联邦司法体系的联系。东区的联邦机构被查封,财产被没收,东区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没有正式宣布,这部分是因为监视西区动态的需要(东区认为

 西区也会脱离联邦)，以及察看拉各斯联邦政府的反应。其他的和平尝试，包括准予各州更大的权力，都失败了。在获得长老和领导人授权后，奥朱古在 1967 年 5 月 26 日采取了最后一项措施，“最早宣称，东尼日利亚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名称就是比夫拉共和国。”①

拉各斯联邦政府好像预料到这点，它的反应很迅速，仅仅在奥朱古发布命令后的第二天，戈翁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直接掌控军队和政府，禁止讨论政治，将国家分为 12 个州(6 个在北区，3 个在东区，西区、中西区和拉各斯各有 1 个)，以此消除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统治的担忧；他还宣布了保护联邦在东区利益的措施。奥朱古视戈翁的措施为对东区领土完整的挑衅和干涉，宣布东尼日利亚从尼日利亚分离出来，组成一个新的主权国家。这标志着内战的开始，因为拉各斯方面已明确表示，将采取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反对分裂。在 1967 年 6 月 30 日的广播中，奥朱古告诫比夫拉所有的公民：

> 勇敢自信的比夫拉同胞们，属于你们的时刻到了。如果我们去战斗，那将是一场对尼日利亚的战争，尼日利亚宣誓要铲除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会胜利！②

双方都宣称将会胜利。拉各斯方面认为比夫拉不可能打败联邦其他州组成的联军。在比夫拉方面，基于两个方面理由也持乐观态度：它预计会得到外国大量的援助，尤其是那些为获得高额利润的石油公司曾表示会支持它。这些公司认为，它们在比夫拉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因为比夫拉需要通过它能得到的所有资源来进行战争。比夫拉方面也认为，这些公司会在各自国家和国际社会起到施压的作用。另外，比夫拉对拉各斯方面的能力表示怀疑，它认为联邦政府软弱、腐

---

① C. O. Ojukwu, *Biafra: Selected Speeches with Journals of Even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pp. 146 – 147.

② Lt. Col. Ojukwu, Broadcast to the People of Biafra, June 30, 1967.

败和无能,这使得联邦政府处于弱势地位。

在宣战后的几周里,双方的领导层都在加强各自的力量。比夫拉成立了国民委员会以扩大政治基础,受到怀疑不够忠心的人被赶出了决策层,全体公民都被动员起来准备作战,并接受了简单的军事训练。比夫拉用“保持警惕”作为动员口号,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警示民众防范所谓的破坏分子。在拉各斯,戈翁也在加强力量,通过建立联邦执行委员会来壮大其政治基础,委员会由来自各州的政府骨干力量组成,但不包括来自伊格博内陆的东区中心地带的人。他们同时也承担行政管理事务,这就减轻了士兵们的日常管理职责。阿沃罗沃担任了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担任的最高职位,可以利用他的影响使约鲁巴人站在联邦政府一边。

战争延续的时间比拉各斯预想的要长。第一次武装冲突发生在1967年7月6日,戈翁认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警察行动”,但却持续了30个月,至少100万人丧生。伊格博人作战的决心、救援机构对比夫拉的接济和联邦军队在管理与组织能力方面的薄弱,是内战拖延不绝的原因。然而,比夫拉方面在战争中的失败,部分原因是粮食短缺和无力抵抗联邦政府更强大的军队。联邦方面正是采取了使敌人断绝粮食的战略。

作战沿袭了传统的方式:双方在指定地点面对面地摆开阵势,在大炮和迫击炮进行了一番攻击后,双方的步兵才上阵对攻,直到一方败退。战斗的目标是获得对道路和城镇的控制权,从联邦方面来说是占领对方,从比夫拉方面来说是死死守住。每当联邦军队占领一个城镇,平民百姓就跟着比夫拉的军队一起撤退,这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和饥荒。比起枪林弹雨,饥荒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这部分要归因于比夫拉内部权力的更替、救援组织通过谈判得以接近受害者施以援手的工作异常艰难,以及联邦政府甚至不惜以牺牲平民为代价封锁比夫拉的战争策略。

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战争国际化的时代。别的国家、军火商和雇佣兵都热衷于战争,目的是想从尼日利亚的财富中分一杯羹,或者是希望尼日利亚崩溃,因为其领土规模对别的国家是一种威胁。比夫拉

政权得到了非洲一些国家(坦桑尼亚、赞比亚、加蓬、象牙海岸)和西印度群岛的海地的外交承认。它也得到了葡萄牙、以色列、法国和南非的同情和支持。它的武器来源靠私营商人,以及法国、南非、以色列和葡萄牙。而联邦政府的武器主要通过英国、苏联、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政府机构提供。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救助组织,如著名的国际明爱会[①]、法国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关爱非洲[②],也都参与其中了。比夫拉利用国际社会的卷入获得了有效宣传、食品、资金、药物和衣服。

124

通过宣传,比夫拉得到了大量的同情和救济。在当地,宣传部门动员民众参加战争;在国际上,它雇用马克普莱斯代理公司[③]向世界告知它的处境,指出是伊斯兰教的北区在对基督教的东区进行种族灭绝和试图进行统治。尽管联邦政府赢得了战争,但是比夫拉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比夫拉发现可以轻易地传播它的观点,它提供的种族灭绝的证据令人信服。

战争迫使尼日利亚政府重新审视它的对外政策。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对外政策与西方绑在一起,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以不损害与西方国家亲密关系为准则。内战及伴随而来的石油收入使尼日利亚重新审视它过去的看法,即认为西方集团是其朋友,而东方集团是敌人。内战时,英国拒绝向尼日利亚出售飞机,美国拒绝出售军事装备,法国则承认了比夫拉政权,所有这些使得决策者将视野转向了东方。苏联这时提供了帮助。从 1968 年 8 月起,莫斯科提供了米格-15 战斗教练机、苏联技术人员、米格-17 战斗机、轻武器和重型火炮。和苏联之间的其他联系也建立起来,如苏联赢得了一项钢铁厂的合同,确立了新的苏联—尼

① 国际明爱会(Caritas International),是天主教一个国际慈善组织。最早于 1897 年产生于德国的一个煤矿区天主教堂,以救济矿难死伤者的家属。1950 年,德国、瑞士、美国等 13 个国家的明爱会联合成立了国际明爱会。现有 160 多个国家会员。——译者注

② 关爱非洲(Africa Concern),是爱尔兰天主教会在比夫拉战争期间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主要救助比夫拉的饥民。这场战争结束后,该组织转而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难民,改名为“关爱世界”(Concern Worldwide)。——译者注

③ Markpress Agency,一家瑞士公关公司。——译者注

日利亚友好合作关系。这一期间,对外政策的其他变化包括竭力加强与非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西非国家的关系,同时也尽可能地增加与欧洲国家的商业渠道。

为结束战争也动用了外交手段。在 1967－1969 年间,非洲统一组织和英联邦秘书处在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尼亚美和蒙罗维亚一共组织了 4 次重要和会。但这些会议均收效甚微,因为各方对其目标都不准备妥协。尤其是拉各斯方面强调,它不想为了和平而导致尼日利亚的最终分裂。对于它来说,和平谈判必须建立在“一个尼日利亚的基础上”。[1]

125

如果说数百万人因战争而受难或死亡,那么军火商和食品商等人则大发战争财。卷入政治的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战争也给经济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国家不得不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人数似乎一夜之间从 1 万人增加到 27 万人。而国防预算也从占 GDP 的 0.2% 增加到 6%,即从 1961 年的区区 405 万奈拉,上升到 1971 年的 31 485 万奈拉。这个增长对经济是个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军队对生产几乎没有什么贡献。战争结束后,军队控制着稀缺资源,军官们过着寄生生活,变得越来越贪婪。

为什么在独立 6 年后尼日利亚人又走向战争呢?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过多的争吵和情绪化反应都阻碍着人们进行理性的分析,政府也没有保留相关档案。该问题涉及种族、第一共和国的问题、军队内部的分裂、个人冲突和殖民遗产。以下两种观点缺乏说服力。一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奥朱古身上,指责他过于野心勃勃,试图通过军队为他自己缔造一个帝国。一名同时代的军官曾宣称:“这是一场一个人与我们其余所有人之间的战争。”[2]但这是夸大其词的。因为奥朱古并非是第一个提出分裂设想的人,在他之前,各地的许多政界要人都已经威胁说要脱离联邦。早在 1966 年,艾萨克·博罗和其同伙就宣布尼日尔河三角

[1] *New Nigerian*, September 13, 1969, p. 1.

[2] 哈桑·卡齐纳少将发表的声明,引自 O. Obasanjo, *My Command* (Ibadan: Heinemann),1981。

洲独立,后来联邦政府耗费4周时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奥朱古仅仅是向前迈进了一步而已。他拥有强大的领导权,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赢得了伊格博人的拥护。殖民遗产和当时的政治危机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被他充分利用。其他伊格博领导人认同了他对危机的诠释。1966－1967年间,他广受欢迎,尤其是在成千上万正寻求新的机会的难民中。事实上,东区那些反对分裂的人成了无足轻重的少数人。第二种看法是第一种的延伸,认为伊格博人应该为战争负全责。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伊格博人引起的1966年1月的政变,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也就不会导致战争。这一系列事件——“一月政变”、“七月反政变”、对伊格博人的大屠杀以及分裂——可能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然而,要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事实上,内战是独立后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最极端的例子。战争的起因不能仅仅追溯到1966年1月。

126

各地区的政治集团以一种或多种方式推动了战争的爆发。因为每一个政治家和军官都是出于自身的或阶层利益来看待政治。另外,除了上一章已提到的问题外,由石油带来的财富影响了政治集团的决定。对于东区的政治家来说,脱离联邦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他们可以从石油财富中获益。但是,吸引东区的石油也同样引起了他们竞争对手的兴趣,尤其是当控制采矿业和制造业比农业更有利可图的时候。到1967年,东区和中西区均已产出石油,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显露出来。甚至早在1964年,NCNC就极力抱怨财富从南方流到了北方,而在1967年危机期间,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东区认为国家相当大的财富是他们创造的。在战争期间,双方都试图控制石油设施,一方失败后就尽力破坏它,使其不能开采,以削弱敌方经济。支持联邦政府的北方政治阶层看到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他们而言,为了获得石油收益,就必须控制中央政权。对西区来说,由于农业收入日益减少,他们也意识到石油的潜在利益,因而他们支持按人口和需要进行收入分配,而不是按产于何地(20世纪50年代,当农业是经济命脉时所推行的政策)。通常情况下,跨国石油公司与外国政府根据如何能更好地

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提出分配建议和“专家意见”。

## 军人统治下的政府

内战未能阻止军政府的建立。军人虽然推翻了文官政权，但是没有行政文员(即公务员)的参与，他们是无法治理国家的。伊龙西和戈翁选择与行政文员(即公务员)积极合作，至少出于三个方面原因：首先，在 1966 年，军队中尚没有人具备独立管理国家所必需的经验、教育背景和技能；其次，军政权认为，他们和行政文员有共通的地方，如价值观取向和统一的指令结构；第三，军政府认为行政文员既有能力又正直，这是丧失信誉的政治家中所缺乏的。的确，文职官僚比军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擅长处理一些政治事务，行政管理上更加熟练。一些行政文员也愿意与军政府合作，甚至认为获得国家发展的最好办法就是与军人合作，制订和执行政策。这些行政文员尽量不去谴责第一共和国的统治政策。



军人和行政文员之间的结盟蕴意很深。首先，高级行政文员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声望和影响。联邦军政府大臣 C. O. 劳森在 1973 年承认，行政文员“在军政府比在民选政府中声望更高些”[①]。他们出席内阁会议，参与讨论，以顾问身份进入一些重要管理部门，如部长会议、最高军事委员会和联邦行政委员会，在地区层面也同样如此，行政文员成为地区行政会议(后来称“州行政会议”)的成员。此外，常务干事们还被任命为国营或半国营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其中的风险是常务干事只要对自己负责，因为公司隶属于他的部门。

在民选政体下，行政阶层被认为要讨论和执行政治家已经达成一致的决定。部长是各部的领导，他要考虑政党的决定、选民的心理和立法者的意见。公务员可以说服部长，但是如果建议被否决，他们无权不执行政府的决定。换句话说，行政部门附属和从属于立法政治机构。

---

① C. O. Lawson, " The Role of Civil Servants in a Military Regime," *Daily Times*, December 11, 1973, p. 24.

政府要想有所作为，它的公职人员必须能干，工作效率高。

然而，在军人统治下，部长并不单独对各项政策的执行和完成负责，军人与行政文员的联合，意味着不只是通过部长对自己部门的监控来进行政治控制。在整个1966年，行政文员就扮演了部长的角色。到1967年，当联邦和州政府任命了第一批部长的时候，高级行政文员已经拥有了空前的影响力、声望和权力。此外，摆在部长们面前的还有其他障碍。第一，被任命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几乎没有任期安全感。军政府有权任命他们，也可以将他们解职。解职非常容易，因为他们不代表任何可依靠的政党或利益群体。和政治家不同，他们不需要为了某项事业或某个理由而工作。第二，既然常务干事是内阁成员，部长就不能将他们排除在讨论和决策圈之外。有时候甚至是行政文员而非军人或部长们决定了政治导向。正因为如此，常务干事把自己看成是部长们的同僚。

行政文员的权力过大和缺乏控制，导致普遍的效率低下。另外，他们对公众的意见、关注点和抱怨也变得麻木了，开始走向腐败。贪恋权力的官僚们还想通过使军政权固定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提出了误导性的建议，将军队领导人和民众隔离开来。他们的联合使得政治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集中。得到联邦或州政府中重要官员的支持和好感，对那些想从政府手中拿到项目的人而言极其重要，由此造就了想通过不正当手段与政府订立合约的人，也进而加剧了滥用职权的趋势。

在军人控制下出现的这种政府结构，认可了军人和官僚之间的联盟。1966年1月，伊龙西取缔了88个政治团体，解除了所有部长及立法者的职务，他成为唯一的立法和行政首脑，并修改了宪法，以适应这些变化。地方上的军事长官也承担起行政和立法者的角色。为协助自己的统治，伊龙西创建了两个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和联邦行政委员会。前者由他本人和4个地方总督、军队总参谋长、警察总长组成，而后者由联邦常务干事组成。地方行政委员会由地方常务干事组成。与最高军事委员会相比，联邦行政委员会经常定期开会，伊龙西也定期召见常务干事。更多的决定是在联邦行政委员会上做出的，而非最高军事委员会，尽管后者在名义上级别更高。最高军事委员会不经常开会，

它的核心成员更多关注地区事务。

戈翁保留了伊龙西时的政府结构,虽然他选用了行政文员做部长以强化他的合法性和支持他的统治。联邦行政委员会改由军人和行政文员组成,官僚们继续发挥着影响,尤其是在前 9 个月没有文职部长的情况下。他们掌控了临时立宪会议,最终结束了拉各斯和埃努古之间的争吵,建立了 12 个州。戈翁时代出现了"高级常务干事",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势的权力集团。据称,这些干事们无视他们的部长,能直接与戈翁讨论国事。

129

## 中央集权的出现

战争推动了权力的更加集中,在随后的几年里,导致了专制主义和对联邦体制的破坏。戈翁在 1968 年谴责了基于地方主义的政治不稳定性:

> 在《宪法》之下,各地势力是如此之大,自认为可以自给自足和几乎完全独立。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应该领导全国的联邦政府的地位被降低了。人们没有认识到,联邦政府才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①]

戈翁体制保留了联邦结构,加强了中央对各地的权力。创建 12 个州有效地改变了中央和各州之间关系的性质。作为一项政治策略,它想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尤其是东区的少数族群,将他们与比夫拉分开,同时,也重新分配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权力,以此消除一些大区对联邦的影响。重新划分的目的是使新设立的州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财力上,都不足以左右中央政府,也希望中央和各州之间不再有冲突的领域,尽管中央政府在理论上不会强大到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各州,在现实中这也不可能。通过把东区分成 3 个州,石油产区也就被一分为三。把联邦分为 12 个州,从本质上说,各州对中央的威胁也就不复

① Yakubu Gowon,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May 26, 1968.

130 存在了。在以后几年里，各州的财政是如此紧张，以至于它们不得不依靠联邦政府为它们的行政文员付薪水。各州实力的削弱，确保了中央可以把政策推行到各州，也可以完全控制对外政策。

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各州都从属于中央政府。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军队的集权化管理也提升了中央政府的地位。在戈翁领导下，各地总督必须执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在戈翁离职后，这些总督就成了必须服从司令官的地方军官。财政关系也被用于削弱各州的实力。在 1967 年之前，各区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尽管它们仍然需要中央的扶持。例如，从 1953－1960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 74.4%，而各区加起来增加了 181.5%。在第一共和国期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 32.5%，而各区总和则增加了 72.0%。在战争期间，形势发生了逆转，联邦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主要是来自石油收入的增加、联邦税收渠道的扩大和联邦政府阻止了各州提高内部收入。各州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下降，使得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央的拨款，它们很难应对开支的增加。

军队也利用战争和集权化政策确立了一种对联邦政府有益的收入分配制度。战争和军事化的组织结构杜绝了各区之间通常为合适的分配制度而产生的争执。联邦政府承担了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获得了采矿租金的大部分收益，在全国制定了统一的税法。1970 年的法令进一步削减了各州的权力，使中央政府在出口税、矿山租金和使用费、消费税和可分配的暂记账等收益中占有更大的份额。

对宪法的修订主要是给中央更大的权力。1966 年的 1 号法令和 1970 年的 28 号法令(权力之上和强制执行)宣布，所有法庭无权决定任何法令是否有效，也不能剥夺联邦政府取消法令的权力。换句话说，只要中央认为适宜，它可以增加、删减或修改宪法条款。这项权力限制了司法部门的影响，加大了对地方事务的干涉。军政府制定的法令和

131 通告凌驾于宪法之上。许多法令和命令的条款取代了宪法中军政府认为与现行统治不相符的内容。伊龙西和戈翁政权表明，一部刚性宪法不适合他们的统治和他们必须要处理的一些政治问题。所以，他们明

确表示,他们修改宪法时不再受任何复杂的程序限制。在民选政体下,宪法就是最高法律:它的条款对所有人和权力机构都是有约束力的,而别的法律只要与宪法不一致,那就是无效的。但是,军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规定颠覆了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表明宪法并不比法令更重要,宪法中的任何条文都不能完全凌驾于法令中的条款之上,换句话说,宪法不再是最高法律。

法治——依法统治而不是凭统治者的一时兴致——同样地被改变。军人政体是基于暴力,最初取得政权的行为就是违反宪法的。但是,军队本身又是依法行事的,尤其是那些规定政府架构和各部门功能的法律。然而,这样说并不是要把一个法律下的政府与一个法治下的政府混为一谈。当军人依法行事时,并不等于说它在管理一个法治的政府,因为它缺少必要条件:它除了对它自己负责外,不对任何机构负责。它没有选举,没有对基本自由的法律保证。军人统治缺乏民主性,在保护基本人权方面导致了诸多问题。

战争使问题变得复杂。它使联邦军政府以一种忽视人权的方式运行。政府有权拘留它认为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的人。1967 年第 31 号《公共安全法》中止了宪法第三章有关基本权利和人身保护的条款。相关法令允许政府根据战争需要接管任何地区和资源,禁止组建工会,以及限制向法庭申诉的权利。

战争期间出现的这种体制在随后几年得以巩固。宪法赋予各州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内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央禁止各州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因此,防止分裂的需要使联邦政府转变成一种支配力量。内战无助于解决应当采取哪种政治和宪法模式之争。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那些为联邦而战的人,在战后极力主张实行邦联制。战争不能解决种族问题。在以后岁月里,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尼日利亚逐步走向分裂,这意味着在内战中那些鲜血都白流了。

132

## 军人统治下的经济

1966 年,军政府接管的是一个疲弱的经济,它面临着三大问题:

国家外汇储备不足;必须同时增加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以便为生产资料的进口提供资金;很难摆脱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压力。内战又造成了更大的麻烦。然而,石油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为国家提供了战争经费,又催生了新的发展计划。在尼日利亚,对石油的勘探始于 1937 年,直到 1958 年,荷兰皇家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组建的合资企业——壳牌达西公司开采和出口了第一批石油。到 1967 年已经钻了 627 口井,其中近 67%集中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原油产量从 1958 年持续增加到 1966 年(如表 8.1 所示)。战争破坏了石油的开采,到 1970 年才完全恢复生产。从 1958 年到 1970 年,石油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增加,几乎成了单一的、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如表 8.2 所示)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16%,增加到了 1970 年的 26%(如表 8.3 所示)。

133

**表 8.1　1958－1970 年原油生产和出口**　(单位:千桶/天)

| 年份 | 产量 | 出口 |
|---|---|---|
| 1958 | 5.14 | 4.99 |
| 1959 | 11.22 | 10.84 |
| 1960 | 17.40 | 17.06 |
| 1961 | 46.03 | 45.22 |
| 1962 | 67.46 | 67.45 |
| 1963 | 76.47 | 75.89 |
| 1964 | 120.21 | 118.67 |
| 1965 | 272.20 | 265.71 |
| 1966 | 417.61 | 318.28 |
| 1967 | 319.32 | 299.38 |
| 1968 | 141.82 | 139.70 |
| 1969 | 540.29 | 540.25 |
| 1970 | 1 084.48 | 1 050.56 |

*Source*: Petroleum Inspectorate, *Annual Reports* ( Lagos: NNPC, various years).

表 8.2　1958－1970 年原油出口占总出口的百分比

| 年份 | 原油(单位：千桶) | 出口值(单位：百万奈拉) | 增长率% | 原油占总出口百分比 |
|---|---|---|---|---|
| 1958 | 1 820 | 1.8 | — | 0.7 |
| 1959 | 3 957 | 5.2 | 188.9 | 1.6 |
| 1960 | 6 244 | 8.4 | 61.5 | 2.5 |
| 1961 | 16 505 | 22.6 | 161.4 | 6.7 |
| 1962 | 24 680 | 34.4 | 45.2 | 10.5 |
| 1963 | 27 701 | 40.4 | 21.0 | 10.9 |
| 1964 | 43 432 | 64.0 | 58.9 | 15.2 |
| 1965 | 96 985 | 136.2 | 112.2 | 25.9 |
| 1966 | 139 550 | 184.0 | 35.1 | 33.1 |
| 1967 | 109 275 | 142.0 | −22.8 | 30.5 |
| 1968 | 52 130 | 77.6 | −45.4 | 18.9 |
| 1969 | 197 246 | 301.2 | 237.6 | 45.1 |
| 1970 | 383 455 | 509.6 | 94.5 | 58.1 |

*Source*: Federal Office of Statistics, *National Accounts of Nigeria*, 1960－1961, 1975－1976, Lagos.

表 8.3　1958－1970 年石油对联邦财政收入的贡献

134

| 年　份 | 石油收入(百万奈拉) | 总收入 | 石油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 |
|---|---|---|---|
| 1958 | 0.2 | 154.6 | 0.10 |
| 1959 | 3.3 | 177.6 | 1.80 |
| 1960 | 2.5 | 223.7 | 1.08 |
| 1961 | 17.1 | 229.0 | 7.45 |
| 1962 | 16.9 | 231.6 | 7.31 |
| 1963 | 11.0 | 249.2 | 4.43 |

（续　表）

| 年　份 | 石油收入(百万奈拉) | 总收入 | 石油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 |
|---|---|---|---|
| 1964 | 16.1 | 299.1 | 5.38 |
| 1965 | 29.2 | 321.9 | 9.06 |
| 1966 | 37.7 | 339.2 | 11.1 |
| 1967 | 41.2 | 300.0 | 13.7 |
| 1968 | 23.3 | 299.9 | 7.8 |
| 1969 | 72.5 | 435.9 | 16.6 |
| 1970 | 196.4 | 633.2 | 26.3 |

*Source*: Federal Office of Statistics, *National Accounts of Nigeria, 1960 — 1961, 1975 — 1976*, Lagos.

**表 8.4a　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百万奈拉）

| 国家 | 1960 年 | 1963 年 | 1970 年 |
|---|---|---|---|
| 尼日利亚 | 3 380 | 4 125 | 7 872 |
| 加拿大 | 39 918 | 43 055 | 82 810 |
| 美国 | 506 696 | 594 501 | 981 199 |
| 英国 | 71 401 | 84 933 | 121 859 |

*Source*: United Nations, *Year Book of National Accoun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70.

**表 8.4b　人均 GDP**　（单位：奈拉）

| 国家 | 1960 年 | 1963 年 | 1970 年 |
|---|---|---|---|
| 尼日利亚 | 192 | 215 | 202 |
| 加拿大 | 2 229 | 2 270 | 3 884 |
| 美国 | 2 804 | 3 142 | 4 789 |
| 英国 | 1 358 | 1 586 | 2 199 |

*Source*: United Nations, *Year Book of National Accounts*, 1979.

1967－1970年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如何管理经济来赢得战争，而非如何刺激发展。战争期间，联邦政府至少耗费了6亿奈拉，比夫拉方面也至少耗资3亿奈拉。这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如削减预算，征收附加税，并对创业公司征税。战争给农业和工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资本支出下降，制造业的增长率也从1966年的15.1%下降到战时的6.7%。投资以每年3%的比率下降，而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总产量比1962年时更糟糕。农业以每年至少1%的速度下降。同时，通货膨胀率很高。为了负担战争经费，1962－1968年的发展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改。战时的财政货币政策就是要解决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尤其是国防支出)、储备下降和收支平衡问题。为了增加收入，许多投资计划被放弃，增加了收入税，除了国防部和内政部外，其他各部都被强制性地削减开支1%。尽管采取了这样和那样的措施，但是，内战期间仍以预算赤字、收入锐减和非资本支出增加为特征。

135

在比夫拉，除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外，也推行了经济紧缩政策。政府事实上对所有经济部门都实行了行政控制。任命了10名行政总监，分别负责食品生产、粮食供应、运输、制衣、燃料供给、价格控制和定量供应、人力利用和就业等方面的集中管理。经济的整体运行受到政策执行的特定环境、比夫拉控制地区人口过于集中、战时大量征用生产性资产和联邦武装力量的封锁等因素的影响。1967年出现的经济积极发展势头未能维系长久，因为比夫拉的政治—军事精英们以牺牲大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求得自身的生存。

最后，战争年代还见证了军队精英分子与其文职同僚如何将一部分石油收益转移进私人口袋。尽管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70年代大肆进行这种行为，但其基础是在60年代奠定的。在军人统治下这很容易做到。军人政权不对民众负责，这就导致它的统治体制鼓励官员腐败，因为多数决定并不取决于辩论或公众调查。军队精英分子及其文职同僚们在与外国企业的联合中成为食利阶层，后者从石油中获取大量财富。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几次公开揭露，他们的联合方式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包括从合同奖励中获得报酬，从向政府供货的供应商那

里得到回扣,以及参股“合资企业”。

基于上文对1960－1970年的经济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到1970年仍然欠发达。事实上,尼日利亚东部的经济此时已遭破坏,国家远未能缩小与其他国家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发展差距(参见表8.4a和8.4b)。尽管GDP和人均GDP显示了经济发展的指数,但它们掩盖了诸如社会—经济安全、自然资源开发状况、公共卫生状况和经济体制稳定性等其他特征。到1970年,尼日利亚显示出许多不发达的特征:经济依赖少数几种出口商品;农业生产率低下;外汇、技术和人才依赖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医疗设备匮乏;文盲率高;基础设施欠缺;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内部贫富分化。然而,战争结束时,尼日利亚人很乐观地认为这种状况将会改变。的确,归功于石油收入,70年代是尼日利亚在20世纪里最辉煌的时刻。

136

# 第九章　军人统治下的石油和政治(1970－1975)

137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丰厚的原油收入,尼日利亚进入政治稳定和繁荣期。接连的 3 个军人政权:雅库布·戈翁、默尔塔拉·穆罕默德和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政权都设法保持了繁荣局面。本章将考察石油工业,主要是其 20 世纪 70 年代的成败得失,包括戈翁执政最后几年的重大事件。戈翁政府将军人转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并用石油收入将战争的创伤减小到最低限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的影响方式有了进一步发展。

## 石油工业和 70 年代的经济

尼日利亚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且含硫量低,属于高品质的轻质原油,在世界市场上售价最高。主要的石油开采中心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在几内亚湾近海地区也有大量的蕴藏。因为奴隶贸易和棕榈油贸易,以及在地理上更加接近欧洲和美国市场,和中东相比尼日利亚具有竞争优势。跨国公司试图在该国石油工业中占有股份,美国从尼日利亚进口了大量石油,而其他国家,如法国则加强了与尼日利亚的经济

138

联系。1971 年,尼日利亚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是石油出口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联合组织。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欧佩克

在石油价格和供应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其本身较软弱,不能有效惩罚那些未能执行集体决定的成员国。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财富是不稳定的。在70年代初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它控制了世界石油产量的50%以上,使得它成为石油的垄断寡头,尼日利亚在1973年也开始经历了一段繁荣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影响渐趋式微,80年代中期时,其石油产量剧降到30%。尽管到90年代又升至40%,它也只保持了有限的国际影响力。尼日利亚虽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可它也做出一些有损该组织的事,如超配额生产,漠视指导价格,以对自己有利的价格出售。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占到欧佩克的8%。

石油对尼日利亚来说既是福,也是祸。它是所有自然资源中最让人垂涎的。它创造财富,影响世界政治,增加外交筹码,而且,如果收入管理得当,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一个穷国变为一个富国。石油给尼日利亚带来了所有这些机遇: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自主,快速改变社会的能力,对西非地区的控制,成为非洲大陆的一个强国,以及追求激进的对外政策。

石油收入将尼日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变成世界上第十三富有的国家,一个地区强国,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拥有成功的中产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百万富翁的自信的国家。这个国家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速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每年8%的增长率。公共财政支出、进口、出口、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在70年代都有了扩大。在1970－1973年间尼日利亚积累了大量的石油收入,加之在欧佩克的压力下,石油价格涨了4倍,使之在1973年和1974年出现了繁荣局面。尼日利亚的轻质原油价格从1973年10月的每桶3.8美元上涨到1974年1月的每桶14.7美元。总的石油收入从1973年的10亿奈拉增加到1974年的40亿奈拉。然而1975年由于世界需求量剧减,石油价格随之下降,到1976年时繁荣局面结束。但是生产从未停止,因为石油已经成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在1971年占到总收入的一半,1974年占到80%,在70年代末期,甚至更多。它也是主要的出口产品:1970年,石油出

口占总出口额的58%，到1976年时飙升至94%。政府的财政运作也迅速增加，10年间增加了10倍。除了巨大的收支顺差外，1970－1975年都有预算结余。此后，由于对石油收入预估的误差，为新州提供资助的需要，以及为了迎合两个发展计划的需要，预算赤字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外国投资在20世纪70年代初增加，从1970年的1.8亿奈拉增加到1975年的37亿奈拉。1974年，尼日利亚拥有足够支付两年进口的外汇储备，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烟消云散。1977年以后由于过度进口奢侈品和引进技术，加之石油需求量的减少，外汇储备也逐渐减少。1978年政府不得不从欧洲和世界银行借了10亿美元，由此开始了最终转变为一个主要债务国的历程。到1979年，随着石油带来的繁荣局面的即将结束，政府已经在计划放弃许多工程项目，缩小工程规模。

20世纪70年代，尼日利亚货币走强，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外汇储备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每年增加近40%，到1975年由于工资的大幅提升而出现了74%的异常增长。经济以惊人的速度从内战中恢复，并立即呈现出显著的增长率。国民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1970－1975年间实际投资增加了35%。政府实施了"本地化"计划，将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尼日利亚人手里，但是收效甚微，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两个发展计划显示了国家的财富和信心，试图扩大各种社会和教育机构，投资新的建设项目，包括3座钢厂，2座冶炼厂，多座石化厂、化肥厂、纸浆厂和水泥厂。戈翁当政时期的第一个发展计划，即"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1970－1974)，目的是除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外，也旨在重建内战期间遭到破坏的设施。该计划的主要成就是恢复了战争期间遭破坏的一些农场、机场、工业企业和道路，扩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校。联邦政府为新建立的州提供了资助，开始了兴建经济型住房的计划，创办了7所新大学，1973年又启动了"国家青年服务社"计划，目的在于推动大学毕业生到其他州，而非原籍州工作。 140

各部门的增长进展不一。石油工业、制造业、住房和基建业实现了

每年超过10%的飞速增长,而农业则以每年1%的速度在下降。为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而实行的高关税保护政策促进了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到1970年,外国人控制着制造业,拥有63%的股权,而尼日利亚政府只拥有约27%,民众占10%左右。本地化计划是为了让更多的尼日利亚人参与到各种经营活动中。一些小企业都由尼日利亚人经营,而大型企业只有40%的股本由尼日利亚人通过入股的形式拥有。1977年法令修订后,尼日利亚人在许多部门的参股额扩大到100%,而在一些大型工商企业,参股额则增加到60%。然而,占有股份并不意味着尼日利亚人获得了控制权,当地人拥有也未必能带来更好的管理。事实上,制造业仍保留了一些旧的特征。由于尼日利亚企业家不愿投资那些需要巨额资本的钢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因此,重要的工具仍然需要进口。工业仅限于几个城市,并且集中生产生活消费品。在整个70年代,它们受到了高关税的保护。得益于奈拉的升值,商人和工业家们多使用进口材料,这既损害了当地原有的材料业,也不利于发展当地的进口替代。加之,他们不出口制成品,因而对实现经营多样化未能做出贡献。

基础设施建设缓慢,与巨额支出不匹配,因而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扰乱了经济活动。在发展计划中,能源和交通部门占有巨大的比重。应当承认,公路网有了很大的改进。能源和电话服务有了提升,但是,随着需求的持续增长、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和住宅及商业建筑的急增,它们仍然显得不足和低效。

在70年代,石油的持续性影响凸显出来。首先,提炼石油的跨国公司和尼日利亚国家之间的买办关系得以发展。著名的跨国公司,如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获得了开采石油的许可证。发放许可证和征税成了国家的主要职能。因此,尽管国家控制了石油,但是它仍然依靠外国技术、专家和公司进行提炼。对于那些授予合同的精英们来说,可从跨国公司那里收取回扣。数以百万计的奈拉消失了,身居高位的领导人却可以从石油公司得到巨大利益。地方上的权贵虽然没有直接的国家权力,但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为跨国公司服务,获取报酬。

141

石油财富是在联邦政府政治稳定和权力集中的时候到来的。资本主要积聚到了中央。尽管各地也从中获益,但跨国公司和巨大的税收都集中在中央。这本身也成了不稳定的一个来源。政变和反政变,对联邦权力的激烈竞争,以及最终分享到权力,都对确保控制石油税收极为重要。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希望能一直保持现有地位。戈翁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改变想法,实行放权。他的继任者中除了一位以外都和他一样,最初承诺会移交权力,但是在认识到石油带来的收益和腐败后,都改变了想法。跨国公司和其他外资企业开始支持这样的政体或者领导人,只要能获准资源开发,或者能得到慷慨的大幅让步。

令左翼工会和知识分子恼火的是,尼日利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在殖民时代,英国公司享有垄断权,壳牌公司把这种垄断权转化为优势,一直延续至今。英、荷合资企业壳牌达西公司率先在尼日利亚进行了勘探。在 1956 年发现石油之后,壳牌公司迅速地在所有已知的产油区获得了开采权。其他的石油公司被排除在外,直到很久以后它们才获得离岸特许权。荷兰皇家和壳牌跨国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子公司"壳牌石油发展公司",产量高,获利丰厚。它比其他公司生产了更多的石油。70 年代,在每天生产的 230 万桶石油中,它占了 130 万桶。此后,在欧佩克规定的日产 180 万桶配额中,它占了近一半,每桶至少能盈利 1 美元。

本地化计划扩展到了石油工业。与左派主张的国有化不同,本地化只是为了让尼日利亚人能获得更多的进入石油公司管理层的机会和获得更多的利润份额。国家打算动用部分石油税收使依赖最小化,准备获得所有新的特许权 100%的股份,在已有的石油特许权中占 35%的股份。之后,35%的份额增加到了 60%。另外,1971 年政府建立了一家控股公司——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NNOC),来管理和监督石油的开采,并对跨国公司及其当地的子公司提供指导意见。5 年后,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与矿产电力部合并,成立了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它拥有着广泛的权利,积极参与石油的生产和销售。之后的几年里,矿产电力部和尼日利亚石油公司成为两个机构,机构设置

142

重叠导致许多冲突。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也负责国内的石油提炼、石化工业和管道网。

不过,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跨国公司控制、对石油税收的依赖和这些税收的管理等相联系的麻烦事已表露出来。首先是跨国公司,国家未设立一个强力机构监管它们,以防止其欺骗和贿赂高级官员,将公共财富转到私人手里。石油工业一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运行着,与其他部门联系较少,其技术靠进口,与本地工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尽管在技术消化上做了一些有限的努力,但是,技术进口的高额成本对国家的收支平衡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由于该工业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对国家就业的影响也就无足轻重。它的生产局限在国家的某一角落,有着自己的供给和安全系统,与当地民众的相互影响很有限。石油公司采取了使当权者而非人民大众满意的策略。在 70 年代,它们对国家的福利计划贡献极小。它们不关心泄漏到空气中的天然气,当地的石油泄漏也比别的地方更普遍,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政府也忽视了环境恶化的最初迹象。到 80 年代,石油泄漏成了司空见惯之事,使得尼日利亚的环境比其他石油生产国更为恶劣。

来自石油的收入形成了国家发展的“单一经济”模式。石油成为经济的中心,来自石油的收入确保了国家对进口的依赖,但由于管理不当,尼日利亚成了一个债务国。直到 1965 年,农业生产还是该国的支撑产业,此后,石油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造成像可可和花生之类产品的生产被忽视,由此降低了多样化生产的积极性,尼日利亚成为依靠石油出口的单一经济国家。市场是反复无常的,而石油价格的变动没有受到重视。两个发展计划极大地夸大了石油收入,于是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调整,来解决“石油不景气”和价格下降问题。如果考虑到国家稳定的因素,石油繁荣驱动下的经济增长存在误算,它没有考虑到不可预知的变化。即使到今天,政府的长期计划在财政上都是不稳定的,它没有考虑到总体的管理不善这个额外的因素。

143

尼日利亚成了一个食利国,其收入完全依靠石油开采使用费,这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经济依靠生产和税收不同,石油开采使用费主要

来自国外,而非国内,来自一个与其他经济部门没有联系的产业。在石油开采使用费支出方面,这个食利国家会忘了其民众,认为国家不必对民众负责,因为钱或税收并非来自民众。国家不必给各州和各工程调整收入分配。当民众愤而起来抗议时,只要国家能从国外收到“租金”,生产的损失和劳动力减少未必能使经济瘫痪。食利国家有能力获得武器来削弱或消灭敌对势力,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和更为自主。增加或者减少石油生产能力,也给了食利国家相应地判断其收入和规划其支出的控制权。公共财政可能受短期的应急之事所支配,并非国家的长期需要。食利国家通过增加石油产量,或者用以后支付的石油开采使用费作担保进行借款的办法,使短期需要促进财富最大化。当1973年和1980年石油涨价带来意外之财时,国家大肆花钱,再一次忽视了长远考虑。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大规模开支的年代,具体反映在政府和中产阶级炫耀式的挥霍和无数的工程项目上。事实上,政府在1973年吹嘘其钱多到花不完,这给中产阶级留下了处处都有发财机会的想法。考虑到尼日利亚的发展是在瞬间实现的,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宏伟的工程,其政策促成了价格的扭曲。联邦和地区政府的规模膨胀到远远超出实际管理的需要。1973年,政府有50万公务员,到1981年,人数增加到了150万,而生产却没有相应的增加。为了显示石油美元带来的益处,并换取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工资在1975年提高了100%。这就是著名的“乌杜季奖”。大笔的钱被用于支付欠款和庞大的福利开支,尤其是低息汽车补贴。通货膨胀达到了两位数,相伴随的是政府财政赤字和对进口货物的需求。消费价格指数有了大幅上升,从1970年的150,增加到了1977年的423。有些食品的价格上涨了500%。于是,不得不严控通货膨胀,禁止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并采取控制措施制定合理的租金和食品价格,但是,收效甚微。 144

政府大肆蚕食私人部门,接管或创建了新的企业和半国营企业。对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却没有什么回报,大多成为特权阶层发财致富的渠道。一些精明的企业家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竭力加入政府企业,

而不是创建自己的企业。

国防开支持续上升。戈翁政权未能使士兵复员,军队人数在1977年达到了25万人。在和平时期,这显然过多了。由于军队不直接从事现代化建设,无需对经济发展做贡献,反而对稀缺资源贪得无厌,他们成了寄生者。国防开支从1970年的3.145亿奈拉,增加到了1975年的11.167亿奈拉,占到GDP的7.6%,比其他许多国家高很多。这还没有把军人的工资和在政治职位上获得的收益算在内。利用掌握的特权,军队违背民众的意愿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为自己乱花钱,做出一些对国家富强或与抵御任何外部威胁不相干的事。

农业对国家生产的贡献下降到30%以下。农业停滞不前,如考虑到它雇用了大多数劳动力,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出口作物的生产到1977年事实上已经崩溃。对石油的过度重视、政府政策的不当、从农村迁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陈旧落后和1972－1973年萨赫勒地区的干旱等因素,是农业衰退的部分原因。城市地区消费掉了大部分的石油收入,造成农村被严重的边缘化。其后果是粮食生产的直线下降,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粮食生产指数下降到了低于内战以前的水平,粮食的需求超过了供给,国家无法再实现自给自足。于是,国家以每年25%的增长率进口粮食。城市居民依赖于进口的食糖、小麦、牛奶、肉、鱼和大米。国内能买到的粮食价格飞涨,粮食进口对于国家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消极影响。农村居民看不到石油带来的大部分好处,现在又不得不承受农业失败带来的恶果,用他们有限的收入来购买高昂的进口必需品。

145

增加本国粮食生产成了国家的当务之急,尽管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低价向农民提供技术和化肥,改革市场委员会,引入对农民在任何时节出售农产品均有效的价格保护机制。有两次全国性的粮食运动:第一次是1972年的“国家加速粮食生产计划”;另一次是1976年的“养活国家行动”。后者动员了数千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这两次运动都未能降低通货膨胀率和粮食价格,也未能减少粮食进口。大量的钱花在了在各地建立“河道盆地发

展署”，目的是在土壤肥沃地区建立大面积的粮食种植园，通过灌溉和洪涝控制给予邻近居民以帮助。1978年国家颁布了《土地使用法》，将农村大量的可耕地开辟成大规模的农场。该法令将土地授予了政府，这为那些在政府中挣到了钱的人提供了投资农场机会。然而，因为他们还有别的投资和现金储蓄，投资农场的失败并没有导致他们在经济上的垮台。为了弥补损失，他们很快又退回到政治领域。

鼓励出口作物生产的改革也实施了，但成效同样不大。人们期望新的商品委员会能够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工作，而并非是为政府征税的一个机构。有利于政府的定价政策——产品销售税和出口税——被取消了，这样农民会得到更多的钱，进而生产更多的作物。

## 战后几年的政治

戈翁政权为20世纪70年代尼日利亚积极的对外政策打下了基础。尼日利亚在内战期间对西方国家的失望，再加上经济繁荣，为其重新审视对外政策铺平了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在表面上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之一——为了避免对冷战任何一方的支持——但事实上是亲西方的，并且得到了英国领导下的英联邦国家的高度认可。在70年代初，尼日利亚实现了6项重大变化：首先，它重新排列了对外政策的顺序。60年代时，它所关注的国家依次是英联邦、非洲、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到70年代时，非洲国家排到了首位，其后是英国和苏联，而英联邦国家失去了影响力；其次，欧洲成为其贸易伙伴，而非仅仅是英国，法国从中受益；第三，尼日利亚调整了亲西方的态度，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保持不冷不热的关系，与苏联发展了更加亲密的关系。因为尼日利亚没有寻求国有化政策或者激进的反跨国公司的规章制度，西方国家也没有因此而恐慌。事实上，戈翁不像有些国家领导人那样粗鲁、独裁和极端腐败，作为一名温和的、理性的国家领导人的典范，他在西方国家很受欢迎。第四，国家开始重视对非政策，积极建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该共同体由16个国家组成，于1975年创建，目的是将所有成员国合并成一个共同

146

市场，以此来促进地区内的资本、财产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期望各种经济形式都能很好地整合，使所有权和资本的控制实现本地化。第五，尼日利亚与曾经支持过比夫拉政权的非洲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时也加强了与邻国的关系。第六，它自认为是黑人种族利益的捍卫者，努力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为此，它提出了许多新的动议来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尼日利亚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富裕的国家，认为它不仅能领导非洲走向现代化，而且要为许多贫穷的国家提供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援助。

如果说尼日利亚的对外关系是成功的话，其国内问题的处理就不那么顺畅了。未能抑制住当权者的腐败导致了政权的垮台。戈翁认为，他之所以退出政坛，与所谓的“九点改革计划”有关，该计划的提出本来是要改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在战争顺利进行、个人享有很高声望和拥有石油财富的背景下，戈翁非常乐观地宣布，他的政权将重组军队和行政机构，根除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进行发展投资，批准一项新宪法，创建更多的州，进行新的人口普查，建立新的国家政党，将国家交回给一个民主的政府，以及着手进行战后和解、整顿和重建计划。预计这一切将会在 1974 年实现，后来延迟到了 1976 年。

147

事实证明，完成以上任务要比赢得战争更难。政府行政机构按照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了重组，但是，并没有轻易地出现预期的结果。戈翁失去了对国家财政的掌控，也无法审慎有效地管理日益增加的石油财富。腐败现象在他重要的部长和州长中不断被曝光，受到了公众的嘲讽。1973 年的人口普查得到人们有限的信任，最终宣布无效，因为普查受到了操纵，尤其是受到据说人口以 72%的幅度增长的北方的操纵。由于收入分成与各州的选举席位分配有关系，每一个州都竭力增加它的人口数量。到 1974 年，媒体和社会公众已经向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指责它的腐败，认为它为少数人创造了财富，留给大多数人的只是匮乏，且忽视了农村的穷人。公众普遍认为行政当局很腐败，但当局却没能平息这种舆论，甚至也没有认真地处理腐败问题。对权力所有者和高级公务员来说有足够的金钱向民众炫耀，聚集更多的

财富,为其雇员分配资源就够了。家长式统治失去了控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官员与其致富的机会之间的关系。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群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组织,以“卡杜纳黑手党”著称,其目的是为了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来获得权力和财富。

戈翁由于无法实现改革计划,身边又围着一群野心勃勃的行政文官和密友,而他本人又贪念权力,于是,他在 1974 年 10 月宣布将推迟向民选政府过渡。他说,“草率地‘还政于民’……将会使国家陷于混乱”。[①] 他拒绝对政治解禁,指责一些人“搞帮派政治,发表无节制的言论和著述,都是企图激起国内对他们有利的不满情绪……这是很清楚的:那些想领导国家重新回到文官统治状态的人们,并没有从国家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②]。为了确保国家的生存,他要求有更多的时间来创建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他做出了新的承诺:任命一个专门小组来起草一部民众支持的宪法,创建更多的州,以及在政府中吸纳更多的平民。他略微提及了对其政府的重大改革,要更换那些任职多年的部长或州长,同时将开展一场强有力的反腐败斗争。

148

这是他最后一次发表的重要政治演说。公众对此感到震怒,戈翁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也失去了成为国家独立后第一个政治英雄的机会。他违背恢复民主的承诺总体上是失算的,引起了大部分民众和不同政治派系的不满。从权力和工程合同中被排挤出去的军队高官也对他不满。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谴责他。早在 1973 年,大学教师为提高工资举行罢工,就受到了他的羞辱,导致了双方的对立,此时他们已疏远了戈翁政权,并提出了强烈批评。大声抱怨还来自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如伊斯兰教领导人哈吉·阿布巴卡尔·古米指责戈翁道德颓废和敌视伊斯兰。他的军队同僚,甚至来自他本地区的同僚也与他分道扬镳。对他提出最激烈批评的是政治家们,他们感觉自己被出卖

① Independence day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October 1, 1974,全文见 *Daily Times*, October 2, 1974。

② *Ibid.*

了，开始大造声势，说戈翁想要永远霸占权力。抱着对1976年政治变化的期望，政治家们积极进行地下活动。军政府曾承诺会移交政权，这激起了政治领袖对权力的觊觎。为了使政府合法化和赢得战争，戈翁启用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战争结束后，他们作为政治专业人士被边缘化了，而行政官僚在管理经济和执行经济政策上变得更加活跃。

如果戈翁能得到公众的强力支持，这或许会成为他的力量之源或者行动之源。相反的是，许多平民百姓对他的政府也感到了厌倦，部分原因是他在缩小不平等和分享石油收益上的失败。没有什么比1975年的"水泥船队"事件更能说明当时的混乱。为修建军营、私人住宅和为非洲文化艺术节修建国家文化馆，尼日利亚定了2 000万吨水泥。可到达后船只等了长达一年的时间才卸载下水泥，而国家则为此支付了滞纳金。漫长的等待使水泥结块，而不得不被扔掉。但是，那些攻击戈翁政府腐败的人受到了打压。通货膨胀也未能得到抑制，戈翁最终软弱到既控制不了内阁成员，也指挥不动各州的州长。1975年7月29日，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中，他被推翻了，穆尔塔拉·默罕默德中将当政时期开始。

149

# 第十章　改革和军人退出政治（1975－1979）

[151] 穆尔塔拉·拉马特·默罕默德中将夺取政权的政变广受欢迎。他当政的时期短暂但很重要，他本人成为最受人们称赞的国家领导人。在 1976 年 2 月 13 日的未遂政变中，默罕默德被杀害，权力转移到奥卢塞贡·奥巴桑乔中将手里。奥巴桑乔上台后继续实施前任的政策，将国家带入改革时期，修正了戈翁当政时的一些错误，使公众享有自由和安全，成功地向第二共和国转变。这是第一个明确表述和执行了民族主义、廉洁、责任和纪律等理念的政府。它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一直试图根治社会弊端。

1975 年 7 月 30 日，默罕默德在第一次全国讲话中，宣布了一个大胆的施政纲领，把他的政府定性为一个“纠错的政府”，要把国家从戈翁治下麻木不仁的状态下解救出来，认为戈翁政府“以缺乏协商、无判断力、无纪律和忽视一切为特征”。[①] 部队中资深的军官已退休，联邦的所有部长和内阁成员被革职，政府任命了三个专门小组来分别研究拉各斯是否适宜作为联邦的首都、设立新州的必要性，以及老的北区和东区财产的归属等问题。[152] 默罕默德声明，本届政府将不承认 1973 年的人

① Brigadier Murtala Mohammed,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July 30,1975.

口普查,推迟主办第二届非洲文化艺术节,建立一个允许政府重要成员进行讨论的机构,并裁减军队的规模。他最后以强硬的口气宣布:"本届政府将不会容忍混乱行为,也不会宽恕职权的滥用。"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

如果说尼日利亚民众习惯了那些空泛的承诺,那么默罕默德显示了他的不同。他当政后很快就去兑现他承诺过的事,理顺政治程序,考虑公众舆论(至少在一些问题上),要求官员廉洁。在他演讲的第二天,新任州长都发誓他们一定会显示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建立开放的政府,并且把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另一次著名的演讲中,默罕默德宣称撤销了先前的州长:

> "由于他们贪污、滥用公款和他们的个人行为引起的普遍不满,他们受到了指控。人们对他们生活奢华、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和对人民权利和财产的剥夺充满了怨恨。其他的控诉包括对经过时间检验的有效政府程序的误用、任人唯亲、徇私枉法、亵渎传统惯例和对受人尊敬的传统领袖的羞辱。所有这些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把各州当做私人领地在管理。"①

他多次重申"廉洁政府"这一主题,公众也开始相信他是一个诚实的领导人。所有离任的州长被要求申报自己的财产,经调查后一些有权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资产;许多合同不是被复查就是被取消;半国营集团董事会和公众服务委员会被解散并进行了重组;那些拥有资产超过法定收入的公职人员,其财产将被没收;腐败行为调查署和专门法庭得以建立以处理腐败案件;并设立了公众投诉委员会,调查公众投诉政府官员的案件。

反腐败运动仅仅成功了几个月。虽然领导层是真诚的,但既得利益者反对将不法之财充公。后来谋杀默罕默德的官员们认为他正领导

---

① Brigadier Mohammed, Swearing-in ceremony for new governors, July 31, 1975.

着国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因为政治层不熟悉生产经营活动，他们当时的游戏规则是要学会如何在腐败的环境下生存。

153

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以下问题是适宜的：尽管政权是真诚的，公众也给予了协作，但为什么腐败的根除如此困难，或者为什么腐败在这种体制下频繁出现？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托词——贿赂、偷窃、强取、任人唯亲和庇护——在尼日利亚很流行。最严重的是，用政治权力来加强自身利益和局部利益，这违背了人民和他们的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大多数的腐败案件根源于权力，根源于权力如何分配和部署。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正如在尼日利亚，它就会被滥用和摆脱束缚，而这种束缚本是人民用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当权力是以家长制的方式组织起来时，家长有责任不惜牺牲他人来显示其对"家族成员"的忠诚。当施行的是独裁统治时，正如在殖民时期和军人统治时期，权力只被用于实现有限的目标，其对人民的责任也就降到了最低限度。政府将会失去它对人民的忠诚和责任，仅依赖于少数人的支持以维持统治。在该制度中，只有极少数人在牺牲别人的利益中得到了满足，权力属于统治者而不是被统治者。

尼日利亚的主要腐败案件都是与家长式专制统治制度相联系的，包括公职人员、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行贿受贿、任人唯亲、强取和保护主义。民众也有人与其协作，充当了委托人。商业精英们也开心地享受着经济的增长、稳稳到手的合同、减少与外国人的竞争和侥幸做成的劣质交易的成果。家长专制统治下，权力的拥有者可以滥用权力，他们无视审核权力使用和分配公众资源的准则，似乎认为资源是他们自己的。权力所有者自认为是他们本部族、城镇、社团和教会成员的庇护者，无视客观性和合理性地以各种方式分发巨额赏金和机会，以显示他们的忠诚和威望。他也会要求别人回报他的帮助，如收取合同的回扣。石油收入为那些从公共开支中牟取私利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默罕默德政权所做的努力是惩罚一些人，作为反腐败运动而博得喝彩，但是，他却未能改变家长式专制统治制度。

## 行政部门改革

20 世纪 70 年代初政治、经济方面管理不善，行政部门对此难辞其咎。人们认为，它很腐败，势力也过于强大，并且和戈翁协力将国家引上了“偏离和优柔寡断之路。”在默罕默德看来，要使国家有所进步，就要对其进行彻底整顿。一场以前从未见过的大清洗随之而来。在八周内，超过 11 000 名公职人员屈辱地退休或者被开除。行政程序本身的缓慢代谢过程被忽略，公务员只要收到点小抱怨就会被辞退，无罪和有罪之人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士气受挫，一些机构人手不足，谁都对自己的任期缺乏安全感，“高级常务干事”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很多人变得过于谨慎，不再向他们的政治上司和行政长官提出反对意见。

154

然而，公众支持政府，并将这次清洗看做是政府诚信和领导阶层兑现承诺的凭证。人们期望，一个更具竞争力、更谦恭、更少腐败和更高效的官僚阶层将会出现。这次大清洗只是为此付出的小代价而已。由于各个层次空缺职位的出现，身居低位能够晋升的人也很欢迎这次行动。大清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行政部门代谢程序在几年内才能完成的事情。为了减小高级文官在戈翁当政时期所拥有的权力，其在联邦行政理事会上的审议职权被终止。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或者由于存在不安全感而辞掉工作，转投私人部门。但事实上，他们仍掌握了从政府那里拿到的获利丰厚的合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中的成功人士成为公众事业私有化的热心支持者，以便自己能够得到这些企业。

伴随着许多高级官员、法官（首席法官退休）、大学（四个大学副校长被撤职）和所有政府的半国营集团官员的辞职，大清洗也影响到了军队和警察。退休和开除通常是由于他们的不良行为、无能、健康状况差、生产力下降和年龄过大。这是发生在 1975 年的平常事，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恐慌，但同时也得到了公众中反精英人士的人的喝彩。改革终结了公务员在政治中所扮演的突出的角色。然而，政府很小心，并未将权力转交给政治家，而是给了专家和学者，任命他们为部长和各种专

门委员会的成员。而在确定宪政体制调整时,资深的政治家也参与了其中。

## 政府结构的改革

为了改进联邦体制,政府进行了许多项改革。这些改革涉及新州的创建、联邦和各州的公职人员薪水制度的整顿、改变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和修改税收分配比例。在行政人事方面,专家和行政官员之间为夺取高级职位而进行竞争这一难题,则通过让所有干部进行公开选拔竞争得以解决。工资制不再多样化,整合后的新结构在整个国家实行,简化了预算,也消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紧张局面。 155

1975 年 8 月成立了专门小组来商讨创建新州的必要性。5 个月之后,7 个新州建成,州的总数达到 19 个。新的州从原有的州中分离出来,有了新创的名字和新的州长,新州为创建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和快速的职位升迁提供了机会。精英们很高兴,因为这让他们受益匪浅。部族领导人也很满意,因为这给政治职位的任命创造了很多空缺。阿布贾,作为新的联邦首都,坐落在国家的中心地区,独立于任何一个州政府进行管理。因为各州在经济上都不能独立自足,它们都得依靠联邦的税收。更多的州创建于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一个问题也应运而生:为什么国家要继续采用这种方式来管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呢?因为大量的州出现,它们不能再有庞大的政府,它们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花在工资上,只能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于兴建工业和改进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权力得以大大加强。尽管存在一些难题,但是在 70 年代及其后,创建新州的热情仍然在继续。究其原因,是出于发展的需要和政治阶层获得权力和金钱的需要。作为中央的机构,各州可以从中央获得资金,而这些钱通常由部族的显要人物控制着。部族显要人物和其他精英要得到更多的钱,有一个策略就是呼吁创建更多的州,来分化现有的州。由于联邦政府把平等原则作为其分配税收的一个原则,当一个部族分裂成几个州之后,将会在“国家蛋糕”中获得更大份额。另外,《宪法》明文规定,“联邦的特征”应该反映在权力的分配上,这就确保了

156 各州的当地人能担任部长、高级行政长官和外交家等众多职位，而在合约审批和联邦工程选址时，需要从部族和国家的角度综合进行考虑。创建新州也是由以下事实激励的，那就是每建立一个新州，就会产生新的、更小的少数族群，他们反过来又要求建立他们自己的州。

一项主要的改革是将地方政府变成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下的第三级政府，其目的是拉近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方式，向基层拓展民主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的需要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北方，土著管理局是很强大的，并被传统领袖控制着，但也有必要推进其现代化和加强公众的参与。在南方，没有强大的地方政府存在，创建新的地方政府就很有必要，于是，70 年代引进了这项改革。1976 年军政府颁布了各州地方政府法令，规定地方委员会成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再由被选上的成员任命一名主席，均需多数人投票赞成。这样做是希望地方政府将成为“民主制度的训练场”。[①]每个委员会都将得到联邦政府的财政分配。然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自治的第三级政府在 70 年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许多地方政府都被一些人品低劣的政治家所控制。在以后的几年里，地方政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开始他们的事业提供了机会。政治家们拥有了更多的经验和财富，这确保了他们在地方政府选举中资助他们的拥护者，将他们的权力向农业社会拓展。

这个政体也试着处理有关各州和联邦政府间财政分配的政治事务，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政府试图不让规则受政治的影响，然而，并未取得成功。南方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争论说，来自南方的大部分税收收入流向了北方，北方人把持权力是为了支配税收的分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脱离联邦可能是很必要的。历次宪政改革中都涉及税收分配的争论，争论点在于是否要强调来源原则（钱从哪里而来）、发展

① Brigadier Shehu Yar' Adua, Chief of Staff, Supreme Headquarters, Speech to the Commossioners of Local Government, November 21, 1978（全文见 *Daily Times*, November 23, 1978, p. 26）。

原则和国家整合原则。税收分配影响到了国家进行精确的人口普查的能力，因为为了获得更多的钱，每个州都在夸大人口数量。国家不得不想出一个办法在各级政府保留的税收百分比的问题上使所有的部族都满意，也得提出一个在各州之间分配法定和非法定税收的标准。税收分配规则经历了多次改变，其中两个专门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也被否决了。由于石油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有了少数民族被更大的部族欺骗的抱怨。联邦军政府多次改变这种体制，仅仅是因为这些州的州长相对于中央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级别较低，不能公开有所抱怨。另外，权力集中到中央给了联邦政府更多的特权，使得联邦机构比起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来更加强大、更加富有。默罕默德和奥巴桑乔的制度接近于他们的前任在 1975 年时的指导方针：

(i) 付给产地州的采矿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从 45%缩减到 20%，而余款记在可分配的暂记账上；

(ii) 联邦政府保留所有商品的 65%的进口税，除了汽油、柴油、烟草、酒、饮料酒和啤酒外。包括汽油和烟草在内的这些商品的税以全额上税，记在可分配的暂记账上；

(iii) 50%的消费税记在可分配的暂记账上，其余的由联邦政府保留；

(iv) 可分配的暂记账中 50%是以人口为基础进行分配，剩余的 50%是基于各州的平等进行分配；

(v) 联邦政府将个人所得税标准化。事实上，州政府改变个人所得税率的权力被剥夺了。①

两年以后，政府任命了一个新的技术委员会来提出新的建议。该委员会基于以下五项原则提出了一个新的分配规则：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国家整合的最低标准；吸收能力；独立的税收和最低的课税效率；

① Oyeleye Oyediran and Olatunji Olagunji, "The Military and the Politics of Revenue Allocation," in Oyeleye Oyediran, ed., *Niger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under Military Rule*, 1966－79( London: Macmillan, 1979), p. 201.

财政有效性。每一项都经过了仔细权衡,以便各州能提前知道他们应该期待什么。军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因为这些建议是在新的宪法形成时一次性提出的,所以,军政府要求立宪会议给予考虑,希望能将其变为法律。北方的政治家拒绝了这些建议,称这项计划太技术性了。

军政府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工会是混乱的和敌对的。1975 年尼日利亚劳工代表大会成立,合并了四个势力强大的工会。军政府受到了它所认为的强大的激进运动的威胁。1975 年 12 月,政府逮捕了数百名工会成员,并发起了一场详细调查。后来,政府拒绝了 11 名工会领导人参加以后的政治活动,解散所有现存的工会,禁止所谓的必要服务行业(石油业和银行业)的工人参加罢工,重组了新的工会,将其置于政府管制之下。

## 经济

由于 1978 — 1979 年国际石油供过于求和美元贬值,尼日利亚的石油税收也减少了。政府的外债达到 1 亿美元,但它仍能留出足够多的储备来加强以后的管理。国防事业继续耗费着巨大的金钱,因为工资支出庞大,尽管政府成功地裁减了军队中的 50 000 人。食品价格飞涨和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国家管理陷入了苦恼中。针对食品短缺,政府通过了一项土地法令,试图通过尽可能地在农村地区为大规模农业生产获得土地和减少城市的土地投机活动来改变土地所有制度。尽管该法令具有官方合理性,但在人民继续买卖土地时,该法令很难执行。这段时期内,研究机构得以重组和加强,但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关于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节约的政策,禁止进口昂贵的布匹和香槟,同时政府也放弃了使用奔驰汽车。为了保存外汇,食品进口减少了,这进一步助长了国内的食品短缺和通货膨胀,贸易受限制影响到了其他的进口物品。高等教育的经常性开支削减了使得初等教育的普及热情也减弱了。供电也不稳定了。其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收购了《每日时报》和《新尼日利亚人》两家全国性报纸的 60%股权,在拉各斯又建了一座港口,结束了一长串轮船等在停泊处的局面。随着经济变化对人们的生

活水平产生了糟糕的影响,军政府开始受到媒体的攻击。1978 年 4 月,当高中生和大学生们到处发表声明和进行抗议时,一场危机发生了。抗议活动是受增加的学费和生活费所激发的。中央政府通过关闭学校、制止尼日利亚学生的全国联盟并开除了一些积极活动分子予以回击。总的来说,因为政府总是最先承认国家存在问题,公众也就保持了宽容的态度,同时,政治家们正忙着为第二共和国做准备,对军人政府的攻击也就不那么狂热了。

为了信守前任的诺言,在一些表现尼日利亚富有的国际工程上政府耗费了巨额资金。它举办了非洲文化艺术节、一次童子军大露营活动和一次国际商品交易会。尽管兴办了如此宏伟的工程,但在第三个国家发展计划中(1975－1980),政府也认识到了国家的穷困。它承诺要动员全民参与经济建设,从国外购买技术,夺取石油生产、加工和分配上的更大的控制权,更强有力地贯彻本地化计划。至于后者,政府颁布了法令来强迫外国企业要么将公司卖给尼日利亚人,要么与尼日利亚人一起兴办合资企业。

## 对外政策

尼日利亚在反殖、反种族隔离制度斗争和地区经济联盟中想充当领导者的角色,这是其对外政策中最激进的运动。怀着勇气和远见,尼日利亚挑战了西方国家在安哥拉和南非的地位。它也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来减少工业国家对贫困国家的控制。同时,它也在继续加强同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尼日利亚自认为是一个陆上大国——它在联合国的地位得到了强化,世界领袖和高官对其进行了访问,这段时期内,它在非洲国家的冲突中还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

在安哥拉,出现了三场为权力而斗争的运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和安哥拉全面独立民族联盟(UNITA)。起初,尼日利亚选择的是一个民族联盟的政府。然而,当南非和美国为了建立一个傀儡政府和开发安哥拉的矿产而支持 FLNA 和 UNITA 结盟时,尼日利亚认为它有必要进行反对。这样的

160

联盟将会危害到安哥拉的邻居——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于是,1975年尼日利亚宣布,它支持安哥拉独立和 MPLA 使用古巴和苏联的武装力量,愿为安哥拉摆脱南非侵略军提供资源。美国总统福特试图破坏尼日利亚的声誉,他要求其他国家不要跟随尼日利亚的领导,警告他们不要支持 MPLA,因为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蔓延。尼日利亚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设法羞辱福特予以反击,政府取消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预先定好的国事访问,接管了美国在拉各斯和卡杜纳的信息大楼和无线电监控机构。尼日利亚要求非洲统一组织承认 MPLA 为安哥拉唯一的政府。它大胆地呼吁,美国是个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期待着与欧洲勾结起来再创造 19 世纪时的非洲分裂,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其主要的考虑是出于大国利益,而没有考虑非洲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1] 后来,吉米·卡特和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将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增加了一个扩大贸易的协议。

不过,1976 年尼日利亚宣称,戈翁卷入了那场失败的政变中,英国与尼日利亚的关系也随之恶化。戈翁流亡在英国,出于自卫,他拒绝回国。同时,英国政府也拒绝将他引渡回国。尼日利亚做出了实现储备金多样化的决定,持有的英镑严重影响了英国货币流通。然而,双方的关系在 1977 年实现了正常化。尼日利亚并没有投入东方集团的怀抱以作为替代盟友或对西方的反击。苏联对战后尼日利亚没有选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者与他们保持亲密关系深感失望,于是放弃了先前的建立钢铁厂的援助协议,同时尼日利亚也不再需要来自苏联的财政贷款。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在原油供应方面可以达到自给自足。尽管莫斯科想要对尼日利亚青年开放它的学校,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得到这个吸引人的机会。尽管双方的关系变得冷淡,但是也没有导致大的冲突。(后来)双方签署了双边协议,大批的尼日利亚学生到苏联读取学位。尼日利亚似乎是为了表明它并不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加强了与波

161

① Murtala Mohammed, Speech to the OAU Summit, *Daily Times*, February 21, 1976, p. 1.

兰和罗马尼亚的亲密关系。

尼日利亚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则取得了更明显的成果,它得到了别国对它的尊重。它站在安哥拉一边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举办非洲文化艺术节提高了国际声望,它还促成了西非经济共同体协议的通过。邻国赤道几内亚虐待了其境内的尼日利亚外来务工人员,激进的民众要求将其吞并,但政府拒绝了这一呼声,而将这些人员接回了国内,重新安置在农场或者为其找了份挣钱的工作。津巴布韦和南非的解放运动得到了尼日利亚的经济援助,同时尼日利亚就大国在非洲不断增加的军事和外交干预表达了反对意见。很多时候,国家威胁说要惩罚那些与南非进行贸易的国家,甚至用军事力量来与南非展开对抗。

尼日利亚扮演着陆上大国的角色。石油收入确保它能够维持住90家大使馆,为国际的和地区的组织负担所有的会费和专门税款,在危难时给予非洲其他国家以援助和支持解放运动。然而,与大众的想法相反的是,尽管与美国存在摩擦,但它仍无法用石油收入来对抗西方大国,主要原因有三方面:首先,没有多样化的经济。由于财政收入对石油的依赖以及技术的重要性与市场的波动,以石油作为武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其次,政府无法控制跨国石油公司,他们拥有破坏生产和转移原油,甚至向敌国南非转移的权力。最后,尼日利亚并非唯一的石油生产国。如果它与西方进口国的关系恶化,延长冲突,西方国家可以到别处去购买石油。

## 向第二共和国过渡

1975年10月,政府宣布了一个4年、分5步走的过渡计划:任命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创建新州;选举产生一个立宪会议;批准宪法草案;各州和联邦选举将在1979年10月举行。这项计划是要重建联邦政府,并且允许新的州建立令人满意的官僚机构并实现其非军事化。由49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975年10月4日被任命,一年后提交了一份草案。这份草案要求国家执行总统制,总统和副总统均由选举产生,享有明确的权力。总统将要与来自国家不同地方的内阁成员

162

一起工作。尼日利亚仍然实行联邦制。考虑到第一共和国时存在的弊端，草案呼吁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它下放权力、推进共识政治、消除残酷的政治对抗和胜者全取的方式，以及鼓励建立全国性政党。立宪会议讨论了这项草案，并于 1978 年 8 月提交了一部宪法呈请军人(政府)批准。同时，政府任命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CO)收集选举人的名单、划定选区、登记政党和组织选举。

1978 年 7 月，当联邦政府内阁里的军队统治者和士兵重新部署回兵营和宪法颁布时，军队希望退出的诚意得到了重申。军政府确立了广泛的指导方针，警戒人们不能再出现与第一共和国时期相似的政治，尤其是不能诉诸暴力，还要阻止那些有腐败行为的人参与政治。军队成员可以为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一个候选人或政党投票，但是，不允许他们参加或者组建政党。对政治感兴趣的军官需辞职，新的政府管理者不仅负责各州事务的管理，也是各军事单位和兵营的指挥官。传统首领和地区领导人需是无党派人士，而媒体工作人员需要维持公正性。

1978 年 9 月 21 日撤销了参政禁令。在不到 7 天的时间里，出现了许多政党，表明相关的秘密活动一直很活跃。事实上，政治家已经形成了长期存在的“社会团体”，来讨论获取权力的策略。第一个公之于众的政党是“尼日利亚联合统一党”(UPN)，其领导人是奥巴费米·阿沃罗沃。它是到目前为止最有序也是最有成效的政党，有 4 个主要的施政原则：各层次的免费教育、免费的保健设施、充分就业和农村的全面发展。阿沃罗沃成为该党的党内总统候选人，来自东区的菲利普·乌米爱迪成为副总统候选人。该党尝试招揽北区一些主要的政治候选人，但所有尝试均告失败。第二个宣布成立的政党是“尼日利亚人民党”(NPP)。它是由三个社团合并而成的。在 11 月其第一次政党大会上它就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两个新的政党：“大尼日利亚人民党”(GNPP)由前部长瓦齐里·易卜拉欣领导，他也是总统候选人和首席财务专家；另一个政党仍然使用旧名称，由纳姆迪·阿齐克韦担任领导人。两党都承诺要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推进国家的融合和统一，促进机会平等，朝着免费教育和充分就业的方向努力。“尼日利

163

亚国民党"(NPN)是第三个政党,尽管其组织构架极其混乱,但很快就成为最大的政党,吸引了许多第一共和国和戈翁时代的、卓越的政治家。接下来的政党是"人民救国党"(PRP),由阿米努·卡诺领导的唯一的左派政党。

政治活动中出现的新人,也在试图建立政党,形成了总数超过50个的小政党,但最终未能获得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官方认可。UPN、NPP、GNPP、NPN和PRP完成了它们的注册要求,按规定它们的会员资格必须向所有的尼日利亚人民开放,总部必须设立在联邦首都,它们的名称、徽章、座右铭必须反映国家的、而不是部族的或者家族的取向。它们必须在2/3的州设立党支部,强调的重点是政党的创建将是全国性的,要避免第一共和国时的狭隘主义和地区主义。只有国家的政党能够为竞选拉选票,而部族的、地区的和文化的集团禁止向政党提供资金。然而,新的政党体系在很多方面与第一共和国时期是相似的。关于注册了的政党的定位,UPN其实就是重生的AG,由专家和学者控制着,其领导人是阿沃罗沃。该党声明,它以提供福利和社会规划作为其政府的主要目标。PRP是最理想化的,它承诺要建立"民族经济",进而平等地分配资源,使人民大众受益。它吸引了许多学者和工会活动家。GNPP并没有就重组社会做出基本的承诺,它的重镇建立在北方,尤其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NPP试图复活阿齐克韦领导下的NCNC。NPN是来自北方的、重量级政治人物控制的政党,犹如第一共和国时期间控制了联邦政府的原尼日利亚国家联盟。该党内三位资深的政治家成为关键性人物:谢胡·沙加里,北方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亚历克斯·埃库乌米,伊格博人,成为副总统候选人;阿金洛耶,约鲁巴人,作为党的主席。该党向代表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分配职务。例如,北区产生总统,东区产生副总统,西区产生党主席,少数民族地区产生参议院的领导人。从一开始,NPN就更专注于职务的分配,而不是政府的目标,尽管它也宣布了它的目标,包括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对所有公民实现机会平等、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确立人民民主地表达他们的意志的至高无上地位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164

与军人政府的期望相反的是,有着新的政治哲学的政治家并没有出现。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控制着政党。在组织活动和招募新的政党成员时,个人的资历,而非其政治意识,显得更为重要。部族和地区分裂的呼声像过去一样出现了,而政党也没有将民主视为解放穷人的一种方式。学生、学者和行政文员被禁止参与政治(除非他们先辞掉他们的职务),这一领域就留给了个体经营者和职业政治家。在各地区,政党办事处的成立和经营很可能由有钱人去实现,他们将权力看做是弥补他们支出的渠道。由于工会被禁止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来源,尤其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可能,也就被根除掉了。程序及相关法规保障了有产的政治阶层的特权的重建。尽管存在这些缺陷,但通过完成它所承诺的交出权力,奥巴桑乔政府重建了军人政府的形象。

# 第十一章　第二共和国(1979－1983)

165 尼日利亚采用了由总统负责的美国式宪政，希望能纠正第一共和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①]中的失误。自那时起，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总统制宪政的精髓只做过很小的改动被保留了下来，为第三共和国做了准备。人们认为，拥有真正权力的、强大的总统更适合于非洲的现状。与早期的体制不同的是，总统和他的代理人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总统为了确保大多数州与部族的认可，他必须赢得整个国家的多数选票，至少是国家的 2/3 的州超过 1/4 的选票。总统是最高行政长官和军队的总司令，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每届四年。他享有任命各部部长、检察长、联邦执行机构的成员和军队与警察部门首脑的权力。但立法机关也对这些广泛的权力加以了限制。

立法院是一个两院制的国民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在四年的任期内，国民议会有权力支配政府开支；当有人揭发行政官员滥用 166

① 威斯敏斯特体系是一种特殊的议会民主制，源于英国，名字就取自英国议会的所在地伦敦威斯敏斯特。这种体系被广泛用于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并已经成为大多数英联邦国家采用的政治体制。特点是其政府首脑需要获得议会的支持才能工作，而这种支持一般通过信任投票的方式得到体现。因此，在采用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中，立法体系与行政体系并不完全分立。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一般拥有多个党派，而且政府首脑与国家元首分开。在威斯敏斯特体系中，国家元首拥有较大的紧急权力，但受到惯例(而非法律)的制约而较少执行。——译者注

职权时，议会有权进行调查；有权弹劾总统和废除一项得到总统同意的法案。政府的第三个机构是独立的司法机构，其首脑由总统任命，需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为了避免出现第一共和国时的地方主义的威胁，各州相对于中央来说所拥有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但它们的政府建制与联邦一级很相似。地方政府的职能也有了清晰明了的规定，以防止其任意渎职。

预见到政治家可能会滥用职权和为了使贪婪的癖好最小化，《宪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成员的行为准则。该准则禁止他们操纵国外账户，来隐藏他们盗窃的资产；禁止他们从公共账户上领取双份工资和经营私营公司、贸易及第二职业；更具有创新性的地方在于，它包含了关于“基本目标和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的部分。该部分明确了政府在国内和国外事务上的责任，不过这些“不受法院管辖”，这意味着政府不会因没有履行责任而被起诉。《宪法》将政府看做是抱有混合经济哲学的、促动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赋予了它资源分配、土地控制和使个人权利服从于集体利益的权威。

总之，《宪法》通过创建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将地方主义危险最小化和为国家政党的建立订立规则的办法，解决了第一共和国时期的一些难题。它明确了权力在政府各机构中如何分配和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注定《宪法》最终失败的并非它存在缺陷，而是竞争性政治的本性、将政治商业化的终极目标；市民社会拥有的监督领导者的权力有限，以及政治家们对民主化进程的破坏。

1979 年，联邦众议院、参议院、州议会、州长和总统在 6 周的时间里进行了 5 次选举。军队和警察维持了秩序，选举行为中的许多过失被报道出来，参与选举投票的人又相当少。在注册了的 4 770 万选民中，只有 1 680 万人参与了总统选举投票。选举中，NPN 居于领先地位，在众议院占有 37%的席位，州议会中占有 36%的席位，参议院中占有 38%的席位。UPN 紧随其后，在众议院、州议会和参议院中的席位分别是 25%、25%和 30%。NPP 在三个立法机关赢得了 17%的席位，余下两个党瓜分了剩下的 10%的席位。在州长的竞选中，NPN 在 7

167

个州获胜,UPN、NPP、GNPP、PRP 分别在 5 个、3 个、2 个、2 个州获胜。总统候选人哈吉·谢胡·沙加里没有能满足选举规则的要求——他必须赢得 2/3 州的至少 25%的选票,而他仅在 12 个州达到了要求,这无法让选民心悦诚服地将权力委任给他。但是,由军政府支持下的司法部门做出了最后的判读,它认为,19 个州的 2/3 是占选票的 12.7%,而非现在的 13%或 $12\frac{2}{3}$%。这确保了他在选举中获胜。对于一个精心设计的过渡计划来说,这是一个讽刺性的终结。但是公众接受了这位总统和选举出来的其他官员,期望民主制度能够带来积极的转变。

尽管政党通过任命它们的官员、领导者和开展全国性的运动,试图达到全国性,但结果显示,族群对抗和地区狭隘主义依然存在。各政党与其第一共和国时的前辈们一样,族群集团化的投票选举使得许多政治家把握了权力,因而 UPN 在约鲁巴人中获得了成功;NPP 在伊格博人中得到了支持;NPN 则宣称要向全国扩展,但它被北方政治家控制着,人们认为它是 NPC 的转生,不愿让南方政治家染指,并成功抑制了南部的政治家,尤其是约鲁巴百万富翁 M. K. O. 阿比奥拉酋长的野心。然而,赢得总统选举的规则使得依赖单一的种族集团是不够的。因而,沙加里在所有的"少数族裔州"能够获得重要的选票。

## 国内问题

尽管第二共和国将大量的资金花在了农业、住房和教育上,但结局是惨痛的失败。1982 年税收分配规则的修订给了各州更多的资金,并且允许它们征收所得税和营业税。教育设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迎合了全国初等教育的需要。1976 年,这一项目开始实施,兴建了大量的教师培训学校,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学校教师。UPN 控制的州主要在西区,在那里兴建了数千所小学和中学。因为该党给予了人民大众机会,这打破了精英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高等教育得以推进,技术学校落成,7 所新的大学创建,并建了一所开放的远程教育大学。在快速扩张

168

普遍化的情况下，如影随形的是资金、人员和设备的短缺。但是，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只强调建立学校的重要性，而非其局限性。因为没有将教育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综合起来考虑，他们极少，甚至根本没设想过成千上万的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而这将成为第二共和国及以后的政府无法解决的难题。

同样的，政府在拓展社会服务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尤其是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扩建，5 所新的医院的完工，3 所医院改造成了医学院附属医院，并且建成了 1 个国家眼科中心。农村卫生方面建成了 362 所卫生保健院。但是，在当时医务人员向国外移民、食品短缺和药物匮乏的情况下，扩张政策的作用也仅体现在这些设施建设上，对大众健康的改善来说，效果并不明显。

宗教向政治的渗透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新危机。宗教暴力开始于沙加里当政时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成为国家最严重的危机之一。1980 年卡诺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到 1985 年时，暴动已蔓延到许多大城市。这场被称为"麦塔特斯尼暴动"的动乱，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联邦政府指责外国煽动暴动，来达到延缓尼日利亚实现积极计划的目的。政府设立法庭来调查暴力事件，但是没有找到支持外国煽动这场暴动的可靠证据。更确切地说，宗教暴力是对政治、经济的衰退和腐败所做出的回应。从 70 年代起，国家就面临着压力，而很大部分是来自宗教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立宪会议中的北方代表为把伊斯兰教法纳入司法体系而斗争。在选举活动期间，NPN 就把对宗教的掌控作为它的策略之一，为得到宗教领导人和穆斯林酋长的支持，将宗教诉求转化为政治力量，进行了有力的尝试。

从宗教组织以往的言行来看，很显然，它们抵制政治(甚至宗教)领导人的腐败。他们认为社会是衰落和过度物质化的。选举中出现的失职行为和政党之间的对抗使改良主义宗教领袖确信，世俗化不再是国家的理想。一些人开始抵制宪政体制，要求用由精神领袖统治的神权国家取而代之。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和伊朗的阿亚图拉·霍梅尼都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领导模式。他们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强大的、受欢迎

169

的、诚实的、符合道德标准的,是忠于民众的。

1980年宗教危机的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马尔瓦,他更以“麦塔特斯尼”著称。他将伊斯兰教和巫术结合了起来。他吸引了大批愿意为信仰而丢弃性命的忠实的追随者。他为世俗政府及其现代化议程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替代选择。他认为,领导者必须是非物质的,一定要拒绝以西方国家和现代技术为象征的物质主义。他的追随者是一些从周围农村迁到卡诺的年轻人、城市贫民和少数来自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的外国人。政府通过颁布控制传道者的规章制度来干涉宗教事务。尽管传教的取向和动机不同,但其他人也可能会重复马尔瓦范例。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激进的伊斯兰教组织。

伊斯兰教组织和基督教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了异常紧张的时期。1982年10月,穆斯林暴徒放火烧了8所著名的教堂,这成为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开端。政府将此次暴动归咎于基督教徒在伊斯兰城市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和来自伊朗的激进文学的影响,并且建议决定在穆斯林聚居区域建立教堂时一定要慎重。但这也为基督教徒对长期以来在工作、土地分配上受到的歧视,没有自己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和他们的学校被接管等提出广泛的抱怨创造了机会。这件事成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长期而又激烈对抗的开端。最终将导致分裂国家的、恐怖的宗教战争爆发。

基督徒愤怒的一个主要和长期的根源是,他们认为穆斯林企图将新都阿布贾变为一个伊斯兰教城市。清真寺和一个纪念开斋节的祈祷场所很快出现,靠近总统大厦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国家清真寺,城市的大门和其他一些地方也设计成了伊斯兰教风格。使用豪萨语、穿豪萨族服饰和戴与总统有关的帽子成为吸引注意的很普遍的方式,同时,一些南方的基督教政治家们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不知羞耻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在1983年的重新选举中,北方政治家承诺要紧紧握住权力,以此来推进伊斯兰教事业。 170

人们预见,新政府面临的将是萧条的经济,要应付逐渐增加的收支

平衡难题和被迫着手解决通货膨胀和农业衰退问题。然而，新的共和国却迎来了大量的好消息：由于波斯湾的危机，石油收入得以增加，1980 年联邦公库获得了 224 亿美元的意外收获。当石油价格稳定后，1983 年的收入是 100 亿美元。但随后全球经济不景气，石油收入下跌。这成为向国外贷款的正当理由，贷款意向达到 150 亿美元。随着各州与联邦政府共计获得了 102 亿奈拉的惊人巨款，国内债务也不顾后果地增加。

由于总的石油收入减少，政府未能有效实践它的任何承诺，来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它没有能解决遗留问题，反而使问题增加了。政府关注更多的是为部分成员获得合同和进口许可证创造机会。食品进口(尤其是大米)和新的首都阿布贾的修建成为更快获得巨款的渠道。政府的雄心并非像拉美和亚洲一样，要建立高效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要保持扩张性的支出来消费所有的财政收入，甚至去举借更多的钱。投资不必满足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发展的严格标准，而仅仅简单关注的是允许部族的显要人物施展权力和积累非法财富。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来消费，而不是用来增加投资机会。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着眼于满足短期的需要。财政赤字继续上涨，从 1980 年的 32.956 亿奈拉增加到了 1981 年的 48.826 亿奈拉和 1982 年的 53.711 亿奈拉。由于这需要国际和国内的贷款来为其负担经费，这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其他的问题包括：走私、失业、通货膨胀和对国库的大量掠夺。除出现了前一个时代的消极特征外，生产部门也衰落了：依赖进口；重要的工业集中在拉各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生产所需货物很有限。由于进口原材料的匮乏，许多制造企业不是取消业务，就是被迫进行最低限度的生产，导致了工人的大规模裁减。据报道，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存在生产率低下问题。尽管联邦政府把农业放在了考虑的第一位，但由

171

于技术不足、农村向城市移民和政府资金转入私人口袋的问题继续存在，农业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国家得到的商品是劣质货和假货，包括药品在内，打击走私也成为一个难题。石油资源和稀缺商品走私到了邻

国(贝宁共和国和多哥),在那里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和为私人致富开拓道路,政府大规模地进口食品,在1979－1983年间达到了83亿奈拉的惊人数字。另外,肥料的进口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对国内生产的动员却削弱了;食品进口与外国贷款及对外依赖联系到一起。与第一共和国时的情况不同的是,农民无法再通过不缴纳税金和收回作物这样的方式向政府领导人施加压力。在第二共和国,国家的财富来自石油,而非农业。那些负责财政支出的人无视农村的大多数人,并不担心农民会通过投票或其他方式来报复他们。

经济持续下滑,政府将责任归咎于全球经济衰退,无视它本身改革和减少管理不善情况的需要。它没有能核查它的鲁莽的财政措施,而是一味地举借外债。贷款也并未用来有效地投资于货物生产和服务,同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其农业政策的不当,使得支出飞涨,外汇储备枯竭。1983年(到1983年12月31日止,第二共和国存在的最后一天)的中央银行报告呈现了一幅暗淡的画卷:

> 1983年的尼日利亚经济处于严重的滞胀状态:在价格总水平剧增的同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广泛的经济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4%,超过了1982年的3.4%的衰落纪录……对外部门也没有从国家总体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的纪录值从1982年的213亿奈拉降至1983年的173亿奈拉;国外支付状况进一步恶化,导致延滞付款累积值创历史最高纪录;国外支付状况如此糟糕,也使得为解决一些贸易负债不得不再次申请贷款,同时,也开始了就收支平衡问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贷款,就结构性调整贷款与世界银行进行协商。……总的来说,农业生产指数大体上降低了9.4%,而1982年是上涨了2.7%,1981年上涨了3.4%,1980年上涨了2.5%。工业产量也大幅下跌,工业生产指数下降了11.8%……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失业、劳动力裁减(包括管理人员在内)、消费品严重缺乏、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和

172

走私活动猖獗。[①]

## 对外关系

《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的目标：促进非洲国家的团结；实现非洲总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推进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来巩固世界和平、相互尊重和加强与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进行斗争。这是尼日利亚70年代末的政策取向。它基于尼日利亚有资源成为世界大国和黑人民族的领导者的设想。从大体上看，沙加里政权试图来巩固上届政府在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中的成就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虽然其政权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理念，但它更多地认同西方国家的利益，与东欧的关系则进展缓慢而谨慎。国家通过言论、金钱和物资赞助来支援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结束欧洲人统治的运动和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尼日利亚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要求建立一个自治国家的愿望，同时拒绝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尽管强调了双方强有力的商业关系。

虽然总统的权力在国内受到了削弱，但在外交方面沙加里支持80年代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激进要求。将尼日利亚视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沙加里在1980年这样谈道："我们必须拒绝向富裕国家的经济提供资助，我们出售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给他们（工业国家），他们回报我们的却是过高价格的制成品。"[②]尼日利亚呼吁建立一系列新的规则来重新分配全球收入，推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帮助它们实现工业化。尼日利亚主办了非洲统一组织峰会(O. A. U)，会上达成的重要文件——《拉各斯行动计划》是关于非洲到20世纪末如何实现经济好转的具体计划。尼日利亚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也

173

① Central Bank of Nigeria, *Annual Report* (Lagos: CBN, 1989), p. 1.

② President Shehu Shagari, Address to Niger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imeographed.

很活跃,尽管它于 1983 年时降低了它的原有价格从而削弱了组织的基础。

尼日利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如果说不上是亲密得近似屈从,也算是正常了。这是多种因素驱使的结果:尼日利亚对外来投资和贷款的欲望;需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保持良好声誉纪录(这样才能得到贷款);过度乐观地认为世界银行会帮助它进行农业改造,并且提供特殊贷款。中央政府把美国看成是它最好的盟友,通过互访、共同磋商非洲事务、建立新的农业合资企业、积极吸引美国投资者赴尼投资等方式加强双边关系。尼日利亚与英国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同时法国和德国是其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商。

当然,对外关系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尽管尼日利亚想要成为地区大国,同时推进西非共同体的发展,但 1983 年 1 月政府驱逐了国内所谓的非法外国居民,人数超过百万,这损坏了它在该地区的国家形象,使它看起来对经济破落的小国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喀麦隆和乍得对它缺少敬意,前者由于边境纠纷,后者由于爆发了内战,使得难民流入尼日利亚。总之,国家对对外事务的反应是迟钝的,总是落后于公众舆论,同时又受到互相争斗的政党各抒已见的状况影响。例如,UPN 迫切要求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激进分子则批评尼日利亚在乍得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拒不承认卡扎菲在 1982 年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认为这维护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总的来说,尼日利亚选择了一个谨慎的和没有太大野心的国际外交政策。

## 第二共和国的衰落

第二共和国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和政治家们甚至无法成功维持自身生存,最终走向消亡。政治的名声被搞坏,许多不当行为破坏了《宪法》和共和国本身。民主制度的主要成分被滥用,法律规则和独立的司法被搁置一旁,尤其是在选举行为中;没有公平的竞争;政府各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也不再运行。许多人没有机会去选择他们的领导人; 174

政治没有达到公众的目标。政府机构无法无天,警察随意亵渎人权;暴徒骚扰和攻击政敌;一些高官和法官受委托去协助选举中的失职行为。政治家完全忽视了《宪法》要维护竞争性政治与舆论之间的平衡的精神和目的。

政党的首要目标是获得权力,以使他们的成员将拥有特权来实现他们自私的欲望。政治家的行为是如此的恶名卓著,使得民主制度有了负面的含意。总统制宪政变得繁琐和昂贵,难以操作。总统可以任命他的内阁,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多数政党成员可以要求这样那样的职位。政权的放纵无度和滥用降低了《宪法》和政府职能的尊严。

对政治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时期内能从国库中捞到多少钱,这种态度符合家长式专制统治哲学,这种哲学促进了偷窃、没落的领导和政治的不道德,并为其辩护。家长式专制统治在经济中更加引人注目。以进口为例,进口需要许可证,政治密友可以申请得到,而非真正的企业家。他们又将特许证转手卖给进口商,进口商则将费用附加到了商品上。他们进口伪劣产品,然后按照已订立的供给合同卖给政府。囤积大米、牛奶之类生活必需品成为普遍现象,造成了人为的物资短缺,物价上涨。新首都、学校和医院的修建使部分人受益,如果说他们真的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话,那也是夸大工程规模,建造豆腐渣工程。审批合同的人则从中拿到回扣。为了给政党提供经费,通过审批合同和其他交易获得的贿赂有一部分进入政党的保险箱,于是政党变成为腐败组织。

政治家向大量的依附者和拥护者提供了慷慨援助,用钱来换取支持,招募效忠者,奖励心腹,打压反对者。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期望,他能将政府工程吸引到他所代表的地区,在就业和大学录取和合同获得方面能对该地区人民有利。因为政治家们都要得到报酬,政府不得不控制几乎所有的盈利部门。因为享有国家权力就意味着享有了地位和身份。选举中的失败和虽然赢得了选举却未被任命到赚钱的机构就等同于巨大的商业失败。而且,支持竞选中失败的候选人可能会遭来报复,就像农民不选 NPN 所希望的人就不能拥有肥料一样。

175

NPN 宣称自己是一个关爱成员的政党。它通过向它的成员发放奖金、工作和机会来赢得支持。政策成为分配问题的附属品，而政党也无法控制它的领导成员。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资源出现紧张，NPN失去了权势，并开始内乱。那些处于当权者位置的人拒绝放弃权力，甚至为此甘冒生命危险。同时，新成员在为获得权力而斗争，即使这将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衰落。

其结果是导致社会问题的紧张。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他们成了城市中心区的威胁。他们轻易地被政治家招募去做政党的暴徒，或是加入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中。农村向城市移民过程中，大批年轻人进入城市。在北方，许多人加入了麦塔特斯尼组织，因为宗教抗议已经成为反对世俗机构堕落和攻击腐败的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社会运动。走私、持械抢劫、毒品走私成为人们选择的职业，尤其是在南部城市。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被腐蚀——在许多人看来，保卫国家不值得，他们应该根据自身晋升的需要，对国家进行开发利用。诚恳、勤奋地工作已不再需要，也是无效的。当政府着手实施所谓的“财政紧缩措施”和为改进沦丧的道德观念而号召进行种族革命时，公众只当其为笑谈。因为总体上来说，发出号召的那些人完全不具备担当道德和政治领导的资格，他们只是一味地炫耀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财富

公共事业经历了快速的衰退。在许多州，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尤其是教师工资，被拖欠了一年以上，这不仅使得人们士气低落，也成为人们不再一起努力工作的正当理由。一些公共建筑没有得到维护，一些重要的建筑甚至遭遇了火灾。这是由于一些官员和政治家企图毁灭他们的盗窃和合同交易的犯罪记录，而唆使暴徒纵火。医务人员、大学教师和其他一些人为要求更好的报酬和服务环境展开了长期罢工。医院也成为“没有药物、水和设备的咨询诊所”。[1]

法律问题、秩序问题和安全问题很严重，因为暴力事件、持械抢劫、　176

[1] Coup announcement, Brigadier Abacha, December 31, 1983, *Sunday Concord*, January 1, 1984.

滥用人权、警察骚扰和法律的不公正很盛行。政府的代表们首先就是违法分子。那些通过不法选举行为获得权力的人,违反了《宪法》。政府不能将国家治理得很好,营造了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环境。因为许多人对共和国的存活时间表示怀疑,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就将腐败看成了他们最紧急的任务。不清楚军人何时会发动攻击,于是当权者就把尽可能多地盗窃钱财当做首要任务。他们像掠夺者一样的行为,给社会道德标准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为了保护自己避免遭受公众的愤怒和暴力行为,为警察机构花费巨资也就成为必要,似乎民众就是犯人。对穷人来说,无正义可言。公众对警察和司法体系失去了信心,富有的人有钱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①。政府没有改革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式,而是为了保护官员的生命财产,在警察局的武器设备上花费了越来越多的钱。以 1980 年为例,联邦政府认为持械抢劫事件猖狂,于是在原预算之外又追加了 8 300 万奈拉,为警察购买设备。三年后,政府又拨款购买装甲车,但这并未减轻暴力和盗窃事件的频发。因此,不安全感使得不少政治家开始穿防弹衣。私家安全防护系统和坚固的围墙也成为普遍的景观。

随着文官政府第一阶段走向终结,许多人认为这种体制应该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加以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选举过程已经与暴力、纵火、谋杀、抢劫和大规模腐败现象紧密结合起来。在所有政党里,领导者和其他候选人的预选就导致了残酷的对抗和暴力。政党之间的结盟反映了他们赢得权力和分享权力的需要,而不是共同商讨政策和规划的需要。当 UPN 为创建一个包括 UPN、NPP,以及 PRP 和 GNPP 部分成员在内的进步党团联盟时,他们在总统候选人和其他职位候选人名单上没有达成一致。因为每个人都对权力感兴趣。PRP 是一个左派政党,一些成员想要加入到占重要地位的 NPN,最终因争论而走向分裂。联邦选举委员会也失去了组织一次公平的竞选的信

① Comment by Alhaji Isa Keita, Chairman of the Code of Conduct Bureau, *New Nigerian*, November 22, 1983.

誉,因为它厚颜无耻地做了有利于 NPN 的事情。经过一场规模空前的欺骗性选举后,NPN 重新获得了权力,声称他们已经在先前别的政党统治的地区获得了成功。该党领袖很贪婪,在 UPN 的大本营,如奥约州和翁多州,通过不正当手段赢得了统治者竞选。在奥约州,暴力活动的规模大到迫使联邦选举委员会为了顾全面子而不得不安排一场所谓的“重新计票”。当沙加里在 1983 年 10 月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时,公众、媒体和反对势力联合起来,最终将他赶下了台。使他获得权力的选举既非自由的,也非公正的。贫困、无纪律和普遍的不安全感笼罩着整个国家。1983 年新年前夕,军人政权再次向文官政府发起攻击,政权转到了布哈里手里,他承诺要拯救国家。

177

# 第十二章　军人统治下的经济和政治(1983－1993)

随着第二共和国的衰落,尼日利亚又重新回到漫长的军人统治时179期。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尼日利亚现代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与之前几十年里"理智"将军们不同的是,新的统治者更加专制独裁：他们随意地丢弃责任原则;在处理腐败问题上也很失败;在平息政敌方面更多地倾向于诉诸武力。在这一章中,我们着重探讨两个政权：穆罕默德·布哈里政权(1983－1985)和易卜拉欣·巴班吉达政权(1985－1992)。虽然他们的执政方式不同,但他们都关注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问题。他们都不情愿地交出了政权,前者是在一场政变中退出,而后者则是不光彩地辞职了。

## 背景

尼日利亚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严重的衰退期。生活水平降到比以前更糟糕的地步,外债增加。70年代着重强调提供人民生活所需的发展计划,因为国家支持出口导向战略而被放弃。这也是一个180冲突的时代,穷人抗议政府的政策,宗教冲突也不断增加,在经济衰退和政治上管理不善的刺激下进一步激化。

80年代末冷战结束,全球政治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尽管尼日利亚更多地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通过与超级大国协商来指导它的对外政策，然而，东方集团(社会主义阵营)为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激进分子和左派学者呼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机会。80 年代及其后，东方集团失去了影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也没有积极的经验可供非洲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权——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的失败，更使社会主义模式声誉受损。自由主义者和右翼意识形态占了统治地位，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左右着国家的选择。90 年代，非洲国家不仅向国外寻求经济管理经验，也寻求关于"好政府"的理念。人们希望政府能够通过对公众需要给予更多的回应，改进民主制度和避免军人统治来改造自身。尼日利亚政府迎合国内外需要，承诺要向文官政府转变，但它并未履行承诺。阿巴查将军在 1995 年自信地宣称：独裁政府将与发展携手同行。[①]

随着不同国家抗议运动的爆发、市民社会的激进化、一些选举的成功实例和民主化改变，非洲国家掀起了民主化浪潮。尼日利亚人民也要求文官统治和拓展民主化的空间。成千上万人为此献出了生命，然而，军人却仍顽固地握紧权力不放。

## 布哈里时代：1983－1985

布哈里当政时期关注更多的是能够使他获得权力的近期政治局势，而不是对这十年社会大背景的成因进行分析。像 70 年代的默罕默德一样，布哈里中央政府将自己看成是一个"纠错"的政体，他承诺要避免"我们社会中的不道德和不公正行为"。[②]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央政府：

"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给国家指明一个更好、更有目的

① General Sani Abacha, "This is how we do it in Nigeria," *The Economist*, July 22, 1995, p. 40.

② Major General Muhammad Buhari, Maiden Address, January 1, 1984(全文见 *Daily Times*, January 2, 1984).

的发展方向；对现有资源进行规范管理；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在指定时期内实现主要粮食、商品和重要原材料的自给自足；鼓励劳动密集型项目，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重新规划涉及大额度外汇交易的发展项目；清洗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维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生命和财产安全；推崇公共责任原则；鼓励尼日利亚工人改进职业道德；监督和抑制囤积、走私和所有其他的破坏社会经济的行为。”①

由于认定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家是贪污腐败的，民众又缺乏纪律性，布哈里政权对他们采取了残酷的策略，其结果却使它失去了外国朋友。西方媒体将政变看做是对民主制度的颠覆。尼日利亚与英国的关系也因逃亡政治家乌马如·迪科的问题而破裂。他是第二共和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被指控幕后操纵了选举人的欺骗行为和有盗窃行为。尼日利亚希望将其绳之以法，原计划将其强行劫持，却遭到了英国警察的干涉而中途失败。尼日利亚与英国的外交裂缝也由此产生。

在内政方面，军政府是果断敏捷的。与文官政府缓慢的决定过程不同的是，军政府在许多问题的决定上是迅捷的。如改变货币颜色（针对伪造和非法贩卖货币行为的出现而采取的措施）和废除文官政府创建的地方新政府。在调查和处罚第二共和国的文官领导人的过程中，人民普遍感觉，许多 NPN 的成员获得了赦免。政府留给公众的印象是，它对别的政党，甚至总体上对南方人存在偏见。政府颁布了两项法令，使它普遍地不受欢迎。其一是司法部要服从于军政府的政令，这削弱了司法部的权力：它不能再对军事法官的决定提出挑战。其二是钳制新闻界的自由。这样，军政府就不受任何机构的监视和抑制了。

责任问题和“大扫除”置于政府议事日程的首位。杜绝腐败行为将与“职业道德的培养”相伴而行。一项法令授予了军政府没收政党和政治领导人非法财产的权力。各级政府的公职人员若被怀疑存在腐败行

① General Muhammad Buhari, *Daily Times*, January 7, 1984.

为,将受到审查和较长刑期的严重惩罚。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沦为了这项法令的受害者,被送进监狱。军政府为所有公职人员颁布了《行为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他们应该注销部分银行账户,并且公布他们所拥有的财产。

公众似乎因为第二共和国的失败而成了罪人,一场"向无纪律宣战"(WAI)的改革运动对他们进行改造。这是70年代开始的多场"伦理运动"中最为声势浩大的一场,其目的是"灌输并增进人们的国家意识、爱国主义精神,而首先是其纪律性"。[①] 现在,人们唯一能够记起的布哈里发起的"战争"是:强迫人们排队等候,按时上班报到和打扫邻近的地区(保持环境卫生)。WAI改革运动看上去有些荒唐,但它在一段时间内对那些认为尼日利亚的问题来自腐败和混乱的人来说是个令人振奋的话题。可惜其影响力是短暂的,糟糕的领导和人们对快速赚钱的热衷最终将其破坏。厉行公共纪律并没有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或者是灌输民族自豪感。军政府错误地将人民的沉默与乐意配合"战争"等同了起来。

布哈里政权的经济政策没有创新性,只是在他前任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包装。他没有能降低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没有能扩大就业和减轻对石油的依赖。原材料的短缺削弱了本地的工业。政府认为,那些走私者、造假者和食品出口商之类所谓的破坏分子应该为出现的经济困难负责。因此,政府颁布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措施来惩治罪犯。政府严格控制国家的外汇交易,甚至不承认合法企业的交易活动。财政预算中排除了损耗和巨大的赤字;为了削减开支,对合同进行了重新的估价;缩减了公共开支和政府人员的工资收入;减轻了对消费品进口的依赖。

尽管不善的管理得到了改善,但经济萧条的局面仍未改变。外汇储备低,偿还外债的利息耗费了资源。农业的失败则为当地的商人从食品和肥料的进口中攫取利益创造了机会。工业——除了石油部门

① *The Guardian*, March 21,1984.

外——依赖进口，对国家的贡献又很小。债息增加，试图与欧洲国家和巴西进行对等贸易的尝试失败；持械抢劫盛行，成为国家内部不稳定和公众绝望情绪的晴雨表。

183 军政府铁腕的管理方式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因为军政府与先前重要的文官和传统首领关系密切，而这些人又与NPN相互勾结，人们对这样的领导质量表示怀疑。布哈里政权对政治家的调查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使他们成为政权的强大敌人，并企图对政权进行破坏。军政府由北方人控制，南方政治家抱怨其不公平；军政府在缓解国家创伤和扩大就业方面未能成功，失去了市民社会的支持；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们看到它的持久性，也没有任何"还政于民"的转变计划，布哈里政府没有为政治家创建一个有利的转向，或者用建立一个新政府的可能性来安抚公众。军政府也未能平息一小群高级军官的愤怒，因为他们想要推进另一种不同的议事日程，以此来把持权力，从中受益。利用军政府存在的不足，巴班吉达在1985年8月27日上演了宫廷政变。尼日利亚陷入了极度混乱中。

## 巴班吉达时代：结构调整计划

巴班吉达是一个机敏但误入歧途的官员。正如尼日利亚人民所说的，他"从优雅走向了草莽"。如果说布哈里是一个率直诚恳的人，那么巴班吉达则是一个邪恶的天才——他表面上友善，但却很狡猾，是一个两面派、欺骗和含糊其辞的大师。他当政时期主要有两大议题：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和向文官政府转变的政策。

如同以前一样，尼日利亚经济仍然是主要依靠石油，但却无法保持过去的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外债增加。国家无力再进行新的工程。周期性的日常开支(基础设施建设、30所大学和巨大的公用设施)费用很高。现有设施和建筑的维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一些消极的经济行为，诸如大举外债、预算紧缩和缩减支出却成为常态，与此相伴的是高失业率和空前的腐败。石油收入也使得政治复杂化，成为腐败的军政府拒绝放弃权力的原因之一。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发现。1992

年时,经测定的石油储量高达 179 亿桶,4 年后增加到 200 亿桶,足以开发到 21 世纪中叶。现有的公司和新的公司都投资了巨额资本来寻找新增储量。

巴班吉达政权解决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是经济结构调整计划(SAP),该计划开始于 1988 年 6 月,作为一项改变衰落景象的审慎政策,它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这激起了尼日利亚人民反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也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付诸实施,但并没有贷款优势。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迫使国家重新定义了它在经济管理中的角色。人们认为,政府的企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要求对其实行私有化。政府应该从主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管理人,通过对企业提供指导方针来确保市场经济的繁荣兴旺。结构调整计划有 5 个重要目标:(1) 对经济生产部门进行重组和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以减少国家对石油部门和进口的依赖;(2)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也就是说,要减少或尽可能地消除财政赤字;(3) 增强私营部门的增长潜能的同时,也要减少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大量无效投资,提高该领域的效率;(4) 为持续的非通货膨胀性或通货膨胀最小化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5) 减少政府对经济部门的高压管制。正如政府所概括的那样,这项战略的执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i) 通过操作外汇市场,来确立奈拉实际的对外价值;(ii) 实施刺激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出口措施,包括非石油货物在内;(iii) 使关税合理化以保护本土工业,从而有助于工业增长和多样化;(iv) 在改善贸易和支付自由化方面进行投资;(v) 为实现资源配置,将放松行政管制与加大对市场力量的依赖结合起来。

184

结构调整计划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与本国政府的计划结合了起来。这是自独立以来,经济改革中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尝试。它导致经济上出现无法想象的灾难、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抗议与暴力活动盛行。尼日利亚与债权国的关系虽因此得到了改善,但结构调整计划削弱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增加了外债,允许资本外流。政府每年吹捧该计划所取得的收益,并向公众承诺苦难很快就会

结束。列举该计划的优点时，政府总是会提到：发展工业所需原材料的本地化（例如，啤酒厂用当地的玉米来代替进口的小麦）；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因为农民将留在农村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作物；许多新的185 企业的出现；种植可可和橡胶并出口获益，从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另外，还会提及政府企业的私有化与更好地使用外汇。

这些政策在医治国家严重的经济病症上彻底失败了。政策实施两年后，政府开始动摇，到 1991 年，也只有它最热心的支持者还能看到该计划的价值。经济改革最终失败，尽管政府拒绝承认。该计划导致了奈拉的贬值。贬值对于一个坚挺了很多年的货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打击。随着食品、住房、交通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这一计划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货币贬值增加了所有进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中产阶级负担不起汽车、机器配件、机械和其他物品。当政府提高了石油产品的价格时，通货膨胀率翻了 10 倍，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困难。生活水平的下降让穷人和中产阶级都深受其害。本地工业苦于国家外汇的有限，而债务又增加了国家的对外依赖。[①]成千上万的专家移民到西方国家或别的地方，这使得所有重要部门人员短缺问题异常尖锐。反对结构调整计划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动，造成了高等教育机构的长期关闭。

为了迎合国外债权人的需要和国内要求更高生活水平的需要，政府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包括政治操纵、精英领导和高压统治。在这一过程中，巴班吉达及其政权失去了信誉和人民的尊敬。

内债和外债飞涨。实施结构调整计划的两年来，外债从 150 亿美元增长到了 234.5 亿美元。财政收入的很大部分用来偿债，政府也不得不每年拿出至少 23 亿美元偿还借款。到 1988 年，政府每年偿还的国债达到 70 亿美元，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一半。为了满足偿还债务的需要，教育、医疗、住房的公共支出大幅度削减了。私有化政策确保

① 尼日利亚本国工业所需原材料多数需要进口，而此时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极其有限。——译者注

了那些与权力有联系的人可以买到先前的国营企业,从而将更多的钱转移到了有钱人手里,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

186

政府承诺要实施一项财政政策来根除消费上的浪费,但它的大多数行为却对此给予了否定。巴班吉达用公款贿赂军官和重要的文官来赢得支持。政府更乐于建立一些新的机构来酬谢主要盟友和给人们留下国家进步的印象,而不是去维护现有的设备和资产。例如,巴班吉达领导下的结构调整计划摇身一变成为"自力更生和经济恢复全民动员运动"(MAMSER),这在人们心中营造了一种假想的"意识"并鼓励他们去维护自身的权益。政府首次在预算中设立了妇女领袖这一职位,来提升妇女的地位。这项名为"为农村妇女生活更美好"的计划受总统或州长的妻子的控制,城市妇女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时装展览提供机会,而没有实现性别授权(gender empowerment)。这是一个艳丽奢华的政策,损害了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信誉。

与他的前任相同的是,巴班吉达政府也强调食品生产。1986 年 6 月,政府成立了食品、道路和农村基础设施董事会(DFRRI),以食品生产和农村发展作为其服务的对象,主要以三种方式展开:(1) 动员农村人口来参与国家发展;(2) 用现有的资源来发展农村地区;(3) 提高生活质量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为农村道路、食品生产、建立社区银行、简单的技术和用本地的材料建筑房屋几个方面分配了预算。不幸的是,资源大都流进了城市而非农村,而且由城市里的技术专家控制着。

到 1993 年这个政权结束的时候,结构调整计划所造成的后果是:货币大幅贬值和削弱;大批工厂关闭;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教育和社会机构衰落和腐败增加。

巴班吉达当政时期,毒品贩卖日益猖獗。尼日利亚不生产麻醉剂,但它却是东南非的海洛因运往欧洲和美国的转口贸易站,因此而臭名昭著。贩卖毒品的组织出现,有些还与政府高官有关系,不过其在数量和效率上无法与亚洲和哥伦比亚的相比。1989 年一份国际警察组织(INTERPOL)报道,旅居国外的尼日利亚侨民身上没收的鸦片数量在

世界上是排第三位的。尼日利亚无辜的旅行者在国际机场都会受到屈辱的搜身,严重影响了它的国际形象。国家毒品法执行处也由于同大毒枭勾结和贩卖没收来的毒品而毁坏了名声。

## 长期紧张:宗教骚乱和抗议

于此同时,由于宗教冲突,成千上万人失去了生命,建筑和财产遭到了破坏。国家被推到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边缘。国家的种族多样化是问题之源,也为政治领导者进行操纵提供了机会。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促使人们去寻找政治和社会生存的替代方案。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加速了它们的转化过程,去吸引那些愤懑的、贫困的和失望的人们,几百万人皈依了宗教。随着激进组织散布反对军人政权和世俗化的讯息,原教旨主义的新趋势出现了。在基督教中,原教旨主义采用了福音主义的形式,比较保守,反对变革。而穆斯林则猛烈抨击西方的影响、物质主义和世俗的政府。对军政府的不满导致了马赫迪思想的复活,人们希冀这个救世主的到来将会拯救国家和改革伊斯兰教。在谢赫易卜拉欣·泽科泽基领导下的什叶派人数也迅速增加。他是一个勇敢的布道者,要求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尼日利亚共和国。什叶派在不同的地方引起了冲突,如卡齐纳、迈杜古里、卡诺、包齐州、扎西亚和卡杜纳。这些骚乱通常是反政府的,要求建立由公正的、敬神的领袖统治的神权国家。

也有一些主流的宗教组织,其领导人有机会进入媒体和政府。在穆斯林中,伊斯兰事务最高委员会和伊斯兰促进会(JNI)[①]维护伊斯兰教的利益,并提出一些政治性的要求,如以星期五来代替星期天,作为休息日;废除学校和法庭中代表基督教传统的象征物。在基督教徒中,尼日利亚基督教会(CAN)是最主要的基督教徒的保卫者,它要求政府远离伊斯兰教。这些组织开始类似于政党,它们不仅提出大量的要求,动员它们的信徒,有时也组织抗议活动。军人政权成功地将宗教变成

① Jama'atu Nasril Islam,是尼日利亚最大的穆斯林组织。——译者注

了他们发挥政治作用的平台。政治家会害怕失去权力或被疏离,但宗教领导人则相对免去了滋扰。

1985年巴班吉达政府使尼日利亚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OIC),这个组织在政治、经济问题上联合伊斯兰教国家。其成员国必须为组织提供资金,也可以从该组织中获得贷款。先前的尼日利亚领导人都拒绝这一举措,但巴班吉达暗暗地加入了这个组织。当基督教徒反对这一将国家变为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举措时,长期的对抗接踵而至。在以后的几年里,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在许多城市,如包齐、卡诺、卡杜纳和赞贡—卡塔夫都发生了大的冲突,人们参拜的场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188

## 向第三共和国过渡

巴班吉达领导下的军人"还政于民"的尝试使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欺骗性的和不可预知的,最终证明是一个失败。起初,巴班吉达将军得到了人们的信任,但是,他经常性地改变竞争规则,为迎合私人欲望对移交权力的过程进行控制,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他是不打算放弃权力的。他在1990年时承诺退出,随后又将日期推迟到1992年、1993年。他的个人抱负、从军人政权中受益的副官们、对石油税收控制的欲望和开采石油的特许权的分配,这一切都使得权力交接不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批评过渡计划的人成为政府的敌人,1993年在出现内战可能爆发的迹象时,政府对新闻界进行了压制。

政府的过渡计划认为,军人会理智、慷慨地将权力交给改革派的政治家。在一个巧妙的平民主义策略中,巴班吉达于1986年呼吁就国家的政治未来进行全国性的大讨论。为监督这些讨论会并递交一份关于政府政治模式的共识,政府设立了一个政治局。每个族群和主要利益集团都提交了他们的观点,媒体则主要聚焦于宪法、政党和政治行为进行讨论。政治局的报告中分析了第二共和国存在的病症,并就应做出的改变提出了建议,但是政府对大多数建议没有给予重视。

军人政权不允许政治家来控制过渡进程,而是决定由自己统治和

189

制定所有规则。政府禁止“老派”政治家参与其中，政府要控制政党，并设立一个选举委员会。政府设立了各式各样的机构来为过渡奠定道德基础和哲学基础。“自力更生和经济恢复全民动员运动”(MAMSER)将改革种族和激励大众，民主研究中心将成为政治家的训练场，政府间关系国家委员会将解决存在于各级政府之间的争论。政府举办了许多场会议，而且巴班吉达为了寻求永久的权力，将各机构的领导人指派为该计划的增补委员。尽管人们希望这些领导人能够推进过渡，但各机构是维护军人统治的，反对匆忙地移交权力，甚至宣扬巴班吉达就是国家最好的领导人。

与精英分子进入政府各级机构同时，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大学教授和其他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发现，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名贵的汽车，以及送他们的孩子进私立学校上学太难了。政府的恩惠成为维持优裕生活的关键。巴班吉达在利用他的优势来操纵经济局势方面是精明的，他任命了军队官员、承包商、商人和许多政治家，运用慷慨的策略收买他们的忠诚。同时，他又用军队来反对文官领袖，要么批评他们的野心，要么夸大他们的过失，以此来为延长他的统治时间而辩护。

政府允许政党在严格的规则下创立，但对 30 个自由形成的政党并不满意。于是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政府自己建立两个政党，一个“略微偏右”——社会民主党(SDP)，另一个“略微偏左”——民族共和党(NRP)。政府宣布了它们的成立，并为其办公大楼和管理人员负担经费。这两个政党拒绝反对军政府，在结构调整计划失败和专制独裁问题上保持沉默。军政府行使了禁止任何政治家参与的权利，迫使大量精明强干的政治家要么死，要么保持沉默。军政府驱散了政党的管理人员，无视法院指令，并操纵着选举委员会。

与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的是，巴班吉达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直到他当政的最后几个月。在向公众承诺了不再举借外债后，他改变了想法，贯彻落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条款，奉行自由民主制和自由放任的外交政策。巴班吉达成为外国领导人和跨国公司的宠儿，成为他们在非洲所需要的领导人类型的最好榜样——腐败，但在专制

策略中并不粗鲁。外国领导人和跨国公司的支持削弱了亲民主组织加强国际联合反对巴班吉达的力量。事实上,政府对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激进分子进行了镇压,他们自然是更喜欢那些对国际金融机构资助下的项目给予支持的保守分子。

190

尽管有如此多的障碍,但也不乏拥有抱负和金钱的候选人。虽然仍被认为是“新生力量”,一批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致富的人已在 80 年代巩固了自己的实力。也有一些退休了的将军,他们利用职权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尽管他们建立了大量的企业,但他们并不具备经营企业的头脑,而是认识到在政府中担任角色对他们获得经济收益更加容易便捷。这些有野心的人加入了政党,利用他们的金钱和关系建立了一套控制措施。大量对权力着迷的富裕文官加入他们当中,文官中的一些人得到了军队慷慨的支持。与大众期望相反的是,这些新成员不赞成任何新的看法,也不避讳奢华的生活方式和公开地夸耀他们的富裕。然而,老的政治家不易被击败:他们发号施令,在幕后操纵,并且为政党提供资金。一些主要的政治协会正是依据这种“老派”人物的意愿形成的。而且,这些人还资助了那些职场新人和地方政府选举。他们残酷和不择手段地利用种族和宗教势力,操纵着这一过程。

巴班吉达能够用政府资源和高压政治来破坏许多政治家的政治野心,将他自己以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他无视他的州长们和部长们的腐败,用职位和金钱犒劳许多人,巩固与传统首领之间的友谊,操纵着政府的报纸,如《每日时报》和《新尼日利亚人》。他庇佑着一个不民主的组织——“尼日利亚更美好”(ABN)协会。该组织有着充裕的资金,发起了“巴班吉达必须掌权”的运动。他挑唆一个政党去反对另一个政党,穆斯林反对基督教徒,北方反对南方。他把持着禁止和准许每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力。这个权力确保了他决定谁可以参政,及何时参政。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将被禁止,什么时候准许,因此做事慎之又慎。但是,尽管军政府仍然加以控制,正如修订了的《宪法》明文规定的,选举甚至国家治理仍由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国民大会来主持。

191 1993年6月12日的总统选举是转变过程中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阶段。巴班吉达实施了很多保护措施来确保没有人能够真正获得胜利。来自南方的阿比奥拉和来自北方的哈吉·贝希尔·托法两位候选人获得允许参加竞选。巴班吉达认为,由于南北分裂和两位候选人都是穆斯林,这次选举不会产生获胜者。阿比奥拉组织了更好的竞选活动,能够战胜北方和基督教徒的对抗。选举前一周,还未出现任何阻止这一进程的重大障碍,但是到选举前五天时,"尼日利亚更美好"协会进行起诉,希望能得到终止选举的指令。尽管该组织并不是一个注册过的组织,但众所周知的是,它是由巴班吉达资助的。尽管创建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法令允许它忽略一些不重要的事项,但是,亲政府的法官在选举前两天出面干涉,"国家选举委员自此无权组织总统选举"。[1] 能说明这一时期混乱局面的一个例子是,拉各斯高等法院法官第二天却又宣布选举应照常进行。

结果,在尼日利亚国家历史上最和平、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中,阿比奥拉赢得了58%的选票,甚至在非约鲁巴地区和他的反对者的家乡(卡诺地区)也获得了大量的选票和广泛的支持。公众对军人政权已经厌恶至极,而阿比奥拉为公众提供了改善经济状况的希望。巴班吉达下一个阴谋是要使此次选举无效,企图通过"尼日利亚更美好"协会、腐败的法官和选举委员会来阻止新总统就职。在选举委员会宣布阿比奥拉获胜之前,巴班吉达在6月23日宣布选举无效,这将国家推向了混乱状态,这种局面持续了5年多。在许多地方,特别是西南方的暴力抗议激发了亲民主运动的发展。成千上万人开始迁回家乡。

选举的废止将国家推向了政治危机的顶峰,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政治危机。民主政治力量失去了解决危机的能力。阿比奥拉的痛苦经历成为他个人,乃至国家的悲剧。对约鲁巴人和其他南部族裔来说,这是北方想要永久地控制权力和石油收入的野心的典型例子。事实上,许多将军和北方的著名政治家都怂恿巴班吉达不要将权力交

---

① *African Concord*, June 12, 1993, p. 12.

给阿比奥拉。因而,族群统治的因素公开显露出来。北方寡头政治代表把阿比奥拉描述成一个危险分子——谣传他将撤销一些官员,推翻巴班吉达的政策和着手进行一个人民党(平民党)计划。但并没有证据证明,阿比奥拉做了这其中的任一项。他本人是军政府的受益者,在从联邦获取的合同中赚了巨额资本。至于他要羞辱巴班吉达,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对巴班吉达有着崇高的敬意,直到选举废止之后他们发生争吵为止。如果有人要探寻阿比奥拉可能会给政府带来哪些变化,那么他最不可能做的就是去挑战北方的利益,但是会改善经济管理。他在投资策略上是很精明的,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将实施长远的革命性的改革。

192

个人的野心对此十分重要。巴班吉达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权力欲望。随后的事件显示出,他的主要副官阿巴查将军也希望能够接替他。阿巴查智力有限,然而,他是个以自己的方式操纵权力的诡计老手。因此,在巴班吉达及他的副官们眼里,阿比奥拉的胜利不仅会导致权力向南方转移,而且会使他们失去对石油收入分配的控制。

尽管选举废止后的余波未止,危机日益升级,但巴班吉达仍企图把持权力,他承诺要改组选举委员会,在总统候选人满足新的条件的情况下再次进行选举。为了激起政党间的冲突,他准许所有"老派"人物参选,以便更多的人进入总统政治的竞技场。为了败坏阿比奥拉的声誉,他指控阿比奥拉与政府存在利益冲突行为,因为阿比奥拉是联邦政府的承包商,政府还欠着他的钱。尽管控诉的阴谋是和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一起操作的,但它并没有公众的配合,而是发动暴力,因而还需要别的策略。在试图劝说他 20 多年的好友阿比奥拉公开声明退出竞选的尝试失败后,巴班吉达诉诸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用一个政党反对另一个政党或一个种族反对另一个种族。在巴班吉达及他的支持者看来,阿比奥拉作为一名约鲁巴人,只想利用权力为他的族群谋福利。政党和军政府分裂,成为种族冲突政治和无能的文官政治家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没有能联合起来保卫民主制度和 6 月 12 日的选举。巴班吉达威胁要废除两个政党和其他的民主机构,除非它们同意举行一次新的

193 选举或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无法维持对社会的统治，害怕政变发生和意识到政治紧张局面在加强，巴班吉达在随意任命了欧内斯特·肖内坎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后，于 1993 年 8 月 26 日辞去了职务。巴班吉达没有能改善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他给国家带来的问题，在他离职后仍困扰了国家很长时间。

# 第十三章　掠夺性的统治 (1993－1998)

临时过渡政府是一个骗局，它缺少合法性、信誉和人民的尊敬。为转变过程付出大量精力的政治家感觉自己被出卖了。肖内坎对权力的控制很无力，以致大部分人嘲笑他是个篡权者、卖国贼和马屁精。由于政府机关不断受到民众示威活动的冲击，过渡政府自始至终都陷入被围困的状态。油价上涨导致许多城市出现了混乱局面，阿巴查将军成为骚乱的受益者，他推翻了临时过渡政府，废除了所有选举产生的国家议会和州议会，解雇了各州的行政长官，解散了所有的地方政府委员会，取缔了所有政党。 195

尽管阿巴查用保护国家的需要为借口，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一直怀有当总统的野心。他并没有什么创新之举：他在政府任职几十年，是巴班吉达的得力助手，参与了这次失败的过渡，他从来没有因为对经济政策做出杰出贡献而为世人所知。许多政治家，包括阿比奥拉在内，都认为阿巴查会将权力交给他们。然而，一些亲民主的人士接受了阿巴查的邀请，到政府任职。这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年里削弱了反对阿巴查政权的力量。一些知名的政治家也进入他的政府，因而再次暴露出尼日利亚政治中的机会主义特征。阿巴查成为国家最糟糕的独裁者和最厚颜无耻的腐败与粗鲁之人。在他统治下，尼日利亚外交政策乱 196

成一团,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遗忘了的国家,生活水平降到了20世纪的最低点。

## 独裁统治时代

阿巴查的掌权改变了政治态势,将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前任驾驭着一个买办的、带有殖民遗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向它的依附者分发财富,而阿巴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授予自己个人独裁的特权,建立了一个掠夺性的政府。像以前一样,政治依靠一个忠诚于军人统治者和庇护人与依附者之间联系的网络。在阿巴查当政时期,除了石油部门和一些长期投资外,政治的长期不稳定让外国投资者失去了信心。向邻国走私成品油、非法的货币交易和专门的投机活动成为最赚钱的经济行为。政治领导人如往常一样为私人目的去挪用公款。然而,这种状况在阿巴查时期进一步恶化。由于对不稳定局势和政府可能垮台的担心,加之政府频繁地将部长和州长职位换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作为对他们的酬劳,造成了一种"蜂拥盗窃"的氛围,不是稳妥地、谨慎地盗窃,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将失去权力,因而快速无情地夺取财富。由于通货膨胀和奈拉的疲软,对于那些想要建造豪宅、开顶级汽车、过奢华生活,甚至通过慈善组织来提高声誉的人来说,盗窃少量资金作用有限。阿巴查对数以十亿计的钱感兴趣,他的效忠者则对数以百万计的钱感兴趣,尽管财政收入在下滑,他们却依然在榨取国家的财富。

阿巴查将权力集于一身,与巴班吉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权力分散的政治布局中,不同层级的庇护人照顾不同层级、地域的依附者)。他不顾及法则和条例,不信守诺言,暗地里签署许多重要文件,戴着墨镜在公众场合露面。他不尊重他的部长们,也不定期召开内阁会议。他缺乏远见和思想,也没有长远规划,他的大部分言论都是关于实施强制统治,而不是政府要为它的人民做些什么。他采用了一个奖赏机制,使他的效忠者可以得到权力和金钱,尤其是在石油部门。然而,在对待国家

197

大多数人时,他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上的,并最终将政府变成了镇压的工具。总统的突击部队羞辱和杀害了他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特工人员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和监督所有所谓的阿巴查的敌人。阿巴查政府没有减轻工会、学生、专业协会和亲民主组织的恐惧,而是对他们进行镇压,破坏他们的活动。阿巴查没有等到政变的发生,因为之前他就对军队进行了清洗。相反,他谎称有人发动政变反对他,动用军队来解雇和监禁官员,惩罚那些他认为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人。1994 年 11 月 22 日颁布的一项严酷的法令——第 22 号令允许阿巴查的特工人员无故地扣押任何人,并拒绝被扣押人与他们的家人、律师见面和参与审判程序。法庭无权审理被错误拘留的人的案件,同时,政府也不需要释放被拘留者,也无需对错抓负责任。

专制统治的后果非常严重。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降为维护专制主义和镇压的工具。警察不再保护人民,而是屠杀和伤害那些反抗阿巴查政权的尼日利亚人,把空余时间用于向摩托车司机或是犯了轻罪的人索取贿赂。在军队里,军官受到恐吓而保持沉默。为了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实力,政府引进外籍人员安插在安全和情报部门。行政部门在国家的政策议题上贡献很小,与公众直接接触的公职人员因为做了一点小事就向公众讨要贿赂。政党即使存在,也没有一个能对政权提出批评意见,司法部也处于从属地位,敢于讲实话的媒体被迫转入地下。

种族问题很复杂。在阿巴查当政时期,阿比奥拉身陷囹圄,这是对他个人以及尼日利亚民主事业的粗暴践踏。对许多南方人来说,这也是北方人统治的典型例子。阿巴查要维护他的个人统治,必须驱逐那些他认为的敌人,因此,需向忠于他的北方人和黎巴嫩人寻求帮助。权力被剥夺的族群成员抱怨他们被边缘化了,要求脱离联邦。

军队作为一个机构和政府统治的代理人都已经失去信誉。尽管公众知道文官政治家是腐败的,但他们还是愿意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军人政权没有给人民带来希望和承诺。除盗窃规模和权力滥用程度似乎略低外,军队领导人在其他方面的腐败程度要远远超过文职官员。　198

国家失去了威望,它疏远了英联邦国家和欧洲经济体,以及许多西方国家。尽管在 1997 年塞拉利昂政变后,阿巴查为其恢复文官统治做出了贡献,但这并没有增加他本人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他此时也在国内镇压民主力量。

这个政权招致了国内外的一致反对。人权问题和民主问题融为一体,催生了反军政府势力、公民自由和亲民主组织,它们虽然在主张和策略上不尽相同,却因共同反对阿巴查的立场而走到了一起。这些组织大多在城市,由精英分子领导,缺乏与草根阶层的稳固联系。虽然它们的联合遭到了失败,且一些领导人有获得声望和引起人们注意的野心,这些都削弱了它们的实力,但它们仍对专制政体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分析其政治经济规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个政权独裁统治的性质。

## 经济和社会

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占到出口收入的 90%以上。资本积累的手段也主要靠石油,因为其他部门都已经垮掉了。壳牌公司继续保持着在尼日利亚石油生产中的支配地位。它在尼日利亚所获得的收益使它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尽管尼日利亚的政局不稳定,但石油公司仍在继续投资,因为它们意识到了其中的巨大利润。在 1995 — 1996 年间,壳牌公司花费了 10 亿美元来更新设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公司,如埃尔夫(ELF)、阿吉普(AGIP)、雪佛龙(Chevron)、美孚(Mobil)和德士古(Texaco)公司也在运营成本上加大了投入。还有一些公司在贮存天然气的工程上与政府合作,而不是将其白白燃烧掉。著名的"液化天然气工程",是一个新增加的财源和能源,尤其是对国内大多数人还在使用木柴来说。

经济衰退和军政府为恢复经济的尝试的失败,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国家和跨国公司的不满。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军政府和壳牌之类的跨国公司完全就是一回事,它们相互勾结起来迫害民众。盛产石油的地区是国家的衣食之源,却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石油工业招募当地人,让他们从事危险的、只能挣几百美元的不体面的工作。随着

199

他们的生活方式——农业和渔业——遭到石油生产的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因石油溢出物和污染而恶化,当地民众开始奋起斗争。仅1993年一年,石油公司因设备和生产方面遭到破坏而蒙受的损失就高达2亿美元。壳牌等公司为尼日利亚警察购买武器,然后双方合谋镇压当地民众。但迫于抗议活动的压力和对生产不时中断的担忧,石油公司开始为周边地区搞福利建设,投入一些钱来促进发展。例如,壳牌公司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和教育项目,每年耗费超过2 100万美元。

彻底揭露石油公司和阿巴查政权暴行的事件是在1995年11月10日由尼日利亚作家肯·沙罗·威瓦和另外8个人发起的。生活在盛产石油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奥戈尼人,多年来其代表一直请求政府在分配石油税收时能公正地对待他们,采取措施阻止因石油生产造成的环境进一步恶化。该地区的50万奥戈尼人认为,他们的土地(650平方公里)生产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石油,但他们却一无所获。1990年10月,他们发起了"奥戈尼人生存运动"(MOSOP),为争取正义、自治和避免环境恶化而斗争。一项人权法案的出台、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和1993年1月动员了大多数欧格尼人的示威游行,激化了社群内部的骚乱活动。政府却把罪名推到"奥戈尼人生存运动"领导人的身上。1994年5月,奥戈尼人4名酋长被抗议者中的一名暴徒杀害,政府将其归罪于"奥戈尼人生存运动"组织,并逮捕了它的9名领导人,包括肯·沙罗·威瓦在内。特别军事法庭判他们有罪,阿巴查顶着国内外的压力将他们处以了极刑。这引起了国际上一系列的抗议,甚至有些来自购买尼日利亚石油的盟友。在国内,这为发动强大的社会运动来反对阿巴查政府提供了又一个理由。从1996年起,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年轻人,尤其是伊乔人,诉诸持久的对抗,有时候是类似于游击战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尼日利亚人民进入了最绝望的时期。民众对他们的领导人、政治状况和军队,事实上对所有的公共机构都失去了信心。媒体和公众开始谈论国家即将毁灭,若要重建则需数十年时间。各个层次的教育事实上已经瘫痪。那些能负担起教育经费的人,都将孩子送往国外。大 200

多数人连一日三餐、买药、建造或维修住房都负担不起，更别说送孩子去私立学校或者去履行预期的文化义务。国家在国际上被孤立了；在国内，基础设施损坏了，政府不能治理腐败、不公平和违法行为。生产效率降到了最低水平，因为许多工人磨洋工，或干脆不干活。通货膨胀又使大多数人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

政治问题将阿巴查政权推向了毁灭边缘，而经济方面似乎也好不了多少。早在 1994 年，政府就放弃了结构调整计划，转而采取一些临时管理措施，导致经济逐步瓦解。官方的政策是国家控制外汇、财政和贸易。外债偿还陷入了困境，不仅履行不了与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时的承诺，而且每年拖欠的负债高达 30 亿美元。1996 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委员会，为国家制定了一个发展计划——“遥想 2010”。这一计划无视国家的现状，似乎政局动荡并不重要；愤怒饥饿的尼日利亚人民可以无视；似乎政府官员都已经不再贪污腐败，一厢情愿地提出要在几年时间里，提升国家地位的宏伟蓝图。充满激愤的公众并不接受这个以及它的主题思想。

阿巴查竭力建立个人统治的尝试进一步破坏了国家经济。他需要控制经济巩固独裁政权。当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提出建议时，他不是无视这些建议，就是将其纳入他的掠夺性机制下运行。他创立了一种新的依附模式，使所有的机构和财务都处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和他的效忠者霸占了经济活动中利润最丰厚的部门。在更低层的政府中，官员的行动策略也如出一辙，把窃取公款当做宏观经济管理的唯一目标。

## 政治的自我演进

似乎是为了安抚政治家，阿巴查在他首次演讲中宣布了一个过渡计划，他承诺去扶持一个真正的、持久的民主制度。他将召集一个制宪会议，允许所有尼日利亚代表来讨论国家的政治未来，提出和睦相处和共谋发展的方案。但这个计划只是他巩固自己权力的一个计谋。似乎先前的宪法、政党和争论都已无效，为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将军，国家不得不进行另一次无谓的冒险。

201

阿巴查不仅阻止了应于 6 月 12 日完成的过渡(还政于民),他还为民主接管制造了新的障碍。先前的领导人都使用拖延手段来延长他们的统治,而阿巴查则蛮横地把自己统治的延长当做军人退出政治后的形式。他提议实施一个民主化进程,其目的是将自己任命为总统,不通过选举,而是通过公民投票。他不打算放弃对军队的控制,他没有自己的政党,也不依赖公众的建议和大众的支持。他以一种缓慢的、但是带有强制性的方式展现了他的计划。在第一年里,他就明确表示不会将权力交给阿比奥拉,而且取消了先前的过渡计划(还政于民)。在巩固权力之后,他解雇了许多内阁大臣,在随后几年里又随意任命了一些州长和部长。

他所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假惺惺地表示过渡(还政于民)事实上还是可能的。他在 1994 年召开了国家制宪会议,对先前的《宪法》进行了小幅改动,但阻止人们考虑军政府的退出和让仍在狱中的阿比奥拉在政府中担任角色。1996 年 10 月 1 日,他被迫解除了参与政治活动的禁令,出现了 5 个获批政党——"尼日利亚统一大会党"、"国家共识委员会"、"尼日利亚国家中间党"、"尼日利亚民主党"、"草根民主运动"。很快,所有政党都认识到,他们必须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否则就有被取缔的危险。政府拒绝与阿比奥拉有联系的政党和亲民主势力进行注册。和巴班吉达的过渡计划一样,阿巴查任命了一个选举委员会,规划了 1996－1998 年两年的选举时间表,来选拔地方议员、州长、国民大会成员和总统。这一过程从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项反民主的法令规定,无论选举胜利与否,只要军政府不接受候选人,它就有权取消其资格。同时,选举委员会的活动也受到阿巴查本人的严密监视。

对阿巴查来说,第二步措施就是决定谁能参与民主进程。他通过驱逐激进分子、亲民主组织和那些他认为反对他的人,缩小了民主空间。以国家的和平和安全为借口,他将政敌都送进了监狱。通过使军队名誉扫地和扶持缺乏民众支持的政党,阿巴查成功地阻止了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因为民众已对民主进程、各级机构及其领导人失去了信心。在这一时期的所有选举中,参与率低得令政府都觉得尴尬。

202

作为控制进程的一个部分，阿巴查不是制造骚乱，就是从那些未解决的问题中受益。国家没有能解决 6 月 12 日的危机，亲民主力量坚持认为他们不会参与任何选举，直到阿比奥拉任职以后。阿巴查想要把分区原则引入《宪法》，但不希望民众议论纷纷。他提出 12 个重要职位：总统、副总统、总理、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将由不同地区的人轮流担任——东北部、西北部、中部、西南部、中东部和南方少数民族——每个地区都有机会产生总统，30 年循环一次。

他的第三步计划是营造一种高压态势。民众如果说他不好，或者对他提出批评，将会遭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特工和警察的报复。他实行的是恐怖统治。在军队里，他在军官之间制造信任危机。他两次控告有反政府的政变。第一次是他虚构的，而第二次则由他一手操纵。这为他监禁直言不讳地对他提出批评的人创造了条件，其中包括前国家元首奥巴桑乔和他的助手雅·阿杜阿，后者死在了狱中。甚至连阿巴查手下的二把手也于 1997 年 12 月遭到了囚禁。阿巴查镇压反对势力，关押或压制批评者，流放了很多人。司法机构失去了应有的权力，因为法官在一些重要的政治案件审理中听从政府的命令。

第四步计划，阿巴查试图强迫大众保持沉默。他知道许多人都处于饥饿状态，于是进口了廉价的牛奶和大米，以他的名义大规模地向民众发放。电视机上也刻有他的名字，甚至纺织品上也印了他的照片。他把一个“支持阿巴查”的圆形小徽章发给公职人员和军官，许多人被迫佩戴。政府声明不与政府合作的将受到惩罚，人们受到了炸弹的威胁，一些人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恐怖气氛。政府削弱了工会运动，用指定的行政人员替换了它的领导人，以阻止反阿巴查集会的召开。因为抗议活动并没有威胁到阿巴查，许多人开始放弃抗争，听天由命，乞求上帝的干预。因为阿巴查的触角伸不到尼日利亚以外的地方，他的反对者在西方通过抗议、集会、发表反对阿巴查的文章，甚至创办秘密的广播电台，掀起了反对他的声浪。

最后一步计划是通过暴力和贿赂，使 5 个政党都提名阿巴查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他并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成员。在意识到自己

不得人心时,阿巴查不再想举行大选,而是直接实行一个通过立法任命自己为总统的计划。操纵政治家并非难事,因为他们大多唯利是图,而阿巴查也愿意给他们利益。阿巴查和他的前任都通晓政府提供给政治家的机会是什么。当政治家之间进行的是“零和”竞争时,不能参政将得不到任何回报。对于政治家来说,作为一个极少从事经济生产的阶层,参政是他们最佳的选择,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自己从国家政治中被排挤出去。即使阿巴查是专制、固执、无礼和粗鲁的,决心获得权力的政治阶层却不能团结起来挑战他。相反,他们将与他合作,摧毁他们中的其他人,以减少竞争对手。

国内外的反对力量向阿巴查政权发出了挑战。许多人因致力于捍卫6月12日的选举而联合起来了。他们呼吁释放阿比奥拉,建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进行一次新的选举。其中最有名的组织是“国家民主联盟”(NADECO),这是一个由政治机会主义者、民主人士、老的政党成员、维护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的组织及个人组成的一个奇特的联盟。另外一个组织是“民主运动”,由劳工领袖、人权维护者和学生组织组成。这两个组织都要求由阿比奥拉来领导政府,结束军人统治。它们组织了一系列的罢工、暴力抗议和示威游行,尤其是在1993年和每年6月12日的选举纪念日。反对力量在一些城市多次引爆炸弹。尽管许多反政府组织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但他们的行动既不能推翻政府,也不能减缓阿巴查的镇压行为。阿巴查又玩弄他的老伎俩来收买人心。他把民主制说成是约鲁巴人企图让阿比奥拉代表本族掌权的民族阴谋。他与其他族群中有野心的政治要人接触,用金钱和合同来封住他们的口。

政治家们与市民社会总是脱节的。当穷人举行抗议活动时,族群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则在耐心等待获取变化可能带来的收益。当学生和其他人对阿巴查政权提出抗议时,许多人失去了生命,而政治阶层的成员则选择与阿巴查政权相勾结,因此,大大削弱了反对势力的力量。 204

正当所有连任的计划顺利实施,并且实施高压统治的政府暗自庆幸自己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恐怖氛围时,结局却峰回路转:1998年6月

8日凌晨,阿巴查神秘地死去。高级军官们部分地是为他的死因不明感到羞愧,部分则是准备为权力而竞争。他们将阿巴查火速安葬,把他的效忠者从阿索岩[①](总统官邸)驱逐了出去,并让阿布巴卡尔接掌了权力。公众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许多尼日利亚人公开地庆祝阿巴查的死亡,这在尼日利亚宽恕死者的文化中是不同寻常的表现。

① Aso Rock,阿索岩是一块裸露的大岩石,高400多米,位于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郊外,是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性物体,总统府、议会大厦和最高法院都位于其附近。Aso在当地语里意为"胜利"。——译者注

# 第十四章　危机处理与向民主过渡

205

阿布巴卡尔将军表现得像一个临时接管人。他没有下决心实施重大的改革,或者对经济、政治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他的政府一再重申其目标,是为国家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文官政府作准备。因为人们对军政府已经失去了信任,于是对阿布巴卡尔是否廉洁、正直表示质疑,尽管他并不爱出风头,也因离开政坛和避免冲突而获得了好名声。他在1998年6月9日发表首次演讲中,对阿巴查大肆赞扬——歌颂他的"创新性领导"、透明的管理工作、诚实、果断和对国家的总体承诺。对于那些将阿巴查的死看做是国家发生变化的机遇的人们来说,这次演讲令他们大失所望,一个月的哀悼期的公告也被忽视了。阿布巴卡尔不得不面对国内外亟待解决的问题:改变破落的国家形象;恢复人们对国家领导人的信心和结束国际孤立局面。他自己并没有时间进行哀悼。

人们认为阿布巴卡尔与阿巴查没有什么区别。但阿布巴卡尔上台后以最快的速度纠正了人们对他的认识。他释放了大量的政治犯,并且放弃了对他们的指控。这些措施安抚了大量的反对势力。他没有向他们道歉,然而,他将这些决定形容为和解的姿态,并力劝他们与他的政府合作。与此同时,他拒绝了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来处理长期的冤情和暴行,或者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的要求。他在高级军官中达成共识:在政策公布之前,通过召

206

集会议来讨论国家事务。他也宣布他的统治时间是短暂的，最初将截止日期定在 1998 年 10 月，后改为 1999 年 5 月。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自我调整与和解”。人权得到了改善，政府不再颁布一些不道德的法令，也不会没有正当理由而去杀人或将人民送进监狱。政府承诺要废除不经审判就拘留人的法令。总的来说，他的政府没有压制自由、政治团体、贸易和专业组织，尽管许多法令并没有彻底废除。

然而，这并不能说他的政府真心实意地处理了所有侵犯人权的案件。一些被判在 1990 年、1995 年和 1997 年煽动政变的人没有获得释放；限制工会的法律没有撤销；政府消极应对公众的抗议；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族群的投诉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一些限制司法机构权力的法令依然有效；监狱的条件还和过去一样糟糕，这反映了人权和人道主义待遇问题。一些州，尤其是在拉各斯州，政府反对工会的要求。当工会领导人要求增加工资，并在 1998 年 10 月举行罢工威胁政府时，州长立即撤销了他的职务，一如阿巴查时代的作法。但工人罢工仍在继续，并从变化多端的政治气候中获得了益处。在其他地方，如果工人的工资没有增加，他们也会以举行罢工来威胁政府。

在阿布巴卡尔上台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不得不在中央政府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里清除阿巴查的效忠者，在军队中将他们的影响最小化，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解散了阿巴查的总统特遣部队，其官员被重新安置或劝其隐退。一些与阿巴查关系密切的官员也退休了，特别是杰里迈亚·乌塞尼将军。他是阿巴查的好朋友，军队中的第二号人物。阿巴查的妻子和孩子受了几个月的监控。效忠阿巴查的政治家发表了认错声明，要拉开与阿巴查的距离，融入新的过渡期。在一些坚持反对阿巴查的地区，拒绝与公众讲和的人遭到了公众的讥讽，甚至人身攻击。以约鲁巴商人哈吉· 埃里塞科拉·艾奥为例，学生们毁坏了他所有的汽车后，将他赶出了伊巴丹大学的毕业典礼仪式现场。阿布巴卡尔重组了内阁，驱逐了阿巴查的核心效忠者，以反映所谓的民族性为原则任命了一批新人。他也任命了一些新的州长(现在称为“行政长官”)。为了制止军队中躁动不安的情绪，他指派了一些军官到重要的

207

政治机构任职,并普遍地提高了军人的工资,还到一些战略要地进行了考察,来寻求与该地区官员的合作。

在阿比奥拉去世前几天,要求释放他的压力加重。亲民主团体和许多国家领导人想让他在新政府中担任某种角色。很显然,只要阿布巴卡尔有办法削弱阿比奥拉的能力,使他不能成为敌对势力的核心人物,他也愿意释放阿比奥拉。国际上对阿比奥拉施加压力,要求他放弃担任职务。各种版本的报道众说纷纭,但阿比奥拉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据报道,他对来访的外国外交官说,他对当总统不再感兴趣了。但是,他的拥护者不承认这一报道,并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接受委任。他在囚禁中死去,其责任最初归咎于政府,直到验尸结果发现并非如此。他的猝死在许多地方引发了大范围的暴动,但由于反政府力量已缺少旗帜性的人物,他的逝世最终结束了政府面临的政治危机。这确保了约鲁巴政治家为了"还政于民"的过渡计划的顺利实施,除了支持阿布巴卡尔的计划外,没有别的选择。种族对权力的操纵增强了,因为大多数族群声称,他们的种族被边缘化了,并受到了别的族裔的剥削。尽管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保持了安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会放弃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能从职务中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利益。

阿布巴卡尔也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他承诺只会保留几个月的执政权,于是终于打动了为此等待已久的政治家来参与议政。他解放了许多政治拘留者,并承诺会释放阿比奥拉(最终仍死在了狱中),于是获得了国内外的支持。通过与各利益群体保持协商,他给人们留下了抚慰者和平易近人的领导者的印象。通过在全国各地的公开露面,他能够在每天亟待解决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

## 腐败

即使没有对公职人员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仍有些发现揭露了阿巴查统治时期腐败的严重性。政府试图收回更多的被盗钱财,以此来满足公众的要求。在搜查阿巴查的得力助手乌塞尼将军的家时,找到了国内外货币几百万美元,还有许多汽车和卡车。在中央银行负责人的家中也搜

208

到了他秘密库存的数百万的各国货币，他声称是为了维护阿巴查的利益而收藏的。在黄金地段还查到了他的 37 栋房子和一个汽车群，这些东西多数被没收。阿巴查的安全事务负责人被要求为拥有的 10 亿多美元作出解释。在阿巴查的家里搜到的钱更是惊人。据揭露，他在巴西、埃及和黎巴嫩存的钱多达 30 亿美元，这是他 4 年执政过程中盗窃的国库资金。一些外国银行与尼日利亚政府合作归还了部分赃物。此外，阿巴查的家人和朋友获得了几个政府机构的巨额合同，控制了天然气的进口，甚至将联邦政府的房子转为私人使用。阿巴查腐败的严重程度甚至连他的同僚都惊讶，尽管他们也不诚实，或从未声明过要诚实。被阿巴查侵吞的资金部分被追回了，但政府并没有对他的大多数党羽进行起诉。

公众对调查结果很愤怒，这也证实了他们一直以来所怀疑的。公众要求对其他的官员进行撒网式搜查，调查前两个政权的呼声强烈。中央政府不愿与公众合作，于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很少对公众作出承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腐败证据暴露出来，政府决定让部长、州长和军官们公布他们的财产。这并不是对他们进行调查，因为他们不需要透露财富的来源，或者在他们离职后再次公布他们的财产。外国公司和尼日利亚政府协作来确认那些盗窃的资产，但这只是针对小部分人采取的措施。部长们被警告，不要把他们的职位看成是“通往一座让人迅速致富的金矿的”许可证。这样的警告似乎并不能让他赢得反腐败战争的胜利。阿布巴卡尔承认：

209

> 对尼日利亚来说，腐败问题并不特殊。任何地方都存在腐败现象。我们似乎在公然指责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他们都是腐败的。与腐败作斗争是尼日利亚人民的责任，以确保我们的工作态度真诚。当人们出去寻求合同，市民社会应该避免行贿。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项措施，我们已经颁布法令，要公开招标来签署合同……腐败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①]

① *African News Digest*, September, Third Week, 1998, p. 9.

石油工业被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败坏了。石油的开采权和加工租赁权授予了那些军政府的高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随着精炼油成为稀缺品，军队领导人的亲密伙伴也就成为主要的进口商。那些没有从这久负盛名的交易中获益的人，将煤油和汽油装舱走私到邻国，他们可以在那里卖到更高的价格。阿布巴卡尔政府停止了授予新的石油开采权的合同，但却没有创立一个廉洁的招标体制。他解散了石油部来减少腐败和其与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的冲突。石油部和中央银行是两个问题最严重的部门。它们无法说明每年 7 亿美元的石油产地使用费的花费去向，另外，每年将石油收益转化为奈拉时还损失9.54亿美元，而且，他们还设立了许多特殊的账目以隐藏收入。

对犯罪行为的审查是项艰苦的任务。尤其是关于贩卖毒品和骗取订金案，即当地人熟知的对外国人不利的"419 罪"[①]。暴力犯罪和抢劫在继续，甚至拓展到攻击拉各斯国际机场和高速公路的豪华大巴上的乘客。由于一些人能够得到枪支，部分甚至是由警察和军队为他们提供，这使得抢劫问题异常严峻，在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连警察自己都公开承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腐败的，并且支持犯罪团伙。[②] 邮政盗窃也是很普遍的，许多被怀疑装有贵重物品的信件被打开、篡改或丢弃了。向没有戒心的买家出售假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快速致富"的文化使得人们甘愿去杀人和赌博。

## 经济

阿布巴卡尔接掌政权时，经济一片混乱。国际石油供过于求，油价大跌，减少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流通中总的货币量也因大量地印

---

① "419"，是尼日利亚一条法律的代号。尼日利亚一直流行一种称之为"419 罪"的国际金融诈骗活动，行骗者大多打着尼日利亚政府高级官员和银行、大公司、高级职员的旗号，使用各种伪造的信笺、票证、证件、文书或者签名等，向素不相识的海外人士寄去数以千计信件，骗取这些人汇付的巨额资金。因这种诈骗活动是尼日利亚政府专门针对各种诈骗活动的尼国《刑法》第 419 条，故称为"419 罪"诈骗活动。——译者注

② Special Supplement, "*Nigeria's Police Force*," *African Today*, October 4, 1998, P. 43.

发钞票而增加，从1985年的40.62亿奈拉，到1997年的1 440亿奈拉。所有的商品，不论进口的还是本地的，价格都极其昂贵。工业缺乏设备和原材料。石油产品缺乏，价格昂贵，使得交通费用上涨到人们无法承受的地步；电力供应不稳定，电话服务断断续续；失业率很高。事实上，由于所有部门原材料短缺和电力电话服务的中断，持续的经济活动是不可能的。由于农业和制造业的萎缩，大多数人们的收入降到了20世纪的最低水平。食品匮乏迫使国家大量进口大米、糖和小麦。食品和石油进口又进一步加重了尼日利亚对别国的依附，依赖于用外汇储备金换取生活必需品。

210

人们希望，规范的政治氛围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并能提高公众的道德修养。阿布巴卡尔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政治重建"，他接受了前任提出的"遥想2010"计划，执政伊始他就表明，经济不会成为他关注的头等重要问题。然而，他也承诺要作出大量的表面性的改变：为许多公司设立董事会，以便它们在一些突出问题上作出决定；通过宏观经济措施来降低通货膨胀；增加国内石油产量；稳定利率。国家优先考虑的是出口石油资源，维修本地遭到破坏的石油精炼厂和供应肥料。1998年，美孚石油公司开始从尼日利亚向美国输送天然气液体（丙烷），这给尼日利亚带来了额外收入的期待。

袭击石油公司及其设施的公众抗议活动和工人罢工运动仍在继续，导致了生产率和出口量的降低。事实上，三角洲地区好斗的青年人和愤怒的农民试图破坏石油供应站及其设备，攻击石油工人，赶跑石油公司，以此来唤起国家对他们贫困和受歧视境况的重视、改善生活条件、在国家和地区政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且补偿石油溅出物对他们造成的损害。袭击行动是成功的，因而也造成了国家普遍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被迫暂时停止，公共财产也遭到了损坏。石油矿产生产发展委员会是一个为缓解这些地区苦难而设立的政府机构，却被控告存在资金管理不善问题。1998年10月，政府向该机构指派了新的董事会成员，希望他们能够在促进发展和使对石油公司的攻击最少化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些石油公司公开要求政府加快出产石油地区的发

展，来阻止更多冲突的发生。同时，他们在保护自身安全上仍然耗费着巨资。1998 年 10 月 17 日，在瓦里附近的杰塞地区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这一地区盛产石油，农业和渔业则很落后。成百上千名穷人希望能从破裂的输油管道中得到点好处，他们拿着小容器去舀取石油，然后到路旁卖掉。就在此时，爆炸和火灾发生，毁掉了整个村庄，700 多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这次事故再一次揭露了：正是贫困驱使着穷苦的村民去盗窃和抗议；当人们受到歧视时，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是激励不起来的；燃料匮乏为小商贩用各种容器贩卖石油创造了机会；医疗卫生服务的欠缺增加了疾病的痛苦；消防人员和警察人员不足在控制火势、拯救生命的过程中效率低下。这次事故更激化了日益加剧的反政府和反跨国公司情绪。盛产石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激进组织将这次事故看成是对他们悲惨命运的麻木不仁的另一个例证，有些人甚至组织起来攻击他们中的政府支持者，肆意破坏输油管道。联邦政府最终承认了石油产地首当其冲地承受了环境的恶化，并承诺寻找创新性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211

在 9 月时，政府宣布要大幅增加联邦工人的工资。无疑，鉴于高额生活费来说，这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决定。可这样做的结果以及其他的公共开支，使得奈拉贬值和利率低下。石油收入减少的同时，为满足公共开支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一套宏观经济政策缓慢地执行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私人经营者和公共企业在交通运输、传媒通讯和能源领域的竞争有了大规模的拓展；外资企业参与了许多肥料生产和石油工业的合资企业；分配更多资金来维修道路和支持公立大学；公开进行合同招标，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与其他政策结合起来，政府的三个经济目标可以概括为：为了更大的贸易而开放尼日利亚边界、削减政府开支和国营企业私有化。

与政界不同的是，经济体对变化的回应更为缓慢。在阿布巴卡尔统治下，经济的主要特征仍然是相当的萧条。尼日利亚成为世界上第十三贫困的国家，这反映在国家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况、国内生产总值不足 2 500 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两位数、年轻人无时无刻不想着 212

要移民国外。制造业和工业产量下降到了20年来最低水平。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仍在继续上涨。财政赤字则通过向中央银行贷款和动用外汇储备来填补。1998年预算显示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这可能归咎于国内公共开支的增加、阿巴查统治下大规模的腐败遗产和原油价格的下跌、国内通货膨胀与奈拉对外贬值的压力结合了起来。不善的管理永无止境,尤其是在信贷市场方面,同时,大量的银行处于危难中。外债依然很高,超过了300亿美元。预算外的开支使得行政长官能继续将资源用于可疑的用途。缺乏问责制和财政责任成为常规;教育质量大幅下降;医院在水、药品和不中断的用电方面供应不足。农村地区一片萧条。人们士气低落,因为许多公共部门的工薪阶层人员被列入了预期的解雇人员行列。同时,工会攻击政府,要求将没有决定性价值和对经济社会没有长远影响的公共企业卖掉。燃油价格的预期上涨趋势让人们感到,政府对贫困漠不关心。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期世界上多数国家进入萧条期,复兴的战略开始强调扩大出口。尼日利亚将成为国外低价倾销各种商品的对象,这些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包括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肥皂、胶水、牙膏、安全火柴和蜡烛等。然而,与同一大陆的南非和埃及不同的是,尼日利亚缺乏拒绝货物和拓展自己的出口货物来增加外汇储备的能力,因为它的制造业和工业部门衰落了,而且国内有太多的贪官,他们可以从进口和走私中获益。尽管存在如此多的问题,但是尼日利亚仍是世界上第六大石油生产国,占据着令人羡慕的地位。

## 国际关系

尽管拥有着庞大的人口和巨额石油收入,但尼日利亚在国际政治中的声音仍然是低沉的。当外国大使和外交官匆忙赶往尼日利亚诱导阿布巴卡尔实行民主化转变时,他得到了西方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的热烈拥抱。仿佛是等待已久的改革之风吹过了尼日利亚。阿巴查的死为西方国家重建与尼日利亚的关系创造了机会。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呼吁尼日利亚应平稳地向民主制度过渡,重建一个尊重人的政府。

213

它们要求释放政治犯，并且派代表到阿布贾讨论未来的政治规划。联合国和英联邦秘书处提出了相似的要求，他们的秘书长仓促赶往拉各斯，为新的开始和“尼日利亚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1]提供建议。

阿布巴卡尔于1998年8月访问了南非，修复了双边恶化的关系。1995年尼日利亚活动家兼作家肯·沙罗-威瓦被处死后，南非呼吁英联邦国家对尼日利亚强行实施经济制裁。阿布巴卡尔不仅通过这次访问向国际社会表示了他将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化的诚意，还宣布了一项外交政策议程。该议程指出，尼日利亚和南非作为两个非洲主要大国和强国，将合力成为“一个权力中心来推进大陆的和平与稳定”。[2] 他为日益增多的、认为非洲国家无法实行自我管理的言论所困扰，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来证明这种观念以及说非洲大陆充满着暴力和战争的认识是错误的。纳尔逊·曼德拉访问尼日利亚，成为双方和解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西非国家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尽管长期以来的冲突依然存在：与喀麦隆在盛产矿产的巴卡西半岛归属上有冲突；与邻国在石油资源走私问题上的纠纷；与佛得角在尼日利亚外出打工者的疾病治疗问题上的争论。尼日利亚对西非经济共同体及其军事武装——和平维持部队(ECOMOG)给予了积极支持。尼日利亚继续维持它在和平维持军中的军队，参与了几内亚比绍实现和平的行动。阿布巴卡尔访问了许多国家，讨论了地区性问题，为保证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的和平继续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98年11月，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互换了巴卡西半岛冲突中捕获的战犯，尽管争论还远没有解决。

1998年9月，阿布巴卡尔出访了许多西非国家，并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他的任务是结束国家的孤立状态、恢



---

① 英联邦秘书长埃梅卡·阿尼奥库(Emeka Anyaoku)的公开发言，1998年6月30日。(参见 *The Guardian*, June 31, 1998, p.1)

② 阿布巴卡尔将军在南非罗本岛的公开发言，1998年8月25日。(参见 *The African Herald*, September 9, 1998, p.11)

复其大国形象和吸引外国投资。另外,他也吸引了流亡国外者回到国内,并且与亲民主组织举行了会谈。

外交努力的结果喜忧参半。从积极方面来看,尼日利亚不再处于国际孤立状态。一些商业联系得以恢复,尤其是英国和南非航空公司重新开通了飞往尼日利亚的航班。英国贸易考察团远赴尼日利亚寻找能源、水、天然气和远程通讯方面的商机。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强加给尼日利亚的制裁解除了。英联邦和欧盟要求其成员国取消它们对尼日利亚的经济制裁和体育仲裁。加拿大重开了其在拉各斯的大使馆;日本捐赠了 120 台水泵,用来与埃努古州和埃邦伊州的麦地那龙线虫病抗争;印度承诺在农业方面给予援助;巴基斯坦则对发展蔗糖工业比较感兴趣;南非在投资远程通讯方面热情高涨。尼日利亚向民主政府的转变也得到了国际支持,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给予了协作,印度提供了立法程序方面的培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国际贷款机构与尼日利亚就减免债务问题进行了重新讨论,另外,在公营企业私有化方面也提供了建议。

从消极方面来看,博得别国尊敬的过程是缓慢的。尼日利亚也无力帮助非洲其他贫困国家。持续的经济困难、全球经济的衰退,使尼日利亚更多地关注南非和为了更大的相互依赖增加了与欧洲国家的共识,这成为其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失败的部分原因。尼日利亚希望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拥有轮换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自己能够提名候选人。但是,国内问题阻碍了这一雄心的实现。由于国内的政治环境和经济衰退,投资并没有达到它的期望值。同时,一些国家直到尼日利亚结束军人当政,并且在遏制走私之后,才同意解除制裁。尼日利亚人出国旅游,在国际机场仍被当做嫌疑犯来对待,似乎他们就是毒贩或者拿着伪造的境外旅游许可证,同时,他们在寻求庇护时受到了虐待。尼日利亚仍是个债务国,它寻求取消债务和延期偿还的努力并不受欢迎。为了满足各债权国的需要和吸引外资,政府追求的是民族主义色彩很淡的议事日程。精明的跨国公司和小的外国公司正是抓住了它这一弱点,去探测那些接受快速开发的地区。

215

## 过渡时期的政治

国内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被破坏的经济，而是军政府如何交还权力。在许多人看来，阿巴查的死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机遇。阿布巴卡尔政权接受了国家的民主化要求，并承认先前的努力已经被政治体制、行为体和机构的操纵所破坏。他充分认识到他的前任违背了他们的诺言，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向人们保证他向民主制度转变的宣言是真诚的。媒体人士和政治阶层提出的重要建议包括，要在军政府领导人和各种族群之间展开广泛的对话，并且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阿巴查时期建立的 5 个政党想仅仅改换一下门庭，但亲民主团体要求将它们全部取缔。对军政府的批评之声日涨，许多人要求他们交出权力。在早些时候，人们希望阿比奥拉能够获得释放，并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不是担当总理就是国家的领导人。

在所有的建议里，调解所有种族关系的民族团结政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军政府对此并没有接受，并争辩说，这是不民主的。为了安抚民众，政府承诺要创建一个反映国家特色的联邦内阁，并且在几个月内将权力转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政府也拒绝恢复 1993 年 6 月 12 日的大选中阿比奥拉获胜的选举结果。政府认为，该选举是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切实际的。随着阿比奥拉的去世，政府再没有任何必要来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尽管它的理由并不令人信服。

阿布巴卡尔的话起初受到了挑剔的精英分子的质疑，但他抓住每次机会来宣称，自己将于 1999 年让渡权力。他甚至警告同道官员不要梦想着未来进行政变。他说军人统治对尼日利亚来说并非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他也敦促有抱负的政治家要善治，并且在没有军队参与的情况下解决他们的争端。与他的前任不同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极少干预，并允许选举规则来发挥作用，与重要的政治家保持距离。公众对这一转变计划的反对之声渐渐轻了下来。其中最主要的一支反对力量是来自反阿巴查联盟的残余分子，由民主运动主席贝科·兰塞姆·库蒂博士领导。他试图召集一个民族会议来讨论联邦体制的重组和制定一

216

部替代现行法令的《宪法》。在贝科看来，阿布巴卡尔不值得信任，因为他曾经在阿巴查手下做事，他与巴班吉达关系密切，又来自北方，这一地区已经支配国家权力很多年了。

1998 年 7 月，政府解散了 5 个现存的政党，并允许新的政党形成。之前由 5 党竞争选出的地方政府被宣布为无效，唯一的行政长官由中央委派，来管理地方事务。政府解散了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INEC)，而由负责新政党的注册、汇编选民名单和指导选举的新的委员会取而代之。一个详细的过渡时间表被公布：

| | |
|---|---|
| 1998 年 | |
| 9 月 24 日 | 公布临时注册的政党 |
| 10 月 5 日—19 日 | 选民登记 |
| 12 月 5 日 | 地方政府选举委员会进行选举 |
| 12 月 23 日 | 提交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人名单 |
| 1999 年 | |
| 1 月 9 日 | 州长和州议会选举 |
| 1 月 20 日 | 公布总统和国家议会选举的指导方针 |
| 2 月 12 日 | 提交总统候选人名单 |
| 2 月 13 日—15 日 | 甄别与选拔总统候选人 |
| 2 月 19 日 | 总统候选人助选活动结束 |
| 2 月 27 日 | 总统选举 |
| 3 月 6 日 | 如果国家议会和总统需要，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竞选 |
| 5 月 29 日 | 竞选出的总统进行宣誓就职仪式 |

与先前不同的是，注册过的政党将是临时性的，仅存在几个月。真正的考验是在地方政府选举委员会选举投票中的表现。只有当一个党在至少 24 个州的每个委员会中赢得 5%选票，并且在全国 2/3 地区设有办事处，它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党。另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是，国家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修改阿巴查统治时期制定的《宪法》。而在法规最后定下来之前，就爆发了政治性抗议。人们期望能有一个小型的委

217

员会来组织一次全国性辩论，就总统制宪政在许多地方需要进行的改革给予建议，包括：分区管理是否恰当；总统、多个副总统职位的更替；以及在不同种族和宗教反对北方人统治和其成员，尤其是少数民族族群受歧视的背景下，寻求一个培养民族归属感的最佳办法；寻求解决军事政变发生的可行性办法。然而，问题在于，大多数尼日利亚人民没有修订《宪法》的权力，因而也就不能提供什么有意义的建议。

随后的政治活动表明，国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第一条策略是个很普通的招数：复兴旧的政党，正如“尼日利亚统一大会”改名为“尼日利亚人民党”。这样做是容易的，因为它们在该地区有政治网络和行政机构，已经存在的政治家想要保持他们的影响力。

第二是恢复种族政治，因为每个种族群体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在南方，其目标是阻止北方人对政治的统治。南方的政治家认为，他们的权力被剥夺得太久了，于是提议实行政治分权，包括解散军队和对《宪法》进行修改，使权力转向南方。一些南方政党的领导人想要与北方结盟，以便在总统从南方产生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一名约鲁巴政治家建立了“人民统一联盟”，作为一个以约鲁巴人为基础的政党。伊格博领导人宣布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条件，包括向他们的地区分配执掌实权的职位和呼吁遵守公平、平等和法治的原则。在一次广受欢迎的演讲中，伊格博人的领袖之一奥朱古，以他典型的好斗风格发表了以下评论：“……自从我们被宣布在战争中失败以来已经 28 年之久，正是由于失败，他们不间断地刮我们的鼻子对我们进行羞辱……我们不再去要求被赦免或接受。我们遭受苦难的日子太久了。”[①]

如果说伊格博人是恼怒的话，那么约鲁巴领导人则是痛苦的。他们希望阿比奥拉能够担当领导重任，但他的死亡却使约鲁巴人陷入了混乱中，一些族群自始至终都在为脱离联邦而活动。总部设在美国的　218

① 埃梅卡·奥朱古(Emeka Ojukwu)，《在伊格博人会议上的演讲》，1998 年 7 月 24 日。(参见 *The African Herald*, Vol. 9, No. 8, August 1998, p. 10)

奥杜杜瓦后裔协会[1],不仅搞了分裂活动,甚至还提出了《宪法》草案。北方的目标是要么阻止权力向南方转移,对任何意图这样做的《宪法》条款都称其不民主;要么资助一名他们认为会效忠北方的南方政治家。一个批判性的声音在北方出现,认为国家的疾痛应由军政府和一些政治家来负责,他们需要的是一位有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部落首领。因此,少数民族主张实行两头政治[2]。

人们对这个看似全新的开始充满了热情。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这样的一个领导:能够考虑穷人的疾苦;能够推进平等、正义、诚实、责任感和鼓舞国民。10 月份的投票人登记结果是令人难忘的。然而,这项工作显示了政治制度的衰败,因为一些政治家为了操纵以后的选举购买了选民证,也有许多人不止一次地登记。同时,登记过程本身也被许多地方的总体效率低下和选民证不足而破坏。尽管有这些不法行为,但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继续实施它的计划,为有抱负的政治家指明了方向,剥夺了不合格的候选人的权力,并采用了一些使欺骗行为最小化的选举方法。

在这段时期里,26 个政党提交了注册申请,9 个获批。它们是:“民主联盟党”(AD),它要求实行道德驱动下的政治和一项福利计划,由许多反阿巴查的团体组成,成为中间偏左的政党;“人民民主党”(PDP),是由退休了的、富有的军事将领统治的中间政党;“全民党”(APP),是由许多支持阿巴查的人组成的一个中间偏右的政党;“民主与社会正义运动”(MDSJ),是由先前的警察局长穆罕默德·优素福领导;“民主进步运动党”(DAM),由通吉·布雷思韦特领导,他是拉各斯的一名律师,经常与其他政治家分道扬镳;“人民救赎党”(PRP),由一些左派人士领导;以及“国民团结运动党”(NSM)、“联合民主党”(UDP)和“统一人民党”(UPP)。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些没有获批的人则抱怨他们受到了歧视。

---

① Egbe Omo Oduduwa,约鲁巴语,意为“奥杜杜瓦的子孙们的协会”。——译者注

② “两头政治”是指一个政权归两个统治者的政府。——译者注

政党的大量出现,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创立者想要在竞选中获胜,而是因为它们想要在权力争夺上进行讨价还价,要么加入已注册的政党,要么协商合并。一些小的政党合并了起来,形成了6个大的政党。值得注意的是,PDP和APP都是由资深政治家控制的。在权力分配的讨论中,许多人宣称了"真正的联邦制",希望各州和种族群体将得到很明确的权利、义务、平等和安全。可大多数政治家都在追求个人的野心,花更多的时间"操纵董事会",而不是对政策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没有考虑过如何才能培育一群可信赖的政治家、有助于民主运作的机构,或独立而正直的司法部门。借用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话来说,政治家们仍被看做是一个贪婪的阶层,他们狂热、贪心,有着唯利是图的秉性。大多数政党都是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它们无法通过推行具体的政治纲领,无法对社区和工人的抗议活动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将它们与别的政党相区别。事实表明,它们没有在经济活动中投入宝贵的时间,而仅仅希望政治能提供奶牛,它们可以从中挤奶。在一些选举政党候选人的初选会上,竞争蜕化成了暴力事件,这成为未来民主进程的一个坏的征兆。

219

像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这样退了休的军事将领,亚历克斯·埃库乌米之类的政治家(第二共和国的副总统)和先前的州长博拉·伊盖,以及像加马利亚·奥诺索德和奥卢·法莱尔之类的著名高级文官,都为了总统职位向新成立的政党开出了价。其他的政治企业家也加入了,很显然他们是想引起公众注意,至少是为了确保未来能获得政治职位。权力的竞争主要是对那些先前在政府工作过的人和已经拥有物质财富的人很有利,退休将领在易于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被迫与资深的政治家竞争或合作。这两个集团都必须耗费巨资,似乎职位是向最高竞买人出售的。因为许多人在先前的中央政府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于是,金钱成为腐败的政治机器的润滑剂。他们没有向群众描述各种竞选纲领和施政计划,而是通过提供物质利益,如纺织品、自行车、牛奶和现金来购买选票。因为每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试图削弱别人的力量,此时尼日利亚似乎徘徊在平静的暴风眼,在

为即将到来的飓风作准备。

第一轮选举在 12 月 5 日举行，为 774 个地方政府议会选举议员。由于担心许多政治家会购买选票或以别的方式来操纵选举，选举提前了。在一些地方，如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冲突正在进行。许多族群宣誓不会参与其中。政府设法阻止可能出现的不法行为，封锁了与 4 个邻国的边界地区，以防政治家招募外国人来为他们投票。大约有 2 000 名外国观察员获得了对选举进行监督的权利。9 大政党都进行了合作，因为它们的选举表现将决定它们是否有资格参加 1999 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尽管一些小的、激进的亲民主组织采取了抵制行动，但政党动员大多数拥护者参与了投票。

220

与阿巴查任期内举行的选举不同的是，结果比先前的更好，显示了政党是活跃的。尽管在敌对党的效忠者之间发生的冲突中有 15 人丧生，但总的来说选举还是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失败的政治家们则指责选举中的贿赂行为和骗局。3 个政党在选举中表现出色，分别是：PDP、AD 和 APP。剩下的 6 个党在未来的选举中可能会遇到取消资格的危险，于是，它们可能需要与别的大政党寻求合作。AD 得到了西南地区约鲁巴人的大力支持。一个强有力的迹象显示，一个政党如果不与别的政党合作，即使它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也仍是个地区性的政党。APP 是 3 个党中最弱的，它的未来可能依赖于与另一个政党结盟。PDP 表现出色，这增加了它的候选人赢得总统职位的可能性，它也得到了北区和东区的支持，是所有政党中最具全国性的政党。它可能会设法削弱 AD 以增强本党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如果它变得过于强大，并且赢得了权力，那么为了作为一个支配性的大党存活，它可能会退回到一个腐败的家长式专制体制，以此来奖励它众多的领导成员。种族集体投票、地区联盟和金钱，成为在剩余的选举活动中获胜的 3 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奥巴桑乔尽管在约鲁巴人民中不受欢迎，但他在 1999 年最有可能以总统的身份出现。他展现了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形象，他的政党资金充足，他还得到了许多北方领导人的赞助，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位亲军方的、保守的和高效的人。

文官共和国会维持多久？一方面，尼日利亚已经声明军人统治导致了专制主义和管理不善，这增强了国家实现民主化和要求军人退出政坛的呼声。另一方面，国家也同样显示了文官统治造成的混乱局面和腐败现象，这又激发了军人对政治的干预。这是这个寻求持久稳定的体制中一对尖锐的矛盾。

## 余绪：1999 年大选



本书付梓之时，尼日利亚国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选的走向，尤其是总统之位的归属。在第一轮选举中，PDP 明显领跑了参、众两院的选举，获得了最多数量的州长之位。1999 年 2 月，人们的注意力转而开始关注 2 月 29 日[①]开始的总统选举。因为奥巴桑乔已成为最强大的候选人，他的对手们就不得不想尽办法来首先减弱他在本党中的影响力，然后再试图在选举中击败他。奥巴桑乔成功地募集了大量竞选资金，并获得了退休军官们的支持。AD 和 APP 结成了联盟，共同推选了一位总统候选人——奥卢·法莱尔酋长。选战和选举过程使得两位候选人的支持者互相仇恨，虽然双方都是约鲁巴人。奥巴桑乔没能化解本族群中大多数人对他的敌意。他们彻底拒绝为他投票。

奥巴桑乔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整个选举过程极不规范，可能存在舞弊行为。于是他的反对者公开抗议，国际观察家们也认定选举实际上并不公正。但因为双方应该都存在作弊行为，因此我们也很难知道选举结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如果公正严明地进行的话，结果又会有多大差别。军队接受了选举的结果，奥巴桑乔则承诺要建立一个公正的、致力于国家发展的政府。刚一上任，他就启动了环球访问，在国际上到处为尼日利亚寻求友情和支持。奥巴桑乔的知名度很高。20 世纪 70 年代末他就曾担任国家元首，但后来却归隐田园，著书立说，也协助调解非洲的各种纠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他在国际上威望很高，还曾经是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主要候选人之一。

---

① 原文如此，但 1999 年 2 月无 29 日。——译者注

1995 年时,因被莫须有地指控密谋发动反对阿巴查将军的叛乱,他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1998 年 6 月获释。此后他开始再次投身国内政治。

展望大选结束后的未来,仍然困扰着尼日利亚人的问题包括:这次是真的民主了吗?军队会在多长时间里不干预政治呢?经济状况会得到改善吗?关于未来,与其说尼日利亚人充满希望,不如说他们充满疑虑。虽然人们对结束军人统治迎来文官政权多少是欢迎的,但这届政府产生以来的政治过程仍然充满了过去的种种弊病:金钱无处不在的作用;老的政治派系仍然牢牢控制着政治过程;泛滥的选举舞弊行为;以及军队(还包括退休的将军们)仍然广泛的影响力。



尼日利亚此后的紧迫任务是,在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衰退、军队专政和腐败泛滥之后重建国家。尼日利亚军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划清与政治的界限——如果他们不实现职业化而一再把触角伸到政治领域中来,那它就会再次动摇尼日利亚的政治体系。石油收入滥用终结,往届那些腐败不堪的领导人受到传讯对自己的财产做出说明——这样的迹象并没有出现。

# 后记：困难和挑战

尼日利亚现代史是一部令人忧虑的历史，其特征不是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国家，而是未能克服政治动荡和经济落后这对孪生难题。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个思想开放的知识群体，以及一群勤劳的民众，国家没有理由发展得如此糟糕。 223

尼日利亚作为一个贫穷国家跨入新千年之时，它的发展状况甚至比它在 1960 年取得独立的时候好不了多少，它的人民变得迷茫和失去信心。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出国谋生。大批失业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其他人则求助宗教获得慰藉。石油财富没有被好好利用，以降低对单一出口商品依赖的影响，积累大量的国内资本和吸引外国投资，并促进总的生产能力和社会资金的增长。一个成功的生产者阶层尚未出现，因为接近权力总比靠薪俸过活更有利可图，或者参与贸易、石油储运、走私、土地投机、货币兑换、毒品买卖，或从事其他欺诈性活动也更发财。严重依赖进口的地方工业继续在苦苦追求硬通货，而外国投资依然基本限于石油工业。

尼日利亚不仅将财富砸在那些毫无成效的工程上，而且总体上管理不善，分不清发展的轻重缓急。它竭力要把自己打扮成非洲的巨人和黑人种族的领袖。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在经济上回报甚小，一家耗资 90 亿美元的钢铁厂结果证明毫无效益，6 家 224

汽车厂生产不出什么汽车,并且新首都阿布贾的建设也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收入。石油产生的美元没有被投资到国际资本市场以获得高额的回报,同时在国内投资既常常难以为继,也不能产生效益。国家收入除了石油外别无他途,在石油市场萧条时,缺少其他替代商品。

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充满生气和受过教育的民众,以及非洲最大的石油储存,尼日利亚变成今天这样可悲的景象,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殖民后遗症、领导人腐败、政治独裁、政府无能、石油收入管理混乱、体制性腐败、政治集团对种族关系的操控、漫长的军人统治、赢家通吃的"零和"政治,以及外部势力的剥削等等。迄今为止,国家没能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特别是设计出一种能遏制滥用权力和真正从军人执政到民主政治转变的机制。石油收入使国家能勉强维持下去,并让民众对未来心怀憧憬。然而,石油财富使极少数政治阶层享有高度的政治操控权,同时在践踏大多数人的权利。

政治对尼日利亚发展的作用十分关键。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发展是不可能的。政治家们的目的让人疑虑:获得权力是为了得到劫掠财富的手段,而不是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军队无论是作为一个安全保障机构,还是作为一个政治管理者,都已经信誉扫地。民主,尽管自身有很多问题,但它提供了一条值得寻求的途径。然而,尼日利亚的民主制必须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如果不重视裙带关系问题,权力只是简单地从军人转移到民选政府手中,不可能长远地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问题,以及改善不断下滑的经济。

## 尚未解决的问题

迄今为止,国家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对人权的保护、《宪法》维护、结束军人干政,以及通过改善经济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25

首先是经济。依赖石油而带来的收入不稳定将继续给计划制订和经济发展造成难题。多年来,一些跨国石油公司控制了工业,并且付给国家的特许税在一般标准之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家就合同

重新谈判，增加了讨价还价的能力，并且参与了石油开采的大部分阶段。然而，它还没有获得对生产的全部控制以及价格决定权，还需降低对跨国公司的依赖，获得相关技术，并实行经济多样化。

来自进口税和消费税等非石油部门的收入，不足以弥补衰退时期石油收入的下降。在尼日利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是农业养活了民众和政府。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3种农产品——可可、花生和棕榈油——仍占出口收入的大部分。尼日利亚是世界上第二大可可生产国和棕榈油及花生的主要生产国。但从70年代起，由于新的来自石油的收入、计划不周、对农民缺少激励政策，以及实施粮食进口战略，农业地位下降了。

联邦政府行使分配石油收益的权力。州和地方政府缺少资源来维持自己，结果为了分享石油财富，它们不得不接受联邦政府的控制。在不产石油的州，分得石油收入才能使它们在有限的地方资源之外，将公共开支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没有一个州对分享收入的规则感到满意，因为每个州都想得到更多。在那些生产石油的州看来，"产地原则"将给它们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才体现出公平。缺乏石油的州则高谈需要运用财政政策来整合国家，不愿意支持任何重新分配石油收入的动议。出产石油的州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因为它们不能控制事情全部，而且它们往往是少数族裔，它们抱怨种族统治也是有根据的。中央用于奖励和惩罚的权力过大。可以理解的是，即使从控制石油收入而言，对中央政权的争夺自然激烈。无力解决经济问题造成了许多相关的危机。例如，导致了通货膨胀，其他的还有：生产率低下、收支逆差和对外依赖。通货膨胀造成了政治和社会动荡，增加了发展的成本。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失业、进出口贸易的走私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各级政府都得过且过，用一些误导的统计数据和花言巧语来欺骗公众。 226

在20世纪上半叶，尼日利亚依赖农业，养活了它庞大的人口，还出口了各种作物以获得收入。但从60年代起，农业衰落了。农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66年的10.5%，降到了1973年的3.5%。石油取而代之，占外汇收入的90%以上，占政府总收入的90%以上，占

GNP 的 50%以上。

再来看政治问题。分裂和内战的条件依然存在,政治争夺的是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和什么时候得到。当国家采用联邦体制时,中央权力很大,使各州自治成了天方夜谭,而非现实。当多数人要求建立民主政府时,军政府却拒绝交权。要求民主的那些人希望选择的执政方式多种多样,选择范围从多党制到一党制或者零党政治,每种方式都存在问题。巴班吉达政府通过立法确立了两党制,但是他未能消除两党之间很大的意识形态差距,政治实际上已经退化成南北双方或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意见分歧。

抛开政治模式和《宪法》不说,存在的主要政治问题是如何在彼此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分配财富。占有支配地位、拥有资产的集团,已经通过权力积聚了财富,它们慢慢转向保险业、银行业、建筑业、制造业和其他先前由外国企业控制的部门。这个小团体知道,一旦失去权力,就意味着会失去财富。它们是财富的掠夺者,而不是创造者,它们执掌政权的目的不是为多数人,而仅仅是为一小部分人谋取利益。随着经济的衰退,对权力的竞争更加激烈。人们最想获得的权力是掌握石油开采许可证的发放和插手联邦财政。

政治行为体分为不同的集团。其中最主要的是军人,他们从 1965 年以来就控制了权力,其间只有 1979 — 1983 年短暂的时期除外。军人执政的高度专制和武断,对国家来说很危险:它反对实行民主,并且高度腐败,这耗费了国家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如果说政治家腐败贪婪,那么军政府多年来浪费性的管理不善,已经使军队名誉扫地,使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选择民主制。下一个行为体是政治家,他们主持了两届失败的共和国,并且自 1970 年以来,在所有的过渡计划中他们都争权夺利。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得到的是钱,而非为国家服务的机会。

227

其他集团积极寻求参政的途径。公职人员们渴望恢复昔日的影响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赞成军人统治,因为军政府授予他们在管理中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总体上被冷落;苦于教育部门的不受重视,许多人离开了尼日利亚,剩下的人整天忙于生计。最后是一些传统的酋长

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有钱又有权，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还想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也有一些人主张共和主义与君主政体的结合。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执政当局感到有必要通过操控酋长们来控制公众。

现有的得到和维系权力的方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常常使国家走向倒退。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武力，一些将军在政变中取代了另一些将军。尽管他们在风格上、诚信度上和负责任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观念都是一样的。当人们指责军人缺少文化知识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军政府开始创建自己的大学，举办高级研讨班，邀请嘉宾演讲。军政府也受到种族政治的影响，在部队征兵和晋升时有时实行配额制。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军队一直由北方人掌控，在民选政府时也是如此。由于政治中包含着长远利益，就会不断产生一些实质性的争论。后来，西南地区的部族领导人征召了地方军队，显然是为了促成分裂。

接下来最重要的途径是对种族的操纵。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在创建联盟、协会和政党时是有效的。它可以采取南北分裂，或者伊格博人反对约鲁巴人的方式。撇开政党的因素，种族是一个难题。政治领域纷繁复杂，要形成跨越壁垒的纽带非常困难，常见的仍是本种族的抱团。只要有本种族的人参与，该种族就会宽容领导人的不公，为他们的腐败辩护，容忍管理失误。新州创建后，州的数量达到了 36 个，还有更多的想建立，但并没有像预期那样解决了种族冲突问题。只要还是中央政府向各州拨款，人们就会认为，要想获得更多的资源，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再裂分现有的州，以便增加每个州所分享的联邦收入份额。然而，种族认同跨越了州界，政治活动能够很容易地唤起人们对村社和种族的忠诚。

228

第三种得到和维系权力的方式是操控宗教，强调种族的差异性。在北方，伊斯兰教一贯被用来统一该地区，对抗国家的其他地区。伊斯兰教为促进北方统一、维护已有的特权和动员民众反对南部政治家及其要求提供了工具。从 1978 年起，北方因为要求实行伊斯兰教法——

"沙里亚法"以及对世俗国家的排斥,造成它与国家其他地方的差异。要求的核心是:穆斯林不应该生活在一个世俗的州里,或者政府应该根据伊斯兰教法统治穆斯林,而不是殖民时代遗传下来的基督教法规。在基督徒看来,这个要求是用伊斯兰教法来团结穆斯林的一个策略,是使尼日利亚向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转变的前奏。

最后,在军政府的允许下,平民百姓被组织进政治协会和政党中。政党操控宗教和种族,通过媒体来宣传他们的观点。总之,各个政党的主张都大同小异,限制了他们在个性和行动风格上的不同。政治信仰根据需要而变化,不再一成不变。当一个政治家通过选举不能获得权力时,只要军政府对他们有利,他们立即就会投靠。

## 展望未来

政治联盟伴随着新、老成员对权力的角逐将继续分合不定。各级政府将继续争夺对石油收入的分配。权力的社会基础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工人、企业家、承租人和地主们的要求各不相同。尽管精英们将继续控制着权力,但却受到了来自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要求的挑战。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向上流动机会的减少,国家将会经历频繁的骚乱,一些人要求进行革命,另一些人则对整个社会结构构成威胁。

军人的威胁会依然不断。军队享有的影响力和权力与它在防务上所扮演的角色不相称。它将继续要求满足它的整体利益。对于要求军队承担一些有益的社会职能的建议,遭到军队的一概否定,而政治家也不会始终允许军人进行统治。军人退出政治还是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军队已经打破了它的诺言,两个共和国都是短命的,以后出现的可能也不会持续很久。军队做不到保持政治中立。种族和宗教造成的分裂,以及官员们对金钱和权力的贪婪,对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防止政变的《宪法》条款遭人践踏,军队将继续对平民百姓实行专制统治。由于管理不善和腐败,军政府的官员们已失去了人们的尊重,军政权将继续受到公众的嘲讽。阻止军人干政的唯一办法并非是司法体制,而应通过对非法政权大规模的、勇敢的反抗,才能建立一个满足民众需要

229

的、好的民主政府；而国际合作也必不可少，在军人当政时，国际社会应勇于取消对这种政府的经济支持，甚至必要时全面抵制尼日利亚的石油和其他出口产品。

随着数百万人失去土地和失业，又得不到适当的住房、教育和休闲的机会，社会紧张局势将会日益严重。由于富人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穷人们将会索取“国家蛋糕”中本应属于他们的份额，以求实行较公平的分配。穷人的对抗将会通过武装抢劫、贩毒和其他犯罪行为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必然结果，国家很容易发生暴力事件。穷人将会通过暴力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一个由非法领导人统治的、动荡的国家，将会通过暴力来维持秩序和遏制民主的兴起。与西方民主的稳定性相对比，试问：为什么在尼日利亚，各个亲民主的团体不能团结起来？为什么政治家要继续屈服于军人的高压统治之下？为什么像巴班吉达和阿巴查这样的将军一个人能将 100 万军人的命运控制在他们手中？答案只能是，尼日利亚是一个家长式专制统治的国家，它有着反民主的特征，无论谁统治国家都不能容忍许多反对力量的存在和其他强有力的领导人的出现；国家不会因为使用高压统治和暴力手段来打击反对力量而感到羞耻；政治官员习惯于获得财富，一旦获得就会想尽办法保住所得，而那些没有财富的人就会考虑怎样谋求权力以获得财富。选举和政变都是获得财富的手段，并非实施政策的机会；许多富人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身份，或者经济才能，而是因为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支持。

只要国家的政治准则不变，尼日利亚将仍然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当政治目标是使自己致富的时候，强盗政治就成了政治范本；当无权就很难做成事的时候，民众就会向往着特权和权力；当经济被政治化的时候，参与者就会用行贿的方式希望得到惠顾。建立一个不可分割的尼日利亚迄今尚未获得全体民众的认同，也未形成一个稳定的民族主义。当民众拒绝效忠政府，而政治阶层又是一帮强盗时，发生积极的、迅速的变化是很困难的，这个国家一个不变的信条是：“人人为自己，而上帝恩惠于大家”。

230

尽管尼日利亚在内部分成几个部分,但只要石油继续流出,它就可能继续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联邦体制将得以保留,因为它使那些掌权的人得以将资源转移到他们的地区和口袋里。联邦体制下的尼日利亚为政治家的运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使外国势力能够操控国内的掌权者,并迫使弱小的州向中央寻求帮助。但因为宗教和种族分裂,民众对特权的反感,以及民主制的失败,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仍将是一个问题。只要国家难以实现民主和满足联邦各个组成部分的需求,政治制度仍将表现出不稳定性。鉴于军人对权力的痴迷,可能会有更多的军官发动政变和进行反政变活动。然而,赞成民主的力量也将进一步加强,以此来对抗持续不断的军人统治。公民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随着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克服,将会动员更大的力量来对抗专制主义。

尼日利亚还有巨大的、可以拯救自己的资源。它仍旧是西非地区的强国和主要的地区经济体,能从改进了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运作中受益。它庞大的人口仍然是其重要的"财富",勤劳的人民将会继续追求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要达到预期的结果很难。只有当军人彻底地回到兵营,政治领导人遵循职业规则和遵守《宪法》,实现公平而又自由的政治竞争,只有当市民社会发展到能足以阻止对民主制度的颠覆行为,能迫使政治领导人把权力用于改造社会的时候,积极的变化才有可能出现。

# 尼日利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桑尼·阿巴查少将(Abacha, Major General Sanni,1943－1998)** 231

尼日利亚多起政变的发起者。1962 年开始军事生涯,后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1984 年晋升为少将,1985 年任陆军参谋长。1993 年,自任国家总统。在他统治时期,国家经历了专制和经济衰退。

**莫舒德·阿比奥拉酋长(Abiola,Chief Moshood,1937－1998)**

生于阿贝奥库塔,曾在此就读高中。后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成为一名会计师。1965 年,他加入国际电话电报有限公司,后晋升为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副总裁,尼日利亚分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后来发财致富,并引起争议,也是该国主要的慈善家。他的企业涵盖报纸出版、面包、航空运输、石油钻探和图书贸易等行业。在第二共和国期间,他是尼日利亚国民党的重要成员,但 1982 年他因为被阻止参加总统预选而退出了该党。20 世纪 90 年代,他在社会民主党(SDP)的平台上东山再起,在 1993 年赢得了总统选举,但军政府取消了这次选举结果,后来阿比奥拉在监禁中度过了人生最后几年。

**阿布杜勒萨拉米·阿布巴卡尔(Abubakar, Abdulsalami,1942－ )** 232

出生于明纳,1963 年作为军校学生加入尼日利亚空军,1966 年转

入陆军,第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在担任过不同职位后,他于 1991 年晋升为少将。3 年后,他被任命为国防总参谋长,一直到他 1998 年成为国家元首。

**齐努阿·阿契贝(Achebe, Chinua,1930 — )**

非洲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著有:《崩溃》(*Things Fall Apart*)、《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不再轻松》(*No Longer At Ease*)、《神箭》(*Arrow of God*)、《大草原上的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等许多作品。他出生在尼日利亚东部的奥吉迪,在伊巴丹的大学学院获得学位。1954 — 1967 年间,他当了一名播音员,后进入恩苏卡的尼日利亚大学当了一名教授。他获得过许多大奖和荣誉学位。尼日利亚其他著名作家还有:布奇·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西普里安·埃克文斯(Cyprian Ekwensi)、文森特·艾克(Vincent Ike)、约翰·佩柏·克拉克(John Pepper Clark)和派厄斯·奥基格博(Pius Okigbo)等。

**桑尼·埃德(Ade, Sunny, 1946 — )**

尼日利亚居居音乐的一位国际明星,混合使用约鲁巴人的和西方的乐器。1963 年,刚满 17 岁时他开始了职业生涯,在作词、作曲和乐器使用上不断创新、变化。大约在 1930 年,随着滕德·奈廷格尔(Tunde Nightingale)和一个五人乐队组建,居居音乐兴起。20 世纪 40 年代时,引进了电吉他,50 年代时加入了说唱鼓。在 50 年代晚期和 60 年代,通过使用手风琴和变换各种韵律,I. K. 戴诺占据了舞台。桑尼·埃德从模仿戴诺开始,但后来通过使用吉他转变为奈廷格尔的演唱风格。到 1967 年,他成为只有埃比尼泽·奥贝(Ebenezer Obey)可以与之媲美的明星。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一个接着一个。1974 年,他自创品牌来录制唱片。随着他的歌曲在欧洲和美国录制,他的音乐走向国际。他现在仍然保持着创造力和活力,从约鲁巴文化和当代政治中汲取创作灵感。

**西米恩·埃德博(Adebo, Chief Simeon, 1913－ )**

一位资深的行政官员、外交官和律师。他于 1948 年取得律师资格,担任过高级公务员,1961 年擢升为西区政府文职部门的首脑和秘书长。1962 年他成为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968 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和联合国培训和研究所的执行理事。1970 年他回到尼日利亚,接受过各种任命,如多个委员会主席,以及国家政策与战略研究所主席。尼日利亚其他的著名行政官员还有:阿德巴约·阿德德吉(Adebayo Adedeji),他是一名教授,担任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一职很多年;阿金·马博贡杰(Akin Mabogunje),一位受到高度赞誉的地理学家和多种奖项的获奖人,包括双博士学位;丘库梅卡·阿尼奥库(Chukwuemka Anyaoku),曾担任过英联邦的秘书长。



**约翰逊·阿圭伊-伊龙西少将(Aguiyi-Ironsi, Major General Johnson, 1924－1966)**

1942 年加入尼日利亚军队,1953 年晋升为上尉,1956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尼日利亚时他担任武装侍卫。1958 年晋升为中校,1961 年担任陆军准将,1965 年,他升为少将,担任尼日利亚军队总司令。1966 年,他成为国家第一位军事元首,但仅在位几个月。

**阿金托拉酋长(Akintola, Chief S. L. ,1910－1967)**

一位有争议的政治家,1959－1966 年西区的总理,后在第一次政变中被杀。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行政官员、律师和演说家。他是政党“行动派”(AG)的最早成员之一,50 年代在中央立法委员会工作,1955 年成为“行动派”的代理主席。1959 年阿沃洛沃在竞选国家总理时,阿金托拉继任为西区总理。此后不久,他和阿沃洛沃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导致 1962 年的一场重大危机和 1963 年在西区实施紧急状态。阿金托拉的政治理想是与北区结盟,这也成为他麻烦的一个根源。他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政党——“尼日利亚全国民主党”。他被指控操纵 1965 年 10 月的选举,以此重新得到权力。他的奥格波摩苏

(Ogbomoso)民众对他仍然非常忠诚。今天,坐落在这座城市的州立大学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奥巴费米·阿沃洛沃 (Awolowo, Obafemi, 1909 — 1987)**

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律师、作家、商人、民族主义者、记者和约鲁巴人的英雄。他是最早认真考虑尼日利亚宪法该如何制定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很多书中对此都作了细致的论述,如《尼日利亚宪法思想》(1968 年)。他在 1948 年建立了一个文化组织“行动派”,它在 1951 年时发展成一个政党。1949 年他创办了每天发行的《尼日利亚论坛报》,这份日报目前仍在发行,成为他所在政党的喉舌。1954 年他成为西区总理,在任职期间,他推行了免费初等教育,使得他大受欢迎。1959 年,他在联邦总理的竞选中失败,但是成了议会中反对党的领导人。1962 年,他被错判犯有企图推翻联邦政府的叛国罪,被捕入狱,直到 1966 年被军政府释放。此后到 1971 年,他一直在政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 1979 年和 1983 年的总统竞选中都未能成功。他被授予许多领袖头衔和荣誉学位,1982 年荣获了国家最高荣誉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勋章。在他的幕僚中,后来有 5 位成为政治家,均担任了州长职务,他们是:安布罗塞·阿里(Ambrose Ali)、博拉·伊盖(Bola Ige)、迈克尔·阿贾辛(Michael Ajasin)、拉蒂夫·贾坎德(Lateef Jakande)和比西·奥纳班乔(Bisi Onabanjo)。

234

**纳姆迪·阿齐克韦(Azikiwe, Nnamdi, 1904 — 1996)**

出生于北部宗盖鲁的一个伊格博人家庭。他曾就读于几所教会学校,后做了两年小职员,直到 1925 年去了美国,在那里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作为一名成功的记者、出版商、企业家、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阿齐克韦是尼日利亚激进民族主义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从事民族主义事业,利用报纸从事反殖民主义运动。1954 — 1959 年期间,他担任了东区的首任总理,1959 — 1960 年任联邦参议院主席,也是国家第一位名义上的总统和总督。他从来没有退出过政坛。

在1979年和1983年的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中，他参与了竞选。《非洲的复兴》(*Renascent Africa*，1939年)和《我的奥德赛》(*My Odyssey*，1970年)是他最有名的著作。在他漫长而又积极的人生中，他获得了许多荣誉学位、酋长头衔，并在1980年荣获了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大统帅勋章。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国家机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优素福·阿约·巴巴洛拉(Babalola, Joseph Ayo, 1904－1959)**

耶稣使徒教会(Christ Apostolic Church)——一个意图摆脱白人控制的独立教会的创始人。该教会以"阿拉杜拉"(双手交叉祈祷)著称，在尼日利亚建立的其他许多教会则强调祈祷和虔诚的崇拜。巴巴洛拉受托宣讲福音，周游西非各个城市进行传道和平息纷争。他否定土著宗教，销毁它们的崇拜物。他的教会迅速发展壮大，其成员还走出尼日利亚建立传教团。尼日利亚其他的著名先知还有乔赛亚·奥西特卢(Josiah Ositelu)、加里克·布拉德(Garrick Brade)和阿波斯托尔·奥巴达雷(Apostle Obadare)。

**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少将(Babangida, Major General Ibrahim G.，1941－ )**

他生于尼日尔州的明纳。高中毕业后，他于1963年参军，之后担任过许多职务。1984年成为陆军参谋长。第二年，他在政变之后担任了国家总统。1993年辞去国家领导人职务后，他仍然在国家政治中发挥影响力，希望能选立一个国王，最后再自立为王。

**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爵士(Balewa, Alhaji Sir Abubakar Tafawa，1912－1966)**

尼日利亚首任总理。生于包奇州的塔法瓦巴勒瓦镇。曾就读于师范院校，后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在20世纪40年代，他完全投身于政治。1947年入选拉各斯立法委员会。两年后，他和别人共同创建了一个文化协会，后改为"北方人民大会党"(NPC)，巴勒瓦任副主席。他担任

过一些重要职务：公共工程部长(1951－1954)、交通部长(1954－1957)和政府总理(1957－1966)。他的友好举动使英国对他产生了好感，授予了他许多荣誉：1952年被授予英帝国四级爵士勋章；1955年获英帝国骑士勋章；1960年获英帝国二级爵士勋章，1961年入选英国枢密院。

**“萨杜纳”艾哈迈杜·贝洛(Bello, Ahmadu, the Sardauna, 1910－1966)**

生于索科托州，是奥斯曼·丹·福迪奥的孙子，是20世纪来自北方的一位著名政治家。1938年他竞选索科托州苏丹失败，但被授命为“萨杜纳”(Sardauna，战争领导人)。1949年他代表索科托州参加了北方众议院，是“北方人民大会党”的创建者之一。1954年成为北方总理。尽管他有可能当选为尼日利亚总理，但他选择呆在北方，而让他的副手塔法瓦·巴勒瓦到拉各斯担任了总理，而他本人几乎成了事实上的领导者。北方第一所大学由他的政府创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去世后，他的名字成了一个符号，他的追随者仍然尊重他。

236

**穆罕默德·布哈里少将(Buhari, Major General Muhammad, 1942－ )**

1983－1985年任国家元首。他出生于道腊，中学毕业后，他于1962年参军，第二年提升为少尉。他出任过不同的指挥和参谋职务，并于1975年担任了东北州的军事领导人。1976年，他出任联邦负责石油和能源的部长，一直到1979年。

**亨利·卡尔(Carr, Henry, 1863－1945)**

出生于拉各斯，他的父母曾是获释的奴隶，从英国迁居到塞拉利昂，后移居尼日利亚。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是尼日利亚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之一，也是塞拉利昂福拉湾学院第一个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管理人员，曾在立法委员会任职，1918－1924年任拉各斯殖民地的特派代表。他倡导教育改革，修建了一座大型的私人图书馆，其存在时间超过了他的寿命。他对殖民统治的批评

并不强烈，这让 20 世纪 30、40 年代年轻一代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不满，他们把他看成是英国人的朋友。他荣获过名誉博士学位和英帝国骑士勋章。

**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Crowther, Bishop Samuel Ajayi, 1809 – 1891）**

探险家、传教士和英国圣公会在尼日利亚的第一位非洲人主教。他约在 1821 年被抓为奴隶，但是运载他的奴隶船只被截获，他被释放。在塞拉利昂临时居住期间，他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并在正教传教会(C. M. S)接受了教育，获得大学文凭。1844 年被任命为牧师后，他成为一名全职的传教士，被派往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亚，他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并且将《新约》翻译成了约鲁巴语。因为与白人传教士在政策上产生冲突，他于 1890 年辞职。他曾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现在成为教会的一个圣徒。另外一个著名的牧师是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 1836 – 1917)，英国圣公会的第二位非洲人主教。作为一名民族主义先驱，克劳瑟主教是拉各斯精英分子的领袖，他批判帝国主义，呼吁非洲教会实行自治，让非洲人得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肯尼思·戴克（Dike, Kenneth O., 1917 – 1983）**

237

他曾在塞拉利昂福拉湾学院就读，后就读于英国达勒姆大学、阿伯丁大学和伦敦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位。他的著作《1830 – 1885 年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是非洲新一代历史学家中最早的学术著作之一，很好地再现了非洲过去的辉煌。他是尼日利亚的一位历史学教授，为考古委员会和国家档案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60 年，他成为该国最早的大学——伊巴丹大学的第一位尼日利亚人校长。他的事业因内战而被打乱。内战期间，他迁往美国哈佛大学。尼日利亚其他著名的历史学家包括：雅各布·埃德·阿贾伊(Jacob Ade Ajayi)、阿迪埃莱·阿菲格博(Adiele Afigbo)、博兰莱·阿韦(Bolanle Awe)、巴拉·奥斯曼(Bala Usman)等教授。与戴克同时代的埃尼·恩乔库(Eni

Njoku, 1917－1974),是一名植物学家、大学管理者、政治家和三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获得者。

**多米尼克·埃坎德姆(Ekandem, His Eminence Dominic, 1917－ )**

出生于克罗斯河州伊图的奥比奥伊比奥莫族。他曾就读于天主教学校,1947年起任牧师,1954年成为助理主教,在1963年成为西非第一位天主教主教,1977年当上尼日利亚第一位红衣主教。他获得过许多崇高荣誉,如英帝国骑士勋章和尼日尔骑士勋章。尼日利亚在20世纪还出现了其他著名的神职人员,包括大主教奥卢布恩米·奥克杰(Olubunmi Okogie),他打着尼日利亚基督教协会的旗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动员基督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红衣主教弗朗西斯·阿林兹(Francis Arinze),他可能是下一任教皇的最合适人选之一。

**塔斯林·伊莱亚斯(Elias, Dr. Taslim O., 1914－ )**

一位杰出的法官、法学家和行政官员。他于1947年进入法律界,是第一个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尼日利亚人。之后,他在多个学校任法学教师和研究员,1960－1972年担任国家检察总长和司法部长。1972年他成为首席大法官,1975年被派到海牙国际法庭,后成为庭长。他也扮演了其他重要角色,获得了许多博士学位,出版了几本有影响的法学著作。其他著名的法学界人士还有:1958－1975年任最高法院院长的阿德托昆博·阿德莫拉(Adetokunbo Ademola)、1975－1979年任首席大法官的达恩利·亚历山大(Darnley Alexander)、1972－1975年任检察总长的纳博·格雷汉姆-道格拉斯(Nabo Graham-Douglas)(来自河流州)、1975－1976年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的罗蒂米·威廉斯酋长(Rotimi Williams),以及著名的民权律师加尼·福韦欣米酋长(Gani Fawehinmi)。

**安东尼·埃纳霍罗酋长(Enahoro, Chief Anthony E., 1923－ )**



出生于埃多州的乌鲁米。从培养精英人士的拉各斯国王学院毕业

之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44 年成为《尼日利亚南方守卫者报》(*Southern Nigerian Defender*)的编辑。他也为其他报纸担任过编辑职务。他是"行动派"的创始人之一,1951 年赢得了西区众议院的选举。之后,他进入联邦众议院,提交了"1956 年政府自治"的提案。他是 1953 — 1960 年间历次制宪会议的著名代表。20 世纪 50 年代,他担任了西区的部长。当"行动派"成为反对党时,他任该党在 1959 — 1963 年间对外政策发言人。他与阿沃洛沃一起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被投入监狱,直到 1966 年戈翁当政时才获释。之后,他成为中西区的重要领导人,1966 — 1975 年担任联邦政府的部长。1993 年总统选举被废止后,他成为反对军人政权的主要力量,并在流亡欧洲和美国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动。

**雅库布·戈翁(Gowon, Yakubu ,1934 — )**

生于中部州的潘克欣。1954 年参军,1963 年晋升为上校。第一次政变后,他成为陆军参谋长;第二次政变后,他开始执掌国家大权,担任了军队总司令和国家元首(1966 — 1975)。他的政权见证了内战和石油带来的繁荣。在他统治期间,州长们都是强势人物,比如阿德因卡·阿德巴约(Adeyinka Adebayo)少将是西区的领导人,后来成为一名文职政治家和商人。政权被推翻后,戈翁流亡到了英国,注册成为一名学生,并于 1984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民主化过程中,他试图重返权力宝座,但在奸诈的政治领域,他缺乏金钱、机敏和自己的关系网。

**弗朗西斯·阿卡努·伊比亚姆爵士(Ibiam, Sir Francis Akanu, 1906 — 1995)**

出生于伊莫州的温瓦纳,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和政治家。他曾在英国接受教育,1936 — 1966 年在卡拉巴尔州从事医生职业。他也参与政治活动,1949 — 1952 年曾任立法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委员。另外,他也在教会中扮演重要角色。1958 — 1962 年担任尼日利亚基督教理事

会主席,在 1961 年世界基督教大会上任共同主持人。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他任尼日利亚东区的总督,内战期间任奥朱古上校的特别顾问。他获得过 4 个荣誉博士学位,还荣获了国家尼日尔大骑士勋章,并被英国和天主教会授予爵士爵位。

239

**阿尔万·伊科库(Ikoku,Alvan,1900－1971)**

出生于阿罗丘库,受过教师培训,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1928 年,他通过函授学习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哲学学位。1931 年,他创建了一所私立高等学校——阿格雷纪念学院(the Aggrey Memorial College)。他积极参加尼日利亚教师工会(NUT)的活动,另外,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还是南方各省的教育委员会、东尼日利亚众议院和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他在 50 年代时试图进入国家层面的政坛,未能成功。但他作为尼日利亚教师工会的主席而出名。他的一生奉献于教育事业,设法提高教师素质、建立学校和为穷人设立私人奖学金。除了获得一项荣誉博士学位外,他还被尊为民族英雄,头像被印在了 10 元奈拉的纸币上。

**欧内斯特·伊科利(Ikoli,Ernest,1893－1960)**

出生于河流州的布腊斯,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高中毕业后,他在《拉各斯每周记录》做助理编辑。1921 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非洲信使》(*African Messenger*),1926 年他成为《每日时报》的首位编辑,该报是尼日利亚几十年来最有影响的日报。两年后,他创办了《每日邮报》(*Daily Mail*),同时为另一出版商兼任《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编辑。他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在 1941 年和 1946 年赢得了立法委员会的席位,1941 年又担任了尼日利亚青年运动(NYM)的主席;之后,又成为尼日利亚铁路公司的公共关系顾问和广播服务业的主席。与他同时代的名人还有:科福沃若拉·阿巴约米爵士(Kofoworola Abayomi),一位医学博士和政治家,在 1938 年任尼日利亚青年运动的主席,以及埃德耶莫·阿拉基贾爵士(Adeyemo Alakija,死于

1952年),一位成功的记者。另一位让人尊重的记者是哈吉·巴巴滕德·乔斯(Alhaji Babatunde Jose),他在1941－1975年间扬名于《每日时报》的不同岗位上,并在1980年获得了一个荣誉博士学位。

**迈克尔·伊莫杜酋长(Imoudu, Chief Michael, 1902－ )**

出生于埃多州的奥拉,是一流的工联主义者和政治家。1928年,他在尼日利亚铁路部门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最初是一名劳工,后成为车工。1932年他与其他人一起创立了铁路工会。1941年他成为一个混合的工会——"非洲公职技工联合会"(ACSTWU)的副主席,该工会包括尼日利亚非洲海员工会、P. & T. 工会和公共服务部门工会。他的活动让他的老板和英国政府心神不宁。他于1943年被解雇和拘留,在1945年的抗议活动中才获得释放。同年,他领导了全国性的大罢工。他是"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党"(NCNC)的成员,同时他又作为尼日利亚劳工大会主席领导着工会运动。即使在独立后,他在许多工会活动中仍起着积极作用,一直到1976年他被军政府辞退为止。两年后,他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他作为激进党的领导成员继续参与政治活动。

240

**塞缪尔·约翰逊牧师(Johnson, Rev. Samuel, 1846－1901)**

出生于塞拉利昂,1857年随父母移居拉各斯。他竭尽全力地在约鲁巴人中布道。他的声望源自他的著作《约鲁巴人史》。该书手稿完成于1897年,但直到1921年才出版。这部长篇巨著涉及非洲人如何用他们自己和欧洲人的语言开始记录口头传说,重构过去和思考他们民族的进步,这是这方面最早的也是最好的著作之一。

**哈吉·阿米努·卡诺(Kano, Alhaji Aminu, 1920－1983)**

一名教师、政治家、行政官员和两个左翼政党的创始人。他漫长而显赫的政治生涯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为穷人的利益大声疾呼。在1948－1953年间,他领导了"尼日利亚教师协会"。他与保守的北方政

客分道扬镳,建立了北方人进步联盟,在1950－1966年间担任该党领导人。1959－1964年间,他出任联邦政府的副秘书长。他想同南方政党结成联盟驱逐"北方人民大会党"(NPC)的努力没有成功。他在军人统治时期成为一个明星人物,1967－1974年担任部长。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他是总统候选人。卡诺的国际机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在北方继续坚持传统的、激进政治的同伴是巴拉拉贝·穆萨(Balarabe Musa),1936年出生于卡杜纳州的卡亚。穆萨作为"人民救国党"的成员而成名,在1978年当上了卡杜纳州的州长。在州立法大会被反对党"尼日利亚国民党"控制后,穆萨卷入了长期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冲突中,导致他在1981年被弹劾。

241

**托马斯·兰博(Lambo,Thomas,1929－ )**

出生于阿贝奥库塔州,曾在伦敦受过精神病医生的培训。1950年他在阿罗医院神经疾病科做专科医师,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966年,他成为伊巴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和医学院院长,1968年担任了大学校长。他是一位国际性人物,担任过许多职务,如西非医检理事会的主席、非洲精神病医师协会的创立者和会长、非洲科学理事会主席(1965－1970),1965－1968年任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UNESCO)执行委员会委员,1968－1971年任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后任副总干事)。在他获得的许多荣誉中包括荣誉博士学位、英帝国骑士勋章和1970年的"塞拉西非洲研究奖"(Selassie African Research Award)。

**弗雷德里克·卢格德爵士(Lugard,Sir Frederick,1858－1945)**

一名经验丰富的英国殖民行政官员。在拥有作为士兵和条约谈判者等各种经历后,他在1900年被派到尼日利亚。他领导了对尼日利亚北部的征服。1907－1912年他曾到中国香港任职,之后又回到了尼日利亚。1914年,他将尼日利亚南、北保护领地合并,成为间接统治政策的主要理论家。他于1919年退休,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英

属热带非洲的双重统治》。他在书中认为,英国在非洲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他在尼日利亚的继任者中出名的有:唐纳德·卡麦伦(Donald Cameron,1872－1948),1931－1935年任总督;亚瑟·理查兹爵士(又称米尔沃顿爵士),1943－1947年任总督,他为《宪法》的修订奠定了基础,该《宪法》最终导致尼日利亚独立。

**赫伯特·麦考雷(Maculay, Herbert,1884－1946)**

他于1923年创办尼日利亚国家民主党,该党是参加竞选的第一个重要政党。麦考雷是著名传教士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的孙子。作为一名工程师和新闻记者,他是一名令人尊敬的领导人,激起了人们民族主义意识。他捍卫拉各斯酋长的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坚决反对1908年拉各斯的《自来水费法案》。他创办的《拉各斯日报》(*Lagos Daily News*),被当做其政党的宣传喉舌。对英国人和他的批评家来说,麦考雷显得缺少风度和粗鲁。他视自己为民族主义者,但因为有两项犯罪指控,他不能参加竞选,不得不扮演一名“国王制造者”的角色。1946年他不幸去世,来自各地的人们纷纷赶来悼念,充分显示了他受欢迎的程度。他的活动为他赢得了“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的美誉,他的肖像被印在了纸币上。

242

**穆尔塔拉·拉马特·默罕默德(Mohammed, General Murtala Ramat, 1938－1976)**

1975－1976年间任国家首脑。1957年他应征入伍,1961年晋升为少尉,在部队从事行政工作,在内战期间领导了分裂活动,在1971年升任旅长。1974年任政府部长,一年后成为国家首脑。他在一些地区被视做英雄,包括拉各斯国际机场和一些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同时他的肖像也被印在一种纸币上。

**谢蒂马·蒙古诺(Monguno, Shetima,1926－　)**

出生于博尔努州的蒙古诺,是任期最长的国家内阁部长之一。他

通过培训成为一名教师，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在博尔努地方当局任教育秘书。作为“北方人民大会党”的一名活跃分子，他担任第一共和国和戈翁政府的部长。另一位著名的卡努里人是资深政治家哈吉·瓦齐里·伊伯拉希姆，第一共和国的部长和政党领袖，曾是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

**帕特里克·丘克乌玛·恩泽奥古少校（Nzeogwu, Major Patrick Chukwuma, 1937 — 1967）**

他父母是伊格博人，但他成长于北部的卡杜纳，在那里上学念书。1956 年，他作为一名学员入伍，10 年后成长为一名少校。他和其他人一起发动了国家的第一次政变。当政变成功地终结了第一共和国后，恩泽奥古和他的同谋者们并没有掌控政权。他最初被联邦政府拘禁，后被奥朱古上校释放。在比夫拉战争期间他站在比夫拉一边。对很多人来说，他是铲除第一共和国政客的英雄。而对北方的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恶棍，杀害了著名的“萨杜纳”贝洛。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将军（Obasanjo, General Olusegun, 1937 — ）**

1975 — 1979 年间的国家首脑。他于 1958 年参军，1963 年进入工兵部队，后来成为工程兵司令。在战争期间他遏制了分裂，并在 1970 年接受了分离主义者的投降。1975 年后，他的命运变化莫测：在那年的 1 月，他被任命为联邦政府部长；7 月，他被任命为军队的参谋长，并在 1976 年 2 月成为国家首脑。1979 年，他从部队退役，过着农民、作家和资深政治家的充实的生活。1980 年他被授予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大骑士勋章。他经常以建设性的方式大胆地批评政府。在阿巴查执政时，他被错误地指控为犯有“政变罪”，被判处长期徒刑。1998 年他被新的军队领导人释放，得以参与政治，竞选总统。

243

**奥杜梅古·奥朱古（Ojukwu, Colonel C. Odumegwu, 1933 — ）**

一位著名政治家和百万富商路易斯·奥朱古之子。奥杜梅古是第

一批拥有大学文凭进入军队的人之一。他于1957年参军,在1963年成为陆军中校,1967年被任命为东区的军事首领。他是内战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比夫拉共和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总统。1970至1982年间,他处于流亡中,直到被总统特赦。从那时起,他一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但结果让人失望。

**奥卢芬米拉约·兰塞姆-库提夫人(Ransome-Kuti, Mrs. Olufunmilayo, 1900－1978)**

一位女权捍卫者和政治家。她出生于阿贝奥库塔,在1919年前往英国之前,她进了该市的一所中学。在英国,她学习音乐和家政。回到阿贝奥库塔后,她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和牧师伊斯雷尔·兰塞姆-库提结婚,后者是著名神职人员卡农·乔赛亚·兰塞姆-库蒂(Canon Josiah Ransom-kuti)的儿子。1948年,兰塞姆-库提夫人动员阿贝奥库塔的妇女建立了"埃格巴妇女联盟",成为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妇女联盟发动的一件著名事件是抗议阿莱克("城镇统治者"之意)强制推行粮食贸易规定而造成民众生活的不利。阿莱克在1948年被赶走,随即政府对行政管理进行了改革。兰塞姆-库提活跃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NCNC),在1947年作为唯一的妇女代表抗议《理查兹宪法》,在该党拥有行政职位。她因为代表妇女利益而出名,并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尼日尔爵士和列宁和平奖。 244

兰塞姆-库提夫人的公公,卡农·兰塞姆-库提(1885－1930)是一名教会领导人和阿贝奥库塔受人尊敬的长者。她的孩子同样很有名,其中最出名的是费拉·阿尼库拉波·库提(Fela Anikulapo-kuti,1937－1997),他是"非洲节拍"的发明者和国内最驰名的音乐家和国际明星。在20多年里,费拉是军队的重要批评者,被数次投入监狱。他的音乐兼具独创性和独特性,将非洲节奏与爵士及布鲁斯音乐糅合到一起。他在拉各斯的俱乐部拥有近40位音乐家和舞蹈家,是他不断举办音乐会和脱口秀的主要场所。另一位著名的儿子是贝科·兰塞姆-库提,一位医学博士和政治活动家。由于被错误地指控参加了1994年的政变,

阿巴查将他投进监狱,直到 1998 年才被释放。

**哈吉·谢胡·沙加里(Shagari, Alhaji Shehu,1924[①] — )**

1979 — 1983 年任尼日利亚总统。起初他是一名教师,1949 年加入“北方人民大会党”,完全投身于政治。1954 年,他当选联邦众议院议员,1958 年任议会秘书长,并在 1959 年成为政府部长。1967 — 1970 年间他出任州的专员,随后再次被任命为联邦部长,直到 1975 年。此后,他从事秘密政治活动,成为“尼日利亚国民党”的重要成员,并参加总统竞选。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更擅长于做具体工作,而不是制订令人振奋的政策。他的副总统是受人尊敬的伊格博人亚历克斯·埃库乌米酋长。

**沃尔·索因卡(Soyinka, Wole,1934 — )**

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非洲人,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他是一位批评家、政治活动家和剧作家。他是反对阿巴查政权的一位重要代言人。他的著作包括《杰罗教士的考验》(*The Trials of Brother Jero*)、《路》(*The Road*)、《译员》(*The Interpreters*)和很多诗集。作为天才作家,他除了写过各种类型的作品外,还做过演员和舞台导演。约鲁巴人中也产生了其他著名作家,其中之一是阿摩斯·图图奥拉,通过他创作的许多作品,约鲁巴民间故事从约鲁巴语翻译成英语,从而被众人所知,最有名的是《棕榈酒鬼》(*The Palm-Wine Drunkard*)。像 D. O. 法贡瓦(D. O. Fagunwa)一样(他主要用约鲁巴语进行写作),图图奥拉把他的读者带入魂灵和精灵们的世界。

245

**约瑟夫·塔卡(Tarka, Joseph,1932 — 1980)**

他是来自中部蒂夫的著名政治家。他是中部联合大会党的创始人和主席,该党主张建立中部州。1954 年他赢得联邦众议院的选举,将

① 一说出生于 1925 年 2 月。——译者注

他的政党带入当时的制宪会议中。他与南方政党结盟的努力取得有限的成功。1967 年,军政府建立了贝努埃高原州,塔卡出任联邦政府的部长。他在 1974 年离职,但后来以“尼日利亚国民党”党员的身份重新参与政治活动。他担任参议员一职直到去世。

**提努布女士(Tinubu, Madam,1805 — 1887)**

19 世纪一位成功的女商人和领导者。她出生于阿贝奥库塔,最初在巴达格里从事盐、烟草和奴隶买卖。1846 年阿基托耶国王被罢免后,前往巴达格里,接受提努布的帮助。在他重获王位后,提努布跟随他前往拉各斯,在那里她变得有权有势。阿基托耶死于 1853 年,王位由多苏姆继承,提努布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导致民众对国王太软弱的指责。在与拉各斯富裕移民的一次斗争失利后,她被从拉各斯赶走,重返阿贝奥库塔。她再一次从事贸易和政治活动,在 1864 年成为“伊亚洛德”(Iyalode),即阿贝奥库塔地区所有妇女的首领。她现在被人们看做女英雄,在拉各斯有一座以她名字命名的广场,并在阿贝奥库塔为她建了一座纪念碑。其他著名女性还有阿杜尼·奥卢沃莱(Aduni Oluwole)、奥索马里的奥姆·奥卢维(Omu Oluwei of Osomari),以及奥尼沙(Onitsha )。

**奥斯曼·丹·福迪奥(Fodio, Uthman dan, 1754 — 1817)**

出生于西北部戈比尔的豪萨州,一位富拉尼人牧师、传教士、多产作家,发起 1804 年圣战社会运动的领袖。他反对对穆斯林的迫害、过度的赋税和受教育的富拉尼人在政治中受到排挤,这些是丹·福迪奥组织反抗的一些原因。他被任命为“信仰者的领导人”,于 1804 年发起圣战运动,到 1812 年一个伊斯兰国家出现。英国人利用索科托哈里发进行间接统治,这也为北方统一于现代尼日利亚打下了基础。丹·福迪奥的一个著名儿子是艾哈迈杜·贝洛(1797 — 1837),他在 1817 年继承自己的父亲为苏丹。作为一名学者和战士,贝洛能够将哈里发政权集中于中央统治之下,并实行有效的管理,直到他去世。19 世纪另两

个具有决定性的宗教人物是穆罕默德·法-卡拉米(1779? —1835)和伊本赛义德(1840? —1898)。法-卡拉米将博尔努皇帝从索科托的圣战主义侵略军中拯救出来,并建立新的王朝来代替塞法瓦王朝。哈亚图,丹·福迪奥的曾孙子,他在 19 世纪 80 年代重新燃起激进的马赫迪主义运动。1881 年,他宣布自己为马赫迪(被选择用来纯洁伊斯兰教的弥赛亚),并负有赶走异教徒使命。他没能建立起新的政治王国,但他的思想成为抵抗英国人的意识形态。

# 精 选 书 目

以下推荐书目并不意在一一列举相关文献，但它确实提供了许多可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有概况方面的，也有研究各个专题的。有些书可能普通读者看不到，许多不错的论文则因篇幅有限没有收录。

关于该国独立前的详细历史，以及 20 世纪 60、70 年代所做研究，参见论文集：O. Ikimeed., *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 (Ibadan: Heinemann, 1980). 有关独立后的尼日利亚，有编纂的 10 卷本：Tekena Tamuno, *Nigeria Since Independence: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Ibadan: Heinemann, 1989). 现在看有些过时，但 M. Crowder's *The Story of Nigeria* (London: Hutchinson, 1971) and O. Arikp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igeri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对研究尼日利亚 1945 年之前历史仍有用。E. Isichei, *A History of Nigeria* (Harlow, England: Longman, 1983) 有深入的分析. 还有每年出版一本的 *Africa* (Guildford, England: Dushkin)。

有关尼日利亚的重要书目综述作品有：C. C. Aguolu, *Nigeria: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00 —1971* (Boston: C. K. Hall, 1973); E. Baum, ed., *A Comprehensive Periodical Bibliography of Nigeria, 1960 —197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5); M. W. Delancey and E. L. Normandy, eds., *Nigeria: A Bibliography of Politic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s Angeles: Crossroads Press, 1983); O. G. Tamuno and G. A. Alabi, eds., *Nigerian Publications, 1950 –1970*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J. Daloz, *Le Nigeria: Société et Politique* (*Bibliographie*) (Bordeaux 1: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1992)。

旅游参考和基本信息可参见 H. D. Nelson, *Area Handbook for Nigeria*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University, 1972); H. D. Nelson, *Nigeri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University, 1982); and A. Oyewo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Nigeria* (London: Scarecrow, 1987)。对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进行反思的一篇文章: Toyin Falola, "Africa in Perspective," in Stephen Ellis, ed., *Africa Now: Peopl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James Currey, 1996), pp. 3 – 19。

**第一章**

尼日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很快,很多事情都无法预料。对了解最新情况有用的杂志有: *West Africa* 和 *Africa*. 现在可能有点过时,一本有关环境的有趣作品是: N. P. Iloeje, *A New Geography of Nigeria* (Lagos: Longman, 1965). J. V. Udoh'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Dilemm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stport: Praeger, 1994) 回顾总结了多种争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参见 Toyin Falola and S. A. Olanrewaju, eds., *Nigerian Transport Systems* (Syracuse: 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 Foreig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Program, African Series XLII, 1986); 有关人口与健康的读物可参见 Toyin Falola and D. Ityavya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in Africa* (Columbus: Monograph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2). 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很多,但多只关注特定族群。关于尼日利亚各地文化实践概况,参见: M. U. Okehie-Offoha and M. N. O. Sadiku, eds.,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Nigeria*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6)。对当代文化的分析,参见: S. Afonja and T. O. Pearce, eds., *Social Change in Nigeria* (Harlow, England: Longman, 1984)。对某些城市的研究,参见: A. B. Aderibigbe, ed., *Lago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frican City* (Lagos: Longman, 1976); A. O'Connor, *The African City* (London: Hutchinson, 1983); and W. Ogionwo, ed., *The City of Port-Harcourt: A Symposium of i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badan: Heinemann, 1979)。有关城市化的研究包括: A. L. Mabogunje, *Urbanization in Nigeri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68); P. O. Sada and J. S. Oguntoyinbo, eds., *Urban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blems in Nigeria*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J. Uyanga, *Towards a Nigerian National Urban Policy*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82)。有关尼日利亚城市发展综述,参见: Toyin Falola, "The Cities," in Y. B. Usman, ed., *Nigeria Since Independence: The Society* (Ibadan: Heinemann, 1989), pp. 213-249。有关尼日利亚的人口情况,参见: *Population Data Assessment in Nigeria* (Benin City: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Nigeria, 1980)。有关内部界限问题,最好的作品是 O. Adejuyigbe, *Boundary Problems in Western Nigeria: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Ile-Ife: University of Ife Press, 1973)。

**第二章**

本历史时期概述可参见: Toyin Falola and Biodun Adediran, eds., *Nigeria before 1800* AD (Lagos: John West, 1986) and Toyin Falola et al., *History of Nigeria: Before A. D. 1800s* Vol. 1 (Lagos: Longman, 1989)。有关各地区的非常专业的专著和期刊文章

较多,书目可参见：Toyin Falol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re-colonial African State, Ibadan, ca. 1830 — 1900* (Ile-Ife: University of Ife Press, 1984)。有关某些文化群体的历史,可参见：D. Forde, *The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Western Nigeria* (London: I. A. I., 1969); M. A. Onwuejeogwu, *An Igbo Civilization: Nri Kingdom and Hegemony* (London: Ethnographica, 1981); and D. C. Ohadike, *Anioma: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gbo Peopl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4)。有关本土宗教,最有价值的作品有：J. S. Mbiti,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New York: Praeger, 1970); and E. B. Idowu, *Olodumare: God in Yoruba Belief* (London: Longman, 1962)。研究性别问题的有：N. Mba, *Nigerian Women Mobilized: Women's Political Activity in Southern Nigeria, 1900 —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David Sweetman, *Women Leaders in African History* (London: Heinemann, 1984); O. W. Ogbomo, *When Men and Women Mattered: A History of Gender Relations Among the Owan of Nigeria*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7); and C. Johnson-Odim and N. E. Mba, *For Women and the Nation: Funmilayo Ransome-Kuti of Nigeria*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有关19世纪的研究文献很多,包括有关约鲁巴战争、伊斯兰革命、尼日尔河三角洲等课题的专著。Toyin Falola and Dare Oguntomisin, eds., *Nige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gos: John West, forthcoming) 综述了各课题上的新进展。一本容易找到的综述作品是 Toyin Falola, et al., *History of Nigeria; Nige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11 (Lagos: Longman, 1991)。有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参见：Toyin Falola and Biodun Adedira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West Africa* (Ile-Ife: University of Ife Press, 1983)。

## 第三章

研究欧洲人向非洲扩张的背景作品有：M. Crowder, *West Afric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Hutchinson, 1968)。一本颇有价值的文献集为：T. Hodgkin, *Nigerian Perspectives: An Historical Antholog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有关基督教扩张的重要著作有：E. A. Ayandel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 1842 —1914: A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 (London: Longman, 1966); J. F. A. Ajayi,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 —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London: Longman, 1965); and F. K. Ekechi,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Rivalry in Igboland 1850 —1914* (London: Frank Cass, 1971). J. H. Kopytoff, *A Preface to Modern Nigeria: The "Sierra Leonians" in Yoruba 1830 —189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是一本非常棒的、研究新精英阶层作用的著作。对探险家的研究有：E. W. Bovill, *Missions to the Niger*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66)。有关贸易和贸易竞争的重要著作有：K. O.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 —18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and R. O. Ekundar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igeria, 1860 — 1960* (London: Methuen, 1973)。一本很好地概述了尼日利亚东部情况的作品是：C. C. Ifemesia, *Nige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Nok, 1978)。

## 第四章

从不同角度研究非洲的殖民分割及非洲人的反应的著作与文章众多。一篇简短的综述是：O. Ikime, *The Fall of Nigeria: The British Conquest* (London: Heinemann, 1977)。论殖民划分格局内幕的一本有用作品是：A. I. Asiwaju, *Partitioned Africans: Ethnic Relations Across Africa's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1884 — 1984* (London: C. Hurst, 1985)。卢加德爵士的传记，可参见 M. Perham,

*Lugard* (London: Collins, 1960)。近期一本研究这一时期尼日利亚英雄的著作为: D. C. Ohadike, *The Ekumeku Movement: Western Igbo Resistance to the British Conquest of Nigeria, 1883 – 1914*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1)。有关文化上的抗争,可参见: J. B. Webster, *The African Churches Among the Yoruba, 1888 – 192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对这一时期的综述,可参见: Toyin Falola, et al., *History of Nigeria: Niger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3 (Lagos: Longman, 1992)。

**第五章**

有关殖民统治的重要概述作品有: F.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1922 and 1965); H. A. Gailey, *The Road to Aba: A Study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Policy in Eastern Niger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0);及 I. F. Nicols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Nigeria 1900 –1960: Men, Methods and Myth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比较研究可参见: C. Young, *The African Colonial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壮大的本土精英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详细介绍教育发展趋势的作品有: A. Fafunw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Nigeri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4), O. Nduka, *Western Education and the Nigerian Cultural Backgrou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and N. Oka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Nigeria* (London: Longman, 1971)。有关殖民政策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可参见: Toyin Falola, ed., *Nigeria and Britain: Exploitation or Development?* (London: Zed, 1987)。

**第六章**

关于民族主义,强烈推荐下列著作: J. S. Coleman, *Nigeria:*

*Background to Na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R. L. Sklar, *Nigerian Political Parties: Power in an Emergent African 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B. J. Dudley,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Northern Nigeria* (London: Frank Cass, 1968); H. I. Bretton, *Power and Stability in Nigeria: The Politics of Decoloniz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62); K. W. J. Post, *The Nigerian General Election of 19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K. W. J. Post and G. Jenkins, *The Price of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d C. S. Whitaker Jr., *The Politics of Tradi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orthern Nigeria, 1946 —196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有关去殖民化时期改革殖民统治的尝试,参见: P. Kilby, *Industrialization in an Open Economy: Nigeria 1945 —196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及 Toyin Falola,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ecolonization in Nigeri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6)。部分民族主义者的传记,可参见: O. Awolowo, *Aw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ief Obafemi Awolow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N. Azikiwe, *My Odyssey: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C. Hurst, 1970); 及 A. Bello, *M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Wogu Anababa'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Africa: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London: C. Hurst, 1979)一书,分析了行会联盟早期对英国统治的影响。

**第七章**

与本章相关的推荐作品有: B. J. Dudley, *Instabi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Politics and Crisis in Nigeria*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73); B. J. Dudley, *Nigeria 1965: Crisis and*

*Criticism*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66); E. O. Awa, *Federal Government in Nigeri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L. Diamond, *Class, Ethnicity and Democracy in Nigeria: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Republic* (London: Macmillan, 1988); A. Adedeji, *Nigerian Federal Finance: Its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Hutchinson, 1969); K. Ezera,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Ni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J. p. Mackintosh, *Niger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6); H. A. Oluwasanmi, *Agriculture and Niger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O. Aboyade, *Foundations of an African Economy* (New York: Praeger, 1966); G. K. Helleiner, *Peasant Agriculture,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igeria* (Homewood, Ill.: R. D. Irwin, 1966); R. Anifowose, *Violence and Politics in Nigeria: The Tiv and Yoruba Experience,— 1960 – 66* (New York: Nok, 1980); and, I. A. Gambari, *—Party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igeria During the First Republic* (Zaria: A. B. U. Press, 1979)。

**第八章**

研究内战时期的著作相当多,观点各异,有些作品与其说是在客观分析,不如说是在抒发感触。推荐作品主要有: O. Eze, *Nigeria-Biafra Conflict: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Basel: University of Basel, 1971); E. W. Nafz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 The Nigerian-Biafran War* (Colorado: Westview, 1983); G. A. Affia, *Nigerian Crisis 1966 – 1970: A Preliminary Bibliography* (Lagos: Lagos University Press, 1971); J. De St. Jorre, *The Nigerian Civil War*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2); O. Ojukwu, *Biafra*, 2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A. Ademoyega, *Why We Struck: The Story of the First Nigerian Coup* (Ibadan: Evans Brothers, 1981); Africa Research Group, *The Other Side of Nigeria's Civil War* (Boston: Africa Research Group, 1970); N. Akpan, *The Struggle for Secession., 1966 —70* (London: Frank Cass, 1971); S. Cronje, *The World and Nigeria: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 1967 —70*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72); F. Forsyth, *The Biafran Story* (London: Penguin, 1969); A. H. M. Kirk-Greene, ed., *Crisis and Conflict in Nigeria: A Documentary Source Book 1966 —69*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A. A. Madiebo, *The Nigerian Revolution and the Biafran War* (Enugu: Fourth Dimension, 1980); N. J. Miners, *The Nigerian Army, 1955 — 66* (London: Methuen, 1971); A. A. Nwakwo, *Nigeria: The Challenge of Biafra* (London: Rex Collins, 1972); O. Obasanjo, *My Command* (Ibadan: Heinemann, 1980); I. Nzimiro, *The Nigerian Civil War: A Study in Class Conflict* (Enugu: Fourth Dimension, 1978); and J. J. Stremlau,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 1967 — 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第九章**

论石油的作品实在已相当可观,质量也不错,但此处只能约略提一些: L. Schatzl, *Petroleum in Nigeria* (Iba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K. Panter-Brick, ed., *Soldiers and Oil: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Nigeria* (London: Frank Cass, 1978); A. A. Ikein, *The Impact of Oil on a Developing Country* (New York: Praeger, 1990)。关于教育方面的变化,可参见: M. Bray,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in Niger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B. Labanji, *Anatomy of Corruption in Nigeria* (Ibadan:

Daystar, 1970)一书抓住了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如何看待腐败的问题。其他有帮助的作品有：G. Williams, *State and Society in Nigeria* (Idanre: Afrografika, 1980); G. Williams, ed., *Nigeria: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ex Collins, 1976); G. J. Apeldoorn, *Perspectives on Drought and Famine in Nigeria* (London: Allen & Unwin, 1981); A. D. Ayida and H. M. A. Onitiri, eds.,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Nigeria* (Iba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及 Dupe Olatunbosun, *Nigeria's Neglected Rural Majority* (Iba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第十章

与本阶段相关的最详尽作品为：O. Oyediran, ed., *Niger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Under Military Rule, 1966—79* (London: Macmillan, 1979)。其他有价值的著作包括：W. I. Ofonagoro and A. Ojo, eds., *The Great Debate: Nigerian Viewpoints 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1976/77* (Lagos: *Daily Times*, n. d.);及 T. O. Odetola, *Military Politics in Nige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78)。Toyin Falola and Julius O. Ihonvbere, eds., *Niger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ist System*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88)一书提供的分析比许多亲军队的书籍更加谨慎。对不同事件的概括总结有帮助的一部作品是：H. Biene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Nigeria* (London: Frank Cass, 1985)。

## 第十一章

研究本阶段的两本权威著作是：R. Joseph, *Democracy and Prebendal Politics in Nig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及 Toyin Falola and Julius Ihonvbere, *The Rise and Fall of Nigeria's Second*

*Republic*, *1979 — 84* (London: Zed, 1985)。推荐一篇相关论文：L. Adamolekun, *The Fall of the Second Republic* (Ibadan: Spectrum Books, 1985)。其他既谈到本阶段也谈到之前阶段的值得注意的作品有：W. Graf, *The Nigerian State* (London: James Currey, 1988); P. Lubeck, *Islam and Urban Labour in Northern Ni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 Kirk-Greene and D. Rimmer, *Nigeria Since 1970*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1); P. N. C. Okigbo,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Nigeria* (Enugu: Fourth Dimension, 1981); T. Forrest, *Politics and Econ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Boulder: Westview, 1995);及 Toyin Falola, ed., *Modern Nigeria* (Lagos: Modelor, 1990)。

## 第十二章

研究20世纪80年代石油工业的一本重量级作品为：P. O. Olayiwola, *Petroleum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ase of Nigeria* (New York: Praeger, 1987); 另可参见：J. K. Onah, *The Nigerian Oil Indust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83) and G. Etikerentse, *Nigerian Petroleum Law* (London: Macmillan, 1985)。预测未来出现危机的作品中，可参见：C. Stevens, *Nigeria: Economic Prospects to 1985*, *After the Oil Glut* (Londo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82)。关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经济所起的作用，可参见：B. Onimode,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frican Debt: The Economic Impact* (London: Zed, 1989);及 M. B. Brown and P. Tiffen, *Short Changed: Africa and World Trade* (Boulder: Lynne Reiner, 1992)。有些著作研究了犯罪形势的恶化，如 A. U. Kalu and Y. Osinbajajo, eds., *Narcotics: Law and Policy in Nigeria* (Lagos: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1990); 及 S. Ekpeyong, "Social Inequalities,

Collusion, and Armed Robbery in Nigerian C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9: 1 (1989), pp. 21 - 34。

## 第十三章

1993年后研究尼日利亚状况的文献在逐渐增多,这里推荐以下几本: P. Williams and Toyin Falola, *Religious Impact on the Nation State*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1995); M. H. Kukah and Toyin Falola, *Religious Militancy and Self-Assertion: Islam in Northern Nigeria*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1996);及 Toyin Falola, et. al., *The Military Factor in Nigeria* (New York: Edwin Mellen, 1994)。

## 第十四章

尼日利亚当前危机的实质在以下作品中有所探讨: C. Ak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D. C., 1996). Stimulating perspectives are offered in O. Obasanjo and Hans D'Orville, *Challenges of Leadership in African Development*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90)及 Toyin Falola, *Violence in Nigeria*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8)。

# 索　　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


**A**

Aaro 阿罗 24

Aba Women's Riot 阿巴妇女暴动 72

Aba 阿巴 78－79

Abacha, Sanni 萨尼·阿巴查 5,13,15－16,192,231;和国家过渡政府 193,195－196;对政变的担忧 197,201,221

Abeokuta 阿贝奥库塔 10,33－34,42,51,55,56,63

Abiola, M. K. O. 阿比奥拉 13,167,190－193,207,217－218,215,231;和阿巴查 201－204

Abubakar, Abdulsalami 阿布杜勒萨拉米·阿布巴卡尔 204,232;和公众印象 205－206;和腐败 208－209;和经济 211－212

Abuja 阿布贾 1,14;创建 155,170,224;和基督徒的反对 169

Aburi 阿布里 121－122

Achebe, Chinua 齐努阿·阿契贝 7,232

Action Group (AG)行动派 91,163;和第一共和国 99－106

Adar 亚达尔 36

Ade, King Sunny 金·桑尼·埃德 7,232

Adebo, Simeon 西米恩·埃德博 232－233

Adua, Yar 雅·阿杜阿 202

Adegbenro 埃德格本卢 104

Afonja 阿丰贾 33

Africa 非洲,尼日利亚与非洲关系 123,146,159,161;第二共和国期间 172

Africa Concern 关爱非洲 124

African Association 非洲协会 39－40

Agades 阿加德兹 36

agriculture 农业 8,10,14,16,126;殖民前 18－20,22,24－25,31,43－44;经济作物 43－44,50－51,75;和殖民主义 54,75,7;和第一共和国 106,108－113;和军人统治 132－134;和生产下降 140,142,144,170－172,210,226;和多样化 142－143;和第二共和国 167;和化肥进口

175,210;和尼日利亚的未来 225 - 226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阿赫玛杜·贝洛大学 118
Ahmadu, Seku 塞库·艾哈迈杜 37
Aja 阿贾 20
Akintola, S.L. 阿金托拉 104 - 106,233
Akinloye, A.M.A. 阿金洛耶 163
Akitoye 阿基托耶 55
Akoko-Edo 阿科科-埃多 119
*Allafin* 阿拉芬 23,56;和殖民统治 71 - 72
Alali 阿拉里 51
Alao, Arisekola 里塞科拉·艾奥 207
Alimi, Mallam 马拉姆·阿利米 33
Alkari 阿尔卡里 71
All People's Party (APP), 全民党 218, 220 - 221
Alliance for Democracy (AD), 民主联盟党 218,220 - 221
Alooma, Idris 伊德里斯·阿卢马 19
Amyanabo 阿曼亚纳博 32
Anambra 阿南布拉
Angola 安哥拉 159,161
animal husbandry 畜牧业 18,25
Apartheid 种族隔离制度 12,159 - 161,172
Aro 阿罗 35,58 - 59
Arochukwu 阿罗丘库 35,58
Asaba 阿萨巴 49,59,64
Aso Rock 阿索岩 204
Association for Better Nigeria (ABN) 尼日利亚更美好协会 190 - 191
Association of West African Merchants (AWAM) 西非商人协会 88 - 89
Atlantic Charter《大西洋宪章》88
Attahiru 埃塔西鲁 60,61
Awolwo, Obafemi 奥巴费米·阿沃洛沃 91,104,123,233 - 234;和第二共和国 162 - 163
Aziwike, Nnamdi 纳姆迪·阿齐克韦 84, 86 - 87, 90, 234; 和第一共和国 100, 105 - 106;和第二共和国 163

B

Babalola, Joseph Ayo 约瑟夫·奥约·巴巴洛拉 234 - 235
Babangida, Ibrahim 易卜拉欣·巴班吉达 12,15,183 - 186,235;反对布哈里政变 183;和 OIC 187 - 188;和向第三共和国过渡 188 - 193
Badagry 巴达格里 40,42,45
Baghirmi 巴吉尔米 36
Balewa, Abubakar Tafawa 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 93, 101, 102, 105 - 106,235
Banza Bakwai 班扎·巴克维 18
Bariba 巴里巴 19
*Basorun* 巴索朗 23
Bauchi 包奇 59;和宗教暴力 188
Bauchi Plateau 包奇高原 25
Bayajidda 巴亚吉达 18
Beecroft, John 约翰·比克罗夫特 53,56
Belgium 比利时 54,124
Bello, Ahmadu 艾哈迈杜·贝洛 101,235
Benin, Bight of 贝宁湾 2,56
Benin, Kingdom of 贝宁王国 3,7,17,18, 20 - 21,22,30,31,34;和殖民征服 60,64
Benin, Republic of 贝宁共和国 2, 20, 45,171
Benue River 贝努埃河 3,17,20

Benue state 贝努埃州 100
Better Life Program for Rural Women 为农村妇女生活更美好 186
Biafra, Bight of 比夫拉湾 2,56
Biafra, Republic of 比夫拉共和国 11,119-126,129,135,146 又见"内战"
Bida 比达 17,59,64
Bilma 比尔马 18
Bini River 比尼河 56,57-58
Biram 比拉姆 18
Blyden, Edward Wilmot 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 82
Bonny 邦尼 20,32,42,46,48,51;对邦尼征服 56,57
Borgu 博尔古 22
Borno 博尔诺 17,27
Borno Youth Movement(BYM)博尔努青年运动 100,101
Boro, Isaac 艾萨克·博罗 125
Botswana 博茨瓦纳 160
Braithwaite, Tunji 滕吉·布雷思韦特 218
Brass(Nembe)布拉斯(内姆比) 20,32,45,51;对其征服 56
Brazil 巴西 32,41,45
Britain 英国 1,21,30,33-35,37-38;对尼日利亚殖民 10;殖民渗透 43,45-46,48-51;对南尼日利亚的征服 54-59;对北尼日利亚的征服 59-60;殖民管理 68-74;和第一共和国 108,110-113,116;和内战 124;和尼日利亚对外政策 146,173,181,213;和戈翁 160
British Petrolem 英国石油(公司) 132
Buhari, Muhammed 穆罕默德·布哈里 12,13,15,180-183,236;和对第二共和国的政变 177
Burmi 伯尔米 59,61
Bussa 布萨 19,40

## C

Calabar 卡拉巴尔 20,32,34,42,46,51;与殖民征服 56;和独立 85,90
Calabar state 卡拉巴尔州 100
camel 骆驼 29-30
Cameroon 喀麦隆 2,49,90,169,173;与尼日利亚的关系 213
Campaign for Democracy民主运动 203,215
Canada 加拿大 214
Cape Verde 佛得角 213
Caritas International (天主教)国际明爱会 124
Carr, Henry 亨利·卡尔 236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160
census 人口普查 103-105,147;与默罕默德 152,156
Center for Democratic Studies 民主研究中心 188-189
Central Bank 中央银行 112-113,209,212
Central Legislature 中央立法机构 69
Chad 乍得 169,173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中华人民共和国 146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Nigeria(CAN)尼日利亚基督教协会 187
Christianity 基督教 7,10,30,31;和传教士活动 40-44,77;新教徒 40;天主教徒 40;循道公会 42;长老会 42;和教育 42-43;和当地精英的产生 43,48;洗礼 43;

和一夫多妻制 43 - 44;和殖民主义 54 - 55;和独立 82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CMS) 正教传教会 41 - 42
civil war 内战 4,11,95,107 - 108,111,119 - 126;和军人统治 126 - 129;和中央集权 129 - 132;未来可能性 226
Clapperton, Hugh 休·克拉珀顿 40
class: middle class 阶级:中产阶级 14,15,43,115;精英 43,47,62,215;精英和殖民征服 73 - 74,77;工人阶级 78,100;精英和独立 81,85,86,89 - 93;工人阶级和独立 87,89;精英和第一共和国 100,108,110 - 113,115 - 119;与内战 129 - 132;精英和军人统治 128 - 134,141;中产阶级和石油财富 138,140,143;财富悬殊 139,186,228 - 229;反精英主义 154;精英和州形成 155;和 SAP 185。另参见 "peasantry"; "unionism"
clientage 依附关系,参见"corruption"
cocoa 可可 142,185,225
Coker Commission 科克尔委员会 104
Cold War 冷战 99
"collaboration""合作" 70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67 - 80;征服 54 - 60;抵抗 60 - 65;崩溃 87 - 93;遗产 125,224;与石油 141。另见 Britain
Committee for National Consensus 国家共识委员会 201
Commonwealth 英联邦 107,124;和尼日利亚对外关系 146,198,212 - 214
communications 通讯 14,214;和殖民统治 67,74 - 75
communism 共产主义 152,159
Compagnie Francais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CFAO)法属西非公司 76
Conference for Nationalities 民族会议 216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刚果民主共和国 213
Constituent Assembly 立宪会议 158,161,168
Constitution Drafting Committee 宪法起草委员会 161
constitution 宪法 4,5,11,154,155;和独立 89 - 93;和第一共和国 95 - 99,108;和危机 119;和军人统治 128 - 132;和戈翁 147 - 148;和第二共和国 161 - 164,165 - 167,172;和阿巴查 200 - 201,217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腐败行为调查局 152
corruption 腐败 12 - 16;和殖民统治 73,82,93;和第一共和国 103,105,108,117;和军人统治 128 - 134;和戈翁 141,147 - 148;和庇护人身份 147,153,185,189,200,229 - 230;和默罕默德 152 - 153;和第二共和国 162,174 - 177;和布哈里 181 - 182;和巴班吉达 183;和阿巴查 196 - 198,200 - 204,212;和阿布巴卡尔 208 - 209;和石油 209 - 212;和奥巴桑乔 221;政治文化 220 - 230。另外参见 electoral fraud; War Against Indiscipline
counterfeiting 伪造货币 181,196
Court of Appeal 上诉法院 98
credit system 信贷制度,和殖民渗透 46 - 48
crime 犯罪 16,79,182,209;和尼日利亚的未来 223,226,229
Cross River 克罗斯河 32,58

Crowther, Samuel Ajayi 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 41,43,236
Cuba 库巴 32,41,45,160
currency 货币 75,111;和石油 139;和 SAP 186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124

D

Dahomey 达荷美 33
*Daily Service*《服务日报》86
*Daily Times*《每日时报》158,190
Daima 代马
Daura 道腊 18
debt, foreign 外债 14,16,112,171 - 172,184,212;与尼日利亚未来 223 - 230
Decree No. 22 第22号法令 197
Degel 德盖尔 36
Democratic Advanced Movement(DMA)民主进步运动 218
Democratic Party of Nigeria 尼日利亚民主党 201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 4,12,13;与殖民统治 72;和独立 85,86,88,91;和第一共和国 101,102;和军人统治 131 - 132;和戈翁 147 - 148;和第二共和国 151,173 - 177;和地方政府 156;和布哈里 179 - 181;和巴班吉达 189 - 193;和阿巴查 200 - 204;和阿布巴卡尔 215 - 220;和尼日利亚政治文化 220 - 222,223 - 230
demography 地理 3 - 4,22,60;人口密度 4,20;人口迁移和殖民统治 75,78 - 79;人口迁移和内战 120 - 124。另外参见 urbanization
Denham 德纳姆 40
Development 13 - 16,76 - 77;和第一共和国 99 - 100,108,110 - 113;和军人统治 132 - 134;和戈翁 147;和穆罕默德 155;和第二共和国 166;和巴班吉达 186
Development Plan, Second National 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 139
Development Plan, Third National 第三个国家发展计划 159
Dike, Kenneth O. 肯尼思. O. 迪克 236 - 237
Dikko, Umaru 乌马如·迪科 181
Dipcharima, Zana Bukar 扎纳·布卡尔·迪普卡利马 113
Directorate for Food, Roads, and Rural Infrastructure(DFRRI)粮食、道路和农村基础设施到董事会 186
Dosumu 多苏姆 245
drug trafficking 毒品贩卖 16,175,186,209,214,229

E

Ebira 埃比拉 19
Ebonyi 埃博尼州 214
ECOMOG 西非维和部队 213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ECOWAS)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146,161,172 - 173,213,230
economy 经济 8 - 9;非正规部门 8,79,170 - 171;前殖民时期 25 - 27,34,44 - 45;与殖民统治 74 - 80;与第一共和国 110 - 113;与内战 125;与石油 137 - 140,209 - 212;与衰落 143 - 145,158 - 159,170 - 172,180 - 183;与多样化 161,170;和第二共和国 170 - 172;和布哈里

179 - 183；和 SAP 189；和阿布巴卡尔 209 - 212。另外参见 agriculture；industrialization；oil；trade

Edo 埃多 3,5,21

education 教育 6,9,14；伊斯兰 8,19,28,37 - 38；西式教育 10,42 - 43,48；大学 14,77 - 78,84 - 86,91 - 92,139 - 140,168；教育的衰败 212

Efik 艾菲克语 5,32

Egba 埃格巴 33 - 34,41,48

Egbe Omo Oduduwa 埃格博·奥莫·奥杜杜瓦 91,218

Egypt 埃及 18

Ekandem, Dominic 多米尼克·埃坎德姆 237

Ekiti 埃基蒂 63

Ekumeku 埃库梅库人 60 - 62

Ekwueme, Alex 亚历克斯·埃库乌米 163,219

electoral fraud 选举舞弊 105 - 106,173 - 177；与巴班吉达 191 - 193；和阿巴查 201 - 204；和奥巴桑乔 221 - 222

Elem Kalabari 新卡拉巴里 51；对其征服 56,57

Elias, Taslim. O. 泰斯林·O. 伊利亚斯 237

Enahoro, Anthony E. 安东尼·E. 埃纳霍罗 92,238

energe, 能源 140；短缺 158

Enugu 埃努古 3, 69, 78, 79, 91, 117, 129,214

environment 环境 4,142；与干旱 144；与石油 199 - 200,210 - 211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几内亚 161

Eso 埃苏，古代奥约国的军队 23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53,87,124

ethnicity 种族 4,11,13,36；与暴力 4,192 - 193；与殖民统治 74；与独立 86 - 87,89,91,93；少数 99,156,217；和第一共和国 102,107 - 110,116 - 119；和内战 119 - 126；和军人统治 131,192 - 193；少数民族和石油 137,157,199 - 200,206,210；和第二共和国 167；和巴班吉达 190 - 192；和阿巴查 197；与政治 207；和尼日利亚的未来 224 - 227。另外参见 Ibbio；Ijo；Itsekiri；Ogoni；Tiv

Europe 欧洲 76；和殖民前的尼日利亚 20,28,30 - 32,33 - 35,38；和殖民争夺 44 - 48,50 - 51；和石油 137；和尼日利亚的关系 146；东欧 172；西欧 173,180；与毒品交易 186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146；与尼日利亚的关系 198,214

Ewe 埃维 20

Eweka 埃维卡 21

Ewuare 埃乌阿 21

Executive Council 行政会议 69,90,92

exploration 探险 39 - 40,48,62

F

Fadlalah, Rabih 拉比赫·法德拉拉 37,60

Falae, Olu 奥卢·法莱尔 219,221

family 家庭 6 - 7,24

Federal Electoral Commission(FEDECO) 联邦选举委员会 162 - 164,176 - 177

Federal Executive Council 联邦行政委员会 127 - 129

Federal Parliament 联邦议会 91

federalism 联邦主义 129－132;联邦主义的未来 219－222,223－230。另外参见 states, creation of

Fernando Po 费尔南多波 53

Festival of African Arts and Culture (FESTAC)非洲文化艺术节 12,148,152,159,161

First Republic 第一共和国 10－11,127;建立 95－98;与政治争夺 99－106;垮台 115－119,125;与第二共和国的联系 162,164,165－166

fishing 渔业 25,112

Fodio, Uthman dan 奥斯曼·丹·福迪奥 35－37

food 粮食 8,14－15,31;短缺 144－145,168,182,202,210;和价格 158;和进口 171－172,225;和 SAP 184－185。另参见 agriculture

Ford, Gerald 杰拉尔德·福特 160

foreign policy 对外政策 12,28,42;与殖民国家的建立 41,45,49－50,54－61;和内战 121－122,124;和戈翁 145－146;和军人统治 159－61;和阿巴查 195－196;和阿布巴卡尔 205,212－225。另外参见 Africa, Nigerian relations with

France 法国 5,6,30,37;与殖民争夺 45,48,54,56,60;和内战 123－124;和石油 138;和尼日利亚的关系 146,173

Freeman, Thomas Birch 托马斯·伯奇·弗里曼 41

Fulani 富拉尼族 33,35－37

Fulfulde 富尔富尔德语 5

**G**

Gabon 加蓬 123

Gallwey 加尔韦 58

Garvey, Marcus 马库斯·加维 84

Gayya 加雅 24

Gazargamu 加扎加姆 29

gender 性别 186

geography 地理 1－4

Germany 德国 37;和殖民争夺 48,49,53,54,56,60;与尼日利亚的关系 173

Ghaddafi, Moumar 穆阿迈尔·卡扎菲 169,173

Ghana 加纳 57,84,87,121

Gobir 戈比尔 18,19,35－36

gold 黄金 29,76

Goldie, George Taubman 乔治·陶布曼·戈尔迪 49－51

Gombe 贡贝 59

Gowon, Yakubu 雅库布·戈翁 11,12,95,137,238;和内战 119－126,128－130;和石油 141,145－149;反响 148－149;和政变 160

Grassroots Democratic Movement 草根民主运动 201

Great Nigeria People's Party(GNPP) 大尼日利亚人民党 162－163,167

Gudu 古杜 36

Guinea Bissau 几内亚比绍 213

Guinea, Gulf of 几内亚湾 137

Gumi, Abubakar 阿布巴卡尔·古米 148

Gwandu 关杜 59

Gwari 瓜里 18

## H

Haiti 海地 32,123
harbors 港口 75
Hausa 豪萨 3,5;前殖民时期 18,24,28,33,36;和殖民征服 60,63;和殖民统治 73;和文化 169
Hausa Bakwai 豪萨·巴克韦 18
Hausa-Fulani 豪萨-富拉尼 10,119
health 卫生 9,43;与殖民统治 78;与军人统治 134;和第二共和国 168;下降 211-212
Heweti 休伊特 56
Hijra 希吉拉
horses 马 19,29,30
House of Chiefs 酋长院 98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 92
Houses of Assembly 州众议院 69
Human rights 人权 12,44,51;和殖民征服 57-58;和军人统治 131-132,152;和第二共和国 174-177;和阿巴查 197-204;和尼日利亚的未来 223-230
Human sacrifice 人祭 57,58

## I

Ibadan 伊巴丹 33,42,91;与殖民征服 56,60,63;和殖民统治 72,78
Ibadan, University of 伊巴丹大学 207
Ibiam, Francis Akanu 弗朗西斯·阿卡努·伊比亚姆 238-239
Ibibio 伊比比奥 3,5;前殖民时期 23;与殖民征服 58
Ibo State Union 伊博国家联盟 100
Ibrahim, Waziri 瓦齐里·易卜拉欣 162-163
Idoma 伊多马 5,19
Igala 伊加拉 19
Igbo 伊格博人 3,4,5,7,10,217-218;前殖民时期 20,23-24,35,42,46;和殖民征服 58,60-61;和殖民统治 67;和独立 83,86,91;和政变 116-119;和内战 119-126;和第二共和国 167
Igbo-Ukwu 伊格博-乌库乌 9,17,18
Ige, Bola 博拉·伊盖 219
Ijaye 伊贾耶 33
Ijebu 伊杰布 33-34,48;与殖民征服 55-56,57,60,63,64
Ijebu-Ode 伊杰布-奥德 55-56
Ijesa 伊杰萨 63
Ijo 伊乔 3,32;与抗议 199
Ikeja 伊凯贾 110
Ikoku, Alvan 阿尔万·伊科库 239
Ikoli, Ernest 欧内斯特·伊科利 84,239
*Ilari* 伊拉里 23
Ile-Ife 伊莱-伊费 7,9,17,18,20,33,91
Ilesa 伊莱沙 42
Ilorin 伊洛林 33,37,59,119
Immigrants, expulsion of 驱逐移民 173
Imo River 伊莫河 51
Imoudu, Michael 迈克尔·伊姆杜 82-83,239-240
independence, Nigerian 尼日利亚独立 10,14,95;独立动议 43,82-88,90-93
Independent National Electoral Commission (INEC) 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 216,218
India 印度 70,87,214
indigenous religions 土著宗教 7,35,40,42,44;与殖民抵抗 61-62

inderct rule 间接统治 67 – 74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44 – 45,64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8,126;前殖民时期 24,46 – 48;与殖民征服 62;和殖民统治 74 – 76;和第一共和国 110 – 113;和石油 140;和本土化 140,141 – 142,159;和技术 159;衰落 170 – 172,182,209 – 210,212
inflation 通货膨胀 8,14,15,16,113;和军人统治 132 – 133,158,184;和石油 144,149;和第二共和国 170,172;和 SAP 184,186;和阿巴查 196,200;和阿布巴卡尔 210,212;和尼日利亚的未来 225
Interim national Government(ING) 国家过渡政府 13,193,195 – 19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5,112,171,173;和巴班吉达 184,189;和阿布巴卡尔 214
Iran 伊朗 169
iron 铁 25,46
Ironsi, Aguiyi 阿圭伊・伊龙西 11,116 – 119,126,128,233
Islam 伊斯兰教 7;在殖民前的尼日利亚 19,20,22 – 23,28,30,32,35 – 37;和基督教 41,42;对殖民主义的抵抗 59 – 61;与殖民统治 70 – 71,73 – 74;和独立 91
Isoko 伊索科 23
Israel 以色列 7,123;和尼日利亚的关系 172 – 173
Italy 意大利 54,87
Itsekiri 伊特塞基里 51;征服 56,57 – 58,63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 123
Iyalode 伊亚洛德 245

**J**

Jackson, John Payne 约翰・佩恩・杰克逊 83
Jaja 贾贾 35,51,57
Jama'atu Nasril Islam(JNI)伊斯兰促进会,尼日利亚最大的伊斯兰教组织 187
Jam'yyar Mutanen Arewa(JMA)北方人民协会 100
Japan 日本 214
Jebba 杰巴 59,61
jihad 吉哈德,伊斯兰圣战 35 – 38
John Holt and Co. 约翰・霍尔特公司 76
Johnson, James 詹姆斯・约翰逊 43
Johnson, Samuel 塞缪尔・约翰逊 240
Johnston, H. H. 约翰斯顿 57
Jos 乔斯 3,79,88
Jos Plateau 乔斯高原 17,25,75 – 76
Jukun 朱昆 19
Juju 居居音乐

**K**

Kabba 卡巴 119
Kaduna Mafia 卡杜纳黑手党 147
Kaduna 卡杜纳 69,78,117,160;与宗教暴力 188
Kafanchan 卡凡钱 78
Kalabari 卡拉巴里 3
Kanem-borno 加涅姆-博尔努 3,18,19,22,28,30,37,40;与殖民征服 59 – 60
Kanemi, al-加涅米 37,60
Kano 卡诺 18,19,28,29,30;和殖民征服 59,60;和宗教暴力 168 – 169,188
Kano, Aminu 阿米努・卡诺 91,101,240 – 241;和第二共和国 163

Kano People's Party(KPP) 卡诺人民党 101
Katsina 卡齐纳 18,19,28,29,30
Kebbi 克比 18,19
Khomeini, Ayatollah 阿亚图拉·霍梅尼 169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160
Kontagora 孔塔戈拉 59
Kosoko 科索科 42,55
Kukawa 库卡瓦 60
Kurunmi 库伦米 34
Kuti, Fela Anikulapo 费拉·阿尼库拉珀·库蒂 7
Kwararafa 夸拉拉法 18

## L

labor 劳工 13,15
Lagos 拉各斯 1,10,30,34,42,45-46,51,96,110,117,129,160;征服 53,54-55,62;殖民统治 69,75,78;和独立 85,87,90;作为首都 151;和第二大港口 158-159
Lagos Colony 拉各斯殖民地 56,68,84
Lagos Plan of Action 拉各斯行动计划 172-173
Lagos Town Council 拉各斯城市议会
*Lagos Weekly Record*《拉各斯每周要闻》83,85
Lambo, Thomas 托马斯·兰博 241
land 土地 24-25,79,85,158
Lander Brothers 兰德兄弟 40
language 语言 5-6,10,28,31,43,96;和殖民统治 67,73,77-78
law 法律 1,5;和殖民统治 67-74;和军人统治 131-132。另外参见 constitution;Shari'a
Lawson, C.O. 劳森 127
Lebanon 黎巴嫩 76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委员会 84-86,90
Legislative House Powers and Privileges Act《立法院权力及特权法案》97
Liberia 利比里亚 10,53,87,124
Libya 利比亚 169
Liquid Natural Gas Project 液化天然气项目 198
Lokoja 洛科贾 3,59
Lugard, Frederick 弗里德里克·卢加德 60,68-74,77,241

## M

Macaulay, Herbert 赫伯特·麦考利 84,90,241-242
Macina 马西纳 36
Macpherson, John 约翰·麦克弗森 92
Mahdi 马赫迪 37,61,187
*Mai* 玛伊 22-23
Maiduguri 迈杜古里 88
Maitatsine riots 麦塔特斯尼暴动 15,168,175
Mandara 曼达拉 61
Mandela, Nelson 纳尔逊·曼德拉 213
Marwa, Muhammad 穆罕默德·马尔瓦 169
Mecca 麦加 7,19,28,59
Middle Belt 中部地带 3,7,10;前殖民时期 18,19,23,37,50;和基督教 42;和殖民征服 59-60
Middle East 中东 28,29,137
Midwest Democratic Front (MDF)中西部民主阵线 101

military 军人 1,11,15;和政变 10-13,15,141,149,177,183;在殖民前的尼日利亚 20,22-23,32-33,40;和殖民征服 55-65;和对殖民主义的抵抗 56,57,59-65;和技术 64-65;和第一共和国 95,110-111,115-119;和内战期间的统治 126-132;和石油 141,144;和开支 144,158;重组 146-147;和默罕默德政变 151-152;裁军 152;和宪法批准 162;和布哈里政变 177;和巴班吉达政变 183;和阿巴查 197-198,202;和尼日利亚的未来 226-230;政治文化 226-228

Mines and Power, Ministry of 矿产和电力部 142

mining 矿业 3,8,24,25,54,126;和殖民统治 69,75-76,79;在尼日利亚后殖民时代 130;和税收 157

minorities 少数民族。参见 ethnicity

Mobil 美孚石油公司 140,198,210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62,65;和殖民统治 71,74;和独立时期 81;和第一共和国 107

Mohammed 默罕默德 36

Mohammed, Murtala Ramat 穆尔塔拉·拉马特·默罕默德 11,12,137,242;和反对戈翁的政变 149,151;和反腐败运动 152-53;被刺杀 152;和内政改革 153-154;和政府改革 155-158

monarchy 君主制 19-23,33-34

Monguno, Shettima 谢蒂马·蒙古诺 242

Mosque, National 国家清真寺 169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MDS)民主与社会正义运动 218

Movement for Mass Mobilization for Self Reliance and Economic Recovery (MAMSER) 自力更生和经济复兴全民动员运动 186,188-189

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 (MOSOP) 奥戈尼人生存运动 199

## N

Namibia 纳米比亚 172

Nana 纳纳 35,51,57-58

National Accelerated Food Production Program 国家加速粮食生产运动 145

National Africa Company (NAC)国民非洲公司 49

National Assembly 国民大会 165

National Center Party of Nigeria 尼日利亚国家中间党 201

National Congre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 83-84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国家制宪会议 201

National Council for Inter-government Relations 政府间关系国家委员会 189

National Council of Nigeria and the Cameroons (NCNC)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党 90,91,93,126,163;和第一共和国 99-106

National Democratic Coalition (NADECO) 全国民主同盟 203

National Drug Law Enforcement Agency 全国毒品法执行处 186

National Electoral Commission 全国选举委员会 191-192

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

(FLN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 159-160
National Party of Nigeria (NPN)尼日利亚国民党 11,12,14
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 国民共和党 189
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 (NSM)全国团结运动 218
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 (UNITA)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 159-160
National Union of Nigerian Students 尼日利亚全国学生联盟 159
National Youth Service 全国青年服务社 140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3,54,77,80
Native Administration 土著政府 69,71,73,82,90-91,100,156
Native Baptist Church 土著浸礼会 43
Native Court 土著法院 71
*Negro World*《黑人世界》84
Netherlands 荷兰 30,124
*New Nigerian*《新尼日利亚人报》158,190
Niger 尼日尔 124,169
Niger-Benue 尼日尔-贝努埃 19,40
Niger Coast Protectorate 尼日尔海岸保护领 57
Niger Delta 尼日尔河三角洲 3;前殖民期间 20,27,30-32,34,35,42,45,48,50-51;探险 39-40;征服 53,55-58,62,63-64;尼日尔河三角洲独立国 125;和军人统治 132;和石油 137,199-200,206,210
Niger Mission 尼日尔传教团 41,43
Niger River 尼日尔河 3,17;前殖民期间 20,49;探险 39-40
Nigerian Council 尼日利亚议会 68-69,90
Nigerian Labor congress 尼日利亚劳工大会 158
Nigerian National Alliance 尼日利亚民族联盟(NNA) 105-106
Nigerian National Council 尼日利亚国民协会 90
Niger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NDP)尼日利亚国家民主党 84,86
Nigerian National Oil Company (NNOC) 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 142
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NNPC) 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142,209
Nigerian Peoples Party (NPP)尼日利亚人民党 162-163,167
Nigerian Youth Movement (NYM)尼日利亚青年运动 85-86
Nok 诺克 10,17,18,19
non-aligned movement 不结盟运动 146,172
North Africa 北非 3,19,28-30,40
Northern Elements Progressive Union (NEPU)北方进步联盟 91,101,105
Northern House of Assembly 北方代表大会 101
Northern Nigeria 北尼日利亚:和殖民统治 70-71;和独立 89,92-93;和地区紧张局势 116,191
Northern Nigeria, Protectorate of 尼日利亚北部保护地 59-60,69
Northern Peoples' Congress (NPC)北方人民大会党 91,93,167;和第一共和国 99-106,109
Nupe 努佩 18,19,33,59,61,64

Nzeogwu, Patrick Chukwuma 帕特里克·丘克乌玛·恩泽奥古 11,116,242

**O**

Oba 奥巴 21,71
Obasanjo, Olusegun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 11,12,137,219 - 221,242 - 243;与反对默罕默德的政变 151;与美国的关系 160;与军人的印象 164;和阿巴查 202
Oduduwa 奥杜杜瓦 20
*Ogboni* 奥格博尼 23
*Ogiso* 奥奇索 21
Ogoja state 奥戈贾州 100
Ogoni 奥戈尼 199
oil 石油 8,11,12,14 - 16,112,122,126;和内战 130 - 134;与经济增长 137 - 140,161;石油生产 138 - 139;提炼 140 - 141;与技术 142;与裙带关系 153,188,198 - 200;和少数民族 137,157,198 - 200,206,210;和第二共和国 170;和 SAP 183 - 186;和尼日利亚的未来 222,223 - 230
Oil Minerals Producing Development Commission 石油矿产生产发展委员会 210
Oil Rivers 油河 40,46,56 - 67
Oil Rivers, Protectorate of 油河保护地 56 - 57,58
Ojukwu, Odumegwu 奥杜梅古·奥朱古 119,122 - 126,217,243
Oke-Odan 奥凯-奥丹 33
Okigwe 奥基圭 17
Okrika 奥克里卡 32,56
Oluwei,Omu 奥姆·奥卢维 245
Oluwole,Aduni 阿杜尼·奥卢沃莱 245
Ondo state 翁多州 177
Onosode, gamaliel 加马利亚·奥诺索德 219
OPEC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欧佩克(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14,138,173
Operation Feed the Nation 养活国民行动 145
Opobo 奥波博 35,51,56,57,64 - 65
oral tradition 口头传说 18,20,21
Oranyan 奥兰延 23
Order of Blood Men 歃血兄弟社 51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非洲统一组织 124,160,172 - 173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 (OIC) 伊斯兰会议组织 187 - 188
Osomari 奥索马里 245
Ovonramwen 奥翁拉姆文 64
Owome (New Calabar)奥沃弥(新卡拉巴尔) 32
Oyo (city) 奥约(城) 56,62,71 - 72;和殖民统治 71 - 72
Oyo, Kingdom of 奥约王国 3,20,22,23,33,37,40,42,56;崩溃 37,63
Oyo state 奥约州 177
*Oyomesi* 奥约姆西 23
Ozolua 奥祖鲁亚 21
Owe 欧维 24

**P**

pacification 和约 67 - 68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 18,172
palm produce 棕榈油生产 18,34,46,50 -

51,57,75,225
Pan-Africanism 泛非主义 82,87
Park, Mungo 芒戈·帕克 40
parliamentary system 议会制度 95 - 99
patriarchy 父权制 6
pawnship 当铺 50
peanuts 花生 142,225
peasantry 农民 14,50,60,75,90,186;和第一共和国 106,110,112 - 113;和第二共和国 171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PDP)人民民主党 218,220 - 221
People's Redemption Party (PRP) 人民救国党 163,167,176,218
People's Union 人民联盟 83
pidgin 皮钦语,混杂语 5,31
pilgrimage 朝圣 28,29
Poland 波兰 161
police 警察 69,71,73,93;和第一共和国 106 - 107;和军人统治 131 - 132;和第二共和国 174 - 177;在阿巴查统治下 197;和腐败 209
Political Bureau 政治局 188
polygyny 一夫多妻制 6,24,43 - 44,82
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 (MPLA)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159 - 160
Port-Harcourt 哈科特港 75,78
Portugal 葡萄牙 21,30,46,54,123
Presidential Strike Force 总统突击队 197,206
Progressive Parties Alliance 进步政党联盟 176
propaganda 宣传 123 - 126
Public Complaints Commission 公众投诉委员会 152

**R**

racism 种族主义 82 - 87
Rano 腊诺 18
Ransome-Kuti, Beko 贝科·雷桑-库提 216
Ransome-Kuti, Olufunmilayo 奥卢芬米拉约·雷桑-库提 243 - 244
Red Cross 红十字会 124
Reform Club 改革俱乐部 83
Regional Assemblies 地区代表大会 90
Regional Houses of Assembly 地区议会 91
regionalism: 地区主义, and colonial rule 和殖民统治 69;和独立 86 - 87,91 - 93;北方 96,119 - 120;东部 96,100,105,119 - 126,129;西部 96,100,103 - 105,115,119 - 122,126;和第一共和国 98 - 99,102;中西部 104 - 105,119 - 120,126;和政变 117 - 119;和第二共和国 166 - 167;和巴班吉达 190 - 192;和阿巴查 202;与尼日利亚的未来 226 - 228
religion 宗教 5,7,223;前殖民时期 24 - 25,40 - 44;和政治 108 - 110,168,190,227 - 228;与暴力 168 - 169,175,180,187 - 188;原教旨主义 187;和巴班吉达 190;与尼日利亚的未来 226 - 228
revolutions 革命 32 - 38
Richards Constitution 理查兹宪法 90 - 92
Rivers state 河流州 100
Robertson, James 詹姆斯·罗伯逊 102
Romania 罗马尼亚 161
Royal Niger Company (RNC)皇家尼日尔公司 48 - 51,56,59 - 62,64

rubber 橡胶 185

S

Sahara Desert 撒哈拉沙漠 4,29
Salt 食盐 25,46
Sango 桑戈语 20
*Sardauna* 萨杜纳(战争领导人) 101,235
Saro-Wiwa, Ken 肯·萨罗-威瓦 199,213
Satiru 萨蒂鲁 60,61
Second Republic 第二共和国 11 - 12;过渡期 159,161 - 164;与宪法 165 - 167;危机 167 - 172;和对外政策 172 - 173;垮台 173 - 177
Sefawa Dynasty 塞法瓦王朝 19,22,37
Shagari, Shehu 谢胡·沙加里 11,244;和第二共和国 163,167,177;与对外政策 172 - 173
Shari'a 沙里亚法 5,7,19,28,228;与殖民统治 70;和第二共和国 168
Shari'a Court of Appeal 沙里亚上诉法院 98
Shell 壳牌石油公司 132,140,198 - 200
Shell D'Arcy 壳牌达西公司 141
Shell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PDC) 壳牌石油发展公司 141
Shonekan, Ernest 欧内斯特·肖内坎 13,193,195 - 196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10,41,45;尼日利亚维和 198,213
slavery 奴隶制 24,40 - 41,47,50 - 51;废除 44 - 45,54 - 55
smuggling 走私 170,172,175,196,209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 社会民主党 189
Socialism 社会主义 99 - 101,104,180
Societe Commerciale de l'Ouest Africain (SCOA)西非贸易公司 76
Sokoto Caliphate 索科托哈里发帝国 35 - 37,59 - 61,63
South Africa 南非 123,159 - 161; 与尼日利亚关系 213 - 214
Southern Nigeria 南尼日利亚 83,92 - 93,116,156;和巴班吉达 191 - 193;保护地 68 - 69,84
Soviet Union 苏联 87,88,124; 与尼日利亚关系 146,160,180
Soyinka, Wole 沃尔·索因卡 7,244 - 245
Spain 西班牙 46,54
States 州,建立 11,21 - 24,120,122,129;与戈翁 139,147 - 148;与默罕默德 151,155;与第二共和国 161;与尼日利亚的未来 227 - 228
States Local Government Edicts 州地方政府法令 156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结构调整计划 (SAP) 15,183 - 186,189
students 学生 13,15;与独立 83,85 - 86,89;和抗议 118,148,159,207;和阿巴查 203 - 204。参见:National Union of Nigerian Stutents
Sudan 苏丹 59,70
Supreme Council for Islamic Affairs 伊斯兰教事务最高理事会 187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 68,98,121
Supreme Military Council 最高军事委员会 121,127 - 132

T

Taghaza 塔加扎 29

Tanzania 坦桑尼亚 123
Taraba River 塔拉巴河 17
Tarka, Joseph 约瑟夫·塔卡 245
taxation 税收 69,72,74,75,79－80,83,100;和军人统治 130,133;和联邦政府 157;和第二共和国 167
Taylor, J. C. 泰勒 41
technology 技术 19,64－65,75－76;和石油工业 142;和工业化 159
Third Republic 第三共和国 165; 过渡 188－193,195－196
Tinubu 提努布 245
Tiv 蒂夫 19,59－60,74,99,115
Tofa, Bashir 巴希尔·托法 191－192
Togo 多哥 171
Trade 贸易 3;跨撒哈拉贸易 10,19,27,28－30,37;奴隶贸易 10,29,30－32,34,40－41,44－45,50－51,54－55;长途贸易 20,27,38;前殖民时期 19,21－24,26－27,32,44－49;"合法贸易"41,44－46,50－51,53;国际贸易 50－51,57,111－113,124,211;和殖民征服 56－60,63－64;和殖民统治 74－76;和独立 88－89;贸易赤字 171－172,212
transportation 运输 3,8;船运 47－48,76;铁路 68,74－76,78－79;和殖民统治 74－75,83;陆路 75－76,79,211;增长 140;下降 210－211
Trinidad 特立尼达岛 32
Tripoli 的黎波里 30
Tsetse fly 萃萃蝇 3,22
Tutuola, Amos 阿摩斯·图图奥拉 7

U

"Udoji Award""乌杜季奖" 144
Umar, Al-Haji 哈吉·欧麦尔 37
Umeadi, Philip 菲利普·乌米爱迪 163
unemployment 失业 15,16,79,82－83;和军人统治 134,183;和第二共和国 170,172,175;和 SAP 186;和阿布巴卡尔 210;与尼日利亚的未来 223,225－226
Unification Decree《统一法令》118
unionism 工会主义 78;与独立 82－83,87,89,90－91;和第一共和国 100;和军人统治 131;与石油 141;压制 158;和第二共和国 163－164;和阿巴查 202－203;和阿布巴卡尔 206,210
United Africa Company (UAC)非洲联合公司 49,76,88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UDP)统一民主党 218
United Middle Belt Congress(UMBC)中部联合大会党 101,105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88,159,213－224
United Nigeria Congress Party(UNCP)尼日利亚统一大会党 201,217
United Nigeria Independence Party (UNIP)尼日利亚联合独立党 101
United Peoples Alliance 统一人民联盟 217
United People's Party (UPP) 统一人民党 104－105,218
United Progressive Grand Alliance (UPGA)联合进步大联盟 105－106
United States 美国 40－41,45;和独立 86,88;和内战 124;与尼日利亚的关系 146,160,161,173,180,213－224;与毒品交易 186;和石油 210
Unity Party of Nigeria (UPN)尼日利亚统一党 162－163,166－167,173,176－177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普及初等教育 158,167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5,15,22,33,226;和殖民统治 75.78 - 79;和独立 83;和石油 137,144;和第二共和国 171,175;和 SAP 184 - 185
Urhobo 乌尔霍博 23
Useni, Jeremiah 杰里迈亚·乌塞尼 206,208

V

violence 暴力 13,30 - 32,50,219;和独立 91,93;和第一共和国 99,102,103 - 105,107 - 110,115 - 119;和第二共和国 168 - 169,176 - 177;和巴班吉达 184,192;作为文化 229。参见: civil war; religion, and violence
Vision 2010 遥想 2010 16,200,210

W

Wallace-Johnson, I. T. A. 华莱士-约翰逊 87
War Against Indiscipline (WAI)向无纪律宣战 15,182
"Warrant Chiefs""委任酋长" 72
Warri 沃里 31,221
West Africa 西非 28,35,45,138,213
West African Court of Appeals 西非上诉法院 84,85
West African Frontier Force 西非边防军 59,63
*West African pilot*《西非舵手》86
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 (WASU)西非学生联盟 83,89
Western culture 西方文化 73,78,80,108;对其抵制 169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4,139,171,173,214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67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76,77,81,87 - 93

Y

Yaba Higher College 亚巴高等学院 77,85 - 86
Yauri 亚乌里 18
Yelwa 耶卢瓦 61
Yoruba 约鲁巴 3,4,5,10,119,217;前殖民时期 18,19,21,24,32,34,48;和殖民征服 55,60,63 - 65;和内战 55 - 56,123;和殖民统治 67,71 - 72;和独立 83,91;和第二共和国 167;和巴班吉达 191 - 193;和阿巴查 203 - 204
Yusuf, Mohammed 穆罕默德·优素福 218

Z

Zakzaky, Ibrahim El- 易卜拉欣·泽科泽基 187
Zambia 赞比亚 123,160
Zamfara 赞法拉 18
Zangon-Kataf 赞贡-卡塔夫 188
Zaria 扎里亚 18,19,28,65,118
Zikist movement 齐克分子运动 90 - 92
Zimbabwe 津巴布韦 161,172